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現代性的經濟想像：市場觀念在西方論述中的歷史與
知識轉折

The Economic Imaginary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and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ket Concept in
the Western Discourses

吳鴻昌

Hong-Chang Wu

指導教授：葉啓政 博士

Advisor: Chin-Chun Yeh, Ph. D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July, 2012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現代性的經濟想像：
市場觀念在西方論述中的歷史與知識轉折

本論文係吳鴻昌君(D91325005)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完成之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1 年 7 月 31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指導教授)

(簽名)

吳鴻昌

高志宇

吳勇厚

陳惠華

湯志偉

謝辭

一個博士論文的完成，真的必須感謝許多人的幫助。

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我必須感謝指導教授葉啓政老師長期以來在社會理論方面的訓練，特別必須感謝在論文最後時間的壓力下，老師對於我所提供的幫助與包容。其次，我也必須感謝曾經擔任與現任口試委員的高承恕老師、顧忠華老師、吳泉源老師、湯志傑老師、林端老師、吳惠林老師，在論文的不同階段，對於論點的釐清與書寫上的提醒。接著，我也必須感謝在台大社會系十多年來教過我或合作過的所有老師，何明修老師、林國明老師、林瑞穗老師、林端老師、林萬億老師、柯志哲老師、范雲老師、孫中興老師、張志銘老師、陳東升老師、曾嬿芬老師、賴曉黎老師、薛承泰老師，無論是在課堂的專業訓練、社會學課程的助理工作與研究計畫的助理工作等方面，這些老師們的提攜照顧與經驗分享，都直接或間接的對於論文產生了幫助。此外，我也必須感謝中研院的王甫昌老師、汪宏倫老師、柯志明老師、張茂桂老師、陳志柔老師、鄭陸霖老師、謝國雄老師，諸位老師的教學熱誠，豐富了我在社會所博士班的專業訓練。

此外，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並不是一句陳腔濫調。在論文的完成過程中，我也必須感謝林峰燦學長、蔡博方學弟，長期以來在社會學方面的討論與互相鼓勵，不少論文中的相關論點必須歸功於他們的啟發。至於，博士班階段的學長姐、同學與學弟妹，林文凱學長、維中、定綱、中麒、美琪、兆勇、薰璇與育誠學弟，以及諸多曾經遭到我荼毒的學弟妹們與學生，感謝你們在不同階段裡的相處與陪伴，使得漫長難熬的博士生涯，增添了許多的樂趣。

最後，我也必須感謝我的親密伴侶韶君，謝謝妳豐富了我的生命，並且有耐心地陪我度過兵役與博士論文的關卡。同時，我也必須感謝爸、媽與哥長期以來的支持與鼓勵，沒有家人的陪伴，論文的完成將是不可想像的。



摘要

本論文是以絕對化市場觀念(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的發展歷程作為研究主題。其主要的核心問題是：為何在現代性的進程中，西方會發展出“去鑲嵌的”(disembedding)經濟想像，並以單一且自律的市場觀念(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表述之？為何在這個過程中，市場觀念也逐漸地變得越來越去歷史化、去社會化、去制度化、本質化與絕對化？針對此一問題，本文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市場觀念的演進，不僅涉及現代性底下某種看待經濟的特殊方式的出現(現代性的經濟想像)，也涉及了主流經濟論述的理論框架的形成(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更涉及了這兩者之間所具有的糾結纏繞的關係。為了突破現代性經濟想像與主流經濟論述學科知識想像的糾結纏繞所帶來的限制，我依序從現代性議題(導論：現代性的“想像”與“想像的”現代性)、現象(第一章：經濟學社會工程的爭議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弔詭)、理論(第二章：市場社會的爭議與主流經濟論述表徵模式的反思)與方法論(第三章：Foucault 對於現代性想像的批判與 Bourdieu 對於正典化學科知識想像的反思)來定位可能的研究理路。基於這樣的設定，我們也分別從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17-18 世紀)的形構(第四章)、市場所引發的爭議及其治理術的演變(第五章)、經濟論述的正統與異端的鬥爭與市場法則的定位(第六章)，來考察從古典到當代市場觀念的演變，並探究市場觀念為何會朝絕對化的發展歷程邁進。基於這樣的考察，本文發現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涉及了下面六條重要軸線的歷史與知識轉折：一、從家計到經濟；二、從諸多集市(marketplaces)到單一市場(the market)；三、從自由放任原則到競爭性秩序原理；四、從烏托邦想像到市場社會的實現；五、從立法者的科學到形式主義的革命；六、從自然律則到規範性形式公理。基於本論文所做的歷史考察與研究發現，我們也指出了既有社會理論對於市場(或資本主義)的批判與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質疑，都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力度，因此，本文也試圖對於市場社會理論的重建與現代性的重估，提出可能的思路。

關鍵字：現代性、市場、經濟思想史、經濟社會學、社會理論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 concept. The central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why and how can the social imaginary of the economy,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be considered disembedding in modernity?" and "why and how can the concept of the market be regarded an institution without history and social context, and be essentialized and absolutized?"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se questions can be related to a twofold complex composed of the economic imaginary of modernity, which means a particular way to treat the economic reality, and the knowledge imaginaries of the economic discourses, which refer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ain current economics. In order to dismantling the complex, I develop a research strategy by reviewing the issues of modernity (Introduction: the imaginaries of modernity and the imaginative modernity), the phenomena (Ch1: the social engineering of economic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theories (Ch2: the debates of the market society and the meta-reflec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 modes of the main current economics), and the methodologies (Ch3: Foucault's critiques of the imaginaries of modernity and Bourdieu's reflections of knowledge imaginaries of the main canonized disciplines).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y, I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the market concept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17th -18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era (20th century) by trac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market concep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ch4), the debates and the evolutions of the governmentality of the market (ch5), and the orientations of the laws of the market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ghting between orthodox and heterodox economic discourses (ch6). After that, I find that absolutizing the market involved the historical and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s along six axes: 1. from oeconomy to the economy; 2. from marketplaces to the market; 3. from the imaginary of a utopia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rket society; 4. from the principle of laissez-fair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petitive order; 5. from 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 to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6. from natural laws to the normative formalistic theorems. Based on my discoveries, I argue that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sts' critiques of the market (capitalism)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ave lost their power because they ignor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arket concept and the economic discourses, and then I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theory of the market and the reassessment of modernity.

Keywords: modernity, the market,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conomic sociology, social theory.

目錄

| | |
|--|-----|
|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 |
| 謝辭 | iii |
| 中文摘要 | v |
| 英文摘要 | vii |
| | |
| 導論 | 1 |
| 一、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 | 1 |
| 二、重估現代性的可能思路 | 5 |
| (一) 現代性問題：現代性的“想像”與“想像的”現代性： | 5 |
| (二) 現代性的主體想像及其他者 | 8 |
| (三) 現代性的秩序想像及其治理 | 9 |
| (四) 現代性想像的知識政治與象徵暴力 | 10 |
| 三、章節安排 | 11 |
| 一、導言 | 17 |
| 二、由經濟學的社會工程學現象與爭議談起 | 18 |
|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觀念所具有的弔詭性 | 22 |
| 四、總結：現代性經濟想像---絕對化市場觀念的發展歷程 | 31 |
|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問題深化：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 | 33 |
| 一、導言： | 33 |
| 二、現代性的經濟想像：市場及其爭議 | 34 |
| (一) 爭議性的市場概念 | 35 |
| (二) 市場社會的崛起與陳舊的市場心態---Karl Polanyi 對於“鉅變”的反思 | 37 |
| (三) 計畫經濟的興起與理性濫用的批判--Hayek 對於市場秩序的辯護 | 40 |
| (四) 市場的秩序圖像與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Hirschman 的歷史反思與類型建構 | 44 |
| (五) 小結：現代性經濟想像與市場觀念的演進 | 48 |
| 二、主流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經濟論述與實在的表徵模式的後設反思 | 50 |
| (一) 從人文科學的表徵危機說起---經濟理論建構的修辭方式 | 50 |
| (二) 經濟論述的知識論模式---十九世紀現代性文化運動與其範式的侷限 | 53 |
| (三) 現代性的社會想像革命---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的圖像 | 56 |
| (四) 小結：學科的知識想像與市場觀念的演變 | 57 |
| 三、總結：研究對象的具體化與問題意識的深化 | 58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策略的設定：對於知識的知識構作分析 | 61 |
| 一、導言 | 61 |
| 二、由經濟思想史解釋的兩難困境談起 | 63 |
| 三、Foucault 對於現代性想像的批判---知識／權力的真理遊戲 | 67 |

| | |
|---|------------|
| 四、Bourdieu 對於學院知識想像的反省—學院場域的知識政治問題..... | 73 |
| 五、總結與研究策略 | 76 |
| 第四章 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的形構..... | 79 |
| 一、導言 | 79 |
| 二、從家計(oeconomy)到經濟(the economy)： | 80 |
| (一) 家計觀念的起源—古希臘的經濟思想 | 81 |
| (二) 中世紀的商業革命—宗教訓令對於商業的約束 | 82 |
| (三) 漫長 16 世紀的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經濟問題的浮現 | 84 |
| 三、從國際競爭到內部經濟治理：重商主義的貢獻與政治算術學的轉折 | 87 |
| (一) 關於重商主義的定位 | 88 |
| (二) 重商主義的貢獻 | 90 |
| (三) 政治算術學的轉折 | 92 |
| 四、市場的表徵技術的演進 | 95 |
| (一) 複式簿記的修辭效果 | 95 |
| (二) 從政治算術學到經濟表 | 97 |
| (三) 臆測的歷史方法 | 100 |
| (四) Adam Smith 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 102 |
| 五、結論 | 104 |
| 第五章 市場問題及其治理..... | 107 |
| 一、導言 | 107 |
| 二、古典自由主義時期的市場社會的爭議 | 110 |
| (一) 奢侈品的去道德化與商業社會的辯論 | 111 |
| (二) 作為市場社會治理機制的自由放任原則 | 116 |
| (三) 糧食的自由貿易與民眾道德經濟學的回應 | 118 |
| 三、社會自由主義時期關於市場的對立詮釋 | 121 |
| (一) 文化與文明的對抗—浪漫主義 vs 古典政治經濟學 | 122 |
| (二) 社會問題的興起與政治經濟學的分裂 | 125 |
| (三) 自由放任的實現與終結 | 128 |
| 四、先進自由主義時期市場機制的重建與發明 | 131 |
| (一) 秩序自由主義—弗萊堡學派 | 132 |
| (二) 社會主義計算之辯 | 134 |
| (三) 新自由主義的當代旗手—芝加哥學派 | 138 |
| 五、結論 | 141 |
| 第六章 市場的知識政治..... | 145 |
| 一、導言 | 145 |
| 二、從國家理性之學到立法者的科學 | 147 |
| (一) 國家理性之學的興起 | 147 |
| (二) 國家理性的瓦解—重農主義的轉折 | 148 |

| | |
|------------------------------------|------------|
| (三) Adam Smith 的立法者科學 | 149 |
| 三、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方法論爭議 | 151 |
| (一) Ricardo 與 Malthus 的方法論之爭 | 151 |
| (二) J. S. Mill 的捍衛與修正 | 153 |
| (三) 小結 | 156 |
| 四、19 世紀末的經濟學內部的方法論大戰 | 156 |
| (一) 英國歷史經濟學派的興起與方法論的爭議 | 157 |
| (二) 德語世界的方法論大戰 | 160 |
| (三) 小結 | 164 |
| 五、從多元典範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 | 164 |
| (一) 舊制度經濟學的興衰 | 165 |
| (二) 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 | 168 |
| 六、結論 | 171 |
| 第七章 結論 | 173 |
| 一、總結 | 173 |
| 二、市場社會理論的重建與現代性的重估 | 178 |
| 參考書目 | 183 |





導論

一、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

自 1980 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的思潮崛起於西方的文化領域中，並在社會科學內部引起許多的爭端與非議。後現代主義的崛起，不但使得傳統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義與理性中心主義遭到了徹底的質疑(cf. Lyotard, 1984；Said, 1978；Blaut, 1993)，過去社會科學對於現代性的擘畫、對於理性的崇尚、對於社會秩序的追尋等知識傳統，似乎也遭到徹底地揚棄(Macrus & Fisher, 1984)。一時之間，所謂後現代性、後現代社會的來臨等說法，喧囂於世。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非理性、去主體、反整體性(totality)、超實在(hyper-reality)等主張，以及其對於拼貼(collage)、戲仿(parody)、擬仿物(simulacra)的歌頌，對於實在論、實證主義的批判，乃至於對於西方科學所立基的表徵(representation)模式的質疑(cf. Smart, 1993；Rosenau, 1992)，雖然屢屢引發社會科學裡之正統衛道人士的怒火，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經過了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 等質疑的浪潮洗禮之後，的確開啓了社會科學對於現代性的反省契機。

在社會科學內部，對於現代性的反思，可以來自許多不同的知識立場¹。藉

¹對於現代性的反省，除了前述所提到的後現代主義的批判外，我們大致上可以辨別出幾種立場(cf. 林峰燦,2010:6)：一是具有懷舊情節(nostalgia)的傾向，否定現代性所取得的物質成就，批判現代性腐蝕了共同體下民胞物與的人際倫理，懷念前現代“美好的”田園生活與精神價值。此一立場可追溯到 18 世紀末所興起的浪漫主義，在當代仍具有一定重要性(一些反西方、反科技的文化論者、新興宗教團體與環保人士的論述，常訴諸此一立場)。二是強調現代性乃是一場“雖源於西方，卻具有普世性效力”的計畫，只是，此計畫需因時適地予以調整，以包容差異與多元性的存在，但無論如何，歷史終將殊途同歸。這種說法可以稱得上社會科學的主流傳統，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論者、結構功能論者與現代化論者，大致上都採取這種立場，甚至，經濟學家往往也容易不自覺地採取這種立場。三、強調現代性的偏頗、妄想與難以維持。採取這種立場的往往是具有精神分析背景的激進民主論者或女性主義論者(如 Laclau、Mouffe、Butler 等人)，以及強調後殖民主義與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如 Bhahba、Siad、Spivak、Taussig、Chatterjee 等人)。這種立場的研究重點，並不著眼於現代性的起源與演變，而是強調現代性計畫乃是偏頗與妄想的，忽視了特殊人群的歷史與經驗，因而，不僅是難以維持的，而且往往是災難的。四、現代性所掩蓋與維持的秘密。幾乎所有受 Foucault 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概念影響的相關學者，都是採取這種立場。這種立場往往著眼於現代性計畫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之處，挖掘現代性試圖掩蓋與遮蔽的社會問題與歷史軌跡。因此，社會偏差與文明病態，以及相應的知識學科，如道德統計、公共衛生、犯罪學、刑法學與精神病學，往往成為其研究的主要關懷。五、

著對於西方過去歷史經驗的重新反省、對於當代西方先進國家社會轉型的研究，以及對於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的考察，所謂“後工業”、“後現代”、“後殖民”、“第二現代性”、“多元現代性”等說法，在社會科學內部，一時之間蔚為風尚。此外，從諸多不同理論觀點出發，過去許多被忽視或誤置的現代性脈絡與軌跡，也成為當代社會研究試圖反省的對象。因此，無論是對西方過去與當代發展脈絡的重新梳理，抑或是強調現代性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人群有著不同的體驗與理解，這些新的批判與反省，“似乎”都突破了“舊歐洲”傳統下現代性的窠臼，更新了我們對於現代性的認識與理解。

然而，我必須指出，這些新觀點固然有其理論上或經驗上的貢獻，但是，其對於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卻往往僅具有宣示效果，缺乏對於問題更為深刻的反省與釐清，易流於淺薄與俗濫²。特別是，當考量到後現代主義在學院風起雲湧之際，正好也是經濟帝國主義(理性選擇理論)與新自由主義濫觴之時，我們就不能高估這些觀點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後工業、後現代、後殖民、第二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等提法，固然批判了 19 世紀現代性計畫所立基的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主體與客體、理性與非理性、男性與女性等諸多二元對立，然而，

後現代性、第二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的立場。後現代性與第二現代性的立場，往往基於西方先進國家的社會轉型，強調新的社會性質的出現(如後工業社會、風險社會、消費社會的來臨)，使得既有現代性計畫不再適用，必須加以修補或改弦易轍，以適應新的歷史變遷。多元現代性的立場，則是立基於非西方的歷史與發展經驗，強調非西方社會的現代性開展，無須再以西方為模本，也無法用源自西方的單一計畫來理解，不同社會可以且已經發展出各具特色的現代性；最後，強調現代性乃是一個未完成的計畫。此一說法的代表人物為 Habermas 與相關的批判理論學者。此一立場往往強調現代性的啓蒙精神與解放允諾，認為當代諸多對於現代性的不滿，乃根源此一計畫的尚未完成，以及對於此一計畫的誤解，因此，不但不應該揚棄此一計畫，相反的，應該針對現代性危機進行診斷與重新梳理，以重置此一計畫，並找到介入與干預的可能。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更全面性的介紹，參考 Delanty(2000)、Wagner(2001a, 2008)。

² 許多承繼後現代、後殖民與多元現代性立場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往往容易低估現代性在西方發展所具有的複雜性，其批判立場的立足點，往往是基於將現代性予以簡單化而來的。這些知識立場，往往只是簡單地將十九世紀以降特定的社會理論視為是現代性的適切表述(如 Adam Smith、Hegel、Marx、Weber、Parsons 等人的理論)，並將對這些論述的批判等同於對現代性的反省，進而奠定自己知識主張的基石(cf. Heller, 1999)。事實上，這些知識主張，低估現代性的崛起所涉及的歷史、社會與知識變革，因而很難解釋何以現代性計畫乃是由西方所主導而非其他地方。而且，這些知識立場也很難解釋何以在非西方國家屢屢以西方“先進”國家為範本，藉以評價自身不夠現代之處，甚至產生試圖在短期內超英趕美的“現代的太現代”現象。此外，這些知識觀點，一旦放棄現代性所標榜的普世性立場，試圖追求多元與差異，那麼將很難處理非西方對於傳統價值的標榜所引發的道德難題(如標榜東方價值的威權主義、回教基本教義派的恐怖主義、非洲盛行的閹割、酷刑與種族屠殺)。

學術界中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以及全球化浪潮下新自由主義的盛行，卻也提醒我們在標榜反理性、反整體性、去主體、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後現代浪潮下，以現代性之經濟想像(市場觀念)為模本的知識論述與社會工程，卻正在席捲著全球。因此，我們不能高估這些新觀點所取得的成果，更不能低估現代性所具有的複雜之處。

換言之，我們似乎必須重新審視既有論述對於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事實上，對於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一直都是現代社會科學誕生以來的中心關懷。就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關係而言，這兩者存在著某種類似“莫比斯環”(mobius strip)的“雙重迴旋”關係(cf. Giddens, 1991, 1993 ; Hacking, 1999)³。一方面，就社會科學的分析對象而言，現代性乃是一種歷史性的社會形構，社會科學正是基於此一形構，對現代性加以概念化。然而，此一概念化的結果，卻往往反過來被用來證成所謂的傳統／現代、西方／非西方的區分，成為歷史研究、民族誌研究與比較發展研究中“後設論述”，不斷地用來指導西方如何自我理解(諸如資本主義起源的爭議、西方如何興起的議題)與如何理解非西方(如東方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以及非西方如何透過西方看待自己、如何追趕西方(諸如現代化理論的追求、非西方世界的“現代的太現代”現象、後殖民狀態的爭議)。因而，現代性的概念化，也被進一步用來進行所謂文明／野蠻、進步／落後、啓蒙／迷信等區分(當然，也因此遭來許多反省與批判)。於是，關於現代性的表述，逐漸被等同於社會生活的實在(Wagner, 2001a: 4)。

另一方面，就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具制度性的反思知識而言，正是基於現代性的歷史形構，才賦予了社會科學得以存在的歷史、社會(制度)與知識條件。社會科學的出現，不僅依賴於特定歷史場景的變革(例如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也

³ 針對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關係，Giddens(1993)曾提出所謂雙重詮釋學 (double hermeneutics) 的說法來指出，社會科學的論述無法像自然科學般，客觀地脫離其研究對象而存在，反而會捲入其研究對象中。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知識，往往會為其研究對象所挪用，成為其理所當然的常識。因此，社會科學不僅描述社會世界，甚至會改變社會世界。Hacking 則使用迴圈效應 (looping effect) 來指陳類似的現象(亦即社會科學論述與其實在具有迴圈關係)。然而，無論是雙重詮釋學的理論，還是迴圈效應的說法，都低估了現代性與社會科學之間的複雜關係。

依賴於特定社會制度的形成(特別是學院制度與國家相關社會政策的建立)，更依賴於某種知識論與倫理上的轉變(如宗教在倫理上的退位與所謂科學方法應用於人類事務的可行性)。因而，社會科學的興起，本身就是現代性歷史形構重要的一環。然而，正是因為這些歷史、社會與知識條件被視為理所當然，社會科學往往將自己對於現代性的理解，視為是一種普世性的計畫，並有意無意地賦予此計畫規範性的色彩，藉此對於社會實在進行區辨、評價，甚至干預。

簡言之，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一方面，現代性一詞不可避免地帶有雙重意涵，它同時具有哲學性與經驗性，既是概念性的又是歷史性的(Wagner, 2001a:3 ;Yack, 1997)。另一方面，社會科學亦同樣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經驗性的詮釋者，亦是規範性的立法者(cf. Bauman, 1987)。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纏繞，正如莫比斯環此一比喻所指出的，在此中，無法分清楚地區分內與外，任何從中對於此環的剪切，往往無助於解開此一纏繞，只是引出另一個糾結。因而，任何社會科學具客觀性或普世性的宣稱，往往只是某種特殊或主觀立場的偷渡，所謂經驗事實的依據，往往可能淪為某種規範性論述或意識型態的包裝，所謂科學知識的積累與進步，也易於成為一種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的迷思，這似乎正是當初後現代相關論述得以引發知識風潮的關鍵所在。然而，我也必須指出，也正是因為忽視了現代性的雙重意涵與社會科學的雙重身份，才導致諸多後現代相關論述對於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不是流於片面與偏頗，就是過於淺薄與浮濫。

因此，對於現代性的重新估量，必須正視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雙重迴旋關係(特別是現代性的概念化面向與社會科學立法者的角色，這是重建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的關鍵所在)。我們可以從兩個基本且相關連的面向來定位此一弔詭關係：一是關於現代性的概念化歷程，以及透過此一概念化，人們如何定位現代性之歷史形構過程中的經驗、問題與爭議，以及建構相應的治理技藝與知識技術。二是關於現代性的概念化所涉及的歷史、社會與知識前提，這一前提又如何涉及社會科學的出現，並在其知識建構過程中，反過來支撐了現代性的秩序圖像。透過這兩個面向與相關問題的研究，我們似乎可以更深刻地探尋現代性計畫所掩蓋的秘

密、維持的動力與擴展的張力，進而更確切地重建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

市場觀念在西方歷史進程中的轉折，或許可以作為上述現代性重估的一個重要且關鍵的例子。一方面，自現代社會興起以來，現代經濟體制之起源、作用、後果與轉型，總處於社會理論的爭論核心與議論焦點，市場觀念正是分析現代經濟體制的主要核心概念。透過市場觀念與相關爭議，人們不僅可以為當前所面對的問題定位，也賦予現代性體驗具有可以理解的意義，更試圖獲取相關問題的解決之道與指導性政策綱領。另一方面，西方經濟論述的出現，乃至於更狹義的現代經濟科學的興起，正是以現代經濟體制作為其主要的研究對象，並且，還進一步透過市場觀念的營造，來刻畫現代性的經濟秩序。基於這兩個理由，本論文將以市場觀念在西方歷史上的轉折作為研究主題，並試圖透過對於此一主題的考察，探尋某一現代性重估的可能理路。

二、重估現代性的可能思路

在正式進入論文主題的討論之前，我將先對於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提出若干的想法，探尋現代性重估的可能出路，以定位出本論文的基本思路與可能的理論意涵。

(一) 現代性問題：現代性的“想像”與“想像的”現代性：

如前所述，面對著現代性的歷史變革，西方的社會論述，建構了傳統／現代這一組區分來概念化所謂的現代性。透過對於此一區分的相關歷史研究，學者們不斷地勾勒與爭論有關資本主義的起源、西方的興起，乃至於現代世界的形成的時間起點、社會條件與動力因素，並反省歐洲發展經驗的可能侷限(Landes, 1969, 1998 ; North & Thomas, 1976 ; Rosenberg & Birdzel, 1999; Clark, 2007 ; Grief, 2006 ; Mokyr, 1990, 2002 ; Hilton, 1976, 1985 ; Aston & Philpin, 1985; Hall, 1985 ; Baechler et al., 1987 ; Wood, 2002 ; Mielants 2007 ; Marks, 2002, 2007 ; 王國斌, 1998 ;

Pomeranz, 2004 ; Goldstone, 2009 ; 綜合性的討論請參考 Goody, 2004)。此外，在後現代相關浪潮的衝擊下，人們也逐漸透過現代性／後現代性(或第二現代性)這組區分，一方面批判現代性不足與缺憾，另一方面則是刻畫當代西方先進國家的社會轉型(Bauman, 1989, 1991 ; Harvey, 1989 ; Jameson, 1991 ; Giddens, 1991 ; Beck, 1992；綜合性的討論請參考 Rose, 1991 ; Smart, 1993)。於是，前現代(或封建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後現代(或第二現代)的歷史分期，似乎構成了我們理解“漫長現代性”的起源、發展、轉變的主要軸線。然而，我必須指出，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區分，無論僅僅只是一種概念上的區辨，抑或者是確切的歷史分期，在這樣的分析軸線下，似乎掩蓋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面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人們是如何建構了關於現代性的“想像”，這種想像又如何演變成某種普世性的框架，一方面企圖實現“想像的”現代性，另一方面又排除對其質疑與提問的可能⁴？

針對現代性的“想像”與“想像的”現代性此一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現代性的概念表述系統著眼，來加以定位。現代性的概念表述系統，一直具有兩個基本且重要的要素：一是關於人類自主性的想像，意即將人類視為具有理性認知與行動能力的主體，並且，在無須外在的保證下，就具有創造與實現自我的潛能(特別是表現在關於自由與人類解放的相關論述上)；另一個則是關於世界存有模式的想像，意即將世界(無論是自然或社會)視為具有內在的結構與秩序，並具有被分析、理解與治理的可能(特別是表現在社會秩序、理性化等相關論述上)。這兩個要素不僅構成想像現代性的關鍵，而且，也往往被社會科學視為是其論證模式的理所當然的起點。此外，也由於這兩個要素具有一定程度的曖昧模糊性，而且彼此之間也往往充滿既支持又對立的張力，因而屢屢引發相關現代性論述的爭辯

⁴我們必須再次強調，正是基於對此一問題的忽視，才使得相關論述易於混淆現代性的概念性與歷史性(如前述關於現代性的歷史研究)，並且，往往易將某一偏頗的現代性表述等同現代性本身，進而得出過於廉價的反省與批判(如相關後現代論述)。正如同 Latour(1993)所指出的，現代性是一種純化過的論述，是透過對於各種混雜(hybrid)的轉譯(translation)與淨化(purification)的結果，這些混雜不僅在前現代、現代，甚至後現代，一直都是存在著。因此，基於這種對於現代性想像激進的懷疑論立場，Latour 甚至宣稱“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因而當然更不可能是後現代。然而，Latour 的論點固然有力地批判了現代性的“想像”，但是，他似乎並未注意到“想像的”現代性如何道成肉身(words make flesh)的面向，以及“想像的”現代性所具有的象徵暴力的問題，因而低估了“現代的太現代”的可能。

(Wagner, 1994, 2001a ; Touraine, 1995 ; Castoriadis, 1987, 1997, 2007)。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該如何妥適地安置這兩個要素(如哲學上對於主客對立的討論，以及社會學對於行動/結構的爭議)，而在對於此一“現代性問題”加以“問題化”處理。換言之，現代性重估的關鍵，並不在於如何構作理性主體自我維持的技藝與實作，並解放其自我實現的潛能，也不在於理性知識與相應的制度規則能否證成其對於世界存在樣態的勾勒，更不在於該如何協調與整合理性主體與理性知識、制度規則所可能具有的衝突(如理性知識與世界的理性化是否具有理性主體所不能控制的邏輯，在構作秩序的同時是否有著賦予主體能動性的可能)⁵。相反的，現代性重估的關鍵在於重新提問：基於怎樣實際問題的爭議與處理，觸發了人們關於現代性的想像？此一想像又基於怎樣的知識操作與框架，使得現代性的“想像”得以可能(無論是主體的建構，抑或者社會秩序的治理)？此一知識操作與框架，又經歷哪些問題意識與論述脈絡的轉折與變異？此一問題意識與論述脈絡的轉折與變異，又如何使得現代性的特殊性與歷史偶然性，逐步轉變具有成普世性的宣稱與效力，使得現代性的“想像”過渡成“想像的”現代性？現代性的普世性又如何掩蓋其轉變的軌跡，並抹殺關於現代性其他表現形式或多元詮釋的可能？唯有透過這些問題的追問，我們或許才能妥適地重建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使得多元現代性的宣稱，不再僅僅只是空談，從而避免“我們從未現代過”(現代性的“想像”)與“現代的太現代”(“想像的”現代性)的困境與兩難。

⁵ 上述這些提問正是當代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結構與行動爭辯的關鍵所在。一定程度上，關於行動/結構議題爭辯的起點，乃是試圖重回 1937 年 Parsons(1949)所提出的社會秩序問題，意即如何妥適地安置志願行動與制度環境的問題，以完善現代性的制度化個人主義(Alexander, 1978)。然而，後續的理論發展，無論是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兩種秩序觀、規範與衝突因素的平衡、主觀世界與客觀秩序的協調，抑或是溝通、實作、反身性(reflexivity)等理論轉向，結構/行動議題相關知識操作，並沒有真的回到 Parsons 秩序問題的起點，僅僅是針對其解釋模型，在制度與個人的兩端，進行若干的修正與補充，未能意識到“主體不必然是制度的承載者，對於秩序的想像不必然等同於制度本身，主體的建構與秩序的治理往往基於某種特定知識框架與操作而得以可能”等問題，因而，忽略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該如何協調與整合個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而在於對於此特定知識框架與操作進行問題化的反省，深究其可能涉及的知識心態、操作技藝、乃至於象徵鬥爭等問題。關於結構與行動議題的綜合性討論，請參考葉啓政(2004)。

(二) 現代性的主體想像及其他者

如前所述，在現代性的概念表述性系統中，主體的想像一直都佔據著關鍵性的位置，相關論述也一直圍繞著此一要素對現代性進行診斷與批判（特別是表現在關於自由、異化等相關議題上）。然而，在後現代、後殖民的浪潮下，相關論者似乎意識到在主體的建構過程中，主體與他者具有複雜且糾結的關係。一方面，透過對於他者的建構與差異化，主體得以形成自我的認同與理解；另一方面，透過對於他者的形塑、馴化、排除，甚至是獻祭，主體得以形構某種霸權論述與支配關係，並建構理性化與神聖化的秩序。藉由他者與主體的複雜關係，後殖民論者試圖重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一方面批判殖民者如何將對於他者的想像，透過肉體與知識暴力(epistemic violence)，銘刻於被殖民者的身體、心靈與象徵世界，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透過混雜性(hybridity)、模擬(mimicry)等概念，刻畫後殖民狀態的歧異性與異質性，並在其中尋求顛覆殖民論述與去殖民的可能(Taussig, 1987, 1992, 1993；Bhabha, 1994；Spivak, 1999)。

換言之，後現代、後殖民的論述似乎提醒著我們，現代性之主體想像的建構似乎總有著陰暗的一面，現代性在不同團體與人群，不僅可能有著不同的體驗，其經驗總是具災難與創傷性的(cf. 林峰燦, 2010:1-5)。因而，對於他者的包容、對於異己(alterity)的含納，尋求自我與他者的共存之道，從而避免戰爭、種族屠殺、恐怖主義的產生，似乎已成為當代社會場景中迫切且嚴重的倫理議題(Bauman, 1993, 1995, 1997；Touraine, 2000)。然而，我必須指出，上述的論述似乎都低估了現代性之主體想像建構過程所具有的複雜性與歧異性，忽視了主體的想像不必然等於主體本身、主體想像的構作者與理性主體總可能存在著知識上與地位上的落差、理性主體不必然等同於理性知識與制度規則的承載者。因此，重估現代性之主體想像的關鍵，並不在於站在他者的立場批判現代性之主體想像的霸權論述，解構其所涉及的知識-權力的叢結，也不在於重建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倫理關係，尋求平等且差異的可能，而是在於重新審視現代性之主體想像的建構過程，正視主體的想像、理性知識與制度規則的承載者與主體所可能存在的落

差，並探詢其中所涉及的知識心態、操作技藝與象徵鬥爭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揭穿現代性之主體想像所可能隱含知識秘密與象徵暴力，從而避免“底層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議題中所隱含過於理所當然的猜想與似是而非的回答(cf. Spivak & Morris, 2010)。

(三) 現代性的秩序想像及其治理

如前所述，現代性一詞具有雙重的意涵，一是概念性的，二是歷史性的。前述關於資本主義起源、西方世界的興起與現代世界形成的爭議，相關的論述深刻剖析了現代性興起所涉及的自然人文生態(如氣候、地理、人口等)、社會制度(婚姻、家庭、企業、工廠、產權、國家財政、戰爭與殖民等)與文化因素(宗教寬容、科學知識與創新精神等)等條件，豐富了我們對於現代性歷史形構的認識，並試圖透過現代性的外部與內部因素的比較(通常是在所謂全球史的觀點下)，批判與爭辯傳統西方中心論史觀的不足。在社會理論關於現代性之歷史變革的分析中，相關學者往往也利用若干現代性的制度叢結與動力來概念化現代性發展的面貌與趨勢，並反省現代性發展的後果⁶。然而，無論是對於現代性的歷史性分析，或是概念化的理論建構，相關論述並未清楚地指出一個有別於 19 世紀社會想像的知識與社會脈絡，因而古典社會科學知識巨人的鬼魂，依然不時出沒於上述論述的分析框架與理論建構中⁷。

⁶ 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乃是 Giddens(1990)所謂現代性的三大動力因素與四大制度叢結的說法。三大動力因素指的是時空解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去鑲嵌的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與制度反身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四大制度叢結指的是資本主義、工業主義、民族國家監控與軍事暴力。類似但略有不同的說法，請參見 Mann(1986,1993)。

⁷ 由於上述的歷史分析與理論建構，常常混淆現代性的歷史性與概念性，未能問題化現代性的提問與想像，因而古典社會科學的知識巨人理論(如 Adam Smith、Malthus、Marx、Weber、Durkheim、Schumpeter 等)，常常成為上述分析的後設模本。社會理論受惠／受限於古典理論的概念框架，固然不必多言，即便在上述的史學研究裡，Adam Smith 的分工作為發展動力命題、Malthus 的人口作為發展的自然陷阱命題、Weber 的新教倫理命題、Marx 的歷史唯物論、Durkheim 的社會連帶理論、Schumpeter 的企業家精神命題，基本上都是這些史學用來概括歷史複雜性的主要模型。即便存在著對話、修正與批判，經典理論所隱含若干現代性的想像，往往被理所當然地承繼下來，導致對於現代性的重構，總不免帶有若干的不足與缺憾(如個人主義、自由市場、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觀念，在概念與歷史上的可爭議性，即可說明此一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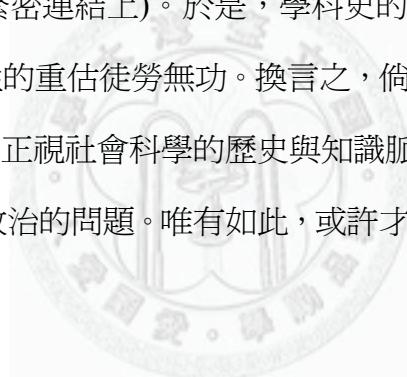
換言之，倘若我們正視現代性的想像包含著一種關於社會秩序的想像，人們也往往基於此一想像，試圖建構社會世界存有的樣態，並規劃相應的制度規則與治理模式，進而收攏與統整多元且歧異的社會實作，那麼或許現代性重估的關鍵並不在於如何更細緻地刻畫現代性的歷史形構，也不在於批判與修補經典論述的不足，而是在於重新審視在現代性制度的收攏與統整過程中，建構了怎樣的社會秩序想像，使得某種問題與對象成為可治理與需要治理的？這種治理模式又涉及怎樣的權力技術與知識操作，使得制度的收攏與統整所需的物質與象徵的資源動員得以可能？並且，透過這種制度、權力與知識的叢結，現代性的社會想像又如何與社會實在貼合，進而產生現代性普世性擴展的張力(特別是對於社會生活的破壞與重置)，並排除對其質疑、與其競逐的可能(至少就現代性普世性宣稱與效力的層次上)。或許，透過這些問題的追問，我們才得以真正地正視西方中心論的根本問題所在，並且避免落入相對主義的陷阱。

(四) 現代性想像的知識政治與象徵暴力

在前面幾點的討論中，我已經指出了，在面對現代性的“想像”與“想像的”現代性的問題時(無論是主體的想像，還是秩序的想像)，特定的知識操作與框架，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這些知識操作與框架，不僅涉及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提問，也試圖透過特定的程序與方法，使得現代性的想像得以具形，進而透過對於現代性危機的診斷與治理，形塑現代性的社會秩序。因此，現代性的重估，似乎必須正視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糾結纏繞的共生關係。

基於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共生關係，不少學者們試圖透過學科史的反省，重新梳理社會科學興起所面對的歷史、制度與知識的變革，以重構社會科學與現代性在歷史形構上的關連(Tribe, 1978, 1981, 1988, 2007；Kadish & Tribe, 1993；Wagner, 1991, 1994, 2001b；Wagner & Wittrock, 1991；Wagner & Weiss, 1991；Heilbron, 1995；Heilbron et al, 1998；Rueschemeyer & Skocpol, 1996；Porter, 1986；Stigler, 1986；Desrosières, 1998；Porter & Ross, 2003)。這些學科史的反省，固然

重置了既有對於學科傳統所忽視與誤置的歷史與知識脈絡(特別指向二戰以來社會科學發展對於學科傳統的發明與正典化)，也釐清若干值得爭議的現代性概念(如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社會、文化等)，更試圖深化現代性社會理論中所謂的“基本問題”(特別指向行動、結構的相關爭議)⁸。然而，我必須指出，這些論述似乎未能意識到，社會科學之於現代性的諸多面向所進行的研究領域的劃分與壟斷(意即所謂諸多現代性的社會想像)，本該就是現代性重估所必須反省與檢討的。學科史的相關反省，往往未能正視此一劃分與壟斷所涉及的展示／隱藏、排除／含納、肯認／誤認等象徵鬥爭問題(特別是在有關提問、對象與證明等方法論與知識論上的正當性與有效性爭議)，因而也未能正視此一象徵鬥爭所產生的真理宣稱與真實效應等問題(這涉及到意識型態的動員與世界觀的強制，特別表現在社會科學與國家知識的緊密連結上)。於是，學科史的反省往往成為一種學科傳統的再發明，使得現代性的重估徒勞無功。換言之，倘若我們要解開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糾結纏繞，除了正視社會科學的歷史與知識脈絡外，更應該正視其中所涉及的象徵鬥爭與知識政治的問題。唯有如此，或許才能解開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共生關係。



三、章節安排

上述的討論，主要是透過現代性想像的相關問題來刻畫現代性重估的可能思路。透過這樣的反省，我們將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指向了現代性計畫的知識構作問題。現代性的知識構作問題，不僅涉及了現代性的“想像”如何過渡成“想像的”現代性(通常是透過現代性的社會工程)，更涉及了現代性社會想像與社會科學知識想像的糾結纏繞。從這樣思路出發，市場觀念在西方論述中的歷史與知識轉折，的確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理論案例。自西方古典時期

⁸ Peter Wagner 關於現代性與社會科學之歷史與理論的相關研究，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請參考 Wagner(1994, 2001a, 2001b, 2008)

(17-18世紀)以來，市場觀念就一直處於現代性經濟想像的核心(而且，概念與實在也常常被等同與貼合)。此一觀念的形構，不僅涉及了複雜的知識構作的演變，也涉及諸多市場化的現代性社會工程，更涉及了西方主流經濟論述知識霸權的確立，以及其對於市場經濟原理的捍衛。因此，對於市場觀念的歷史考察，或許可以使得現代性的問題與其爭議，得到更為具體的理解，相關的理論議題也因此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釐清。基於這樣的研究動機與理論關懷，我依序簡介本論文的章節安排，並進一步探究其對於現代性反省與批判所可能具有的理論意涵與貢獻。

現代性經濟想像：絕對化的市場觀念(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提問)

在第一章中，我主要是從兩個面向來鋪陳本論文的研究起點：一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所引發關於經濟學的社會工程爭議；二是在新古典經濟學內部，基於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理論的構作所引發的理論難題。透過這兩個面向，我將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爭議與一般均衡理論難題的真正問題所在，乃是“市場觀念的絕對化”(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不僅導致特定偏向“市場”的政策在實施時，忽略了歷史特定性的問題(特別是制度、文化與社會脈絡)，也使得形式主義革命後的主流經濟學產生物理論框架的誤解與錯置。準此，我將以“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作為研究對象，並追問這樣的現象從何而來？

絕對化市場觀念的根本問題，涉及的不僅僅只是特定政策典範的缺失，亦或經濟科學當前知識的不完備，而是涉及了現代性之經濟想像的構作與轉折。自18世紀以來，“自律市場”一直是現代性之經濟想像的核心圖像，經濟學此一學科亦圍繞著此一圖像發展出相關理論與爭議。因此，以“市場的絕對化”作為研究對象，將有助對於反省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糾結纏繞，並探究現代性重估的可能出路。

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問題深化）

在第一章中，我已經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並不是真的以市場為其研究對象，而是在後設的理論框架層次上直接預設了市場經濟的存在，因而產生了“市場觀念的絕對化”謬誤。更簡單地說，新古典經濟學缺乏一個真正關於市場的理論。然而，“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不僅涉及形式主義革命所導致的框架錯置與誤植，更涉及了以自律市場為圖像的現代經濟想像的構作與爭議。

因此，為了進一步解開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經濟論述的糾結纏繞，在本章，我將分兩部分來討論絕對化市場觀念的相關問題。在第一部份，針對市場觀念的兩面性所造的混淆，將從市場與相關爭議出發來反省現代性經濟想像的相關問題。首先，對於市場概念的可爭議性，作出初步的定位。接著，延續這樣的定位，進一步討論在更廣大的社會理論脈絡下，三個極具影響力關於市場的社會理論：一是 Polanyi 對於自律市場的所做的歷史考察與理論反省；二是 Hayek 從奧地利經濟學的立場出發所建構的關於市場的社會理論。三是 Hirschman 對於市場的秩序圖像與市場的對立詮釋所做的討論。透過他們三個人的理論，我將釐清“絕對化市場觀念”的形成所涉及的相關因素。在第二部分，為了反省形式主義革命所造成的經濟論述的分析範疇與概念框架的錯置，我將反省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的問題。我將透過經濟論述的表徵危機、知識論模式與現代性想像等三個層次，討論相關學者的反省，並將“市場觀念的絕對化”的問題，逐步由當代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爭辯，關連到 19 世紀社會科學的興起與古典時期(17、18 世紀)之現代社會想像的構作。透過這兩部分的討論，將具體化研究對象，並深化相關提問。

對於知識的知識構作的分析(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策略)

如同前面所述，現代性的形構涉及到特定知識技藝的操作。在前兩章的討論，我已經將對“市場觀念的絕對化”的反省，逐步關連到知識構作上的問題。因此，在第三章裡，我將針對知識構作此一問題所涉及的研究策略與方法進行討論。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取徑，極為類似思想史的研究取徑，因此，我將從經濟思

想史所涉及的方法論兩難困境談起。針對思想史所面對的絕對主義／相對主義、理性重建／歷史重建等兩難，我將指出，思想史的相關爭辯，並未能兼顧知識構作本具有的兩個面向：知性的與社會的，而且，相關的討論也未能反省現代性的社會想像與當代學科知識想像所帶來的限制。因此，我將進一步討論 Foucault 與 Bourdieu 對於知識構作的相關理論。結合 Foucault 對於現代性社會想像的批判，以及 Bourdieu 對於正典化與制度化學科之知識想像的批判，我們試圖突破並反省現代性社會想像與學科知識想像的限制，進而得出本論文的研究策略。

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的形構（第四章）

在本章，我將討論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的產生。針對此一議題，我將追溯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誕生時所涉及的三個線索：一、從家計(oeconomy)到經濟(the economy)：經濟問題的問題化。二、從國際競爭到內部經濟治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貢獻與政治算術學(polynomial arithmetic)的轉折。三、市場的知識表徵技術的演變：從重商主義的複式簿記修辭學、Petty 的政治算數學、Quesnay 的“經濟表”模型到 Adam Smith 的猜想歷史。透過上述四點線索，我將討論市場觀念的形構所涉及的歷史與知識脈絡上的轉折(相應於現代性的歷史變革)，並探討這樣的觀念形構如何為“市場觀念的絕對化”埋下伏筆。

市場問題及其治理（第五章）

於本章，將處理在社會脈絡與論述脈絡中，市場觀念所涉及的爭議與相應的治理術轉折。我們主要是依循著治理術文獻所指出的，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與先進(advanced)自由主義等三個時期來處理上述的爭議與轉折。首先，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主要討論的是關於奢侈品消費與“溫柔商業論題”(the doux-commerce thesis)的爭議。透過這些爭議，將可以看到市場的觀念是如何跟商業社會的倫理爭議連結在一起。而且，隨著“溫柔商業論題”的勝出，自由放任原則也成為此一時期的經濟治理術。然而，自由放任原則的實踐，不僅避免不了

文明衰敗的憂慮，更遭來了民眾道德經濟學(moral economy)的反彈。其次，在社會自由主義時期，市場的相關爭議經歷了文化問題與社會問題的轉折。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改變了此一學科的屬性與定位，也造成了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錯位。而且，隨著社會問題的逐漸惡化(特別是愛爾蘭大飢荒)，19世紀末，政治經濟學也開始改變了其與自由放任原則之間的關係。接著，在先進自由主義時期，基於自由放任原則的破產，經濟學內部出現兩種關於市場觀念的變革：一是弗萊堡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從競爭性秩序原理對於市場觀念的重建。二是新古典經濟學將經濟理論與市場觀念脫勾。這兩者之間的交鋒(透過社會主義計算之辯)，清楚地展現了絕對化市場觀念所造成的影響。而且，當經濟學芝加哥學派試圖結合了新古典經濟學與競爭性市場原理時，市場觀念的絕對化就清楚無誤地表露了出來。最後，綜上所述，我們將試著回答，從古典到當代，市場問題的爭議與治理術的轉折，如何使市場的觀念成為現代經濟想像的核心，並走向絕對化的發展趨勢。

現代性市場想像的象徵鬥爭與知識政治(第六章)

在前面幾章的討論裡，我們或多或少都碰觸到市場的知識構作問題。於本章，我們將焦點更集中在經濟科學的內部轉折上面，討論市場觀念的表述所涉及的象徵鬥爭與知識政治的問題。其中，理論體系的區隔、學科屬性的定位、方法論上的爭議，將會是我們討論重點。首先，在古典時期，經濟論述經歷了從“國家理性之學”到“立法者的科學”之轉折。這個轉折不僅涉及了經濟論述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到 Adam Smith 的演變，也涉及了市場經濟原理從治理技藝到自然律則的定位。其次，我們將討論 19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內部有關學科定位與方法論的爭議。這場的爭議，關鍵在於歸納法與演繹法之間的爭辯(在 David Ricardo、Thomas R. Malthus、Richard Jones、William Whewell 到 John Stuart Mill 之間)。這場辯論不僅確立了 Ricardo 理論體系的正統地位，市場經濟的原理也從自然律則轉變到幾何學式的先驗律則。只是，隨著 Comte 的實證哲學與歷史哲

學所帶來的挑戰，在 Mill 晚期的修正裡，不僅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屬性發生了改變，市場經濟原理也開始被賦予“相對性的絕對化”定位。接著，在 19 世紀末，英國與德國經濟學界，分別發生了方法論的大戰。我們將討論在兩場方法論的大戰中，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經歷了怎樣的重新界定，市場觀念的“相對性的絕對化”又如何被正統論述與異端論述所共同承認。再者，在 20 世紀初，舊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了一場知識上的碰撞。我們將討論舊制度經濟學的衰敗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如何為市場的絕對化掃除了最後的障礙。最後，綜上所述，透過理論體系的區隔、學科屬性的定位與方法論的爭議，我們將試著回答，在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中，市場的觀念是如何向絕對化的發展歷程邁進。

絕對化市場觀念與現代性重估(第七章 結論)

在結論的部分，我將總結本論文對於絕對化市場觀念的相關論點，並將市場觀念的絕對化發展趨勢，歸納出六條主要的軸線：一、從家計到經濟；二、從諸多集市(marketplaces)到單一市場(the market)；三、從自由放任原則到競爭性秩序原理；四、從烏托邦想像到市場社會的實現；五、從立法者的科學到形式主義的革命；六、從自然律則到規範性形式公理。此外，基於上述的結論，我也將回到市場爭議與現代性問題，對於市場社會理論的重建與現代性重估提出若干反思，以定位出本論文所可能具有的理論貢獻。

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提問：絕對化的市場觀念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想法，無論是對是錯，其影響力都超過一般人的理解。…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通常自認為能夠完全免除於知識的影響，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J. M. Keynes

一、導言

在導論的部分，我已經指出了，現代性與社會科學之間，具有某種類似莫比斯環的糾結纏繞。市場觀念作為現代性的核心概念，或許可以用來重新反省此一問題。市場，特別是所謂的“自由市場”(“the” free market)、“自律市場”(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一直都處於現代社會之經濟政策的辯論核心，而且，也一直作為現代經濟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透過市場觀念在西方歷史上所經歷的社會爭議與知識轉折，或許可以有助於釐清現代性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糾結纏繞。準此，底下的討論，我將分三部分來建構我們的研究對象，並提出研究問題。首先，我們將從經濟學社會工程的現象與爭議談起。對於此一議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市場是問題還是解答，而在於相關的爭議並沒有意識到市場一詞所具有的經驗性與概念性的雙重意涵。因而，所有的對抗與辯論，往往顯得似是而非。其次，我們將反省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在市場理論上的弔詭性。這種弔詭性清楚地展現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市場的概念混淆與理論錯置，因此，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缺乏適當的市場理論，事實上，新古典經濟學並不了解市場。最後，結合上述兩部分的討論，我們將問題的根源指向了所謂“市場觀念的絕對化”(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因此，本文將以絕對化市場觀念的觀念演進過程，作為研究對象，來反省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並提出研究問題。

二、由經濟學的社會工程學現象與爭議談起

上個世紀末的最後十年，隨著蘇聯、東歐與波蘭共產體制的解體與柏林圍牆的倒下，一時之間，歷史終結之說與全球化的呼聲喧囂於世，相關論述宣告了資本主義已經取得歷史的最後的勝利，“市場看不見的手”之說似乎成為社會政經發展唯一可想像的救贖之路(Fukuyama, 1993; cf. Gray, 1999)。在這樣的千禧年市場福音的佈道下，後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俄羅斯)，採取所謂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的措施⁹，實施大規模而急速的市場化、自由化與私有化的改革(Kolodko, 2000；Stark & Bruszt, 1998)。同時，世界各國(特別是開發中國家)，也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至上的政策處方的指導下(特別表現在所謂的華盛頓共識)¹⁰，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B)等全球化機構的推動，大規模地進行經濟改革與轉型，試圖促成“經濟全球化”的到來(Stiglitz, 2002)。然而，這些上個世紀末的千禧年福音，如 Stiglitz 所言，往往只會使得後社會主義國家陷入極度不穩定與不公平的政治經濟局勢，也屢屢遭來開發中國家的不滿與社會運動的抗爭。同時，這種上個世紀末對於市場福音的信念，在經歷過 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爆的全球經濟危機的今天看來，似乎顯得格外的諷刺¹¹。

⁹ 所謂的震盪療法，指的是採取快速市場化的政策措施，試圖立刻解除前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價格的管制與經濟部門的控制，並且透過私有化政策立即將過去的國營企業民營化，企圖利用產權制度的改革來促進經濟效率。其背後的精神乃是認為，只要解除過去社會主義對於經濟體制的不當干預，市場機制自能將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步。震盪療法的提倡者，也是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顧問乃是美國經濟學家 Jeffrey Sachs。關於 Sachs 的主張，請參見 Sachs & Lipton (1989)。

¹⁰ 所謂華盛頓共識，乃是指由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B)與美國在 1989 年，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危機與後社會主義轉型的研討會中，所形成的一套政策指導方針，並由與會的經濟學家 John Williamson(1990:ch2)整理命名之。其核心原則乃是財政節約、民營化、市場的去管制(自由化)。華盛頓共識背後的理論精神，正是 1980 年代興起的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主要是用來描述 1980 年代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上台後所引導的一套政策思維。雖然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的政策發展有諸多的變形，但是，在政策建議上，它往往會強調減少政府赤字，解除政府對於勞動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管制(如廢除或降低最低工資、利率的自由化、資本的自由進出)、消減補貼性的社會福利措施，廢止或降低再分配的稅制與稅率，盡可能地民營化國營事業與公共服務部門，鼓勵與促進國際間的自由貿易與資金自由流動。此外，更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甚至會試圖在本來不具市場或不那麼市場傾向的地方，積極地創造市場機制(如教育、環境保護、醫療等領域)。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簡介與分析，請參考 Harvey(2005)。

¹¹ 值得注意的是，1970 年代以降，基於效率市場的假說，由財務經濟學之資產定價的財務工程

事實上，經濟學家對於經濟改革的介入，以及經濟論述對於經濟實在的干預，並非什麼新鮮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為了遏止 1929 年經濟大恐慌的再現與圍堵共產主義的傳播，凱因斯主義經濟學被各國政府奉為政策的圭臬，經濟學家開始大規模地介入了國際政經局勢的重整(如布林頓森林體系與馬歇爾計畫)，積極地充當各國的經濟顧問，介入了各種經建工程的計畫，英美經濟學也大幅度地向各國輸出。此時，對於市場失靈的憂慮與經建計畫的必要性，往往是政策的主導性原則(Coats, 1981, 1997 ; Hoover, 2007)。然而，隨著 1970 年代石油危機與停滯性膨脹的出現，凱因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出現了所謂的典範危機(Bell & Kristol, 1989)。於是，在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思維就逐漸地浮上了檯面。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不但在西方先進國家裡試圖用市場的自我管制，取代凱因斯經濟學的鑲嵌性自由主義(Harvey, 2005; Henisz, Zelner, and Guillen, 2005; Prasad, 2006; Cohen & Centeno, 2006)，更大幅度地介入了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改革(Dezalay & Garth, 2002 ; Babb, 2002)¹²，在 1990 年代更介入了上述後社會主義的經濟轉型與經濟全球化體系的打造。簡言之，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經濟學家與其知識信念(不論其結果成敗與動機好壞)如何將世界各國作為其經濟知識的實驗場，在人類的社會生活與知識場景中，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Bockman & Eyal, 2002)。

上述這種經濟學作為社會工程學與經濟學家作為社會工程師的現象，一定程度上也為相關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所注意。不少研究政策的新制度論學者，在探討國家與政治經濟發展的過程時，開始正視經濟理念與經濟學的知識社群在各國經建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試圖分析經濟理念對於政策的形塑效果，也試圖分析特

模型，所創造出來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以及新自由主義對於金融市場的自由化的推動，可以說是這次經濟危機背後最根本的原因之一。關於財務經濟學如何促成了這一波投資革命，請參見 Bernstein(1992,2008)、MacKenzie & Millo (2003)、MacKenzie (2006)。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如何引發經濟泡沫與危機的分析，請參見 Shiller(2005)。

¹² 其中最著名、也最具有爭議性的例子，莫過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透過所謂的 Chicago Boys，充當智利獨裁者 Augusto Pinochet 的經濟改革顧問，並支持其對於左派異議人士的打壓，請參閱 Valdés (1995) 。

定政治制度如何影響了特定經濟理念的接受¹³。也有不少學者試圖從專業社會學的角度的出發，考察經濟學的社群形成，探討其專業化、制度化與國際化的歷程，並分析戰後英美經濟學如何取得對於經濟議題的支配性論述地位¹⁴。另外，也有一些學者，將經濟論述視為一種意識型態，深究經濟學家與經濟學論述在經濟現代性中扮演的構成性角色，並分析經濟學的抽象理論模型與分析工具，如何透過經濟學的社會工程，在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構築了所謂現代經濟體系與形塑相關的經濟行為¹⁵。

¹³這種分析取徑主要是以所謂的歷史制度論為主，試圖分析在政策場域中經濟理念如何對政策產生影響，以及試圖解釋理念的接受過程(請參見 Hall, 1989, 1993、Campel, 1998, 2002、Campbell & Pedersen, 2001、Blyth, 2002、Fourcade-Gourinchas & Babb, 2002)。至於，經濟學與國家政策之歷史比較的介紹，請參見 Furner & Supple(1990)。國家政策與知識信念的更一般性討論，則請參見 Rueschemeyer & Skocpol (1996)。只是，這種分析取徑主要的研究對象與分析單位乃是政策，關心的是理念在政策形成中產生的作用(以及理念與利益的糾葛)，以及對理念的接受與否如何受到既有政治結構的影響，因而較為忽視理念本身的知識構作歷程。

¹⁴這樣的取徑主要有兩批學者，一種是經濟思想史學者，試圖透過 Merton 的科學社會學的取徑，分析經濟學學術社群的建立、發展與公眾影響力。有關文獻請參見 Stigler (1982)、Coats(1981, 1993, 1997, 2000, 2007)、Colander & Coats (1989)、Cockett(1995)、Goodwin (2007)、Cardoso (2007)。只是，這種取徑比較注重知識社群的發展樣貌，易忽略經濟論述的社會影響力面向，或將其視為理所當然。另一種則是專業社會學家，試圖採取 Abbott(1988)學科競逐議題管轄權的分析取徑，並結合歷史比較方法，來分析經濟學的專業化與國際化的歷史進程歷程，並試圖考察此一進程與國家經建發展之間的關係，請參見 Reay (2004)、Fourcade-Gourinchas (2000, 2001, 2006)、Babb(2001)。這些取徑主要關心的焦點，乃是經濟學社群的建制化與影響力、學科內部與外部不同理論取徑的競逐、不同經濟學取向的變異原因等等。由於其主要的分析方法，是以經濟學家的意見與社會行為、知識實作的組織模式作為研究對象與分析單位，因此，往往會傾向於從外部方式來考察經濟論述的知識構作(如不同學派之間的競爭、學科對於社會議題壟斷、國家的教育制度對學術發展的影響等等)，較少深入經濟論述的知識構作的內部歷程。因此，這種取徑會比較接近“經濟學家的社會學”，而非“經濟學的社會學”。

¹⁵將經濟論述視為一種意識型態，並批判其對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的證成，在社會科學內部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到 Marx 的一系列著作。只是，Marx 將經濟學定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以及其上層建築的分析架構，已不再具有說服力。然而，將經濟論述與相關的意識型態(如個人主義)，視為一種西方的特殊產物，並且指出經濟論述的理論、工具與相關意識型態，深入地捲入了現代性的語意學與社會形構，甚至引發了後殖民的慘況，已為人類學家所重視(請參見 Polanyi, 1947, 2001; Dumont, 1977, 1986; Dilley, 1992; Carrier, 1997; Carrier & Miller, 1998; Mitchell, 1998, 2002, 2005, 2006, 2007; Bourdieu, 2000a)。事實上，長久以來人類學就相當敏感於西方與非西方的差異，Polanyi 與 Dumont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對於西方的經濟意識型態展開了分析與批判。然而，經歷了關於後殖民狀態、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轉向等批判與反省後，上述的 Dilley、Carrier、Miller、Mitchell 等人則進一步指出，西方的經濟理論的抽象模型，不再只是單純地描述這個世界，反而倒過來試圖把世界予以重組以符合模型所述，進而構成(constitute)、製造(make)、發明(invent)了現代經濟體系與經濟實作。因而，Carrier 與 Miller 利用了“擬真主義”(virtualism)來指稱這樣的現象，Mitchell 則利用 Callon(1998)的“表現性”(performativity)概念來刻畫這樣的過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Miller(2002)的“擬真主義”立場，基本上是反對 Callon(1999)挪用語言學“以言行事”的想法所發展出來的表現性概念，認為他預設了經濟模型與經濟實在的完全反映關係，這將導致 Callon 只能完全合理化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干預，忽視了經濟論述的社會工程可能遭致的抵抗與所引發的社會後果。只是，我們仍必須指出，無論是“擬真主義”或“表現性”的概念，雖然更正視論述的知識構作的歷程與效果，但是，在分析經濟論述時，往往過於快速地從論

這些不同的研究取徑，固然有助於理解二戰之後從凱因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思維的變化，以及從凱因斯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轉折，乃至於經濟學之社會工程的歷史變化與社會效果，也使得我們在反省後社會主義轉型、開發中國家經改、全球化等相關爭議時，必須更正視經濟學的社會工程在政策思維、學科知識與意識型態上的諸多形貌。然而，我必須指出，經濟學之社會工程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經濟論述如何被用來合理化特定經濟政策，也不在於經濟學家的公共參與，更不在於經濟論述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為特定的利益與群體掩護與背書。相反的，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市場此一觀念所具有的曖昧性與模糊性。

在上述從凱因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折、千禧年的市場福音、經濟學的社會工程等議題中，無論是反對或贊成市場機制、強調市場失靈或市場自律、支持計畫經濟或市場經濟、傾向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支持全球化還是反全球化的，市場能否自我管制一直都是爭論的主要軸線。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市場是否能自我管制，而是在於市場一詞似乎具有著雙重意涵：一方面是經驗性的，另一方面則是概念性的(Aldridge, 2005:6; Jameson, 1991: 260)。在上述的議題與相關討論中，這兩面性往往容易被等同與貼合¹⁶。於是，我們無法區分到底是市場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出了問題(如同馬克思主義與凱因斯主義所主張與批判的)，還是市場的經濟表述出了問題(如同經濟學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所做的捍衛與澄清)。同樣的，我們也無法清楚地知道，市場改革的失敗與引發的危機，是由於市場相關的模型與政策受到陽奉陰違的執行因而未能徹底的實現(如同經濟學家對其社會工程常做的辯護)，還是因為這些模型與政策的不切實際，低估

述與實作的關係切入，忽略了論述所可能具有的不同層次(從概念、模型、框架到後設論述)，也忽略了現代性底下，論述與實在的糾結纏繞所具有的複雜性(更簡單地說，為何現代經濟論述會不再描述實在，反而試圖重組與干預實在)。

¹⁶倘若我們不先入為主的接受任何有關於“市場”的相關觀念與知識，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最多只會看到各種大小集市(marketplaces)，以及廠商與廠商、廠商與個人、個人與個人之間各式各樣的交易。因此，利用“市場觀念”(先不論其意涵為何)來“模擬”這樣的交易所形成的秩序，這本身就是社會科學基於特定知識視角對於實在所作的概念化與抽象化。而且，這種概念化與抽象化，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往往會用完全競爭市場的觀念來加以表述。然而，問題正是在於這樣的概概念化與抽象化，往往基於“誤認”而“肯認”地將“模型的實在”等同於“實在的模型”，而且，人們也總是試圖去談論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the” free market)。於是，在學術討論、政策辯論與日常生活的議論中，市場的概念性與經驗性往往被等同與貼合。

了實在的複雜性(通常來自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者對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

簡言之，倘若我們要反省經濟學的社會工程現象，我們就必須正視“市場”的雙重意涵所帶來混淆與困境。“市場”在概念上與經驗上的混淆，不但使得關於市場的經濟理論與模型，容易有本質化、實體化的現象(意即忽略了經濟學模型與實在的落差，這是經濟學之社會工程學屢屢引發爭議的原因)，而且，也使得對於經濟學的社會工程學現象的相關研究，低估了市場觀念的知識構作上所具有的複雜性與爭議性。因此，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市場”的相關理論與概念建構，如自利個人(經濟人假設)、均衡、效率、完全競爭等概念，不僅形構了各種經建政策背後根本性思維，也導致了經濟學內部正統與異端的分化，更影響了人們對於經濟實在的相關認知範疇，甚至更構成了人們對於社會秩序的認識模本(Smart, 2003；Slater & Tonkiss, 2001；Courtemanche, 2005)。或許，這才是經濟學的社會工程現象的真正問題所在。

上述的討論，似乎引導著我們把目光轉向於“市場”觀念的概念化過程。因此，底下的討論，我將視角轉向於具主流地位之新古典經濟學¹⁷，討論其對於市場的相關理論建構，進而提出本論文的研究問題。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觀念所具有的弔詭性

在當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對於市場的觀念的概念表述，最具體且完整的表達，乃在於所謂“完全競爭市場”(perfectly competition market)的觀念中，並

¹⁷ 新古典經濟學不是一個容易定義的概念。一般而言，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指向一般個體經濟學教科書所教授的內容。根據 Becker(1976:5)的說法，新古典經濟分析的本質，乃是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與偏好穩定等假設的結合，並且始終如一的貫徹到底(當然也衍生出新的假設與定理)。本文簡單地採取這個定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奧地利學派對於不確定性、訊息問題與競爭過程的強調，以及對於主觀主義的強調(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證主義與數學工具的運用)，因此，奧地利學派並不包括在這個定義底下，即便他們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有一定的親近性。關於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的比較，請參考 Skousen(2005)。

且進一步透過所謂的“一般均衡分析”(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獲得數理化的證明與形式化的模型建構¹⁸。而且，新古典經濟學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套從自利個人的理性選擇出發，通過競爭與價格機制的協調，達成資源最有效率配置的市場理論¹⁹。新古典經濟學也往往基於此一模型(特別是基於 Pareto 效率所衍生出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與第二定理)反對政府對於經濟的大幅干預，並為市場經濟體制背書²⁰。

簡言之，透過一般均衡分析對於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完備，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為“市場經濟體系”建造起一個井然有序的經濟理論模型，而且，這樣形式化與數理化的市場模型也反過來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取得知識上與社會上的權威(兩位對於一般均衡提出完整證明的 Kenneth Arrow 與 Gérard Debreu，也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²¹。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樣的看似美好的“市場”與新古

¹⁸ 關於完全競爭市場與一般均衡分析的概念發展史的介紹，請參見 Stigler(1957)、Arrow & Hahn (1971)、Ingrao & Israel (1990)。基本上，一般均衡分析對於完全競爭市場的證明，可以說是經濟學數理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此，Hutchison(2000)與 Blaug (2003)將其稱之為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formalist revolution)。然而，正是基於這場形式主義革命，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屢屢遭來了非現實性、非科學性、黑板經濟學的批評。同時，也基於這場形式主義革命，使得市場的觀念在主流經濟學中逐漸地往去歷史、去(社會)制度化、去道德化的方向發展，因而遭來許多的非議(Hodgson, 1999, 2001; Milonakis & Fine, 2009; Fullbrook, 2003)。對於一般均衡分析的內部批判與捍衛(如個人作為市場價格接受者與均衡假設的套套羅輯、廠商理論的缺陷、時間向度上跨期交易市場的非現實性假設、貨幣因素的缺乏等等)，請參考 Hahn(1981)。

¹⁹ 簡單地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往往認為個人是最為了解自己利益為何的人，也是個人利益的最佳看護者，在面對資源有限的稀少性問題下，個人將會透過成本效益的衡量，追求個人效用的極大化(所謂經濟人的假設)。此外，新古典經濟學家也相信，透過個人(通常指向廠商與家戶單位)對於利益的極大化追求與相互競爭，經由非個人的(impersonal)市場供需價格機制的協調(個人僅作為價格的接受者)，將會達成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形成所謂的經濟均衡(Pareto 最適化分配)。這種市場觀念的概念與理論建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之中，最為清楚地表達在所謂一般均衡分析之中，也往往透過 Adam Smith 的“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隱喻(metaphor)來表達(cf. Arrow & Hahn, 1971; Ingrao & Israel, 1990; Rothschild, 1994; Grampp, 2000)。

²⁰ 由一般性均衡理論出發，經濟學家發展出福利經濟學的兩項定理。簡單地說，第一定理指的是在完全競爭市場的情況下(意即在充分競爭下，且不存在所謂的外部性、規模經濟與不對稱訊息)，競爭性均衡將可以使得社會福利達到 Pareto 最適化(意即，不可能在不損害任一人情況下，使得至少另一人福利得到改善)。第二定理則是指，任何一種人們想要達到具 Pareto 效率的社會福利狀態，都可以透過市場價格機制達成，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僅僅只是總量的再分配(透過稅收或補貼)。正是基於這兩項福利經濟學的定理，經濟學家往往傾向於支持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這兩項定理，也是市場看不見的手的現代表達。從資訊經濟學出發，對於這兩項定理的討論與批判，請參閱 Stiglitz(1991) on <http://www.nber.org/papers/w3641.pdf> 與 Stiglitz(1994: ch3, ch4)。至於從經濟理論出發，對於這兩個定理所立基的功利主義哲學的批判，請參考 Sen (1987, 2001, 2002)。

²¹ 如同科學史家 Porter(1995)所指出的，在當代社會的公共討論中，數學的運用與否(無論是統計還是公理推導)，往往是政策主張或理論建構(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是否具有客觀性、科學性的

典經濟學的相互證成，卻弔詭地在理性選擇、競爭機制、市場的必要性等三個理論問題上，出現了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的弔詭現象。

首先，由自利個人理性選擇出發的新古典經濟學，何以在其理論模型中，行動者既不理性，亦沒有選擇？

在新古典經濟學之中，經濟學往往被定義為是，一門研究人們在稀缺性資源的前提下如何作選擇的一門科學²²，因而有別於社會學是探究人們為何會沒有選擇的科學(Duesenberry, 1960:233)。基於這種理性選擇的學科自我定位，經濟學進一步透過所謂效用極大化與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等預設²³，避開了對於行動者主觀偏好形成的心理面向的討論，將經濟分析的行為基礎奠立在所謂理性經濟人的抽象模型上。並且，經由此一抽象行為模型，經濟學進一步將其行為基礎予以一般化、形式化與數學化，形構了一套關於行動者理性選擇的理論，看起來既客觀又科學。

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固然引來許多不同學科的批評²⁴。然而，撇開這些從不同行為預設出發的外部批評不談，上述新古典的理性選擇的行

重要判準。然而，Porter 進一步指出，這種社會科學對於數理化的追求，並非如一般人所想的乃是一種更接近真理的理論建構所必要的方式。相反的，數學的運用與客觀性的追求，往往是由於知識菁英試圖透過數學的非個人化的表徵來免除外部壓力與審查的一種手段。因此，知識的數理化，並不意味理論對於實在正確表徵，而是反映了一種用數字的精確性取代理論正確性的“客觀性文化”。延續 Porter 的看法，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正是基於這種“客觀性文化”，可以透過數學精確表達的新古典經濟學，因而被賦予了知識上與社會上的權威，進而被稱許為社會科學的女皇。

²² 這是源於 1932 年 Lionel Robbins(1984)所作出的經典定義。

²³ 所謂的顯示性偏好乃是當代新古典個體經濟學關於消費者行為的理論基礎。其基本內涵就是在給定的價格與預算限制下，所謂的理性行動者將選擇在他偏好尺度上最高的商品組合。換言之，消費者的外部實際選擇將反映其內部的主觀偏好，這使得經濟學家無須對於行動者的偏好進行探究與評判(cf. Stigler & Becker, 1977; Becker, 1996)。同時，也基於顯示性偏好的理論，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出關於行動者偏好的幾個假設，如偏好具有獨立性、穩定性(至少在短時間內是如此)、遞移性(cf.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

²⁴ 關於理性經濟人預設的爭議，在社會科學由來已久。例如，社會學家往往會從規範(結構功能論者)與權力(馬克思主義論者)這兩個角度，批判自利個人的假設不具現實的基礎，低估人性的複雜性，忽視了利他主義的傾向(cf. Etzioni, 1988)。心理學家往往會基於 Herbert Simon(1957)所謂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角度出發，批判這樣假設預設了行動者全知全能的理性，不符合真實的行動者的認知過程與能力(從這樣立場出發，認知心理學家也發展出所謂的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兩個流派)。對於此議題的更進一步討論(特別在哲學與方法論的問題上)，請參考 Hollis & Nell(1975)。在此，限於篇幅與旨趣，我無法更詳細地討論這些爭議。

爲理論，依然產生了“理論結構”與“推論邏輯”上的弔詭。首先，上述的行爲理論所預設的效用最大化與顯示性偏好的假設，固然使得新古典經濟學能將理性經濟人的自利公理予以數學化與形式化，但是，這兩項假設則更進一步預設了行動者具有完全的訊息與完全理性。在所謂的完全理性與完全訊息的狀況下，事實上，行動者根本就毫無理性評估、審慎判斷的必要，使得所謂決策與選擇變得毫無意義²⁵。這使得強調行動者理性選擇的新古典經濟學行爲理論，事實上未能爲行動者的選擇與決策保留任何理論上的餘地。

其次，固然上述新古典經濟學的顯示性偏好理論使得經濟學家避開了關於行動者複雜之主觀性偏好的爭議，但是，這卻爲顯示性偏好理論是否可以或需要否證，以及是否是套套邏輯帶來了爭議(行爲需要透過偏好來解釋，但是偏好卻又是透過行爲來界定)。此外，由於顯示性偏好理論最根本的基礎乃是預設了行動者偏好具有內在的穩定性與一致性，這意味著所謂的理性行動者，在一定時間內面對所有的選項，都將作出相同的選擇，這樣的理性行動者的假設，往往只能推論出相當荒謬的結果，形成 Amartya Sen(1977)筆下的理性傻瓜(rational fools)²⁶。例如，如果行動者是理性的，面對不同選項的排列，持續做出相同的選擇，在長期的時間內，他將持續吃相同的食物、走相同的路線、穿相同的衣服等等，在日常生活中顯得詭異與不合理的行爲舉止。

最後，新古典經濟學雖然立基於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建構了一套在社會科學中看似最爲嚴謹、客觀、科學的行爲理論(就其數學化、公理化的程度而言)。然而，新古典經濟學往往未能交代清楚，所謂的理性是對誰而言才成立的？是觀察者的所持有的客觀與邏輯的理性，還是行爲當事人的主觀理性(Smelser, 1992)？

²⁵倘若選擇與決策具有任何理論上的意義，其前提都來自於行動者面對的是不確定的情境，以有限的訊息進行決策與選擇。然而，在完全理性與完全訊息的狀況下，無論行動者偏好如何，在最大化假設下，行動者只需機械地回應給定的價格與預算等限制，尋求成本的最小化與效用的極大化即可，這導致選擇與決策成爲多餘(Hodgson, 1998: ch4)。

²⁶關於 Sen 對於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理論結構的批判，請參考 Sen(1987, 2001, 2002)。另外，值得強調的是 Sen 對於新古典經濟學行爲基礎的批判，主要來自他對於孤立行動者假設的批評，以及他對於價值投注(commitment)的強調。這樣的批評可以進一步關連到行爲經濟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以及當代政治哲學中 John Rawls(1972)對於功利主義政治哲學的重建。

如果理性只有對觀察者而言才成立，那麼所謂的理性行為假設，不過只是理論邏輯系統基於公理推導需要的一種權宜之計²⁷。若此，新古典經濟學所標榜的主觀主義與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立場，還具有什麼樣的意義？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對於行為當事人而言，到底是一種實證的描述理論，還是規範的行為指導理論²⁸？如果理性對行為當事人而言是成立的，那麼行動者的主觀認知因素又該如何與極大化行為假設協調？標榜形式化與公理化成就的新古典經濟學，又是否能容許有認知轉向與詮釋學轉向的可能？

其次，基於對於市場競爭的強調，建構了所謂“完全競爭市場”模型的新古典經濟學，何以在其理論模型中，事實上不存在所謂的“競爭”？

一般而言，經濟學家之所以對於市場具有強大的信念，其關鍵乃是基於市場競爭充分地展現了所謂經濟自由，而且，此經濟自由進一步構成了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同時，新古典經濟學也相信，透過競爭的機制來消除壟斷與寡佔，將可以充分彰顯所謂的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真正的擴大社會福利的狀態(cf. Friedman, 2002; Nozick, 1974; von Mises, 1991)。基於這樣的立場，新古典經濟學往往透過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來表述這樣的市場狀態。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至少立基於三項基本的假設(Hayek, 1949:95)：一、在完全競爭市場的狀態下，同一性質的產品，存在有眾多的消費者與生產者，因此，不存在壟斷利益，每個人都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二、人們可以自由的進出市場，而且，價格的波動與資源的流動也不存在其他限制。三、所有參與市場過程的人都完全了解相關的因素。

²⁷ 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基於這個這樣原則，利用源自 Milton Friedman 所謂“as if”的方法論上的工具主義立場，捍衛其行為假設的非現實性。對這種方法論的立場而言，其理論命題的有效與否與漂亮與否，並不在於理論命題的假設是否正確地反映了社會實在，而是在於理論命題的預測能力，以及所需要的假設多寡與否(意即所謂的簡約原則)(Boudon, 1998)。

²⁸ 這一點最容易反映在從新古典個體經濟學出發對於社會議題進行分析的理性選擇理論上。特別是當實際的經驗研究不符合理性選擇理論的預測時，理性選擇理論往往並非試圖修正自己的行為假設，反而容易以指責行動者乃是非理性的來加以辯解。這不僅導致了一種對於理性主義的過度擴張，形成教條主義，甚至引來理性選擇理論是否為規範理論的爭議(Elster, 1990)。因此，近來的理性選擇的倡導者，如 Elster(1996, 1999)、Boudon(1998, 2003)等人，都試圖從主觀理性角度或引入主觀的情緒、道德感等變數來重建理性選擇理論。

素。基於這些假設，新古典經濟學也進一步發展出所謂的一般均衡分析，完備了關於完全競爭市場的相關數理證明(Arrow & Debreu, 1954)。

上述新古典經濟學對於競爭的信念，固然引來許多的外部批評²⁹，但是，倘若僅僅就完全競爭市場的相關理論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對於市場競爭的表述，在理論結構與推論邏輯上，仍然存在著極大的問題。首先，基於對於市場競爭的信念，以及完全競爭市場的表述，新古典經濟學往往將完全競爭視為基本原則，並把壟斷視為例外(即便有壟斷的存在，只要引入競爭即可趨向於完全競爭市場)。但是，不少論者都指出，現實生活的市場，幾乎都不是完全競爭的，壟斷式的競爭才是現實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cf. White, 1981; Stiglitz, 1994: ch3)。

其次，為了回應上述的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往往認為完全競爭市場乃是一種對市場的理想狀態的表述，上述的批評並不適用於檢驗所謂完全競爭市場理論與一般均衡分析。即便存在這樣的回應，相關論者仍然進一步質疑完全競爭市場與一般均衡分析的相關假設缺乏任何現實性的基礎(如不同廠商幾乎都生產相同的商品，市場進出完全無須條件、市場交易具有完全知識、沒有考慮交易成本與貨幣因素、預設了所有商品都有跨期交易市場的存在等等)，猶如空中樓閣，並非是對於市場合理的理想狀態描述。至於，對於完全競爭市場進行數理證明的一般均衡分析，除了沒完沒了的對於純粹的邏輯問題予以形式化外，實際上缺乏任何經驗內容，因而無法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一般性均衡是如何得到實現，以及這種均衡又是如何維持著(Blaug, 1980: ch8)。

最後，更為弔詭的是，由於完全競爭市場將競爭視為一種終局狀態(end-state)，預設了一種靜態的競爭觀念，這不但使得“競爭”所欲導致的市場均衡，被預設為自始自終就存在，因而使得“競爭過程”從事實上的經濟活動被轉譯成一種邏輯關係(因而可以加以數理化推導)。而且，這也使得“競爭”作為一種動

²⁹ 至少，在社會學傳統裡，就存在著許多對於競爭的社會後果的批評，在 Marx(1988)的傳統裡，至少可以從“異化”的觀點來批評市場競爭對於人性的傷害；Durkheim 傳統則是可以從所謂的”失序”(anomie)，來批評競爭所導致的無政府與缺乏規範的狀態。這裡限於篇幅與旨趣，我們將不去論證在實際社會生活裡，競爭所導致的利與弊。

態活動過程的經濟意義，在概念框架上被挖空，成為一種沒有意義的理論術語，一套徒具數理證明的空洞模型。因此，在同質化的商品空間裡，以及在完全訊息的預設下，完全競爭市場理論不僅沒有為“競爭”作為一種過程留下任何餘地，而且，“競爭過程”在此一模型裡也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Hayek, 1949:ch2, 5; Blaug, 1997: ch6)³⁰。

最後，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框架到底是證明了市場必要性，亦或證成了計畫經濟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新古典經濟學從自利公理出發，經由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與一般均衡分析，完備了關於市場的理論模型。經濟學家也往往立基於這樣的市場均衡架構發展出來的福利經濟學的兩項定理：一方面，強調透過競爭的引入，打破壟斷與寡佔，使得社會福利能夠最適化，另一方面，則主張有限的政府干預，限縮政府對於市場的管制，以期讓市場價格機制能夠發揮正常的協調作用，避免不當干預所造成的惡果。

上述這樣的概念框架，固然看似完美地證成了市場經濟的必要性，然而，弔詭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概念框架與研究工具似乎亦可用來證明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的可行性(至少是理論上的可行性)。首先，新古典經濟學基於方法論個體主義所發展出來的個體行為的理性選擇理論與均衡分析等概念工具，不僅被用來分析所謂市場經濟下的消費者與廠商行為，一些學者，如 Elster(1982, 1983)與 Roemer(1981, 1982)等人，則進一步使用相同的理論工具與相關預設，試圖為馬克思的剝削理論與階級分析，奠立穩固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經濟分析的基礎，以圓成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³¹。

³⁰ 簡單地說，倘若“競爭”要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其前提就是差異與不確定的存在，基於這兩個前提，“競爭過程”一方面可以強化差異與多元，促成更多可能性的出現，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不同的差異達到某種協調。然而，由於完全競爭市場模型採取的是一種競爭性均衡的靜態分析，而且，往往預設了某種標準化的商品空間與完全資訊的存在，因而，在這樣的模型裡，“競爭”不但不存在，而且，也不必要。

³¹ 上述這種理論傾向，一般被稱為分析馬克思主義(Aalytical Marxism)。所謂分析馬克思主義，

其次，固然新古典經濟學透過所謂的一般均衡分析，完備了對於所謂完全競爭市場的形式化表述，也進一步透過福利經濟學兩項定理，證成了市場經濟的可欲性。然而，由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往往預設了完全理性、完全訊息與靜態均衡，因此，自 Léon Walras(一般均衡分析的首要提議者)以降，到社會主義計算之辯的 Oskar Lange 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屢屢試圖去證明在社會主義下(在資本與利潤公有的體制下)，至少在生產方面，政府對於社會整體資源的調控可以跟私人企業運作得一樣好 (意即，將政府等同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廠商，採取相同的配置方式與理性計算，追求利潤極大化)。同時，相關論者也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理論預設下，試圖進一步說明，在靜態均衡的狀態下，由於充分訊息的存在，生產、分配與消費等經濟過程，無論是透過市場價格的交換機制，抑或中央計畫的調控，基本上是無關宏旨的³²。因此，新古典經濟學似乎面臨一種概念框架上的弔詭，倘若新古典經濟學對於市場經濟的模型表述是正確的，那麼相同的概念框架似乎同樣證明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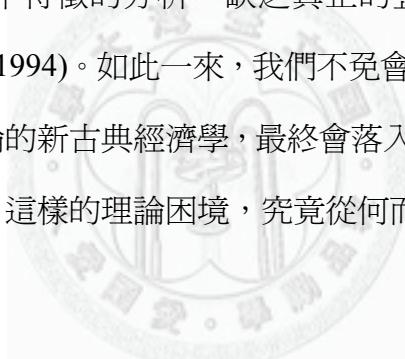
最後，上述新古典經濟學所以面對著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弔詭，其關鍵的原因，除了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若干不當的基本理論預設外，更出自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框架往往將市場經濟體制視為是外部給定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正是基於這種理所當然的假定，才進一步演繹出相關理論假設與數理證明)，因而，無法阻止相同的理論預設與概念工具，被用來證成另一種外部給定的體制的可行性。此外，更嚴重的是，由於這種對於市場經濟體制外部給定的理所當然，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未能正視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形構與歷史發展。因而，忽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性歷程，不但弔詭地伴隨著科層組織、大型公司此一看得見的

其主要起始點乃是 Cohen(1978)從分析哲學的立場，對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所進行的理性重建。基於這樣的起點，相關馬克思主義論者，開始重新解讀馬克思的文本，加以“去蕪存菁”(主要是去黑格爾化與去形上學化)。同時，相關論者(Elster 與 Roemer 是主要代表)也開始從方法論之個體主義的立場出發，引入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分析工具，試圖重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階級理論與剝削機制的分析。關於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文獻，請參考 Roemer(1986)。

³² 這裡涉及的問題，乃是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之辯”(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相關於爭論的發展歷程與理論議題的討論，可以參考 Hayek(1949:ch7-9)、Lavoie(1985)、Stiglitz(1994)。這裡我們暫不處理這個辯論的相關細節，留待後面再更詳細地加以討論。

手的蓬勃發展(Chandler, 1977；Braudel, 1983)，同時，也伴隨著國家對於商業領域更加複雜化與精細化的行政管制(Durkheim, 1984；Vogel, 1996)³³。

從上述三點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弔詭的討論來看，我們似乎必須同意Hodgson(1999: ch2)所指出的，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一個關於人們如何選擇的學科，有的只是給定個人的偏好對於各種選擇序列機械回應的結果。而且，新古典經濟學並不理解真實的市場過程，新古典經濟學家對於市場一詞的頻繁使用，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理解與準確地使用所謂“市場”概念。同樣的，新古典經濟學並不傾向市場，也缺乏適當的市場理論，更遑論去討論市場真正的優缺點。因此，Hodgson 警告我們，不要把新古典經濟學與市場混為一談。簡言之，新古典經濟學最多只有關於市場若干特徵的分析，缺乏真正的整體市場制度形構的理論(White, 1981；Swedberg, 1994)。如此一來，我們不免會好奇，何以試圖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對象來建構理論的新古典經濟學，最終會落入這樣的理論弔詭，產生概念框架的混淆與錯置呢？這樣的理論困境，究竟從何而來？



³³ 一定程度上，所謂的交易成本經濟學(Williamson, 1985)或新制度經濟學(North, 1990)似乎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對於公司發展與經濟制度分析上的缺陷。然而，他們的修正策略主要是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預設(如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以及將所謂的外生變數(如行動者的偏好、產權與制度誘因)重新引入新古典經濟的分析框架中(極大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均衡與效率分析等仍是主要的概念工具)。實際上，這並未能正視競爭與壟斷、自由市場與政府管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乃是既對立又共生。因而，無力去回應此一弔詭。在當代經濟學眾多流派中，大概只有奧地利學派的 Hayek 真正意識到此一弔詭的存在，以及其所造成的理論難題與概念混淆。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Hayek(1960: ch2; 1973: ch1-2)主要是從人類理性的不完備性與知識的侷限性出發，強調市場乃是一種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一種行動的非預期的結果，而非人為的設計。基於這樣的立場，Hayek 進一步區分兩種秩序觀念，一種是人造的秩序(或稱組織)，另一種就是自發性的秩序。基於這樣的區分，Hayek 清楚地認識到，這兩種類別的秩序在現代性底下乃是共生在一起。然而，或許是因為他身處於總體經濟計畫與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因此，他進一步將這樣的區分賦予規範性的價值意涵，急於去批判政府管制對於自由的戕害，駁斥社會主義的狂妄與對理性的濫用，呼籲人們對於自發性秩序的尊重，以避免破壞所謂開放的、偉大的現代市場社會(Hayek, 1944, 1952, 1988)，卻未能對於這兩種秩序共生的弔詭，進行更具歷史意涵的考察與理論反思。

四、總結：現代性經濟想像---絕對化市場觀念的發展歷程

綜合上面所述，我已經指出，基於市場一詞的雙重意涵所產生的混淆，導致許多關於市場體制的爭議與辯論，往往顯得似是而非。同樣的，新古典經濟學對於市場的相關理論建構，往往也過於理所當然。市場與相關的知識構作所產生的這種似是而非與理所當然，不但使得現代主流經濟學得以朝向數理化與形式化的發展，在學術論述與實際社會裡，取得了主導經濟議題的權威地位，而且，也使得經濟學家往往在概念框架的錯置與混淆下，憑藉著上述的權威與社會工程學的知識態度，透過政策等社會工程對於社會實在進行干預，因而屢屢遭來抨擊與非議(cf. Sen, 1987；Hayek, 1944:ch1；McCloskey, 1996)。

然而，這樣的問題，並不僅僅只是對於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預設進行放寬與修正(如交易成本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提議)，抑或對於既有概念框架進行修補與矯正(如一般均衡分析後來的發展)，就可以解決的。事實上，這樣問題的根源，乃在於 Barber(1993)所指出的，從 Adam Smith 的看不見的手，到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主流經濟學對於市場的知識構作歷程，往往理所當然地預設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存在，並且，在概念框架的形式分析過程中，逐漸的將市場去歷史化、去社會化(市場成為不具時空背景與社會脈絡的一種制度)，產生了所謂“具體性錯置的謬誤”(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進而將市場觀念予以抽象化與絕對化(市場整體制度形構逐漸銷融於理論視野之中，成為外生且自始就被預定存在的)，這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³⁴。

³⁴ 這樣的問題，並不單純只是經濟學的內部問題。即便在社會學界，無論是 Parsons 舊經濟社會學的“經濟與社會”典範，還是當代新經濟社會學的鑲嵌命題，社會學屢屢試圖透過挑戰經濟學的市場絕對化的觀念來建構相關的經濟社會學理論。但是，卻往往在概念框架上先供奉“自律市場”的存在，然後才試圖從“外部”討論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如 Parsons 的系統分化概念與 Granovetter 的網路鑲嵌概念)。基於這種外部性的思考(意即，不是從社會關係中討論經濟行動與經濟體系如何進生)，新舊經濟社會學也在概念框架的建構過程中，混淆了“經濟／社會”、“經濟學”／“社會學”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因而往往先將經濟學理論等同於經濟實在，然後才試圖用社會學理論的框架去含納經濟學論述(如 Parsons 的舊經濟社會學)，或者試圖透過“經驗事實”去駁斥經濟學論述來建構理論命題(如新經濟社會學)。這不但使得經濟社會學無法真的回應主流的經濟論述，而且，還導致相關理論往往在概念化上具有嚴重的缺失。此外，我也必須指出，這樣的問題，不僅僅只是涉及特定學科在概念化上的缺失，更涉及了在現代性的庇蔭下，強調市場絕對化的經濟文化形成，以及相關概念的歷史意義的限定與承載(吳鴻昌, 2009, 2010)。

換言之，正是基於絕對化市場觀念的“具體性錯置的謬誤”，才使得市場一詞的雙重意涵產生了混淆，進而引發經濟學之社會工程學的相關爭議。同樣的，也基於這種謬誤，才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在自以為分析了市場的同時，卻弔詭逐漸地遠離了市場。因而，市場觀念的絕對化，實乃涉及了市場觀念的本質化與新古典經濟學概念框架的形式化。然而，我也必須指出，“絕對化市場觀念”所涉及的問題，並非僅僅只是透過批判特定政策綱領(如新自由主義)的缺失，抑或者呼求新的理論典範(如經濟社會學、奧地利經濟學、後凱因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就可以解決的。事實上，“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最具體的表現在去鑲嵌的(disembedding)“自律市場”(*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秩序圖像上面。此一秩序圖像，不僅涉及自 18 世紀以降西方現代性之經濟想像的形成，更涉及了經濟論述關於市場的知識發展歷程。因此，“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更涉及現代性經濟想像與經濟論述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的過程³⁵。

因此，倘若我們要徹底地反省市場及其觀念所造成的難題與疑義(參照於經濟學之社會工程學的爭議與新古典的理論困境)，我們就必須以“絕對化市場”的觀念發展歷程，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並且，進一步追問，為何西方會在現代性的進程中，發展出去鑲嵌的經濟想像，並以市場觀念(*the market*)表述之？市場觀念的產生，涉及到怎樣的知識構作歷程，又經過了怎樣的轉折與爭議，因而逐漸地去歷史化、去社會化、抽象化、本質化與絕對化，並形成所謂自律市場的秩序圖像？此一秩序圖像如何構成人們理解經濟實在的相關認知範疇，進而成爲現代性自我理解的重要模本？西方經濟論述又經歷過怎樣的知識模式的轉折與爭議，因而促成了市場觀念的絕對化？

³⁵ 簡單地說，基於經濟現代性的發展，西方經濟論述建構了“自律市場”的秩序圖像，並且在這個秩序圖像的基礎上，建立了從 Adam Smith 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學科知識傳統。然而，在此一過程中，自律市場的秩序圖像，卻也逐漸成為人們想像現代性之經濟面向的主要模本。因而，自律市場的秩序圖像，不僅涉及經濟論述的知識發展歷程，更涉及了現代性的自我理解(Carrier, 1997)。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問題深化：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

一、導言：

上述的提問將我們的研究對象指向“市場的絕對化”的觀念發展歷程。此一研究對象，乃關連到自 Adam Smith 以降，在西方經濟論述發展過程中，市場觀念從“看不見的手”到“完全競爭市場一般均衡分析”的論述演變，以及在此論述發展過程中，市場觀念逐漸走向去歷史化、去社會化、本質化與絕對化的發展傾向。而且，我們也必須留意，市場的絕對化並非僅僅只是學院知識的某種語言遊戲而已，它更影響了日常生活中關於經濟生活的語意與認知範疇，並構成了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文化想像(特別是自律市場的經濟秩序圖像)。簡言之，市場的絕對化，一方面涉及了經濟現代性的自我反身性理解，另一方面也涉及了主流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然而，正是基於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市場的經濟論述的糾結纏繞，不但使得市場與相關概念在社會科學內部，沒有得到妥善的處理(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往往誤以為新古典經濟學已對這些概念作出了適當的界定與分析)，而且，關於市場的理論建構與政策爭議，也往往顯得過於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因此，為了突破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西方經濟論述因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所造成的認知範疇與概念框架的錯置與混淆，在底下的討論中，我將分為兩部分來討論“市場的絕對化”可能涉及的相關因素：

一、針對現代性的經濟想像，我將從市場及其爭議著眼(為了參照經濟學社會工程的爭議)，反省“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所涉及相關因素。首先，我將先對市場的可爭議性與必須爭議性，作出概念上的界定。透過這樣的界定，我將指出，市場及其爭議，所涉及的並不僅只關於經濟組織模式的辯論，更是涉及到政治意見的表述與社會秩序圖像建構。其次，基於這樣對於市場的定位，我們將從更廣大的社會理論脈絡出發，討論 Polanyi 與 Hayek 從不同立場，對於市場社會在 19

世紀的崛起所做的反省，並將他們的反省扣連到現代性某種特殊的知識態度與文化想像的形成³⁶。接著，為了更全面性討論市場與相關爭議，我將簡單回顧 Hirschman 從思想史角度對於市場社會秩序圖像在古典時期的產生所作的考察，以及，他對於 19 世紀以降關於市場社會對立詮釋的類型分類。最後，我將總結 Polanyi、Hayek 與 Hirschman 的討論，並試圖得出反省“市場的絕對化”的可能思路。

二、針對“絕對化市場觀念”所造成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困境，我將從較為後設的視角出發來反省經濟論述與經濟實在的關係。首先，我將從所謂的“人文科學的表徵危機”談起。藉由經濟學修辭模式的相關討論，我將指出，“市場觀念的絕對化”背後隱藏著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傾向。接著，我將進一步反省在科學主義與自然主義傾向背後所立基之學科知識論模式，並扣連到更普遍關於社會科學與現代性的關係，以質疑自然主義與科學主義所立基的十九世紀知識典範的侷限。並且，我也將這樣的知識論模式關連到現代性的文化變革。最後，基於前兩點的反省，我將指出，市場觀念的構作，涉及到某種現代性自我理解的經濟文化的形成。藉由 Taylor 對於現代性社會想像的討論，我將市場觀念的演進扣連到古典時期(17、18 世紀)更廣大的文化、知識、社會脈絡的變革。

透過這兩部分的討論，我希望能夠突破經濟現代性與經濟科學的糾結纏繞，更徹底地思考絕對化市場的形成所涉及的相關因素，以具體化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並深化論文的相關提問。

二、現代性的經濟想像：市場及其爭議

³⁶ 在眾多關於市場爭議中，我之所以選擇 Polanyi 與 Hayek 來具體化這樣的爭議，主要有三個理由：一、Polanyi 與 Hayek 對於市場的相關討論(特別是前者的鑲嵌概念與後者的自發性秩序原理)，分別代表著社會學與經濟學這兩個學科對於此一議題最重要且最具有影響力的說法。二、雖然這兩者具有不同的價值立場，往往也會對於相同的現象作出不同的診斷與針砭，但是，他們都對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批判。三、這兩者對於現代市場社會的分析，一定程度上都注意到此一過程乃伴隨著某種特定的知識態度與文化想像的形成。

在第一章，我已經指出，市場一詞具有經驗的與概念的雙重意涵。一方面，市場一詞指向了具體的交易場所與制度安排(*marketplaces*)。另一方面，市場一詞指向了一種觀念，一種看待經濟生活與秩序的視角與想像，亦即所謂的自由市場(*the free market*)觀念。正因為市場這兩個面向屢屢被等同與貼合，因而，市場不僅僅是社會與論述建構的，更往往處於政策辯論與社會理論爭議的核心。因此，於本節的討論，我將由市場與相關爭議出發，反思現代性之經濟想像的問題與出路。

(一) 爭議性的市場概念

在一般日常生活裡，我們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市場是屬於經濟分析的範疇。同樣的，在主流社會科學內部(新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社會學)，市場的概念，也往往用來指涉人們基於交易所形成的經濟秩序。然而，從前述關於經濟學社會工程學的爭議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弔詭來看，一旦考慮到市場的雙重意涵，以及現代性經濟想像與經濟論述的糾結纏繞，那麼，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市場的概念不僅不能再被如此理所當然地使用(特別是用單一且自律的市場觀念來表述所有不同商品所形成的交易秩序)，相反的，市場的概念不但是可爭議的，甚至是必須爭議的。

所謂市場概念的可爭議性，是為了要凸顯市場交易有關的社會關係，如何被用來作為理解或建構社會秩序的框架，並形成了社會管制與社會行動的原則(Slater & Tonkiss, 2001:1)。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市場並不如經濟學家或經濟史學者所認為的，僅僅只是一種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經濟模式³⁷，而是涉及到一種社會秩序的建構，一種關於整體社會組織模式的爭議，以及相應的政治意

³⁷因此，這是為什麼我們不使用“資本主義”這個爭議甚多的概念(“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往往傾向於指涉到某種生產模式，並引發上下層建築關係的聯想)。關於市場交換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可以進一步參考 Braudel(1983, 1997)對這兩個概念所做的區分(前者主要是指涉在日常生活中在市集所發生的交易，其本質是競爭的；後者則是指涉商人所建構的有組織性的經濟模式，如大型企業與跨國公司，其本質是壟斷的、反市場的)。但是，我們必須提醒，由於 Braudel 主要是基於歷史過程來對於這兩者進行區分，因此，他並未涉及關於社會秩序圖像的討論。

見的爭辯。在這樣的認知下，市場(或者更確切地說“市場社會”)從來就不是純經濟的事務(市場必然是政治的、社會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更不是某些特定學科與特定論述的禁臠。

從這樣的界定出發，我可以指出，市場觀念與相關爭議，並不僅僅只限於反對市場或贊成市場、市場失靈或市場自律、計畫經濟或市場經濟等所謂經濟管制技術上的爭議而已，而是涉及到在社會秩序問題的層次，關於整體社會協調模式的爭議，更涉及到現代性底下人們的自我理解與自我組織的方式。正如同 Rosanvallon (2004:22-38)所指出的，我們不應該把市場僅僅理解成只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概念，應該把它理解成一種具有社會學或政治學涵義的概念。他更指出，在 18 世紀，自律市場的社會想像的構作，乃是針對社會契約論所未能解決的各種問題的一項回應(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問題、權威濫用的問題、商業社會崛起引發的調節問題)。其反應的是一種呼求文明社會能夠自我調節的深層渴望，一種免除人與人之間產生正面衝突之悲劇的方法，一種對於非個人的、無等級的、無干預的組織模式的期望。而且，基於這些對於社會組織模式的期望，更進一步發展出一種市場烏托邦的自由主義文化³⁸，並且隨著自律市場的社會想像在 19 世紀中的擴散、傳播與勝利，才衍生出以市場觀念為軸線的各種意識型態的論戰。

簡言之，市場觀念不僅是可爭議的，也是必須爭議的。而且，自從它在 18 世紀誕生以來，就涉及了一種關於社會治理模式的鬥爭，並伴隨著這樣的治理模式在意識型態上、文化上、社會實在上的勝利與實現，進而引發了現代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中心的辯論與對抗。準此，在底下的討論中，我將從更廣的社會理論脈絡出發，來定位市場的相關爭議。為了進一步更具體化市場社會所引發爭議，我將先從 Polanyi 與 Hayek 對於自律市場的歷史批判與理論辯護談起。接著，我也

³⁸ 根據 Rosanvallon(2004)的說法，此烏托邦還跟另外兩種烏托邦的想像不可分割：一是以法律統治替代政治衝突的烏托邦，另一個則是強調以具有絕對自主性與自我命運掌控的個人，來組成社會世界的倫理烏托邦。只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以市場觀念為軸線的相關意識型態的爭戰，往往將這三者分割開來，接受了其中一部份，卻拋棄了其他部份。

將回顧 Hirschman 對於市場社會的興起與爭議所做歷史分析與類型建構。最後，綜合這三者的討論來反省市場作為現代性經濟想像的問題，並關連到市場觀念的構作歷程。

(二) 市場社會的崛起與陳舊的市場心態---Karl Polanyi 對於“鉅變”的反思

基本上，Polanyi(2001[1944])對於自律市場的批判與反省，表現在他對於 19 世紀現代性“鉅變”的分析。然而，他的批判與反思，在經濟史、經濟人類學內部都會引發了很大的爭論³⁹。他基於對自律市場的批判所發展出來的鑲嵌概念，亦成為當代“新經濟社會學”重要的理論爭議所在⁴⁰。此外，近年來關於市場社會的爭議中，Polanyi 的相關著作亦構成了爭議的核心所在(cf. Helleiner, 1995; Lacher, 1999; Adaman & Devine, 2001; Blyth, 2002; Bugra & Agartan, 2007)。正如 Block 與 Somers(Block & Somers, 1984; Block, 2001, 2002)所指出的，Polanyi 的理論是相當複雜的，往往引起許多的誤解。倘若要公正地理解與詮釋 Polanyi 的相關理論，必須注意 Polanyi 基本的理論關懷，乃是為了打破十九世紀以降所謂的唯經濟主義謬誤。準此，我們將透過 Polanyi 對於十九世紀鉅變與陳舊的市場心態(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的反思，來討論他的分析對於理解市場爭議的貢獻與

³⁹ 雖然我們在此無法處理相關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史的討論，但是，我們必須指出，正是由於 Polanyi 對於現代市場經濟與其心態的批判，引發了經濟人類學內部關於實質與形式的爭論。此外，經濟史的爭論，則是爭議 Polanyi 所謂“市場經濟不存在於古代、古代經濟是一種鑲嵌性的說法”的對與錯(Humphreys, 1969; North, 1977)。基本上，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史的爭議，都有點誤解了 Polanyi 的論點。Polanyi 主要的關心點，乃是以現代自律市場的經濟想像作為反省的起點，試圖借用歷史或人類學的研究來選擇不同的參照點，以釐清現代市場心態所導致的經濟主義的謬誤。然而，由於 Polanyi 缺乏更有力的理論語言與方法論上的反省，導致他在《鉅變》一書裡把實質命題與形式分析、道德判斷與理論論證往往混淆在一起，因而引發了許多誤解(如 Hector, 1981; Lie, 1991; Hejeebu & McCloskey, 1999)。關於 Polanyi 自身的說明，請參見 Polanyi(1977)的遺稿《人的生計》(*The Livelihood of Man*)與 Pearson 為該書的簡介與導論，並參閱 Block 與 Somers 對後續誤解的釐清(Block & Somers, 1984, 2003; Somers & Block, 2005; Block, 2001, 2003)。

⁴⁰ 關於新經濟社會學對於鑲嵌概念的爭議，我已在別處處理過，請參見吳鴻昌(2009, 2010)。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文裡，我指出了，由於新經濟社會學缺乏對於研究對象的建構、方法論的警覺與意識型態的反省等問題的後設反省，使得新經濟社會學無法妥適地發展出市場的相關理論，這也使得新經濟社會學忽視了經濟論述亦是其所欲分析的“社會實在”的一部份，更忽視了經濟論述在現代性下所扮演的支配性制度反思的角色。本論文的出發點正是基於上述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反省，因而我不從具體的經驗現象來討論市場的相關爭議，而是試圖從觀念史的角度，去探討“經濟是如何去鑲嵌的”，以及去鑲嵌的心態與想法是從何而來。

侷限。

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裡，Polanyi(2001[1944])開宗明義地指出，19世紀現代性所衍生的“鉅變”，正是一場以自律市場理念為核心，試圖實現市場社會組織模式的社會工程。他進一步指出，這種自律市場的理念，乃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想像，但是，卻奇異地構成19世紀的現代性鉅變的基本軸線，並且，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出現、1929年經濟大恐慌的爆發、計畫經濟的興起、法西斯主義的抬頭，這樣烏托邦想像已逐步破滅。對此，Polanyi更語重心長地指出，即便這樣的烏托邦想像已宣告破滅，為應付市場災難所興起的社會自我保護，卻同樣可能對社會生活造成傷害(如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極權國家)，自律市場與社會自我保護的拉扯，構成了我們思考當前社會問題的兩難。

為了進一步反省這樣兩難問題的由來，Polanyi首先批判了19世紀經濟自由主義，否定了他們認為市場交換乃是唯一經濟行為模式的迷思⁴¹。他更指出，有別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想像，一旦市場交換模式取得壓倒性的力量，試圖使社會的整體運作從屬於市場原則，“社會關係被鑲嵌於經濟體系”將取代了原有的“經濟體系鑲嵌於社會關係”，這將會為整體社會組織帶來致命的後果。為了進一步分析這致命後果的由來，Polanyi把矛頭指向了引發19世紀“鉅變”的市場社會雙元運動---自律市場與社會自我保護。

針對市場社會的雙元運動，Polanyi指出，自從1830年代開始，強調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者，懷著十字軍般的熱忱，以一種人為干預的方式，掃除一切妨礙自由市場出現的傳統障礙，試圖通過土地、勞動力的商品化與貨幣自我調整的金本位制度，達成所謂自律市場的出現。然而，當好戰的經濟自由主義份子，試圖通過各種方式與手段，將濟貧法、穀物法、定居法等有礙生產要素自由移動的法律予以廢除，並且有計畫地促成自由市場的貨幣經濟形成，這導致了各種提

⁴¹ 除了市場交易外，其他經濟行為模式，尚有家計、互惠、再分配。Polanyi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其他三種模式，“市場交易模式”的特殊性在於，一方面它有“目標特定的交易動機”與“功能特定的制度”，另一方面，基於強而有力的“交易動機”，“市場模式”具有將孤立被管制眾多的市場，連結成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可能。

供社會安全的傳統連帶破碎，使得人們失去了穩固的文化參考座標，進而導致個人在文化上退化與生活上的災難。於是，1870 年以後，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一種社會的自我保護措施興起，透過各種社會運動的抗爭與串連，以公共衛生、工廠條件、社會保險、工會結社、公共設施等社會手段，為受到創傷的人們提供保護。因此，從對歷史的觀察中，Polanyi 指出，有別於經濟自由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市場社會秩序的想像，事實上，去管制的自律市場機制並非自然而然存在著，而是一個有待達成的人為目標，並且，此一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只會引發文化與社會的災難，導致各種自發的社會安全對應措施必須跟著浮現。簡言之，Polanyi 認為，在社會實在上，市場並非是自發而存在，所謂的市場自我調節，只存在於經濟論述中，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實際的社會制度，乃是由經濟論述透過相關政策與社會工程的計畫，才得以出現；倘若這樣的社會工程推至極端，將會導致災難，因此，社會生活中經濟制度與非經濟制度的關係，構成了市場制度的基本限制⁴²。

除了通過上述的歷史考察外，針對自律市場與社會自我保護的兩難問題，Polanyi 進一步把問題指向了現代性底下特殊的經濟文化的出現---即所謂“陳舊的市場心態”(Polanyi, 1947)。他清楚地指出，這種市場心態乃是西方在現代性時期所產生的一種文化觀念，這種文化觀念不但導致右派市場教條主義與左派計畫經濟的“唯經濟主義謬誤”，還影響了學院論述，更滲透日常生活的語彙與實作哲學中。在這種市場絕對化的經濟文化裡，人們往往將物質動機與利益視為是“真實的”、“理性的”，認為其乃是主導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並且將人類其他“真實的”社會動機(榮耀、自尊、義務、道德責任等)視為是“理想的”，甚至是“不理性

⁴²這裡我們必須提醒，在經濟社會學的相關詮釋與討論裡，學者們往往透過鑲嵌(embeddedness)此一概念，爭論著到底 Polanyi 認不認為市場可以自律，可以去鑲嵌，自律市場到底存不存在等問題(cf. Block & Somers, 1984; Block, 2001, 2003; Lie, 1991, 1992, 1993, 1997)。針對這個問題，我必須指出，由於 Polanyi 缺乏後設的理論語言來反省現代性下市場心態所造成理論構作上的難題，這導致對於自律市場存在與否、市場社會存在與否等問題，他只能時而肯認其存在，時而否定其可能性。簡言之，基於經濟論述與經濟實在的迴圈效應，Polanyi 雖然意識到這種效應的存在(請參考他對於市場心態的討論)，但是卻無法在理論語言上將這樣效應指出來，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關於此點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吳鴻昌(2009, 2010)。

的”，還進一步將這樣的二分視為是一種無時間性、放諸四海皆準的判準，並由此構作了烏托邦的市場社會秩序圖像，而這正是經濟現代性兩難問題的根本所在。

在上述 Polanyi 對於市場社會興起與後果的討論中，他的確提醒了我們，從市場交易到市場社會的演進，並非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基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自律市場社會工程的推動。他也提醒著我們，自律市場的秩序圖像，乃是某種現代性經濟文化的特殊產物。這種市場的現代性經濟想像，不但導致唯經濟主義謬誤的出現，更使得市場概念逐漸走向去歷史化、去社會化與絕對化的發展，最終還導致市場相關認知範疇與概念框架的根本錯置⁴³。因此，雖然 Polanyi 對於鉅變的歷史考察，可能在若干歷史細節需要進一步的修正，他對於市場社會的分析，在理論語言與方法論層次，也往往缺乏更深刻的反省，屢屢引來爭議（特別是表現在自律市場存在與否的爭議上）。但是，不可否認的，Polanyi 對於 19 世紀現代性“鉅變”的分析，的確直指了市場作為現代性經濟想像的根本問題所在。

（三）計畫經濟的興起與理性濫用的批判--Hayek 對於市場秩序的辯護

幾乎與 Polanyi 書寫鉅變《鉅變》的同一時期，面對相同的歷史場景，基於對於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計畫經濟、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憂心，Hayek(1944)開啟了他從經濟學到社會理論的轉變⁴⁴。基本上，在 Hayek 的整體著作史裡，他並未曾對於市場社會的興起或衰弱，做過系統性的歷史考察與分析⁴⁵，他主要是

⁴³ 值得留意的是，Polanyi 亦指出，社會的自我保護也可能帶來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極權的悲劇，這個論點似乎也常常遭到忽視。

⁴⁴ 這個轉變主要始於 1944 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終結於 1988 年之《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根據 Gamble(1996:ch1)與 Caldwell(2004:ch 10)的說法，這個轉變主要因為 Hayek 移民到英國，並參與了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之辯，他開始有系統地批判所謂的一般均衡分析與集體主義計畫經濟(Hayek, 1949: ch2、ch7-9)，並進一步開啟了他從社會理論出發，經由對於社會工程學如何濫用理性的批判(Hayek, 1952)，來完善他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政治哲學主張(Hayek, 1960, 1973)。

⁴⁵ 由於 Hayek 的思想牽涉到許多不同的學門，其思想也有一定的複雜性與內在轉折，在此我們不可能全面地評論其所有著作。我們的討論主要是針對 Hayek 對於市場社會的釐清與辯護，以及他對於社會主義與社會工程學所做的理性濫用批判。對於 Hayek 的整體著作的回顧，以及其所涉及的相關理論議題的討論，參閱 Kley(1994)（主要從社會理論的角度）、Gamble(1996)（主要從社會理論的角度）、Gray (1998)（主要從政治哲學的角度）、Caldwell(2004)（主要從經濟學的角度）

透過批判地反思計畫經濟、社會主義等集體主義社會工程，來捍衛他所堅守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並為市場社會提出辯護(Bottomore, 1985:ch4)。因此，底下的討論我們主要是透過 Hayek 對於社會主義的批評、社會工程理性濫用的批判，反向地來討論他對於市場社會的相關主張。

有別於 Polanyi 將計畫經濟、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源，歸諸因應 19 世紀自律市場所引發的災難而產生的，Hayek(1944: ch1)認為這些集體主義計畫的勝利，非但不是不可避免，更是對於西方文明發展與古典自由主義的一種背離。他認為當前自由主義的節節敗退，一方面源自於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的知識態度崛起，試圖將社會問題轉成技術問題，對於一切社會力量加以集體且有意識的指導，以取代非個人化的、無以名狀的市場秩序；另一方面則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錯誤地以自由放任原則來理解自發的市場秩序力量，因而無力去因應風起雲湧的社會問題與集體主義的挑戰。

為了更深刻地反省自由主義的困境與集體主義計畫經濟，Hayek 進一步深化他上述的兩個論點。一方面，基於對於“計畫經濟”相關知識心態的反省，Hayek(1952)開啓了他針對理性濫用的研究計畫⁴⁶。在此一計畫裡，Hayek 將問題指向了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他指出，當社會科學在 19 世紀興起時，社會科學家往往拙劣地、也奴性十足地模仿所謂的自然科學方法，進而生搬硬套地發展出一種唯科學主義的客觀主義方法(Hayek 是承繼奧地利學派的主觀主義方法論)。Hayek 也指出，基於這種方法論所內涵的，強調自覺控制與理性支配的工程學思維，社會科學逐漸建構了一種帶有目的意涵的社會圖像，進而將社會科學研究轉譯成一種機械工程的研究(排除了道德科學的成分)，試圖根據理想的“理性”社會工程計畫藍圖，假定一切都已受到控制的條件下，尋求社會問題的最適化技術方案。Hayek 更指出，這種工程學的知識態度，不但反映在當前諸多試

等人的著作。

⁴⁶ 對於理性濫用的批判，持續地貫穿 Hayek 的整體著作，他也透過這個計畫逐漸發展出他自己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個人主義、社會秩序、社會演化的相關看法。關於此一計畫的研究背景與相關討論，參考 Caldwell(2004:ch11)。

圖“管理”經濟的各種經建計畫與新古典經濟學論述中，更反映在從法國啓蒙運動到 19 世紀 Saint-Simon、Comte 等所謂工業社會主義論者，乃至於其後的社會學家的論述之中(Hayek 認為，他們都試圖將工廠的管理組織方式，擴散到整體社會的規劃管理)⁴⁷。

另一方面，為了釐清 19 世紀自由放任原則與當代一般均衡分析所帶來對於市場競爭機制的誤解與混淆⁴⁸，並深化對於社會主義的批判，Hayek 重新思考了市場社會的歷史起源與秩序原理。有別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將自利個人視為人類本性的理性經濟人假設⁴⁹，從人類歷史文明的演化角度，Hayek(1988:ch1)指出，人類的本能是集體主義與利他主義傾向(至少在原始社會的狀態下)，基於文明的演化，人類才逐漸走向個體化與分化，並且隨著物質生活、城市、商業活動的擴展，才在晚近出現了現代性的市場社會(Hayek 稱之為偉大社會或開放社會)。因此，Hayek 認為，市場秩序乃是建立在人們通過克服本能且逐步學習而來的傳統與道德規則上(道德在此乃是本能的規則)。在此規則下，人們學會尊重私有財產、誠信交換、公平競爭等，市場的內在責任與道德，因而，社會主義對於市場社會

⁴⁷ 在社會學的古典三大家裡，大概只有 Weber 的理論是唯一能被 Hayek 接受的社會科學研究(Weber 與奧地利學派共享相同的方法論主觀主義的立場)。這裡我們限於篇幅與旨趣，不去論斷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我們要提醒一件事，如 Gamble(1996:ch4)所指出的，Hayek 的社會理論的最大弱點，在於他甚少對於工業社會進行嚴肅的社會學分析(他也甚少閱讀相關作品)。此外，他更指出，Hayek 在閱讀別人作品時，往往容易將作者對於某一議題的分析等同於規定，這導致他往往容易誤讀別人的作品，例如，屢屢被 Hayek 拿來當提倡計畫不可避免之標靶的 Karl Mannheim(1944)。實際上在他的《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一書裡，主要是透過對於集體計畫此一現象的社會學分析，進而指出，集體主義不僅僅是思想發展的結果，還來自工業社會的組織方式。Mannheim 並不如 Hayek 所以為的，主張如同管理工廠一樣管理整個社會，而是要對此現象與所造成的難題進行分析。Gamble 更指出，如果 Hayek 能夠更同理心地閱讀 Mannheim 的作品，Hayek 甚至會意識到，為了避免集體主義的發展，維護他所讚賞的個人主義社會與市場內在道德模式，政府應該要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來對商業規模與行為進行管制，並推動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⁴⁸ 關於 Hayek 對於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與均衡分析的批判，參考 Hayek(1949:ch2, ch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一般均衡分析的後續發展中，芝加哥學派的總體經濟學家(主要是 Lucas 的理性預期理論)，已揚棄 Samuelson 等人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總體經濟理論(主要是結合新古典經濟學與 Keynes 的理論)，重建一般均衡的景氣循環模型，他們往往認為 Hayek 早期關於景氣循環的理論乃是他們的先驅。然而，如同 Butos(1985)所指出的，這樣的主張，往往低估了 Hayek 對於一般均衡分析的批判，具有一定程度的似是而非。

⁴⁹ 基本上，Hayek(1960:61)承繼了蘇格蘭啓蒙運動的想法，認為人依其本性乃是懶惰、放縱、短視與浪費的，只有透過環境的壓力，人們才會被迫學習節約與理性。所謂理性經濟人的說法，乃是 19 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基於建構論理性主義的立場所構作出來的。

的批判，不過是不適應這種競爭性秩序的一種返祖現象⁵⁰。

基於上述對於理性濫用的批判與市場秩序的認識，Hayek(1960: ch2; 1973: ch1-2)進一步區分兩種秩序觀念與相應的知識心態，其一是人造的秩序(或稱組織)，另一種就是自發性秩序。前者涉及建構論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知識立場(起源於 Descartes 與 Hobbes，並為法國啟蒙運動者、Hegel 所承繼)，相信理性能夠自我立法，基於對於理性的全知全能的信仰，試圖發明與設計社會制度來主導社會演化方向，並將所有無法歸諸人類理性計畫的傳統與習慣，視為非理性的殘留，應予以消除；後者則是所謂演化論之理性主義(evolutionary rationalism)的立場(Hayek 認為這乃是蘇格蘭啟蒙運動論者，如 Hume、Adam Smith、Ferguson 等人的偉大發現)，承認且強調人類在事實知識的理性侷限，制度乃是人為有意與理性設計的，正視且尊重傳統、習慣與規則的演化⁵¹。基於這樣的區分，Hayek 指出，市場正是這樣的一種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顯明例子(但是不是唯一的例子，例如語言)，市場秩序乃是人們行動的非意圖與非預期的結果，而非人為的有意設計，任何試圖對於此秩序的有意識控制與意圖性指導，即便出自於高尚的理想，將只會動搖文明賴以進步的根基，危害“偉大社會”(市場社會)的生存。至此，Hayek 重申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於市場社會的認識，並且，完善了他對於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等社會工程學的批判。

在上述的討論中，Hayek 從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幾乎翻轉了 19 世紀以來關於市場社會的相關認識與批判，因而也突破了主流經濟學將市場觀念絕對化所帶來的限制。針對市場絕對化此一問題，Hayek 似乎提醒了我們，無論是右派

⁵⁰ 如同 Kley(1994)所指出的，Hayek 清楚地認識到，很難期望人們會喜歡這種與本能相抵觸的市場秩序與市場道德。但是，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必須”維護市場秩序的競爭性，而非如社會主義一般，試圖利用合作取代競爭，主要是因為市場秩序的競爭過程，在產生最終結果方面，相對於社會主義合作乃是勝出的。

⁵¹ 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的 Hayek(1973:ch2;1988:ch1)越來越傾向從演化論群體選擇機制與模控論(cybernetics)來討論自發性秩序所涉及的文化演化，這導致 Hayek 是否背棄其早期所堅持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爭議，以及自發性秩序如何能支持個體自由的疑問(cf. Hayek, 1949: ch1)。關於這個問題，參考 Gray (1998:118-125)、Caldwell (2004:313-319,353-62)、Hodgson(1993: ch11, ch12)。

(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原則，還是左派對於市場社會的批判，似乎都犯了將市場絕對化與本質化的謬誤，並沒有認識到市場乃是一個在文明演化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自發性秩序，並有賴於非市場的制度與道德模式的支撐。此外，他也指出，在社會科學之社會工程學的背後，隱藏著一種唯科學主義的知識心態，因而，理性經濟人假設、自由放任原則、均衡分析與計畫經濟等經濟論述，不過是一種建構論之理性主義的濫用。雖然，Hayek 對於市場自發性秩序的理論具有內在的盲點與矛盾⁵²，而且，他基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對絕對化市場所做的相對化與歷史化的澄清，也屢屢引來將市場秩序再度本質化的質疑 (Hindess, 1989:154；Hodgson, 1998:107； O'Neill, 1998: 10-11)⁵³。但是，他的確提醒了我們，必須留意市場爭議背後所涉及的現代性經濟想像的構作，以及相應的知識心態問題。



(四) 市場的秩序圖像與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Hirschman 的歷史反思與類型建構

⁵² 如 Gamble(1996)所指出的，Hayek 的演化論的自發性秩序觀念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他一方面，主張市場社會是未經規劃的文化選擇所發展出來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又主張，在當代場景下，我們不能再只依靠文化自然選擇來讓社會演化(集體主義的興起也是一種文化選擇的結果)，為了市場社會自發性秩序的存續，我們必須更有意識地去抵禦對於自發性秩序的威脅(市場的自發性秩序 vs. 社會的自我保護)。而且，Gamble 也指出，Hayek 雖承認市場制度需要非市場制度與道德模式的支撐，但是，Hayek 幾乎沒有意識到，市場的後續發展是否有削弱這些支撐的可能。此外，Gamble 更指出，由於對於自發性秩序的尊重，這也導致 Hayek 幾乎缺乏對私人之間可能具有的權力關係的重視，因而，他甚少仔細分析過企業壟斷的問題，也無法妥善地回答，當大型企業興起，當人人都必須成為雇員依賴他人而生，這對偉大社會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是否會傷害個人的自由與市場的內在道德？Gamble 所指出的這些問題，固然可能源自於 Hayek 所立基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信仰。但是，我認為真正的關鍵在於，如同 Polanyi 一般，Hayek 的分析往往混淆了形式分析(觀察者視角)與實質分析(參與者視角)，也往往混淆了理論論證與道德判斷，因而，Hayek 只能不斷地區隔不同知識立場的好壞，作出應然的判斷，卻未能從再生產的角度(結合上述兩種視角)去分析自發性秩序與組織秩序在現代性底下弔詭的共生關係，未能正視市場自發性秩序，是如何從政府與企業這兩種人造秩序的衝擊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市場競爭又如何不斷地提高人們對於理性計畫與組織秩序的需要與依賴。

⁵³ 透過語言類比，或許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此點。語言作為自發秩序，固然可以透過研究找到文法規則，但 Hayek 似乎如同死板的文法學教師，拿著現行的文法規則，到處去指摘各式的言語不合文法，並且要求所有的人言語必須根據標準文法，而且不接受新的語言用法與規則的演化。同時，強烈地禁止政府推行官方語言與發明人工語言。換言之，Hayek 雖然試圖透過歷史與思想史分析來澄清對於市場的認識，但是，在後續的論證中，他卻賦予了市場秩序規則規範性的意涵。事實上，這個問題真正的根源，仍然出在 Hayek 缺乏後設的理論語言去反省相關問題，因此，在他的分析裡，參與者視角與觀察者視角容易被混淆，經驗分析與規範分析往往交雜在一起。

承上述，Polanyi 與 Hayek 雖然有著的不同理論立場，但是，他們都共同對於 19 世紀以降“絕對化市場”的經濟想像，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與澄清。但是，他們並沒有回答，自律市場的圖像或者自由放任原則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而且，他們一定程度上仍然困擾於自律市場的現代性想像所帶來的限制⁵⁴。因此，在此部分，我將透過 Hirschman 的相關討論，來思考市場社會爭議背後所隱含的現代經濟想像的問題。

Hirschman(1977)指出，古典時期(17 與 18 世紀)市場秩序圖像的構作，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回應當時政治理論危機所產生的治理模式的空缺。他更指出，這種政治理論的危機，與相應而生的治理模式之間的競逐，最為清楚地表現在古典時期有關激情(passions)與利益(interests)的二元論題的演進過程中。

首先，在後宗教改革的古典時期，人們不再相信可以透過宗教戒律與道德教化來約束人類具有破壞力的激情，因而針對君王與貴族的濫用激情所帶來的社會危害，出現了三種替代的模式來處理激情的問題：第一種是對激情採取壓制的方式(repressing)，第二種是對於激情採取馴化的方式(harnessing)，第三種則是對於激情採取制衡的方式(countervailing)。Hirschman 認為，在一定程度上，17 世紀以降的思想家都是針對這三種類型，試圖從人性論的角度，處理有關政治治理的問題，並建構社會秩序的相關理論。

接著，隨著制衡的觀點逐漸成為主導性的觀點，人們進一步將由此觀點出發，從激情中精鍊出一種作為激情馴服者的利益概念(主要針對君王與貴族的濫權)，並且隨著利益與激情的二元對立的深化，利益概念逐漸被賦予理性的、審慎的、物質的意涵，並且被用來對抗情感的、好奇的、生命的激情概念。順著這種利益概念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傾向利用利益概念所蘊含的可預測性與恆久性，進行政治治理與社會管制的理論建構(相較於激情的不穩定性與不持久性)。而且，更進一步的，在這種社會秩序的理論構思中，本來被視為是最危險與最應被

⁵⁴ 這特別表現在 Polanyi 有關自律市場是否存在的爭議，以及 Hayek 是否又將市場予以本質化的爭議。

譴責的慾望--對金錢的貪婪，也因其持久性與可欲預測性，逐漸被視為一種美德，甚至被認為是無害的。

其次，隨著利益概念的取得勝利，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構思社會秩序的圖像，就逐漸取得上風。人們開始正視商業力量的興起，思考其對社會與政治秩序的影響，進而構作了一個“溫柔的商業將有助於和平與秩序，並促進文明進步”的論題(the doux-commerce thesis)。並且，在這個論題上，思想家們開始構思以利益和諧為中心的經濟秩序圖像，強調經濟秩序具有獨立於人類意志而運作的內在自然律則(往往透過鐘錶的比喻或機器的比擬來說明此一律則所呈顯的秩序圖像)。

最後，Hirschman 指出，隨著 Adam Smith 在《國富論》裡將一切的激情與利益等同起來，試圖僅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思考社會秩序的運作，提出了“透過個人對於自身物質利益的追求，將可以最好地實現普遍的福利”的主張，發展了關於市場看不見的手的理論，19世紀以降的相關學術、政策與意識型態的辯論，便逐漸圍繞著此一信念與對此信念的質疑開展開來，形成了關於市場社會的諸多爭議⁵⁵。

為了進一步將上述的反省扣連到當代的爭議，Hirschman(1982)更指出，倘若要釐清市場社會的諸多爭議，就必須從問題化的角度，來思考諸多對立詮釋是如何看待市場與其他社會制度(封建制度)之間的關係。因此，他進一步以“市場社會到底是有助文明的、有害的，還是虛弱的”的問題，建構出四種關於市場社會論題的理念型分類：第一種是市場社會是文明的推手(the doux-commerce thesis)的論題。此一知識立場乃是有關市場社會最原初的根本論題。這個論題認為，市場社會使人們脫離了封建社會的禁錮，推動了文明的進步發展；第二種是市場社

⁵⁵ 這也引發了 19世紀中葉著名的“Adam Smith 難題”(Das Adam Smith Problem)，亦即在《道德情操論》裡，強調共感(sympathy)的 Adam Smith，該如何跟《國富論》裡強調自利的 Adam Smith 協調起來。關於此一難題的由來與回顧，參考 Teichgraeber Iii(1981)、 Nieli(1986)、 Dickey (1986)、 Tribe (1995)、 Witztum (1998)、 Montes (2003, 2004)、 Paganelli(2008)等人的討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固然此一問題跟如何解讀 Adam Smith 有關(特別在古典政治如何繼受 Adam Smith 的理論)，但是，此一問題的構作其實反應的是 19世紀歷史經濟學派興起，以及其如何透過此一難題反擊古典政治經濟學。

會將會自我解構(the self-destruction thesis)，此一知識立場認為，雖然市場社會使得人們脫離了封建主義的牢籠，但是，市場社會的運作邏輯卻內含著自我毀滅的機制；第三種是市場社會的力量是虛弱的，無法動搖封建主義的根基(the feudal-shackles thesis)。此一知識立場認為，市場的力量乃是有限的，並不足以撼動傳統的社會關係；第四種是市場社會的興起，乃得力於封建社會的非經濟的社會關係的支撐(the feudal-blessings thesis)。此一知識立場認為，市場社會興起的動力根源，乃源自非經濟的社會關係的力量，而非僅僅只是在商業活動與技術上的創新，就可以促成的。

基於這樣的類型建構，Hirschman 認為，19 世紀以降，關於市場社會興起與後果的諸多爭辯，都是沿著這四種基本類型(與其交叉混合型)的視角與思路開展出來⁵⁶。他更提醒我們，那些看似彼此矛盾的論題上(特別是 1 vs. 2、3 vs. 4)，在歷史過程中都可能是共同成立的，因此，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除了來自於對於歷史過程的偏頗與忽視外，更來自於相關詮釋者認知上的混亂、心理上的抵抗與意識型態的堅持(特別是為了跟公眾散播個人意識型態上的信仰)。因此，他呼籲社會科學家，以更寬廣的視野來處理此一問題的複雜性。

結合上述兩部分討論來看，Hirschman 宣稱，立基於激情過度到利益的概念，並伴隨商業社會的崛起，古典時期的西方構作了商業是文明推手的命題，並建構了市場的秩序圖像。而且，自 19 世紀以降，人們也反過來利用此一圖像，思考經濟現代性的興起與問題，並產生了諸多對於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換言之，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Hirschman 似乎已經意識到，經濟現代性(市場)一直具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概念的，另一個則是歷史的。對於這兩個面向的忽視，不僅造成諸多對立詮釋的對抗，更造成了人們在認知範疇的混亂與意識型態的偏頗。因此，雖然 Hirschman 的歷史簡介與類型建構，在相關細節與歷史詮釋上，有許多

⁵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分類架構對於市場與非市場關係的處理，也被相關學者用來類型化關於 1980 年代以來市場化與全球化的相關爭議，參見 Guillen(2001)、Fourcade-Gourinchas & Healy (2007)。

值得商榷與需要補充之處⁵⁷，但是，他的討論的確提供我們按圖索驥的線索，來重新反省現代性經濟想像的起源、演變與問題。

(五) 小結：現代性經濟想像與市場觀念的演進

對於市場社會的爭議，Hirschman、Polanyi 與 Hayek 都從不同的角度，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釐清與反省。雖然，他們三個具有不同的知識立場與價值關懷，對於相同現象也做出不同的解讀⁵⁸，但是，在各自的論述中，他們都共同注意到有關市場社會的紛紛擾擾，不僅涉及了有關市場概念的混淆與誤解，更涉及某種特殊的知識心態的形成。準此，在底下的討論中，我們將以市場的概念化與問題化為軸線，討論他們的理論對於考察“絕對化市場”的演進所可能具有的提醒與貢獻。

首先，針對古典時期市場秩序圖像的產生，透過 Hirschman 的相關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市場觀念的構作實際上涉及了古典時期政治治理模式的危機，以及相應不同治理模式的競爭，也涉及了商業社會的興起。基於此歷史與知識背景，人們構作了所謂“商業(市場)社會是文明推手的命題 (the doux-commerce thesis)(Hayek 正是站在這個論題上，澄清了蘇格蘭啟蒙運動對於市場作為一種自發性秩序的認識)。而且，也基於相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西方經濟論述經歷了概念框架的翻轉與重置(表現在激情到利益演變過程中，對於營利與貪婪的美德

⁵⁷Hirschman 的討論，除了可以作更多歷史細節的補充外，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激情與利益的二元論題，當代一些思想史的研究(特別是所謂的劍橋學派)，特別強調在此論題中常為人所忽視的自然法傳統與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面向，因而對於蘇格蘭啟蒙運動與 Adam Smith 的詮釋，做出了跟 Hirschman 有所不同的定位。參見 Pocock (1975, 1985)、Winch(1978, 1996)、Haakonssen(1981, 1996, 1998, 2006)、Waszek(1988)、Hont & Ignatieff (1983)、Stewart(1990)、Campbell & Skinner(1992, 2003)、Tribe(1995, 1999)、Griswold (1999)、Marshall(2000)、Rothschild(2002)、Broadie(2003)、Dow & Dow(2006)、Montes(2004)、Montes & Schliesser(2006)、Wennerlind & Schabas(2008)。

⁵⁸在上述的討論裡，或許 Hayek 與 Polanyi 的立場是最截然不同的。如果借用 Hirschman 對於市場社會對立詮釋的類型學，Hayek 主要是在基於“市場社會是文明的推手”的知識立場，Polanyi 則是站在市場社會將會自我解構的立場。雖然他們兩個分別就這兩種不同立場，對於十九世紀的雙元運動提出了各自的反省，但是，就本論文的旨趣而言，我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何者論斷的誰是誰非，而是要指出，無論在 Hayek 的理性濫用的批判裡，亦或在 Polanyi 所謂的陳舊的市場心態裡，他們都共同注意到社會科學的社會工程學現象，也基於此一現象的批判，他們兩個都反對當代的唯經濟主義的謬誤，也同樣不接受所謂的絕對化的市場觀念。

化)，也促成一種新看待經濟事務分析方式的形成(Polanyi 所謂市場心態的出現)。並且，在此新的看待經濟事務的方式上，透過某些知識工具與隱喻的類比，強調經濟所具有的內在自然規律，進而架構起以市場為核心的秩序圖像。

其次，針對 19 世紀市場社會的興起與對立詮釋的對抗。通過 Polanyi 對於鉅變的歷史考察與反省，我們也可以看出，市場觀念在此一時期的演進，不但有了具體的知識承載者與相應的場域(如古典政治經濟學與國家政策場域)，更涉及了相關社會問題的浮現。而且，參照 Hirschman 對於市場社會對立詮釋的類型建構，我們也可以看出，此一時期隨著經濟自由主義取得支配性的地位，經濟自由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亦受到了其他社會理論與意識型態的挑戰(如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等)。此外，參照 Hayek 對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市場觀念所做的澄清，以及他對於左派與右派建構論理性主義的批判，我們似乎也該注意，從古典時期到 19 世紀，市場觀念的演變，經歷了怎樣的知識論上的變革，使得強調演化論之理性主義的自發性市場秩序觀念，逐漸走向建構論之理性主義的絕對化市場秩序圖像。

再者，無論 Polanyi 對於陳舊市場心態的反省，抑或 Hayek 對市場的觀念澄清與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還是 Hirschman 對於市場對立詮釋的反省，他們都共同意識到，市場相關爭議的關鍵問題，在於某種看待市場的知識心態與視角。這似乎提醒了我們，必須留意市場的雙重意涵所造成的問題(特別是“自律市場”的想像與實在的貼合)。諸多對於市場的對立詮釋，往往忽視了市場概念所具有的複雜性與相應的知識心態，因而，相關的論辯與爭議，無法釐清到底是市場的概念表述出了問題，還是市場經濟體制出了問題，對於市場的贊成與批判，往往只會陷入了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的困境⁵⁹。

綜上所述，Polanyi、Hayek 與 Hirschman 對於市場的相關討論，除了提供我們考察“絕對化市場”發展歷程的相關線索外，他們對於市場觀念所做的歷史與概

⁵⁹ 如同我已經指出的，雖然 Polanyi 與 Hayek 對此一問題有一定程度的澄清，但是他們仍然受到此一問題的困擾。Polanyi 受困於自律市場是否存在的問題，Hayek 則在對於市場相對化的反省中，陷入了市場本質化的爭議。

念上的反省，也使我們得以突破現代性經濟想像的限制，避免“絕對化市場”所帶來的混淆與錯置，進而將市場觀念的演進關連到更廣大的政治治理、社會問題、文化意義的爭議(相較於主流經濟學科想像的限制)。簡言之，透過他們的反省，我們可以更確切地說，市場的概念不但是可爭議的，甚至是必須爭議的。

二、主流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經濟論述與實在的表徵模式的後設反思

在前一部份的討論裡，我們由市場的爭議出發，來反思現代性經濟想像的問題與出路。如同我在前言所指出的，市場的絕對化，除了涉及現代性的想像外，更涉及了主流經濟學關於市場的論述發展歷程。為了突破既有學科知識想像帶來的限制，以及避免“絕對化市場”所帶來的概念框架與認知範疇的錯置與混淆，我將在這部份以後設的立場反省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表徵模式所涉及的問題。底下的討論，我將先從 1970 年代以降之所謂人文科學的表徵(representation)危機說起，透過經濟學修辭模式的討論，來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傾向。接著，將反省在科學主義與自然主義傾向背後所立基之學科知識論模式，並將其扣連到更普遍關於社會科學與現代性關係的反省，以質疑自然主義與科學主義所立基的十九世紀知識典範的侷限，並將這樣的知識論模式關連到現代性的文化變革。最後，基於前兩點的反省，我將指出，市場觀念的浮現涉及某種現代性自我理解的經濟文化的形成，藉由 Taylor 對於現代性社會想像的討論，我進一步將市場觀念的由來扣連到古典時期(17、18 世紀)更廣大的文化、知識、社會脈絡的變革。希望透過上述三點的討論，我們能夠突破既有經濟論述在理論上所遭遇的弔詭，並具體化我們的研究對象與提問。

(一) 從人文科學的表徵危機說起---經濟理論建構的修辭方式

在 1970 年代，隨著學院外部的反文化運動的出現、福利國家的瓦解、後冷戰時代的來臨與美國霸權危機的產生，對於新秩序浮現的想像與呼求，在學院內部開啟了對於既有典範權威的挑戰。隨著 Foucault(1970, 1972)、White (1973)、Rorty(1979)、Said(1979)、Lyotard(1984)等著作的出現，對於人文科學本身所立基的知識條件與正當性的懷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表徵社會實在之方式的質疑、對於現代性所內含的進步、理性等後設敘事與大理論(grand theory)的批判、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工程學角色的反省，逐漸浮現在社會科學理論爭議的視野之中，形成了所謂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爭議(Smart, 1993)。在這場人文社會科學的表徵危機之中，相關論述不再質疑理論與實在之間是否有著正確輝映的問題，也不再質疑概念與其指涉之間適當與否的問題，而是將矛頭指向了概念與理論所立基的表達風格、修辭方式與認識論模式，試圖重置既有論述表徵與實在的關係，歷史化與政治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論述(Marcus & Fischer, 1986)。

這場人文社會科學的表徵危機，從同一時期的經濟學內部的相關理論危機與知識轉折中(cf. Thurow, 1983; Bell & Kristol, 1989)，亦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證與回應⁶⁰。其中，McCloskey (1986, 1990, 1994, 1996)關於經濟學修辭模式的討論，乃是相關討論的重要轉折點，並啟發了後續更多經濟學者，透過更具語言學轉向色彩的後結構主義、論述分析、詮釋學等分析工具，試圖以文學批評模式的類比，促成經濟學研究的“文化轉向”、“詮釋學轉向”與“後現代轉向”(Klamer, McCloskey, and Solow, 1988 ; Samuels, 1990 ; Henderson & Dudley-Evans, 1990 ; Henderson, Dudley-Evans, and Backhouse, 1993 ; Woodmansee & Osteen, 1999 ; Cullenberg, Amariglio, and Ruccio, 2001 ; Ruccio & Amariglio, 2003 ; Erreygers & Jacobs, 2005)。

針對當代數理經濟學的形式化革命，McCloskey 指出，雖然經濟學家常常宣稱他們的理論具有嚴格的事實和邏輯基礎，但是，事實上，經濟學家的說服力往往來自於他們所使用的隱喻和故事，這些修辭的工具與手段，才是經濟學家取得成功與獲取公眾說服力的關鍵。基於這樣的立場，McCloskey 進一步將經濟學的

⁶⁰ 基於這場表徵危機，進而對人文社會科學中之各學科的反省，參見 Steinmetz(2005)。

抽象理論視爲是一種文本，視經濟學的數理模型爲一種隱喻，考察了 Paul Samuelson、Jan Tinbergen、Lawrence Klein、Robert Solow、Gary Becker、Ronald Coase 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數學與非數學的理論結構與推理過程中所使用的隱喻與修辭風格，並在這樣的基礎上，倡導經濟學應該在方法論上放棄已過時的實證主義，放棄對虛弱且難以維持的“科學現代主義”的立場，轉向更具對話性與包容性的修辭學模式，以生產更能自圓其說與能言善辯的陳述，而非虛假的“科學”宣稱⁶¹。

McCloskey 等人這種文學批評化的方法論立場，鬆動了人們對於經濟論述在後設敘事與理論模型中的科學主義迷思，也引發了經濟學方法論中關於實在論與建構論的爭議(Caldwell & Coats, 1984；“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988 年第四卷第一期的專刊；Backhouse, 1994；Boylan, 1995；Kalthoff, Rottenburg, and Wagener, 2000; Peter, 2001)⁶²。撇開這些爭議不談，McCloskey 等人的理論的確開啟特定的理論視野，來反省經濟學“理論模型”的表徵與實在的關係，促使我們必須關注在市場的知識框架的知識構作歷程中，“看不見的手”此一隱喻的使用如何影響了理論模型的建構，也使我們必須注意此一隱喻所內含關於自由放任的想像，如何在政策辯論與市場社會的相關爭議中產生相應的修辭效果，更使得我們必須注意此一隱喻的使用所可能導致的應然／實然、規範／實證等知識立場的混淆與錯置 (Viner, 1960；Samuels, 1990；Evensky, 1993；Denis, 2004；Courtemanche, 2005；Waller, 2006；Henry, 2008；蔡博文, 2005)。然而，我也必須指出，McCloskey 等人的理論，雖然強力地批判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與社會工程心態，但

⁶¹ 值得一提的是，McCloskey(1996)曾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偽科學宣稱主要表現在三個面向：一、濫用統計顯著性。二、黑板經濟學的形式主義。三、社會工程學的傲慢。她認爲，新古典經濟學這三項惡行，不但無助於對世界的理解，也無助於捍衛自由市場社會。有趣的是，McCloskey 雖批評新古典經濟學，但是她卻自稱是自由市場的支持者，關於她對於市場社會的辯護，參考 McCloskey(2006)。

⁶² 在此限於研究旨趣，無法處理關於實在論與建構論的複雜爭議。但是，我必須提醒一點，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本身就構成了社會實在的某一面向，而這些學科知識的發展歷程，更是更廣大而長遠的實在的社會建構過程的一部份。科學哲學家 Hacking(1999)就曾指出，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與其研究對象，具有某種論述表徵與社會實在的迴圈效應(looping effect)。換言之，倘若從最抽象的層次與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社會科學作為現代性之自我理解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某種自我指涉的弔詭性，實在論跟建構論的說法，可能都僅僅捕捉到這種自我指涉迴圈的某些側面。

是，他們的批判往往只是橫向地挪用文學批評的工具，去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論述模式，卻缺乏對於經濟學作為一門制度性知識體系的縱向反省，未能正視學科知識範疇的建立與正典化的過程，也未能正視學科所立基的知識論模式的起源與轉折。換言之，McCloskey 等人雖在方法論與修辭模式上強力地批判了“絕對化市場”所立基的科學主義迷思，但是卻未能回答這樣的迷思從何而來。

(二) 經濟論述的知識論模式---十九世紀現代性文化運動與其範式的侷限

事實上，除了上述這種從以語言學與文學類比出發，對經濟論述進行修辭學的分析之外，也有不少學者試圖從科學史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屬性與發展(Mirowski, 1988, 1989, 2002, 2004；Ingrao & Israel, 1990；Morgan, 1990；Schabas, 1990, 1992, 2002, 2005；Weintraub, 1991, 2002；Davis, 1997)。其中，Mirowski 對當代主流經濟學形式革命與科學主義的批判，可以說是最激進而徹底的。

基本上，Mirowski 將經濟學形式主義革命與科學主義的源頭，指向了所謂經濟學的“物理學嫉妒”(physics envy)。通過對於物理學史與新古典經濟學史的交叉回顧，Mirowski (1989)指出，從 19 世紀末的邊際效用革命到 1950 年代由 Samuelson 所引領的經濟學數理化的形式主義革命，相關理論模型的發展，往往是以物理學的知識論模式作為知識發展的範本，援以物理學的相關概念作為模型建構的隱喻說明與類比基礎。然而，Mirowski 指出，在此概念援引的類比中，新古典經濟學往往誤解、也誤用了 19 世紀古典力學與熱力學的相關理論(表現在經濟學的效用概念與價值理論對於能量概念的類比)，不但忽視了 20 世紀以來“近代物理學”對於古典物理學的理論反省與革新，其對於物理學概念的援引與理論建構模式的類比，亦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層次，因此，經濟學的數學化與公理化的形式革命，並不足以保證經濟學的嚴謹性、精確性與正確性。

上述 Mirowski 的論點，固然引來一些經濟思想史專家，對其經濟學史上相關文本細節詮釋的質疑與批評(De Marchi, 1993)，但是，不可否認的，Mirowski 的

說法，的確將關於經濟論述表徵與實在的反省，導向了學科所立基的知識論模式，這也提醒著我們必須將“絕對化的市場觀念”的相關提問，擺回 19 世紀以來經濟學的學科建制化過程與知識發展脈絡，以反省市場觀念的演進所涉及的方法論與知識論模式的問題。這種對既有學科建制的反省，一定程度地也呼應著上個世紀末 Wallerstein (1991, 1996, 1999, 2004)對於重建社會科學的相關討論。

面對著蘇聯、東歐、波蘭等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解體、東亞的興起、全球化的來臨與全球生態危機的挑戰等世紀末的歷史場景，Wallerstein(1999)指出，這些所謂新歷史格局的發展，事實上，並非是某種新局勢的變化，反而僅僅只是世界不再以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方式運作。因此，他認為，歷史並未終結，終結的不過是我們對於世界的熟知模式(呼應著上述的表徵危機)。基於這樣的立場，他進一步將“歷史終結的說法”與“知識不確定性”的問題，指向了社會科學所立基的十九世紀範式的侷限。首先，Wallerstein(1991)指出，基於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時空經驗的歷史變遷（特別是“變遷”的“常態化”），19 世紀初出現了一場可以名之為現代性的文化運動，社會科學的興起，乃是這個廣大的文化運動的一環（其他尚有各種社會改革運動的興起與諸多意識型態之爭）。因此，從一開始，社會科學就構成了現代性自我理解的一部份。接著，他指出，在社會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社會科學進行了學科性質的定位爭議(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爭議)與學科內部的專業分化，並且進一步在 1850 到 1945 年之間，透過學院體制進行了專業化，更基於此一專業化過程，對於社會實在進行了“過去／現在”(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國家／市場／社會”(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西方／非西方”（前面四個學科／人類學、東方學）等切割。

針對這種學科專業化歷程所造成對於社會實在的切割，Wallerstein 進一步指出，這種對於研究對象的切割，其背後基礎乃是立基於兩種不同的知識論模式與相應的時空範疇，一種是強調時空特定與時空敏感的知識論模式，另一種則是以古典物理學的方法、知識論與世界觀為模本，強調去時間、去空間地對於一般規律進行研究的知識論模式(政治學、經濟學與社會學都是屬於這種模式，而經濟

學更是最為顯著的代表)。他進一步認為，這些社會科學所立基的十九世紀的知識論式，以及其所導致對於研究對象到社會實在的切割，已經從原來對於思想解放與知識確立的助益，逐漸變成對於社會分析的妨礙。最後，Wallerstein(2004)還指出，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古典物理學的知識模式，其所代表的普遍主義與決定論的科學觀，自 1970 年代以來，正受到來自於複雜科學與文化轉向的兩大知識運動的衝擊，這兩大運動強力地批判了社會科學所立基的 19 世紀範式的侷限，因而也迫使我們必須正視重新開放社會科學的必要性與重構社會科學知識版圖的迫切性。

Wallerstein 的相關討論，雖然難免有過於空泛之虞，在相關知識進程的理論與歷史細節，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地，但是，他對於社會科學所做的一般性的診斷與反省，的確提醒著我們，市場的絕對化，涉及了經濟學此一學科的建制化與專業化過程，以及在此一過程裡，對於特定實在的壟斷與切割。因此，倘若我們要以絕對化市場的形成，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就必須正視在社會科學建立自我學科的科學正當性與制度合法性時，經歷過怎樣的關於學科屬性的爭議與方法論上的區隔，又透過怎樣的知識論模式的援引與類比，證成了社會實在的切割與特定知識框架的形成。此外，我們也必須正視社會科學的興起，乃是“漫長的十九世紀”廣泛的文化運動中的一環，社會科學與其研究對象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⁶³，乃是現代性自我反身性理解的一個重要面向⁶⁴，亦是“絕對化市場”的關鍵

⁶³如同前述 Wallerstein(1991)所指出的，十九世紀中的這場文化運動，除了社會科學的興起與社會改革運動的出現外，尚包括著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型態爭戰。然而，無論是意識型態的鬥爭、社會科學的興起，還是社會改革運動，這三者都跟市場觀念的演變具有緊密的關係(Rosanvallon, 2004)。此外，針對這場現代性的文化運動，思想史學者 Skinner(1998)與 Koselleck(1985)亦指出，1770-1830 之間，西方經歷了一場思想、概念與論述模式的過渡與轉變。其中，在意識型態上，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逐漸佔據了支配性意識型態的地位。同時，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新時空經驗，也改變了人們對於既有概念的語意理解與論述模式(特別表現在與時間有關的革命、進步、演化等概念上)。至於關於社會科學的學科建制化歷程與這場現代性文化運動的更廣泛討論(特別是在意識型態的形塑、現代國家的建造、社會問題的改革等問題上)，參見 Tribe(1978, 1981, 1988, 2007)、Kadish & Tribe(1993)、Wagner(1991, 1994, 2001b)、Wagner & Wittrock (1991)、Wagner & Weiss(1991)、Heilbron(1995)、Heilbron et al(1998)、Rueschemeyer & Skocpol(1996)、Porter & Ross(2003)。

⁶⁴ Giddens(1990, 1993)曾用“雙重詮釋學”與現代性的“制度反身性”來說明社會科學與現代性的關係。誠如上述的，Hacking(1999)也曾用迴圈效應，來說明社會科學與其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但是，如同我在導言所指出的，這兩種說法都低估了社會科學與現代性的複雜關係。

所在(特別表現在社會實在的切割上)。

(三) 現代性的社會想像革命---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的圖像

從上述的討論來看，“絕對化市場”的形成，不僅僅涉及經濟理論模型上的修辭模式與論述效果，亦涉及經濟學此一學科的建制化發展與相應的知識論模式，更涉及了現代性底下某種特定的經濟文化的形成。市場觀念的演進，一方面基於這樣的經濟文化，逐漸地走向絕對化與形式化的發展，另一方面，“絕對化市場”的形成，也倒過來強化這種特定的經濟文化。因此，正如同 Somers(1995)所指出的，社會科學的任何概念組成，往往都有其歷史文化意義的承載。社會科學的市場概念框架，乃鑲嵌於一種強調“絕對化市場”的現代性社會想像之中。

所謂的社會想像，根據 Taylor(2004)的說法，乃是一種現代性的自我理解的形式，其所指涉的是，人們用以想像自身社會存在的方式，用以想像人與人之間共處的方式與事情在人際之間進展的方式，以及在人們欲求得到滿足的期望背後所隱藏的規範性想法與圖像。基於這樣的定義，Taylor 進一步指出，在 17 世紀以降的後宗教改革時代裡，西方經歷一場現代社會想像的文化革命，依序出現三種不同的強調去鑲嵌(dis-embedding)的社會想像形式(經濟、公共領域與民主自治)。在這場社會想像的文化革命之中，伴隨商業社會的崛起，人們開始以看不見的手的隱喻，以經濟為中心，透過利益和諧的想法，建構了新的社會秩序圖像。並且，隨著相關論述的鋪陳與進展，無論在社會想像上或社會理論上，社會逐漸地被視為是一種經濟體，一種客觀化的實在，一種自律自足的體系。這樣一種被視為客觀實在的市場秩序圖像，從 18 世紀就一直持續至今，構成了現代性自我理解的重要文化圖示。

上述 Taylor 的說法的確提醒著我們，絕對化市場的形成，不僅涉及特定學科的專業化與建制化的過程，也涉及了前學科時期之某種特定社會想像的建構。換言之，市場觀念並不僅僅只是某一特定學科的知識框架，更是現代性自我理解的

重要的社會秩序圖像。因此，倘若我們要考察“市場的絕對化”的發展歷程，古典時期對於市場秩序圖像的建構，乃是重要的起點。

(四) 小結：學科的知識想像與市場觀念的演變

為了反省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形式革命所造成的混淆與錯置，首先，我們通過了人文科學的表徵危機與 McCloskey 等對經濟理論修辭模式的反省，質疑了新古典經濟學形式革命與“絕對化市場”所立基的自然主義與科學主義知識心態。其次，通過 Mirowski 與 Wallerstein 對於經濟學此一學科所立基的十九世紀範式的反省，我們也指出，自然主義與科學主義等知識心態的出現，乃涉及了 19 世紀現代性文化運動。正是基於這場現代性的自我理解的文化運動，才有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出現，並且在社會科學的專業化與建制化歷程中，相關各學科經歷了對於社會實在的切割與相應的知識論模式的建立，這最終導致社會科學與其研究對象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使得市場的絕對化得以可能。最後，通過 Taylor 對現代性社會想像的討論，我們更指出了，17、18 世紀的社會想像革命，形構了某種關於經濟的秩序圖像，在此圖像中，經濟被想像成某種客觀實在，進而由市場看不見的手來表述這樣的實在，這構成了研究“市場的絕對化”的重要起點。

簡言之，通過經濟學此一學科在理論修辭模式、知識論模式與社會想像的討論，我們逐步將關於 20 世紀數理化經濟學的形式革命與絕對化市場的形成，關連到 17、18 世紀古典時期的社會想像的文化革命、19 世紀現代性的文化運動與學科建制化的歷程。因此，正如同 Rosanvallon (2004) 所指出的，西方自 17 世紀以降的市場觀念史，乃是某種烏托邦社會秩序圖像，從構作、爭議到走向實現的過程，並且，此一過程還構成了我們當代關於市場相關爭議的歷史、文化與知識的重要背景。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對於市場觀念從古典時期看不見的手到 20 世紀中葉的一般均衡分析的知識發展歷程，我們不能僅僅只是依循著主流經濟學的正典化知識系譜，進行帶有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思想史研究(無論是正統

論述的捍衛，抑或異端論述的反擊)，而是必須基於對經濟學正典化知識系譜的警覺，從後設的視角，對市場觀念的“知識構作”進行“知識構作”的考察。

三、總結：研究對象的具體化與問題意識的深化

在上述的討論裡，我指出了，市場觀念的發展，從古典時期看不見的手到當代一般均衡分析，乃是一條“絕對化市場”概念框架的浮現歷程。在這個過程中，主流經濟學也逐漸向數理化與形式化的方向發展。同時，現代性經濟想像與市場經濟論述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不但對於彼此產生了互相強化的作用，也妨礙了對於“絕對化市場”議題的反省。因此，為了突破“市場的絕對化”所造成的認知範疇與概念框架的混淆與錯置，並反省主流經濟學學科知識想像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一方面，通過對於市場社會爭議的討論，我指出了，市場概念是具有可爭議性的(特別表現在市場的雙重意涵上)，市場觀念的演變，不僅涉及古典時期商業社會所引發的社會治理模式之爭，也涉及了 19 世紀市場社會的興起與相應的意識型態對抗，更涉及了唯經濟主義與社會工程學等知識心態的形成；另一方面，我們也通過對於經濟論述與實在表徵關係的後設反省，將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絕對化與形式化的市場觀念，關連到古典時期的社會想像變革與 19 世紀現代性文化運動。

換言之，針對市場觀念從“看不見的手到一般均衡”的絕對化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更具體化此一研究對象：基於 17 到 18 世紀的社會想像革命，人們建構了一種客觀的、自律自足的經濟秩序圖像來思考社會秩序的問題，並透過“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觀念予以表述。接著，經過了十九世紀現代性文化運動中，社會科學的興起與對社會實在的切割，經濟論述開啓了學科專業化歷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建立)，經濟問題也逐漸與其他問題脫離開來，市場的“去鑲嵌化”也開始獲得“所謂科學知識”的支撐。然而，卻也在“去鑲嵌化”的市場觀念獲得學術支撐的同

時，引發關於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與意識型態爭戰。其次，經濟學的學科專業化歷程，到了 20 世紀中葉，更是達到了數理化與形式化的高峰(經過了邊際效用革命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獨霸)。在這此一追求高峰的過程中，市場的觀念逐漸地去歷史化、去社會化與絕對化，並獲得了完全競爭市場的觀念表達與一般均衡分析的數理化證明。然而，市場的絕對化與經濟學論述的形式化，不僅造成了主流經濟學在理論結構與推論邏輯上的弔詭，更是涉及了某種唯經濟主義與社會工程學知識心態的形成。

基於這樣的研究對象的定位，我們可以把論文的研究問題深化如下：

- 一、基於怎樣的歷史場景與知識條件，“市場的社會想像”為何會在古典時期產生，並逐步地走向某種自律自足的秩序圖像，進而被客觀化為某種社會生活的領域與社會體系？其中又包含了怎樣關於社會秩序的論辯與爭議？
- 二、基於 19 世紀中的現代性文化運動，市場的觀念經歷過哪些實質議題的爭議與意識型態的論戰？這些爭議與論戰對經濟論述的學科化造成怎樣的影響？在學科與前學科時期的過渡裡，產生了怎樣的論述模式的轉折，使得市場的觀念逐漸去鑲嵌化？再者，這些爭議與轉折又為市場觀念帶來了怎樣的知識技術裝備，使其道成肉身(word was made flesh)？
- 三、在經濟學的學科建制化過程裡，經濟學經歷了怎樣的學科內部的爭議與外部的批評？經歷怎樣的正統與異端的分化與鬥爭？市場的觀念，為何會在學院的知識精鍊與純化過程中，走向了去歷史化、去社會化的絕對化發展？主流經濟學為何會在這樣的發展過程裡，沾染上社會工程學的色彩？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策略的設定：對於知識的知識構作分析

一、導言

在前面的討論裡，從經濟學社會工程的爭議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弔詭出發，我將論文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問題指向了“市場的絕對化”。市場的絕對化，不僅涉及了現代性經濟想像的形構，也涉及了主流經濟學的論述發展歷程。因此，為了突破經濟學論述與現代經濟想像的相互滲透，我透過關於市場社會的相關爭議，來反省現代性經濟想像的問題與根源，並將市場概念的演進，扣連到更廣大的社會、文化與知識脈絡。而且，為了反省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與絕對化市場所造成的錯置與混淆，我以後設的立場反省經濟論述與實在的表徵關係，並將市場觀念的產生，關連到古典時期的社會想像革命與現代性的文化變革。

簡言之，為了反省“市場的絕對化”所導致之在認知範疇與概念框架化的錯置與混淆，我們試圖通過後設的歷史化、脈絡化與問題化的提問，來反思市場觀念的演進過程中所掩蓋、遮蔽與錯置的歷史與知識脈絡。然而，這卻導致一些研究策略上的問題必須解決：我們該如何看待同時作為我們研究對象與對話對象的主流經濟學學科知識系譜(從看不見的手到一般均衡分析)，使得市場觀念史的考察，不僅不會落入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陷阱，甚至還能反思此一陷阱的由來？市場觀念史的考察，又該如何避免解開現代性社會想像與學科知識想像的糾結纏繞，從而避免“現在主義的知識投射”與“歷史主義的祖先崇拜”的兩難困境呢？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市場觀念的知識構作所必然涉及的知識因素與社會因素，並妥適地安置此一知識構作的兩面性，避免市場觀念史的考察淪為一種學科傳統的再發明呢？

上述的問題，一定程度指向了經濟學思想史中在解釋與詮釋上所遇到的兩難困境(意即，內在理論／外在理論、絕對主義／相對主義、理性重建論／歷史重建論等兩難困境)。而且，這樣的問題，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更關乎 19 世紀末以

降人文社會科學在知識構作所具有的迷思⁶⁵。因此，在底下的討論中，我們將由經濟思想史解釋的兩難困境談起，並通過此一兩難困境所立基的迷思，進一步關連到 Foucault 對於人文科學論述形成與論述實作所立基的知識前提與歷史前提的反省，以及 Bourdieu 對於此種兩難問題在方法論上的超越與提醒。最後，透過上述反省與討論，進一步提出可能關於知識構作的研究方法，並具體化研究步驟⁶⁶。

⁶⁵ 這些迷思的由來，主要是因為忽視人文社會科學所具有的“迴圈效應”而產生的。前述關於人文科學的表徵危機與 19 世紀範式的侷限的相關討論，一定程度上已經指出了若干問題。基本上，這些迷思具體化地表現在幾個面向上：一、研究對象的迷思。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構作，往往會理所當然地將經驗現象直接等同於研究對象，忽視了研究對象乃是基於某種特殊理論視角的凝視而出現的，本身就有其論述建構的歷史過程。而且，也忽視了所謂的經驗現象亦往往受到諸多論述的象徵性包裹，此一論述包裹本身就作為社會實在的一部份。二、關於知識論模式的迷思。如前所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往往試圖模仿自然科學的知識論模式，試圖以某些看似具體的經驗作為解釋的基礎或對象(如物質動機、利益、理性、身體的生理基礎)，並且，試圖透過某些看似中立的知識工具(通常是數學工具)，試圖尋求解釋的普遍性與客觀性。然而，卻未曾深究這樣的知識論模式與知識工具所隱含的理論立場與預設，忽略了這些看似具體的解釋基礎所具有的抽象性，也忽略了客觀性與普遍性本身的社會生成(指現代學院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社會制度)。此外，即便那些採取主觀主義立場的研究，也往往容易以一種想像人類學的方式，將觀察者的知識、信念與慣習偷渡進參與者的視角中，進而建構了主體的想像，卻未曾意識到理性知識的承載者，並不必然與理性主體共享相同的意義脈絡與知識心態。三、意識型態上的迷思。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構作，往往會低估知識的社會生成--現代學院作為知識生產場域所具有的弔詭性與侷限性，因而也忽視了學院的二階論述與常民一階論述之間的差異，忽略了學院知識觀察者視角與常民參與者視角之間的不同。基於觀察者視角與參與者視角的混淆與忽視，往往導致學院知識人，一方面試圖立基於學院觀察者的知識權威，將常民論述視為是一種迷思，試圖透過對其的駁斥，證成自己科學知識的有效性(忽略常民的論述本應該是其解釋對象的一部份，觀察者所建構的理論律則，都相當程度地可以從常民的視角與實作“再生產”出來)，甚至，更會透過某些政策工具與社會工程，企求某種與其學院論述相應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則是以參與者之名，試圖透過對其廉價的代言，以某種政治正確的立場，對於社會與學科現狀進行批判，並透過此一象徵鬥爭，佔取在知識上與社會正義上的道德至高點，呼求符合其利益(物質的與象徵的)的知識變革與社會改革。

⁶⁶ 在此，或許我們可以交代，為什麼我們不採取“新科學與知識社會學”的取徑來分析。所謂的“新科學與知識社會學”，主要是與舊知識社會學之稱的 Mannheim 的意識型態分析與 Merton 的功能論分析(主要針對學術社群與組織)有所區別。針對舊有的取徑，“新科學與知識社會學”認為，一方面認為不該如同 Mannheim 一般，只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與意識型態，賦予了自然科學論述豁免分析的特權地位；另一方面，則是不滿意 Merton 僅僅分析知識的社會組織方式，未能真的針對知識本身進行分析(Barnes, 1974)。因此，“新科學與知識社會學”，一方面重新以“科學實作”為其研究對象，另一方則試圖援引微觀社會學與日常生活語言學派等理論資源，分析知識是如何被接受而成為有效的。然而，在這樣的實作轉向中，往往會將知識化約為行動者的信念，並試圖分析這些信念所立基的社會基礎(例如，信念背後的利益基礎，信念是透過怎樣的社會資源動員而獲得鞏固的)，因而低估了論述結構的複雜性與相對自主性(例如世界觀與論述整體結構的問題)，亦忽視了論述對於社會實作與社會關係的可能影響，以及此一影響所涉及的複雜機制(這事實上是 Mannheim 的意識型態分析已經意識到的)。關於“新科學與知識社會學”的一般性回顧與討論，參考 Barnes (1974)、Pickering(1992)、Swidler & Ardit (1994)、Bourdieu(2004)。關於從“新科學與知識社會學”出發對於經濟學論述的研究，大多數主要集中在財務經濟學如何建構了衍生性金融市場(表現性命題是主要的理論根據)，參考 Preda(2007)的回顧與第一章註釋 11。此外，針對經濟學的學科發展與次學科的研究(如財務經濟學、健康經濟學、勞動經濟學、新古典經濟

二、由經濟思想史解釋的兩難困境談起

類似科學史的內在理論與外在理論的爭議⁶⁷，在經濟思想史內部，亦存在著所謂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爭議(Chalk, 1967; Backhouse, 1992, 1994; Khalil, 1995; Blaug, 1997a; Biddle, 2007)。所謂的絕對主義的知識立場，往往會採取內部理論的科學史解釋觀點，強調學科知識的線性積累過程。因而，絕對主義的思想史研究，往往會從現在的理論觀點與知識判準出發，試圖對於既往的經濟思想論述做出評判，並指出當前學科知識的進步所在(在概念的嚴謹性、分析工具的精確性與理論解釋的完整性等面向上)。而且，這樣的研究也往往會採取輝格史觀(Whig history)的角度，僅就某些歷史上的關鍵人物、關鍵文本、關鍵理論進行詮釋，並試圖建構正典化的知識系譜，以證成學科知識的演進史，乃是一條逐漸邁向真理的有效知識積累歷程⁶⁸。

至於所謂相對主義的立場，則是採取某種外部理論的科學史解釋觀點，強調任何理論的有效與否，都只能從該理論所座落的時空環境來判斷。因此，他們反對以任何絕對的判準來對思想的進步與否進行評判。他們也反對任何線性敘事的知識進步史觀，批判這種史觀預設了“不同時空的經濟論述，都具有相同研究對象或議題”，以及“知識的進展具有歷史必然性”這樣的命題。基於這樣的立場，相對主義的思想史研究，往往會強調歷史背景與社會原因對於知識的影響，試圖將知識的主題、研究對象與外在環境關連起來，透過外在環境變革來解釋論述的

學的興起、經濟學的知識論文化)，參考 Ashmore, Mulkay, & Pinch (1989)、Yonay(1994、1998)、Breslau(1997、2003)、Yonay & Breslau(2006)。

⁶⁷這是Karl Popper、Thomas Kuhn、Imre Lakatos 等人，基於科學哲學的立場，對於科學知識進展所做的辯論而引發的，參考 Lakatos & Musgrave(1970)。關於此一辯論在科學史內部回顧，請參閱 Shapin (1992)。此外，值得一提的是，Shapin 認為上述科學哲學的辯論，並非是此辯論的真正起源，真正起源乃是 Merton 對於 17 世紀科學革命所做的知識社會學考察。

⁶⁸有趣的是，採取絕對主義的知識立場所進行的思想史研究，往往是以所謂經濟分析史為名，而且，通常都是主流經濟學家所做的思想史研究。對於此立場的捍衛，參見 Stigler(1960)、Samuelson(1987, 1988)(這兩位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至於從這樣立場所做思想史研究，最為著名的莫過於 Schumpeter (1994)的《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一書。

變化⁶⁹。

上述這兩種思想史的知識立場，一定程度上都主導著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詮釋方法(Blaug, 1991)，然而，卻也遭遇到各自解釋上的困難。一方面，絕對主義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容易陷入某種目的論的知識進步史觀，粗暴地將過去的經濟理論予以剪裁，以符合當前的知識框架，並證成這種知識框架在知識進展所具有的必然性與真理性。這往往只會導致時代錯置的問題，使得過去的經濟論述失去真正的內容，徒留現代知識框架的烙印，更會導致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正典化的功能之外，失去任何學術上的意義與功能(絕對主義的立場，本身就隱含了否定思想史研究具有任何學術貢獻的意涵)。另一方面，相對主義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只是預設某種外在環境與知識論述的對應關係，並無法有效地將外在環境的變動與經濟論述的變化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建立起來，而且，也無法提供任何有效的判準去解釋知識的變化(知識是否進步的問題)，最終甚至可能陷入某種浪漫化的祖先崇拜情結。

面對這種非此即彼的兩難，一些思想史學者，如 Blaug(1997a, 2001)與 Backhouse(1992, 1994)，試圖揚棄上述兩種立場對於文本詮釋與歷史解釋所採取的過於狹隘與樸素(naïve)的觀點，代之以兩種更具自我意識、問題導向、文本為中心的重建視角：理性重建說與歷史重建說⁷⁰。所謂的理性重建說，其主要目的是讓經典文本與現代經濟學之間能夠產生某種的關連。因此，他們試圖用現在的數理語言去重新表述過去的經濟論述：一方面，基於最新發展的分析工具與技巧，釐清歷史文本所具有的文字晦澀之處，並透過相關數理模型的重建，使得文

⁶⁹ 相對主義的知識立場，往往會從史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來定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關於此立場的經典宣示，參考 Mitchell(1949)、Fetter(1965)。關於從此立場出發所做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著名的乃是知識社會學家 Werner Stark(1994, 1998a, 1998b)所做的相關研究。基本上，Stark 的解釋原則，往往只是以某些重要的歷史變革為背景，來強調如果沒有此一背景，一些重要的經濟論述將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如果沒有工業革命，古典政治經濟學將是不可想像的)。

⁷⁰ Blaug 與 Backhouse 的理性重建與歷史重建的說法，主要是源自 Rorty (1984)的啟發。值得注意的是，Blaug 與 Backhouse 這兩位經濟學出身的思想史家，基本上都認為歷史重建的說法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都較為傾向理性重建的提議。然而，有趣的是，Blaug (2001)卻逐漸改變這樣的立場，轉而傾向於更具歷史重建的提議。關於理性重建與歷史重建的回顧與比較，可參考 Emmett(2007)。

本的主題得以被更深刻的剖析(甚至超乎文本作者所能認識的)，以解開文本可能的矛盾之處或詮釋之謎；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透過這樣的重新表述，使得過去文本的一些真知灼見，得以用更清晰的數理語言，被當代經濟學家所理解，進而帶來理論創新的啟發⁷¹。

所謂的歷史重建，則是採取文化史的立場，拒絕絕對主義與理性重建所預設的“現在主義的投射”：一方面，他們認為諸多經典文本中所謂的矛盾或曖昧之處，主要的問題並不出在經典文本本身，而是出在經典文本與我們有著不同的意義脈絡，所謂的矛盾與曖昧之處，往往是因為強將當今的理論框架加諸經典文本之上所造成的。因此，要理解文本的真正意涵，則必須把文本擺回當時的歷史時空與語境脈絡中，透過重建經濟論述在當時是以怎樣的方式被理解與詮釋的，還原經濟論述所身處的意義網絡，以貼近思想家真正想表達的意圖(對於當時的讀者而言)，解釋其真正的思維；另一方面，則是將文本寫作視為是一種言說行為(speech act)，透過日常生活語言學派的“以言行事”想法的引入，將文本的書寫與外在環境的變動關連起來，達成真正的對於思想演變的歷史解釋⁷²。

這兩種重建立場，雖然不必然如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般針鋒相對，一定程度上，甚至這兩者還可能達成互補的效果。但是，不可否認的，理性重建的立場，往往預設著過去的論述與今日的論述具有相同的研究主題，差別只在於表述工具的不同(文字表述 vs. 數理推導)，因而，當他們利用今日的分析工具去詮釋過去

⁷¹ 理性重建的知識立場，可以說是經濟思想史內部的主流，相關的研究散見在各大經濟思想史的雜誌上(如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等)。這裡僅以兩本較為著名之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為例，參考 Blaug(1997b)、O'Brien(2004)。對於理性重建立場的辯護，參考 Waterman(2007)。

⁷² 這種立場主要是以 Pocock、Skinner 所領導的劍橋思想史學派為主(Tully, 1988; Ball, 1988; Pocock, 1989; Skinner, 2002 ; Palonen, 2003)，經濟思想史學者中受這個學派影響的，主要是 Donald Winch(1965, 1973, 1978, 1996)。關於歷史重建的立場的回顧與辯護，參見 Klaes(2007)、Brown(2007)。值得一提的是，經濟思想之歷史重建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別表現在對於 Adam Smith 理論的詮釋上。關於 Adam Smith 詮釋史的回顧，以及歷史重建後對於 Adam Smith 理論的還原與澄清，參考 Recktenwald (1978)、Tribe(1999)。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經濟學家所做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傾向於理性重建的觀點，當前思想史、文化史與科學史的主流立場，往往是以經過語言學轉向的社會文化分析為主，比較接近歷史重建的看法，相關的討論參見 LaCapra & Kaplan(1982)、Biersack & Hunt(1989)、Shapin(1992)、Poovey(1999)、Bonnell & Hunt(1999)、Koselleck(2002)、Gallaghe & Greenblatt(2003)。

文本時，往往容易產生削足適履的情形，將過去經濟論述難以以數學模型表達的部分予以抹平，終究避免不了時代錯置與扭曲的發生(即便此一誤解可能極具理論上的創意)，使得過去的經濟論述徒留現代數理模型的空殼，而失去其原有理論的靈魂。相對的，歷史重建的立場，試圖更細緻地重建文本所處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來進行詮釋，以達成真正的歷史解釋。然而，我必須指出，他們雖然敏感於論述脈絡的改變，以及現在的社會想像與知識想像對於經典文本的誤讀與誤置，但是，他們卻往往未能以更具後設性的立場來考察所謂“現在主義投射”的根源，並沒有分析在學院的專業化過程中，如何透過經典文本的誤讀與誤置，建立了正典化的學科知識系譜與正統理論的知識權威。因而，他們雖然可能還原了作者原來的意圖與文本在當時時空的意義，卻避免不了祖先崇拜考古癖的諷刺。

簡言之，從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對立，到理性重建的現在主義與歷史重建的歷史主義，這些二元對立的確構成了經濟思想史研究在解釋取徑與知識正當性上的兩難⁷³。然而，我必須指出，上述的兩難困境，乃是起源於相關研究者並未正視“知識的構作”向來就具有兩個面向：一個是知性的，另一個是社會的。這兩個面向並不具簡單的“輸入與輸出”對應關係，而是各自具有複雜而迂迴的反饋機制。這兩個反饋機制之間往往形成某種弔詭的迴圈，使得任何從某一側面切入對於知識構作的討論，往往陷入顧此失彼的兩難。相關研究者也未能正視在上述兩難困境中隱而未顯的現代性想像與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問題。相對主義與歷史重建說，雖然意識到現代性想像與學科想像對於經典文本的詮釋所帶來的扭曲，但是，他們過於橫向地對於文本的解讀(過於重視文本與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意義脈

⁷³ 這種二元對立，除了造成了解釋取徑上的兩難外，一定程度也涉及了經濟思想史此一學科在經濟學內部的尷尬位置與定位。特別是當今日主流經濟學論述越來越傾向於自然科學的知識論模式時，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教育與學者的培養，必然在經濟學內部被貶為次要與殘存的。因此，不少經濟思想史研究者，頻頻發出說帖，試圖向主流經濟學家證成此一次學科的正當性 (Khailil, 1995; Blaug, 2001; Weintraub, 2002, 2007; Kurz, 2006)。此外，也有不少學者意識到，經濟思想史往往成為主流經濟學與異端經濟學的戰場，淪為正統與異端論述取得知識正當性與權威的工具(透過傳統的發明與再發明)，缺乏次學科的自我獨立與專業性(Lodewijks, 2007)。有鑑於此，有不少學者試圖割斷經濟思想史與主流經濟學的聯帶，拒斥經濟思想史淪為經濟學家的業餘嗜好與知識鬥爭的發展傾向，往更廣大的科學史、文化史、思想史的史學社群靠攏，追求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獨立性與專業性(如同科學史之於科學的關係)(Schabas, 1992, 2002)。只是，就目前的情況看來，上述的提案的效果如何，仍有待評估(cf. Blaug, 2001)。

絡的連結)，未能從縱向的接受史角度，回答此一扭曲的根源與意義何在。絕對主義與理性重建說，則是理所當然於現代性的社會想像與學科知識想像，因而，區分了經濟的與非經濟的論述、現代的科學知識與前學科的哲學思想、數學推導的模型建構與文字描述的敘事論證，終究避免不了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相互滲透所帶來的解釋上的混亂與理論上的錯置。因此，無論是絕對主義的證成或現在主義的投射，還是相對主義的批判或歷史主義的還原，終究未能正視現代性的社會想像與當代學科的知識想像所帶來的限制，因而無助於更根本問題的反省。而且，正是因為缺乏對於現代性社會想像與學科知識想像的正視，上述這兩種取徑都未能對於知識構作過程的歷史與知識脈絡提出更具後設性的反省，這不僅導致解釋上的兩難困境的產生，甚至更會導致關於知識構作在研究對象、知識論模式、意識型態上等迷思的產生。

換言之，倘若我們要以市場觀念的知識構作歷程為討論對象，我們就必須同時關注知識構作所具有的知性面與社會面，留意這兩面向所形成的迴圈效應。而且，我們也不能再對於 19 世紀末以降的現代性社會想像與學科知識想像，過於理所當然，必須更具後設性地考察知識構作所涉及的歷史與知識脈絡的轉折。因此，底下的討論，我們將進一步討論 Foucault 基於關於論述形成與論述實作的分析，對於現代性社會想像的批判⁷⁴，以及 Bourdieu 基於學科知識的弔詭性與侷限性的反省，對於學科知識想像的批判，以具體化研究策略與步驟。

三、Foucault 對於現代性想像的批判---知識／權力的真理遊戲

Foucault(1972)對於知識構作最為具體的討論，出現在《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一書⁷⁵。在該書裡，他首先澄清其所強調“歷史乃是斷

⁷⁴受到 Foucault 理論所啟發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參考 Keith Tribe(1978, 1981, 1988, 1995, 2003, 2006)。

⁷⁵這裡必須提醒，Foucault 所謂的論述，並不指涉一般性的言談或意見，而是指向正典知識或學科知識。關於此點，可參見英文翻譯者對於用英文“knowledge”來翻譯 Foucault 所使用的兩個法

裂的，而非連續的”此一基本立場，並試圖將其這樣的立場關連到更廣泛地關於史學方法論的反省與各主題歷史書寫的趨勢(指向年鑑學派與Bachelard、Canguilhem等法國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傳統)，重新回應十九世紀所遺留下之具有形上學色彩的歷史哲學與主體哲學。而且，他也試圖借此一回應，重新釐清自己過去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的軸線，並重新定位、修正自己過去的研究，以利於更細緻地檢討論述所具有的規則性。

針對論述的規則性，Foucault首先界定了論述的單位---陳述(statement)。Foucault指出，要界定與分析陳述，就必須注意陳述所具有的系統性規律、陳述整體所形成的場域、此場域的“論述空間”形構、某一陳述事件在“論述空間”所佔據的位置。接著，Foucault討論了有關“論述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s)的幾個假設。Foucault指出，要分析“論述的形成”，就必須留意陳述與陳述之間的關係，以及此關係所涉及的論述對象的建構、陳述與陳述的關係類型、概念體系的建立與理論的表現形式。其次，延續上面的討論，為了進一步勾勒“論述形成”規則的具體內涵，Foucault依序討論了對象的形成(涉及到使對象迸生的積極與消極條件、隱沒在對象之下的論述與非論述的關係網絡、包裹與談論對象的“論述實作”⁷⁶)、論述的發言模組(涉及到發言者、發言所座落的制度性場所、發言主體於此場所中的各種位置與型態)、概念的形成(涉及到概念與概念的承繼關係、不同陳述場域的共存形式、建構陳述的方法程序)與理論策略的形成(涉及到不同理論之間的同異區辨、不同理論在陳述系統的分佈狀況與連結援引關係、理論得以在非論述場域運用所訴諸的權威)⁷⁷。

文字“connaissance”與“savoir”所做的說明(Foucault, 1972:15)。在 Foucault 的用法裡，“connaissance”是用來指涉特定的學科知識，“savoir”則是用來指涉構成知識整體的基本規則。

⁷⁶ 所謂“論述的實作”(discursive practice)，根據 Foucault(1972: 117)的定義，指的並不是一個人提出觀念、慾望與意向的表達性操作，也不是指發言主體可以說出符合文法的能力，而是一組匿名的、歷史的規則。此一規則總在具體的時間與空間中被決定。這樣的時空，對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地理與語言區位來說，定義了發言功能得以操作的條件。簡單地說，“論述實作”涉及了在特定時空之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下，使某種發言得以可能與不可能的規則與操作。

⁷⁷ 有趣的是，Foucault(1972)進一步將這些規則對應到他過去的作品：《古典時代瘋狂史》(2005a)涉及的是論述對象的形成；《臨床醫學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1993)則是討論論述的發言模組；《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法文原名《詞與物》)(1970)則是討論概念的形成。

基於這些規則的討論，Foucault進一步回過頭來討論陳述與“論述形成”、“論述實作”之間的關係。通過對於陳述與句子、命題的類比與區隔，以及對於陳述的功能性定義，他指出，上述“論述形成”的四大規則(指對象、發言模式、概念與理論形式)，構成了陳述所具有的系統性規律與層次。因此，“陳述事件”體現了“論述形成”的個體化，陳述的系統性整體，則形構了“論述形成”的可能空間，“論述實作”則涉及到使陳述在特定時空下得以可能的社會歷史前提。最後，基於這樣的分析，Foucault試圖擺脫了十九世紀形上學的糾纏(指用排除／含納、外在性分析、論述效果的沈積性等原則，取代總體性、內在先驗性、起源問題的追問等原則)，發展以“論述實作”的“檔案”(archive)為中心、考察“論述形成”的“歷史先驗”前提為任務的知識考古學研究。

上述Foucault關於論述形成與論述實作的討論，的確提供了超越上述思想史兩難對立的可能出路。通過對於在論述實作的“檔案”中，使某一陳述得以可能與不可能的知識、歷史與社會前提的追問，考察此一陳述系統(論述)所涉及的對象的建構(特別是隱沒在對象產生中的論述與非論述網絡)、發言的模式(特別是發言主體與制度場所)、概念體系的建立(概念的承繼、挪用與證成方法)、理論策略的形成(理論間的區隔、援引與權威的訴諸)等問題，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確實提供了某種兼顧知識構作的知性面與社會面的研究策略。然而，我仍然必須指出，上述Foucault對於論述形成規則的討論，無疑地留下一個問題：Foucault如何看待“論述形成／論述實作”與“非論述實作”(但與論述相關)之間的關係？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Foucault(1971)在其法蘭西院士就職演講中，進一步將問題指向的知識／權力的真理遊戲所具有的排他性與掩蓋效果(cf. Foucault, 1980)。在該演講中，他指出真理的構作涉及到一種區分／排除、挑選／遮蔽的過程，其操作可分為外控與內控的程序。前者指向了某種具歷史性的、塑形的、制度性的排除系統(利用各種禁忌、儀式與發言位置來進行對象的排除)與求真意志(will to truth)(真假的辨認與對立)，後者則是涉及論述內在的檢查機制，如評論原則(透過各種詮釋方式賦予論述的正當性)、訴諸或賦予“作者”權威(構作“作者

主體”與“作品全集”，使論述具有整體性)、學科的論述生產的控制程序(涉及以特定的對象領域、方法程序與知識工具，建構論述的正當性，並且，禁制非法的提問與知識)。而且，基於這兩種外在與內在的排他程序，Foucault還進一步指出，真理的構作還必須涉及對於此一程序的否認、忽視、遺忘，並透過此一掩蓋機制，真理得以被自然化，以某種單一理性視角，召喚某種知識主體，將論述與陳述予以重新分類與包裝，並使世界得以在“真理”中被命名、被彰顯。因此，為了追溯此一論述的真理效果與權力機制，Foucault進一步結合考古學的批判與系譜學的考察，來穿透論述形成、權力關係、真理效果的三位一體的自明性⁷⁸。前者(考古學)指向了不同時代的不同排他性系統，後者(系譜學)則追溯某些真理系列在不同知識考古地層中的出現、成長與變化條件，追溯某種賦予真理肯定性，並構成論述對象的權力機制。這也預告了Foucault之後，關於知識、權力與真理的規訓權力(discipline power)、生物權力(bio-power)與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等研究⁷⁹。

⁷⁸ 因此，考古學與系譜學的研究，並非如 Dreyfus & Rabinow(1983)所言，是截然二分的，並構成 Foucault 思想的前後斷裂。考古學指向的是論述的形成與其排他性，系譜學則是在此基礎上，考察論述、真理、權力三位一體所產生的效果與作用。事實上，在此就職演講中，Foucault 就清楚地表明，這兩者從未能完全分開，兩者應輪流交替、互補、彼此支援。

⁷⁹ 關於治理術、規訓權力、生物權力(bio-power)的研究計畫，參考 Foucault(1977, 1978, 1991a, 1991b, 1991c, 2003a, 2003b, 2006, 2007, 2008)。規訓權力、生物權力與治理術都是 Foucault 在其權力系譜學考察中常使用的概念。規訓權力的分析主要出現在 1975 年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中，對於 Bentham 圓形監獄改革的分析中。生物權力主要出現在 1976 年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的第一卷，以及同年度的法蘭西院士《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的演講中。從《規訓與懲罰》到《性史》第一卷、《必須保衛社會》，Foucault 逐漸由某種組織性的、局部性的、微觀的規訓權力分析，轉向了整體性的、一般性、宏觀的生物權力分析(中間經過了《必須保衛社會》一書中關於主權到生命權力的討論)。治理術的概念，正是出現在這個轉折過程中。關於治理術的討論，首先出現在他 1978 年法蘭西院士演講《安全、領土與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的 2 月 1 日的課堂上。治理術的觀念是 Foucault 基於生物權力計畫，以人口為議題，在分析歷史上西方社會的安全裝置(apparatus / dispositif)所發展出來的。在 Foucault 的使用方式中，治理術被用來指涉治理的技藝(程序、技術與策略)、治理的對象與功能、治理的理性，不僅涉及了統治的技藝與社會秩序維持機制，更涉及了對他人的治理與自我的治理(因此後來被 Foucault 用來分析古希臘的倫理學)。因此，就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說，治理術乃是一種對於人治理(個人、他者與人口)。由於在這個後來被 Foucault 廢棄的生物權力的整體研究計畫中(Foucault, 2003a, 2003b, 2007, 2008)，他主要是在處理人口所涉及的生物權力問題，因此，焦點主要集中在政治統治與社會秩序維持的知識-權力與真理的關係，分析了從中世紀的牧養權力(pastoral power)、君主的主權統治、16 世紀以降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的演變(從古典警政國家到現代治理性國家)到 20 世紀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因而，Foucault 的現代性一般權力分析，開始涉及了自由主義與西方經濟論述的治理術問題。簡言之，透過規訓權力、生物權力與治理術的討論，Foucault 的確逐漸把論述形成與組織性、制度性、一般社會性的權力運作關連起來。在這樣的過程中，權力的性質也逐漸從壓制性轉換至生產性(特別表現在主體的生成上)。然而，我必須指出，在 Foucault 的相關研究與討論中，他的確常常利用被遺忘的重要文本來提醒，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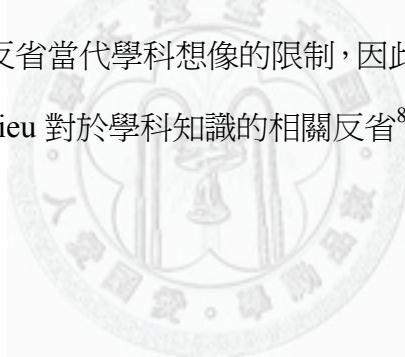
簡言之，Foucault 對於知識構作、權力運作與真理效應的三位一體的討論，以及正視此一結合所立基的排他程序與掩蓋機制，的確提供了某種關連論述與非論述實作的方法。他也提醒我們必須注意 19 世紀以降，人文科學的知識構作在主體、真理、歷史等問題上的許多迷思(這往往來自於主體哲學與歷史哲學的”遺毒”)。他更提醒我們，要打破這些迷思，就必須注意論述與制度之間的歷史性相互形構，關注論述作為一種治理術⁸⁰，如何刻畫了對於主體、治理模式的想像，

現代理性知識系統而言，被忽視的知識脈絡與轉折所可能具有的意義。但是，在他的分析中，主流論述系統對於治理對象與主體建構、對於治理模式的刻畫，卻常常被他理所當然地信以為真(這個問題到了《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對於已學科建制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更容易突顯出來)。於是，在他眼中，真理-知識-權力的複合體，似乎繞成一個的不斷自我再製(autopoiesis)的系統。為了拆解此一系統並尋求出路，Foucault 最終也只能逃到古希臘去尋找新的參照點，開啟了他晚期的倫理轉向(Foucault, 1984, 1986, 2005b, 2010, 2011)，並廢棄了現代性生物權力的分析計畫。換言之，Foucault 的最大問題在於，他的論述分析考察的，乃是現代性的制度性知識體系，但是，他卻往往忽略了此一知識體系向來存在著正統與異端的鬥爭，也忽略了制度性知識的象徵鬥爭與知識政治，如何把其他可能的知識形式禁制為“非知識”，以產生真理的效應(雖然，他宣稱要分析此點，但是，他往往也只是提醒某個被遺忘與忽視的知識脈絡或轉折，並沒有實際分析這個禁制過程，以及對此過程的掩蓋機制)。而且，他也往往將主流論述體系關於主體、治理模式等想像，等同於社會實在本身。於是，他對於社會問題與病態的考察(如瘋狂、犯罪、性濫用)，常常引發這些“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而是由論述所發明”的爭議(Hacking, 1999)。事實上，Foucault 常未能清楚地說明，他所分析的到底是概念與想像，還是社會實在本身，是特定時期知識人的憂慮與關懷，還是社會問題本身。即便 Foucault 可以辯解說，他所要分析的是概念與實在的糾結纏繞(Deleuze, 1988)，但是，他卻往往沒有分析此一糾結纏繞可能涉及的象徵暴力與知識政治(請參照於後續關於 Bourdieu 的討論)。因此，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Foucault 對於現代性的一般權力的分析，實際上乃是一種對於現代性想像的分析與批判(cf. Taylor, 2004)。總言之，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 Foucault 的研究策略(並通過 Bourdieu 相關的討論)，但是，更明確地留意論述對於主體與治理模式的想像建構，以及更注意主流論述的正典化過程。

⁸⁰ 承上註，隨著治理術該次課堂演講的獨立翻譯與相關文章的集結，在英美社會科學界，開啓了治理術的研究(Burchel et al., 1991; Gane & Johnson, 1993)。相關的學者，開始把治理術的概念，運用到社會制度與組織(如警政、公共衛生、經濟制度與組織、社會福利、教育、都市規劃)、社會問題(如貧窮、失業、老年、醉酒、犯罪)、專業知識及其治理(如會計學、心理學、精神病學、保險學、統計學、醫學、犯罪學、法學)、思想史(自由主義、經濟論述與社會科學)等領域。Rose & Miller(2008:1-25)就曾指出，治理術研究在英美的發酵，主要是基於新左派知識份子不滿於既有關於意識型態、主體意識、國家、生產模式的理論辯論流於形式與空泛，因此，研究者試圖藉由 Foucault 的論述分析(特別是治理-倫理問題)來重啓相關研究。他們也指出，治理術的延伸研究，進一步發展出從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到“先進(advanced)自由主義”的研究框架，來研究現代社會的進程(cf. Barry et al., 1996)。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架構下，治理術的研究試圖突破傳統的學科疆界與對象領域，也試圖質疑公共與私人、國家與社會等二元理解架構，更試圖指出諸多超越民族國家格局與後社會(post-social)的治理問題(如風險問題)。關於，對於治理術的研究的一般性回顧與介紹，參考 Rose(1999)、Rose et al.(2008)、Donzelot & Gordon (2008)、Dean(2010)。關於這個取徑的批判(通常也在新左派的脈絡下)，參考 Neocleous (1996:ch3)、O'Malley et al.(1997)、Lemke(2002)。然而，我也必須指出，Rose & Miller 等人一定程度上也意識到 Foucault 的論述分析，對於制度性的知識政治的討論是有所不足，因此，試圖結合治理術研究與由科學社會學家 Latour 與 Callon 所發展出來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然而，行動者網路理論，固然可以幫助分析知識政治的問題(特別是正統與異端的鬥爭，以及“從陳述到事實”的過程)，也分析了現代性想像是一種對於混雜的轉譯與純化的結果。然而，我也必須指出，行動者網路理論，往往如同科學家一樣，混淆了實在與“科學事實”(相對於“混雜與開放的實在”，

而且，也必須注意權力的排除與掩蓋效果，如何使論述得以產生某種真理效應。

換言之，Foucault 對於論述形成與現代性權力分析的討論，的確指明了現代性的權力建制，如何透過排除程序，維護著某種由論述所形構的秩序想像與主體想像，並透過某種掩蓋機制，促使這種社會想像，不僅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被神聖化為真理。因此，Foucault 的確提供了一定的方法策略，使我們得以反省現代性的社會想像的問題。然而，我也必須指出，Foucault 的考古學與系譜學等相關作品，往往是為了駁斥十九世紀所遺留下來主體哲學與歷史哲學所導致知識構作上的迷思，因而主要集中在現代性的文化變革或更早的古典時期，甚少直接論及當代學科的知識想像與知識政治的問題。而且，Foucault 對於權力機制的討論，往往直接預設了論述與權力之間必然的對應關係，甚少處理學院本身作為一種權力機制的問題，如何跟外在的社會制度具有某種程度的同形(homology)關係。因此，為了更深入地反省當代學科想像的限制，因此在具體化研究步驟之前，我們將簡單地回顧 Bourdieu 對於學科知識的相關反省⁸¹。



“科學事實”乃是一種封閉的知識操作與認定)，因此，他們對於科學研究所做的二階觀察與符號學分析，為了處理物的問題(基於物作為科學的對象與工具)，卻奇怪地從知識論的分析(由二階觀察對於一階科學論述的分析)跳到了本體論之“物具有能動性”的宣稱上(此一宣稱乃是對於一階科學論述之“經驗現象與研究對象的混淆”的再混淆，以及觀察者視角與參與者視角的混淆)，陷入了一種奇怪的萬物有靈論的困境 (Lynch, 1993:107-113)。同樣的，在處理社會科學議題時，如同在第一章註釋 11 所指出的，Callon(1998)利用表現性的概念，宣稱經濟鑲嵌在經濟學中，往往如同經濟學家一樣，混淆了經濟實在與經濟學事實，使得他只能完全合理化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干預。此外，如同導言的註釋 4 中指出的，Latour(1993)雖然強而有力的批判了現代性想像的諸多二元對立，但是，卻常常忽略了“想像的”現代性所具有的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機制。

⁸¹ 限於篇幅與旨趣，我無法在此更細緻地討論 Foucault 與 Bourdieu 理論的同與異。但是，我可以指出，這兩者都採取了某種由 Bachelard 與 Canguilhem 發展出來的歷史理性主義的知識論立場，批判傳統的主體哲學與歷史哲學的缺陷。而且，對於知識構作有關的真理問題，兩人也都採取某種以“歷史先驗”為前提的知識史考察(Foucault)或知識社會學考察(Bourdieu)來回應。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透過他們兩個人的理論來反省現代性的社會想像與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問題。不過，如上所述，Foucault 的知識考古學與權力系譜學，對於知識政治的象徵鬥爭的認識是有所不足的(特別在他的實際研究上)，而且，往往也忽略了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正典化過程。Bourdieu 的知識社會學討論，則是由學院作為一個知識構作的社會權力場域出發，反省學院建制化知識生產與知識出場的問題。因此，一定程度上，Bourdieu 對於學院場域的象徵暴力與知識政治的討論，可以補足上述 Foucault 的不足。

四、Bourdieu 對於學院知識想像的反省---學院場域的知識政治問題

針對思想史、科學史上的解釋的兩難困境，Bourdieu(1991a)曾做過深刻的反省。他指出，這些非此即彼的兩難對立，往往只會造成某種排除效應，劃定可討論與不可討論的論述空間，扼殺了其他可能性的理論立場的形成。事實上，這種兩難對立，乃是立基於對於知識構作的兩面性（知性面與社會面的）的忽視與無知。因此，無論是絕對主義、理性重建的實在論，還是相對主義、歷史主義的建構論，在利用科學理性解釋科學史的進展時，相關論者卻往往忽略了科學理性本身就有其歷史，亦有其立基的社會基礎---學院。

Bourdieu 即指出，上述的兩難對立，乃是根源於 19 世紀學院作為知識構作場域的形成。在此過程中，知識場域產生了某種知識論上的變革，相關的科學與人類科學(human sciences)的研究，試圖揚棄傳統形上學的哲學提問(指用實證性”how”的提問取代本體論”why”的追問，用信念的形成研究取代信念/真理與否的判定)，因而產生了哲學與人類科學的對立。並且，在此對立下，哲學論述試圖尋找某種超越經驗的基礎，某種純粹的邏輯法則，這使得受科學哲學影響的科學史研究與對科學的二階詮釋，往往忽略了科學理念的歷史與其社會生產條件的歷史是有所關連的。Bourdieu 因而指出，要解開上述的諸種對立，我們就必須正視 19 世紀中科學場域是如何從神學與哲學中分化開來而取得自主性。同時，基於此分化的歷史過程，他也指出，必須正視科學場域本身亦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場域，並正視科學場域知識構作的弔詭：科學場域是基於怎樣的社會條件而生產出獨立於這些生產條件的客觀而普遍的知識？科學場域與其產物是如何一方面是公開的、對公眾開放的，另一方面卻又是封閉的、具篩選性的？

基於這樣的弔詭，Bourdieu(1991a, 2004)指出，科學場域一方面是知識構作的場域，另一方面則是權力競逐的場域，因此，科學場域裡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權威：一是科學知識的權威，另一是社會權威。基於這兩種權威，科學場域有其特殊的再生產機制與資本的分布與累積法則。作為知識生產場域，科學場域存在著

某種知識構作的程序，在從“俗見”(doxa)到知識(episteme)的精鍊與純化過程中，指導著什麼可以當作理所當然的前提(doxa)⁸²，什麼是被認可為重要的問題，什麼是有效的方法與正確的知識，並以此程序過濾著來自學院外部的侵入與要求，馴化科學場域的新進成員。作為權力競逐場域，科學場域存在著透過界定“自明的信念”(doxa)而產生的正統與異端的分化，並且基於此分化，形成了某種對於知識生產的檢查規則與制度，以及對於此規則定義權與詮釋權之正統、異端的鬥爭。而且，基於這兩種場域的交疊，相關知識承載者基於已被定義與已被結構化的場域位置與稟性(dispositions)，一方面探詢知識的其他可能性，另一方面動員相關資源與資本去進行佔位(position-taking)，促使這些可能性得以實現，並且藉由某種學院的規則儀式，獲得其他競爭者基於批判而來的肯認，以達成某種客觀性的知識建構。



⁸² 我必須指出，“doxa”一詞，基本上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理所當然的信念或意見。但是，在 Bourdieu 的理論裡，似乎有著兩種略有不同的用法與意義。在他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中，“doxa”被定義為一種理所當然的體驗與自明的世界觀，只有透過危機才會被質疑，並且與正統、異端的論述世界是區隔開來的(Bourdieu, 1977:164-9)。在這個意義上，“doxa”在術語上相當接近一個社會既存的常識與“俗見”，而且跟慣習(habitus)的概念緊密連結(cf. Holton, 1997; Throop & Murphy, 2002; Myles, 2004)。但是，到了他轉向現代社會的場域分析時，Bourdieu 却也開始主張，每一個場域都有它的“doxa”，“doxa”不僅使得場域遊戲得以開始，更中介著場域與慣習(habitus)，而且不可被質疑，一旦質疑將導致場域的遊戲無法進行(Bourdieu, 1990:66, 68)。而且，他更指出，每個科學場域(甚至每個已分化的場域)，都有自身的“doxa”(甚至是知識論上的“doxa”)，“doxa”不只界定了場域的邊界，也使得場域內正統與異端的分化得以可能(因為其共享相同的“doxa”)(Bourdieu, 2000:15, 69, 100, 102)。在這個意義上，“doxa”指的是場域遊戲得以開始的自明的前提與信念。換言之，至少在 Bourdieu 後期的理論架構中，存在著兩種不同意義的“doxa”。一個是“俗見”(popular doxa)，此種“俗見”，常作為學院知識的研究對象與批判對象(學院知識常常視俗見為迷思)。另一種是場域內自明的信念，此種信念常透過特定的知識技藝與象徵暴力，進行制度化的自我再製與掩蔽，並且，往往藉由客觀性與普遍性知識的生產，形成對於俗見的一種世界觀的強制(這是 Bourdieu 的社會學分析主要的關心對象)。然而，即便 Bourdieu 已經注意到了場域“doxa”所具有的世界觀強制與社會煉金術，但是，他從未清楚地理論化過這兩種“doxa”之間的關係，也未曾正視“俗見”是否有其自身的理路與歷史，是否有反制、逃離與創造性地挪用場域“doxa”象徵暴力的可能(Bourdieu 後來的社會運動參與稍微碰觸到此一議題，參考 Bourdieu, 1999)。上述問題，主要來自於 Bourdieu 往往過於執著於學院正典化論述與制度性知識的批判，過於執著於學院知識人的自我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因而，雖然他的理論號稱要捕捉的實作的邏輯，但是，實際上，他的理論乃是一種對於制度性知識想像的批判。這也使得後 Bourdieu 時期的法國社會學，逐漸產生了一種實用主義的轉向(Bénatouïl, 1999)，試圖去分析俗民大眾的知識運用過程，分析他們在面對各種不確定情況下，如何利用各種不同的社會常規(conventions)去證成自己的行動與進行評價(Boltanski & Thévenot, 1999, 2006; Boltanski & Chiapello, 2005)。由於本論文的研究旨趣，主要反省討論現代性想像與建制化的學科知識想像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因此，我主要在這個意義上使用 Bourdieu 的研究策略。雖然，限於研究旨趣，我無法處理關於“俗見”層次上的問題，但是，實用主義轉向的“常規學派”，的確也提醒了我們，不要把經濟學理性等同於經濟理性，不要把經濟學邏輯等同於經濟邏輯(即使經濟學理性與邏輯是具有如此強大的支配性)。

簡言之，Bourdieu 認為，基於學院知識構作的兩面性，上述科學場域的客觀性知識生產的弔詭，正是由於科學場域的競爭參與者，以彼此為顧客，透過對於學院場域內理所當然前提(doxa)的誤認與肯認，使得外在的社會成分與利益能夠過被學院程序與儀式純化，達成某種客觀性與普遍性的知識討論(Bourdieu, 2004)。然而，Bourdieu(2000b)更指出，上述的機制，固然保障了知識得以純化與精鍊，使得科學場域取得某種程度的相對自主性，但是，卻也掩蓋了知識構作本來就具有的兩面性。因此，學院建制作為一個象牙塔，往往成為學院中心主義、邏各斯 (logos)中心主義的溫床。因而，學院的觀察者，往往誤以為自己可以單獨面對真理與實在(研究對象上的迷思)，易於將觀察者的視角與參與者的視角予以混淆，以客觀主義的理性中心主義或是主觀主義的想像人類學，誤把邏輯的事物等同於事物的邏輯(知識論上的迷思)，而且，隨著學院知識的出場，論述將會喪失其學院知識生產的客觀性與普遍性基礎(意即，學院的內部自明的前提)，並且透過象徵權力的誤認機制，造成對於日常生活語意與“俗見” (doxa)的殖民，成為一種從模型走向實在的社會煉金術(意識型態的迷思)(cf. Bourdieu, 1989, 1990, 1991b)。因而，Bourdieu(2000b:ch3)呼籲我們採取一種雙重歷史化的反身性研究策略，一方面將論述的純化予以脈絡化，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此過程的社會生成予以條件化。唯有如此，我們將才可以超越學院中心主義的限制，同時又避免掉入相對主義的陷阱，達成真正的歷史理性主義的反身性批判。

換言之，在上述的討論裡，Bourdieu 的確指明了，科學史與思想史的解釋，必須同時關注知識構作所具有的兩面性，必須正視論述場域本身既是知識生產場域，又是權力競逐場域。因此，他提醒我們必須同時拒斥科學進展的社會決定論的相對主義陷阱與知識論上理性重建的合理化陷阱，將焦點擺在學院是如何逐步取得相對自主性，又透過怎樣社會機制去保證其客觀性知識的生產。同時，他也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在學院知識的真理宣稱與理論競逐背後，被掩蓋的學院內部的社會基礎與權力競逐，以及學院理性中心主義所導致的知識構作在研究對象、知識論與意識型態上的迷思。此外，他更呼籲我們必須關注學院與(學院外部)社會

的關係，留意學院知識進場與出場的相關過程，並當心某種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機制。

五、總結與研究策略

在前面的討論裡，為了反省人文社會科學的迴圈效應所導致的知識構作的迷思，我們通過了經濟思想史解釋上的兩難，指出了此一兩難困境的由來(知識構作的兩面性，以及基於此兩面性所導致的現代性想像與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糾結纏繞)。為了突破關於現代性的社會想像與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所帶來的困境與迷思，我藉由 Foucault 對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討論，指出了對於思想史、科學史的研究，必須留意論述、真理、權力的複合體所涉及的知識前提、歷史脈絡，以突破現代性想像所帶來的限制。此外，針對當代學科知識想像的問題，我也藉由 Bourdieu 對於知識場域的反身性批判，指出了對於思想史、科學史的研究，必須關注此一複合體的形成過程中，相關知識承載者與知識場域的形構，以及相伴隨的排除與掩蓋的權力機制，如何導致在研究對象、知識論與意識型態上等知識構作迷思的產生，同時，也必須正視學院知識場域與其他權力機制（如國家政策場域）所具有的同形(homology)的關係，以分析論述的象徵暴力所具有的社會煉金術機制。

換言之，倘若我們要考察絕對化市場的演進過程，並分析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現代經濟論述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形構，我們就必須追問市場的知識構作所涉及的知識前提、歷史前提與社會基礎，關注此一知識構作所具有的知性面與社會面，並留意知識場域與制度場域的同形關係。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底下幾個問題與分析步驟：在前學科時期，我們必須探究論述作為一種知識構作，其論述對象如何浮現？其浮現的歷史背景為何？知識承載者的屬性為何？相關知識論與知識工具為何？又涉及怎樣的論述空間的位移與轉型？此一位移與轉型又涉及了

怎樣的知識場域的形構？知識場域的形構又透過怎樣的知識政治使得某一知識得以被確立？此一知識的肯認與確立又涉及了怎樣的權力機制與軌跡？在學科時期，我們必須注意學院化的歷史背景為何？前學科時期到學科專業化時期，涉及怎樣的知識論上的變革與轉型？此一知識論變革又如何促成學院知識(episteme)與“俗見”的對張關係？此一對張關係如何進一步基於學院內部自明的信念，促成正統與異端的分化？正統與異端的分化又如何進一步影響了相關知識承載者的佔位與理論策略？此一策略又如何透過學術場域與其他權力場域的同形，產生了某種象徵暴力的社會煉金術機制？





第四章 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的形構

一、導言

前面的章節處理了關於問題意識、文獻回顧與研究策略等等，於本章，我們將進入論文正文部分的討論。在此，主要處理的是古典時期(17-18 世紀)市場觀念的產生。然而，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必須指出，由於市場經濟對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而言，是如此地理所當然，而且，也由於強調“市場絕對化”的現代性經濟文化，我們往往會認為交易行為與交易動機是人類普遍且自然的傾向。但是，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文明裡，經濟活動不但受限於許多非經濟的社會關係(如宗教、親屬、政治、族群)，而且，經濟議題只有在很少數的情況下(如飢荒、戰爭、經濟與其他非經濟活動相衝突時)才會被納入集體生活安排的討論議程中。換言之，借用 Polanyi 的術語來說，在人類過去漫長的歷史進程裡，經濟乃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的。因此，倘若我們要研究依附在現代性底下之市場觀念是如何走向絕對化的發展，我們就必須先考察在古典時期市場是如何解開在歷史、知識與倫理上面的重重束縛，逐漸走向了具現代意義之抽象且絕對化的市場概念。

準此，底下的討論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從家計到經濟。在此節裡，我將討論經濟問題的問題化脈絡，尤其回顧古希臘與中世紀對於經濟問題的家務定位，並且試圖指出，透過所謂“漫長 16 世紀”的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經濟問題如何在舊有的打壓中逐漸浮上了檯面，並引發對於相關議題的爭辯(如貿易、貨幣、利率與賦稅)與對於經濟治理問題的關注。二、從國際競爭到內部經濟治理：重商主義的貢獻與政治算術學的轉折。在此節裡，我將處理古典時期裡，重商主義與政治算術學對於上述經濟問題的浮現所具有的貢獻。我將指出，重商主義對於經濟問題的討論，不僅展現了當時對於國富問題的關注，更使得一個獨立的商品流動與交換的抽象空間得以形成。此外，我也將指出，政治算術學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對於經濟論述的“科學化”，更意味著國富問題的分析視角逐漸轉

向了國內問題，人口逐漸成為經濟治理的主要對象，經濟論述也逐漸從政體的家計模式轉向了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三、經濟的表徵技術的演變。延續著前一節的討論，我將處理從重商主義、政治算術學、重農主義(Physiocracy)到 Adam Smith 經濟理論所彰顯之知識表徵技術的演變。透過對於市場的知識表徵技術，從簿記(重商主義)、自然秩序(政治算術學與重農主義)與臆測歷史(conjectural history)的演變，我將指出，透過這些表徵技術，相關經濟論述不僅建構了一個利益和諧的經濟秩序圖像，而且，經濟領域開始被認為具有內在的律則，並且，隨著歷史性觀念的引入，相關論述更是形構了一個市場社會(商業社會)的來臨。四、結合上述的討論，我將提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討論這些古典時期對於經濟秩序的表述如何為市場觀念的絕對化發展埋下了伏筆。



二、從家計(oeconomy)到經濟(the economy)：

根據牛津英語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記載，“economy”一詞主要是源自拉丁文“oeconomia”，並透過中世紀法文“yconomie”與“oeconomie”演變來的。此一詞彙最開始的意思乃是一種對於家務(household)的管理。在 15 世紀，“economy”逐漸衍生出對於事物的良好使用與節約的意涵。到了 17 世紀，“economy”一詞開始具有在生產與消費中所形成的良好秩序的意思(透過合宜的行為與管理)，開始指向一種在有組織性的整體當中內部所具有的和諧秩序關係，而且，此一和諧關係常常被當成是一種上帝的啓示與眷顧⁸³。換言之，在 17 世紀以前，並不存在有一種關於自我運作良好且獨立的經濟秩序觀念，有的只是家務管理與節約的想法。事實上，17 世紀的早期經濟論述當中，在討論經濟問題以及勾勒經濟秩序時，家計模式即常常被援引來類比君王對於國家財富的管理，形成一種對於政體(body politic)的家計分析模式(Tribe, 1978; Foucault, 1991；

⁸³ 請參考牛津英語辭典線上版，“economy”此一詞條(<http://www.oed.com/view/Entry/59393>)。

Olson, 1993; Firth, 1998)。因此，底下就讓我們先從古典時期之前的家計觀念開始談起。

(一) 家計觀念的起源—古希臘的經濟思想

一般而言，在西方社會當中，關於經濟的論述，最遠可以追溯回古希臘，特別是 Xenophon 與 Aristotle 似乎都各自出了一本關於經濟學的專門著作。然而，無論是 Xenophon，還是 Aristotle，他們主要都是從家計的觀念來理解經濟行為(特別是家父長對於家庭與奴隸的管理)，而非從市場的觀念來理解經濟。在古希臘，經濟一詞(*oikonomia*)主要是由“oikos”(家庭)與“nomos”(規範或法規)所組成，明確地表明了經濟是屬於家計的範圍(Roncaglia, 2006: 24-5)。因此，正如 Arendt(1958)所指出的，在古希臘，經濟是屬於私人領域，是被隔離在城邦(*polis*)的公共中心之外。在這個家計的領域裡，人們基於自己的生物性(*bios*)屬性，必須透過勞動來生產生活必需品(necessity)，以提供消費，因而經濟活動是一種維生與耗竭循環的活動，是屬於暴力的領域(特別涉及對於必需品的處置與奴隸的使用)。而且，人們只有免除了生活必需的強制暴力之後，進入了城邦，人們才能獲得自由，獲得自我實現行動的可能。因此，公共與私人對立，自由(freedom)與必然性(necessity)的對立，不僅是古希臘人思考集體生活的一個框架，更構成了西方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換言之，在古希臘人們的思考裡(甚至在拉丁文的詞彙中)，經濟問題並不處於公共生活的核心，對於營利交易與勞動，也往往採取負面的態度(特別展現在對於平等交換與公正價格的倫理立場上)。因此，Xenophon 或 Aristotle 或許發現了經濟，也發明了經濟學，然而，對於經濟議題，在他們的思想裡，並不存在具現代意義上的理解與定位(Polanyi, 1968:ch5; Finley, 1970)⁸⁴。

⁸⁴ 關於古希臘的經濟論述且較屬於歷史重建作品(特別是關於 Aristotle)，請參考 Meikle(1995)。至於此一時期的理性重建作品，請參考 Lowry(1987、2007)與 Lowry & Gordon(199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重建說往往無視歷史重建說對於文本與論述脈絡的堅持，試圖在經典文本中，找出符合現代分析範疇的討論。因而，他們也往往駁斥上述對於古希臘思想的定位。

(二) 中世紀的商業革命---宗教訓令對於商業的約束

上述這種對於經濟的家計模式理解，以及對於營利、勞動與商業的負面態度，一直持續到中世紀(特別是 Aristotle 關於公正價格的討論不斷地被延續下來)。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裡，對於高利貸與利息的反對，以及對於公正價格與公正薪資的道德訓令，都在當時的經濟思想中佔據著支配的地位。在這種思考模式裡，宗教人士關心的主要的是經濟行為的道德基礎，救贖與動機的良善，而非經濟本身的運作規律。因此，即便我們可以發現，在 13 世紀時，St. Thomas Aquinas 曾試圖透過援引羅馬法(將羅馬法與宗教法規結合)來肯定了私有財產制(這是內含於羅馬法的規定當中)的合法性，並且，也軟化了對於勞動的負面評價、以及對於有息貸款的全面禁止態度(需以具體的情況來判斷是否為高利貸，同時，對於租金也逐漸放寬)，但是，整體來說，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經濟思想依然對於商業採取負面態度。而且，他們的思考主要是從倫理學與法學的視角出發，提出對於經濟議題的界定與訓令(主要是要求買方與賣方都必須考量公共福祉)，因而，並不存在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市場概念與經濟分析(Roncaglia, 2006:32-40; Spiegel, 1983:56-66；Viner, 1978；Wood, 2002)。

有趣的是，上述 Aquinas 軟化態度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乃是 12-13 世紀中所謂中世紀的商業革命(Lopez, 1976)⁸⁵。有別於傳統對於中世紀黑暗大陸與田園

⁸⁵ 關於這場商業革命所立基的中世紀整體經濟史的概論，請參考 Cipolla(1984)、Postan & Habakkuk(200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關於中世紀商業革命的說法，一定程度關乎到資本主義起源的爭議(Lopez 之所以用商業革命而不用資本主義，正是為了避開此一爭議)。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當中，基於 Marx 關於原始積累的論點，相關研究者基本上都傾向於把資本主義的起源，定位在 15-16 世紀歐洲的擴張與世界體系的形成。在這樣的史觀底下，甚至引發了關於封建主義主義的危機，以及如何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爭議(Hilton, 1976; Hindess & Hirst, 1975, 1977)。同時，對於 15-18 世紀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之漫長歷史過渡，Brenner 所主張的農業資本主義所具有的貢獻亦引發出許多的爭議(Aston & Philpin, 1985)。但是，承繼著二次大戰前比利時中世紀經濟史家 Henri Pirenne(2001, 2009)對於 12 紀開始之歐洲城市的興起與商業復興所賦予的強調(15 世紀不過是 14 世紀停滯後的再爆發)，年鑑學派的史學家則強調，資本主義乃起源於 12 世紀中世紀的歐洲城市中(商業的復甦與資產階級的出現)。因此，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封建主義的興盛，乃是共生在一起的。此外，年鑑學派的史學家，對於封建主義的界定，主要是基於法律上人身依附關係的認定(cf. Reynolds, 1994)，而非如馬派史學中關於生產模式(莊園經濟)的認定。關於這個論點，請參見 Bloch(1995)、Duby(1980)、Le Goff(1984、2007)，以及 Braudel(1984:70)對於世界體系起源時間的修正(由 15 世紀往前推到 13 世紀)。因此，近來的歐洲經濟史的研究，都開始正視

生活的想像，近來的史學研究越來越強調，西元 1000 年以後，在歐洲廣大的莊園經濟背景下，逐漸星羅棋布地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城市(特別是特許制度所成立的自治市)。這些新興的城市，不僅帶動了所謂 12 世紀的文藝復興(Haskins, 2005)⁸⁶，也促成了商業的復甦。中世紀晚期的商業復甦，除了北方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外，其主要的興盛地點乃是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到了 13 世紀的義大利的城市共和國，更達到高峰(如威尼斯、熱那亞)。這場商業革命主要是由遠程的奢侈品貿易所推動的，當時的商人們透過靈活的手段，避開了宗教訓令對於有息貸款的禁止(例如利用合夥經營與分紅的名義)，並且為了降低風險以及對抗政府與教會可能的掠奪，人們開始發展商業聯盟與行會組織。同時，為了交易上的方便起見，當時的人們不僅重鑄了硬幣，甚至更發明了簿記、信貸與匯票等金融手段。而且，這場商業革命，不僅意味著商人地位的抬高，甚至，也帶動了城市中手工業行會的興盛，以及人口由鄉村往城市的移動。此外，伴隨遠洋貿易的興盛，歐洲的商人們開始與回教世界的商人展開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並且逐漸取得上風。當時的熱那亞商人共和國，甚至在地中海沿岸，開發出許多的殖民地，並從事奴隸貿易。

換言之，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或多或少都可以在這場中世紀的商業革命中找到雛形。更重要的是，在這場商業革命裡，商人階級的出現與地位的提升，

資本主義起源中世紀城市的說法，也正視在 14 世紀黑死病爆發以前中古世紀的商業的蓬勃發展已經達到顯著高峰的歷史事實，承認所謂 15-16 世紀資本主義的擴張，許多商業經營手段與模式都可以在 13 世紀中古世紀的商業革命裡找到源頭(Grief, 2006; Mielants, 2007)。關於這兩種資本主義起源的不同說法，以論述史與觀念史的角度來看，即便我們可以在中世紀的商業革命中找到後來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許多元素，但是，無法否認的是，只有到了 17 世紀以後(請參考後面的討論)，經濟問題才逐漸脫離了宗教的訓令，成為一個獨立的分析領域。此外，我也必須指出，上述兩種對於資本主義起源的對立詮釋，與其說是一種歷史分析，不如說是一種語意學的爭辯，兩者都各自受限於 19 世紀以降的社會想像與歷史想像(年鑑學派受限於 Durkheim，馬派史家則受限於 Marx)。近來的全球史視角的史學研究似乎已經指明，至少在 19 世紀以前，世界經濟的領先者乃是中東與中國，歐洲只有在 1800 年之後，才追上來並快速地超越。關於這個論點，請參考王國斌(1998)、Frank(2001)、Pomeranz(2004)、Goldstone(2009)。

⁸⁶ 12 世紀文藝復興乃是 Haskins 於 1927 年所指出來的，其指涉的主要對象是以法國巴黎為中心的文藝復興(義大利的城邦共和國也包含在內)，特別是當時巴黎大學的創立乃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此一法國巴黎為中心的文藝復興，正好與地中海沿岸的商業革命，形成了中世紀晚期的文化與經濟生活的重要對照。關於文藝復興的後續討論，參考 Benson et al.(1991)、Swanson(1999)、Le Goff(2001)。至於商業革命與 12 世紀文藝復興的關係，參考 Kaye(1998)。

以及他們所發展出來的複雜的經濟組織與社會關係，也都不斷地挑戰當時教會對於商業的貶低態度。面對著商業革命所帶來的挑戰，除了運用上述 Aquinas 式軟化手腕之外，宗教訓令更試圖重新安排商業社會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以安置商業活動對於既有的秩序觀念所帶來的衝擊，這清楚地反映在當時贖罪概念的變化與煉獄(purgatory)觀念的建構。正如 Le Goff(2007)在中世紀的告解記錄的心態史研究中所指出的，11-13 世紀，面對著當時有息貸款(高利貸)的興盛，教會一方面批判高利貸者以錢生錢，違反了聖經的訓令，竊取了上帝的時間(出賣屬於上帝的時間賺取利息，並在禮拜日還持續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利用當時人們對於地獄的恐懼，試圖恐嚇高利貸者，以抑制高利貸蓬勃的發展。然而，有趣的是，教會仍試圖替商人提供救贖之道，他們勸誡高利貸商人，只要在死前歸還所有不義之財(名義上歸還給原來的借款人，但實際上主要是捐獻給教會)，並誠心地懺悔與禱告，就不用墮入地獄，死後可以呆在煉獄裡接受懲罰以洗清罪惡，等到彌賽亞千禧年再臨之後，仍有機會上天堂。簡言之，在面對宗教訓令的威脅下，商人只能在金錢的短暫愉悅與永恆的救贖選擇其一。因而，在商業革命的浪潮中，依然充斥著宗教訓令對於商業的壓抑。

(三) 漫長 16 世紀的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經濟問題的浮現

上述的宗教對於商業的約束，一直要到所謂“漫長的 16 世紀”(1450-1650)中，透過宗教改革、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才產生了一定的鬆動(Finkelstein, 2006:ch10)。所謂的價格革命指的是 1450-1650 年之間，歐洲的物價經歷了五倍到六倍的膨脹⁸⁷(Finkelstein, 2006:1)。關於這場價格革命的成因，史學家的說法向來莫衷一是，但是，大致上還是可以歸納出以下七個原因：1.地理大發現後，美洲白銀的輸入所導致的通貨膨脹；2.歐洲自身礦業的進步所導致歐洲白銀的增加(這個發生在美洲白銀輸入前)；3.歐洲鑄幣降低貴金屬成色所造成的影響(在價

⁸⁷ 關於價格革命的經濟史背景的介紹，請參考 Braudel(2002)。關於這場價格革命在歐洲各地的情況，請參考 Burke & Folca (2002)。

格革命所及之處，幾乎都伴隨著貨幣貶值與偽幣的出現)；4.信用的擴張，導致貨幣流通速度過快，引發價格的上升⁸⁸；5.因為黑死病的消失所導致人口的復甦與成長，使得需求的增加，進而引發價格的上升；7.多原因說。多原因的說法，則是試圖綜合上述的原因，並考量到當時的都市化、專業化的發展與階級的社會狀況，強調價格的變化的不均勻發展(有通膨因素，也有緊縮因素)⁸⁹。

至於早期近代的危機，主要指涉的是根源於 16 世紀，但是在 17 世紀才爆發的經濟、政治、社會與知識上的整體性危機⁹⁰。關於這場 17 世紀整體性危機的時期、原因與性質，史學的說法仍是眾說紛紜，但是，我們大致上可以這樣詮釋這場危機：一、由於不斷出現的天災與瘟疫(特別是 1350-1450 年之間黑死病的大流行)，以及宗教改革後，世俗王權的興起，都加速了中世紀社會體制的衰弱⁹¹。二、由於 1450-1650 年之間，由於城市的興起、商業的復甦、人口的成長、物價的通膨，後宗教改革時期的西歐引發了治理的危機。其中，人口的成長帶來了遊民的問題，物價的通膨更使得一般人(甚至是貴族)的生活水準受到了影響，引發

⁸⁸ 這個主要是依據貨幣數量論的著名公式(貨幣供給量×流通速度 = 平均物價×社會交易量)所做的推論。

⁸⁹ 關於價格革命上述解釋因素的回顧與討論，請參考 Goldstone(1984)、Wordie(1997)、Finkelstein (2006:ch1)。

⁹⁰ 關於 17 世紀的整體性危機(最早可以上溯到 16 世紀)的說法，不同史學家對於這場危機的性質、發生的時間、原因、不同地區的差異，甚至對於是否存在所謂整體性的危機，都有著許多不同的看法與詮釋觀點。這個整體性危機的首要倡導者乃是 Hobsbawm(1965)。他主要是在馬派資本主義過渡的架構下來提出這個命題。他將這場危機的時間點定位在 1720-1820 年，強調這個時期乃是中世紀到早期現代過渡的重要關鍵轉折，在這個時期，歐洲普遍發生經濟衰退、穀物生產下降、人口死亡率上升、資產階級革命、社會動亂。Hobsbawm 的這個說法，後來引發許多史學的辯論與後續研究，後續的討論紛紛從氣候(小冰河期的來臨)、人口(饑荒與瘟疫)、經濟(貨幣短缺、匯率不穩定、紡織品滯銷、穀物生產的下降)、政治(官僚體制的腐敗、稅收問題、革命與復辟)、戰爭(清教徒革命引發的內戰與歐陸三十年戰爭)、文化(宗教權威的喪失與知識表徵的危機)、社會(貴族的危機、商人地位的上升、農民起義、遊民引發的社會控制的危機)等角度來檢驗與重新詮釋這個命題。關於這個危機的討論，請參考 Aston (1965)、Supple(1959)、Stone(1967)、de Vries(1976)、Parker (1979)、Parker & Smith(1997)、Fletcher & Stevenson (1985)、Best(1982)、Munck(2005)、Bergin(2001)，以及“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8 年第 113 卷第 4 期專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2009 年第 40 卷第 2 期專刊。

⁹¹ 值得提醒的是，中古世紀的衰弱與漫長 16 世紀中早期現代的危機，在史學研究中常常緊密關連在一起。有趣的是，年鑑學派中世紀史家 Le Goff(1988)甚至認為，從心態史與俗民文化的角度來看，中世紀甚至可以從西元 5 世紀西羅馬帝國的敗亡，延展到 19 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之前，因此，他提出一個所謂“延展的中世紀”(extended middle age)的說法。換言之，對 Le Goff 而言，中世紀的衰弱與早期現代的危機，不過是一種現代性想像對於歷史的投射。

了濟貧的爭議。而且，隨著 1550 年小冰河期的出現⁹²，更使得上述問題急遽惡化。三、17 世紀中，隨著貨幣短缺、匯率不穩定、紡織品滯銷、穀物生產下降等等問題的出現，社會危機的惡化導致新興的商人階級與貴族階層面臨前所未見的社會壓力。他們一方面憂心自己經濟收益的短缺與自己社會地位的動搖(特別是商人與貴族之間社會地位的競爭)，另一方面，則憂慮著下層人們的暴動與反叛。然而，無疑的，16-17 世紀諸多戰爭的爆發(特別是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戰爭)才是火上加油的因素，它不僅加速了社會危機的幅度也增加了統治階層的負擔。因此，他們試圖尋求新的知識模式與社會控制手段來處理日漸惡化的社會危機。四、上述的社會危機，也加深了人們對於既有知識的不信任感與普遍的末世危機感，促成了對於奇觀 (wonders)與異象(marvel)等超自然現象的關注，而且伴隨著教會知識權威的喪失，導致舊有宇宙觀與相關知識的瓦解，並促成新式知識的誕生(特別指向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⁹³。

簡言之，無論價格革命的成因爲何(而且伴隨著同一時期宗教改革引發的擾動)，在 16 世紀到 17 世紀中，的確引發人們對於經濟問題的普遍關注。在當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經濟小冊子裡，充滿了對於利潤、信用、價格與利率的討論，也充滿著對於貨幣問題的關注(包括著名的劣幣驅除良幣的 Gresham 法則也誕生於此一時期)。人們也試圖援引既有私人領域的家計模式(所謂政體的家計模式)，

⁹² 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概念是參照於氣候上中世紀的溫暖期而來的。根據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說法，小冰河期大致開始於 1550 年，大致結束於 1850 年，在這期間溫度曾高高低低地起伏，其中有三個溫度最低點，分別是 1650、1770、1850 年，中間的間隔則是相對溫暖的時期，請參考其官方網頁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Glossary/?mode=alpha&seg=l&segend=n>。關於從小冰河期角度來討論早期現代的危機，請參考 Park(1979)。

⁹³ 近來的科學史研究紛紛指出，在中世紀晚期到早期近代時，出現了一種重要的知識轉折，其中對於奇觀與異象的重新正視與解譯，以及對於好奇心(curiosity)的重新定位(從否定到肯定)，使得許多傳統被宗教打壓的禁制知識紛紛獲得解套。於是，人們似乎從一個封閉的宇宙走向了一個開放的宇宙，因而尋求新的知識模式與知識分類方式來應付這場表徵危機。這終究導致對於事實(fact)、經驗(experience)等概念的重新定位，促成了 17 世紀科學革命與懷疑論的產生。此外，這場知識的重新定位，除了所謂公開的知識外(如科學革命的自然哲學)，也伴隨著私有知識的出現，特別是所謂的玄秘主義(esotericism)與神秘學(occultism)的興盛。關於這場知識表徵危機，以及其所涉及的關於宗教、科學、玄秘主義、懷疑論的相關討論，請參考 Ginzburg(1976)、Eamon(1994)、Stroumsa(1996)、Daston & Park (1998)、Popkin (2003)、Shapiro(2003)、Hadot(2006)、Evans & Marr(2006)、Benedict(2001)、Coudert(2011)、von Stuckrad(2010)。其中，特別是這場表徵危機與當時商業文化的關係，以及商業、貨幣與交易所帶來的個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重新定位，請參看 Agnew(1986)、Halpern(1991)。

來處理關於公正利潤與公共利益的問題(Finkelstein, 2006)。此外，延續價格革命而來的早期現代危機，以及其所引發的治理問題與知識問題，也使得人們試圖從不同的知識角度與框架來重新理解所謂的經濟活動與經濟問題。因此，宗教改革、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使得經濟議題得以脫離私人的領域與宗教倫理學的訓令，浮現在公共討論與政策的辯論議程中。人們也試圖利用新的知識框架來處理經濟議題，這也就促成了重商主義與政治算術學的興起。

三、從國際競爭到內部經濟治理：重商主義的貢獻與政治算術學的轉折

在討論重商主義與政治算術學之前，我們需留意當時的一個重要變化。基於 17 世紀的治理危機，西歐國家也經歷了一場財政革命(特別是在英國與荷蘭)⁹⁴。在此革命下(從 17 世紀直到 18 世紀末)，西歐國家為了應付不斷出現的財政危機(主要是戰爭與稅收問題引起的)，不僅逐漸地建立常態性的稅收制度與預算制度，也建立中央銀行與正常化的公債發行制度。因此，這場財政革命不僅促進了現代國家的形成(特別是稅收與預算等官僚體制的設立)，現代國家也反過來強化了這場財政革命的深遠影響(特別是透過國際之間的競爭)。在這個背景下，一種對於經濟問題的新思考方式，在 17 世紀逐漸出現，並突破了以往倫理學與法學的教條與訓令。在這種新的思考方式下，相關論者主要是以君主的謀士來自我定位(而非學術取向的學者定位)，強調經濟力量乃是君主軍事力量的補充，更是其必要的前提，因而國富問題成為當時經濟論述的重要起點(Roncaglia, 2006:41)。

⁹⁴我必須指出，這場財政革命，並不是在所有國家都很成功(這特別涉及了財政權相對於行政權的獨立性，以及議會對於預算、公共支出、公債發行與軍事活動的控制能力)。關於這場財政革命的文獻，英國的例子請參考 Dickson(1967)、Roseveare (1991)、Brewer(1989)、Braddick (1996)。荷蘭的例子，請參考 Tracy(1985)。西歐主要國家的比較，請參考 Hoffman & Norberg(2008)。此外，針對財政革命與當時的金融的泡沫(從鬱金香熱、密西西比泡沫到南海泡沫)所涉及的商業文化的討論，請參考 Nicholson(1994)。

在這個歷史與知識背景下，所謂的重商主義，就逐漸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⁹⁵。

(一) 關於重商主義的定位

在討論重商主義以前，我們必須先處理關於重商主義一詞可能具有的爭議與定位。根據 Lars Magnusson(1994:ch2)的說法，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一詞首次使用，乃是出現在 1763 年重農學派的 Marquis de Mirabeau 的著作中。Mirabeau 在《農業哲學》(*Philosophie rurale*)一書裡，主要是利用“système mercantile”這樣的概念，來形容與批判所謂國家可以透過貨幣的輸入來獲得利潤的想法。後來這個詞彙被 Adam Smith 借來，以“the mercantile system”出現在《國富論》的第四篇裡。在 Adam Smith(1976: book IV)的討論中，他批判重商主義的理論(主要是以 Thomas Mun 的理論為主)混淆了財富與貨幣，而且他也批判重商主義的理論，代表的是生產者的利益(特別是製造業業者與商人的利益)，因而在他們以公共利益為名的政策主張背後，犧牲的則是消費者與其他生產者的利益。隨著 Adam Smith 這種說法，19 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基本上都認為重商主義乃是一種混淆貨幣與國富的財富分析理論。然而，隨著 19 世紀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興起，特別是在 G. Schmoller(1936)的《重商制度及其歷史意義》一書中，他將重商主義界定為一種經濟思想體系與特定類型的經濟政策，並且是跟現代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有關的理念與實作，因而開啓了兩種對於重商主義不同定位的爭議。Schmoller 這種定位，更是受到 E. Heckscher(1955)與 J. M. Keynes(1954:ch23)的支持。針對財富分析與國家主義這兩種不同定位的爭議，使得越來越多經濟思想史家與經濟史家都開始懷疑，是否存著一種重商主義的理論體系，是否存在

⁹⁵ 嚴格來說，這裡的重商主義乃是一種泛稱。除了後續將討論的英國重商主義外，在當時的法國，主要是由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 Jean-Baptiste Colbert 所代表的重商主義政策(因此，常被稱為 Colbertism)。在德語世界，則是以所謂的官房學派(camerlanism)為主。這些學派都共享了上述相同的歷史與知識背景。在我們後續的討論中，對於重商主義討論，主要是以英國的重商主義為主(主要是基於英國常被當作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模本，而且，英國也是所謂經濟自由主義重要源頭)。關於 Colbertism 的討論，請參考 Cole(1943)、Hutchison(1988:ch6)。關於財政主義的回顧與討論，請參考 Small(1909)、Tribe(1988)、Hutchison(1988:ch6)、Lindenfeld(1997)、Wakefield(2009)。

著一種共同的重商主義政策綱領(Coleman, 1957, 1969, 1980)。

針對上述對於重商主義的對立詮釋與懷疑論的觀點，近來的研究試圖以更具歷史性的方式重建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⁹⁶。對於上述的詮釋與觀點，他們大致提出了以下三點批評：一、針對所謂重商主義的財富分析與國家主義的這兩種對立的詮釋，事實上，與其反映了重商主義的現實，倒不如說反映了 Adam Smith、Schmoller、Keynes 自己某種知識上象徵鬥爭的理論策略。他們都試圖透過貶低、抬高與重新定位重商主義，以肯定並形塑自己的理論體系(Magnusson, 1994:ch2；Tribe, 1993)。

二、針對所謂重商主義思想乃是強調貿易保護與替口替代的說法，以及重商主義混淆了貨幣與財富等問題，相關學者試著區分出不同世代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包含著三代的成員，第一代是 17 世紀初期的世代，主要是以 Gerard Malynesn(大約是 1586-1641)、Edward Misselden (大約是 1608-1654) 與 Thomas Mun (1571-1641) 為代表，他們對 1620 年代的經濟危機的討論(主要是出口衰退、貨幣短缺、匯率不穩定)，形構了重商主義的理論綱領。其中 Mun 代表的乃是由早期重商主義到晚期的重商主義的轉折點(發展了貿易平衡理論，並逐漸遠離了早期的重金主義的傾向)；第二代成員則是光榮革命世代，主要的代表人物是 William Petty(1623-1687)、Josiah Child(1630-1699)、John Locke(1632-1704)。其中，Child 與 Locke 對於 1690 年代利率與鑄幣改革有所辯論，並發展出從供需關係來定位的貨幣數量論(利率與貨幣成為依變數，由貿易所決定，這主要是 Locke 的貢獻)，以及 Petty 的政治算術學。這些都被視為是經濟分析重要的理論突破；第三個世代則是 Nicholas Barbon(1640-1698)、Dudley North(1641-1691)、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這三個人更具體地突破貿易平衡論所謂出口必須大於進口的說法，試圖發展對於經濟領域的內在機制的分析(但是，受限於當時的秩序觀

⁹⁶ 這裡我們主要參考的是對於重商主義的歷史重建。關於這方面的文獻，請參考 Appleby(1978)、Magnusson (1993,1994)、Finkelstein(2000)。有趣的是，近來亦有從尋租(rent-seeking)理論出發，試圖延續 Adam Smith 所謂利益代表說，將重商主義的定位成商人試圖透過政策進行壟斷的一種策略。關於此點請參考 Ekelund & Tollison(1981、1997)。但是，我必須指出，這種尋租理論的理性重建詮釋，已經遭到 Rashid(1993)的批判。

念，並沒有達到具現代意義之自我管制的均衡概念)。透過這三個世代的區分(值得注意的是這九人都有著商業背景)，相關學者試圖指出，這三個世代具有知識上的進展與理論上的突破(特別是 Mun 的貿易平衡理論、Locke 的貨幣數量論與 Petty 的政治算術學)，因此，不能簡單地將重商主義思想的政策建議等同於貿易保護主義或進口替代政策。而且，晚期的重商主義思想已經注意到，不僅是貨幣，貿易也是受到供給與需求的影響，因而，重商主義並不意味著一種將貨幣等同於財富的理論體系。此外，晚期的重商主義論者，越來越強調貿易自由的政策，越來越意識到經濟似乎有其內在的律則(意即已經出現許多後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元素)，這具體地表現在 Barbon、North 與 Davenant 等人的著作上(Grampp, 1993; Herlitz, 1993; Magnusson, 1994:ch8; Finkelstein, 2000:ch10-12)。

三、針對所謂懷疑論的觀點。基於上述的討論，相關研究者指出，17 世紀的確存在著一種重商主義的理論體系。這些重商主義經濟論述都共同關心著人口成長、殖民地貿易、國內生產力的提升、濟貧問題、進口商品所帶來的衝擊等等問題，因此，他們站在對於經濟的成長與國富問題的共同關心上，發展出歷史中首次的貿易“科學”與財富分析。而且，他們對於金銀與貨幣的肯定，乃是基於金銀是最為被接受的財富形式(貨幣只是用來分析財富的工具)，並且開始發展關於貨幣的功能性定義。此外，他們雖支持國際貿易競爭中，壟斷性組織存在的必要性，也強調國家在商業的積極作為，但是，也已經開始限縮政府所應該扮演的角色，並逐漸朝向自由放任的說法(Grampp, 1993; Herlitz, 1993; Magnusson, 1994:ch8; Finkelstein, 2000:247-251)。因而，重商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思想體系在歷史上的確是存在的。

(二) 重商主義的貢獻

那麼，所謂的重商主義思想，對於市場觀念的形構具有怎樣的意義呢？從上述的說法來看，我們大致可以區辨出三個重要的貢獻：

一、商業、商業知識與商人地位的重要性提升。在上述的英國重商主義的討

論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乃是商業、商人地位與商業知識的重要性不斷地上升。上述的重商主義的三代組成，幾乎都是商人階級的出身，而且他們對於 1620 年代的經濟危機與 1690 年代鑄幣改革的參與與干預，都顯示了當時的政府與公眾注意到商業問題似乎無法再利用傳統的宗教訓令或君王的命令就可以妥善地安置，必須借用商業專家所具有的知識來加以處理(Appleby, 1978; Finkelstein, 2000)。

二、經濟領域(主要在國際貿易的面向上)所具有的自主性。在 Malynes、Misselden 與 Mun 對於 1620 年的經濟危機的回應當中，Misselden 開始強調商業是一個流動的領域，有其內在的律則，必須透過特定的知識(商業的知識)才具有被理解的可能(Malynes 則是訴諸過往的君主權威，試圖使動態的商業靜態化)。因此，他進一步援引簿記工具與家計模式，從政體(body Politics)的家計模式來處理此一新的流通領域。Mun 則是進一步站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貿易平衡論關於貿易、價格、匯率、商品的討論，使得不可見的商業流通領域得以可見，更使得經濟領域(交易優先於生產)作為一個財富領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特別是相對於君主的權威)(Appleby, 1978:48 ; Finkelstein, 2000:ch5; Foucault, 1970:ch4)。

三、經濟的觀念逐漸走出了家計模式。上述第一代的重商主義，雖然透過國際貿易的競爭形構了一個自主的經濟流通領域，並且也抬高了商人階級的社會地位與商業知識的重要性，但是，這樣的流通領域與商人階級卻無法含納進當時的階序性的社會秩序圖像中(這是一種有機體的身體比擬，在此比喻下，nations 是整體，state 或君王是負責思考的頭，Malynes、Misselden 與 Mun 幾乎都採取這種秩序圖像)。而且，流通領域的自主性概念，也使得國內的人口與稅收的理論難題逐漸浮現(政體家計模式的貿易平衡論，無法處理對於人口與稅收問題所涉及的對於流通的阻斷，以及君主基於自利對於暴力徵稅的濫用)。因而，到了 Petty 與 Locke 的世代，這兩人都利用 17 世紀自然哲學中之機械論的生理比擬來取代傳統的階序概念(這主要是源自 Hobbes 利維坦的機械人形概念與 William Harvey 的心血循環理論)，利用一種相互關連的機械論秩序概念取代了傳統的階

序觀念(政體的家計模式乃是立基於這種階序秩序觀念上)。在這種機械人形的循環圖像的幫助下，Locke 發明了供需決定的貨幣數量論(基於對於流通速度的思考)，並試圖利用自然法的等價交換原則，來協調貨幣數量論與貿易平衡論可能具有的衝突，並限制君主自利與暴力的濫用。Petty 亦初步地認識到貨幣數量論的存在，而且，他的政治算術學，更進一步轉變了經濟論述的分析視角，將國富問題由國際競爭轉向了國內的人口問題與稅收問題，並且進一步建構了一種國民(national)會計模型，來取代傳統的政體家計模型。因此，在 Locke 流通模型與 Petty 的國民會計模型的幫助下，經濟的觀念就逐漸走出了傳統的家計模式(包括私領域的家計與政體的家計模式)(Finkelstein, 2000:ch6-9)。

簡言之，基於重商主義的經濟論述，商業已經逐漸走出了傳統宗教訓令對於商業的打壓，而且，在他們的論述下，一個由供給跟需求決定的自主性經濟領域已經逐漸形構出來。並且，透過對於人口與稅收問題的重新定位(特別是政治算數學的國民會計模型)，此一經濟領域的模式也逐漸走出了傳統政體家計模式(Firth, 1998)。因此，底下，我們將進一步回顧 Petty 的政治算術學，來處理從家計模式到經濟模式的重要知識轉折。

(三) 政治算術學的轉折

Petty 的政治算術學，常常被當成所謂歷史上第一次科學的經濟分析，而且，往往也被視為是政治經濟學最早的起源(Hutchison, 1988:7; Letwin, 1975:114; Aspromourgos, 1996:2; Roncaglia, 2006:ch3)。無論這樣的詮釋是否適當，但是，不可否認的，Petty 的確是利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的先驅，而且在他的理論中，他的確拓展了關於分工、國民收入、貨幣數量論、價值理論等討論。因此，底下我們將進一步透過 Petty 關於賦稅與人口的理論，以及他的政治算術學的概念與應用，來討論政治算術學對於市場觀念形構的貢獻。

在 Petty 發展政治算術學之前，他曾於 1662 年發表《賦稅論》(*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一書，提出他對於經濟問題的一般思考，並對於稅賦與人

口的問題提出若干的建議。針對人們對於稅賦負擔的抱怨，Petty(2006)除了把問題指向了君王與官僚的浪費以及稅收制度的不公不義外(事實上 Petty 對於這些抱怨都是有所保留的)，他更把問題指向了政府對於國內人口、貿易與財富情況的一無所知、人口過少所導致稅基與勞動力的缺乏(主要是因為殖民與移民帶來人口的不足)、貨幣短缺與貨幣稅制的傷害(相較於實物稅)、以及過重稅賦負擔所導致的失業、貧困與犯罪問題。因此，透過這種方式，Petty 把貿易、貨幣的流通、人口、稅收、公共支出、社會問題(濟貧與失業問題)聯繫起來⁹⁷。在 Petty 的討論裡，他清楚地說明，倘若要使稅賦負擔與公共支出合理化，政府就必須建立對於貨幣流通、貿易、人口、財富狀況的理解，因此，他呼求建立土地財產的登記，設立信貸銀行(掌握貿易與貨幣流通狀況)、對於土地與人口進行調查(為了建立土地的內在生產價值與外在市場價值，以及衡量糧食與租金可能的價格波動)。

基於這樣的立場，Petty 進一步發展他所謂的政治算術學。在《政治算術學》一書裡，Petty(1981)試圖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客觀的原因上，並且試圖用數量與數量的關係來表達自然的律則。他開宗明義地強調，相較於只用比較級與最高級

⁹⁷ 基本上，Petty 的經濟理論大致上有五個重要的特點：一、就貨幣問題上，Petty 並不認為貴金屬貨幣就等於財富，他清楚地區分貨幣與國富之間的不同，認為貨幣不過是財富的表徵，本身就會有價值的起伏。而且，他甚至試圖用貨幣的購買力(主要是穀物等必需品)來定位貨幣的價值。二、在價值問題上，Petty 基本上認為土地與勞動乃是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包括商品、地租、貨幣、利率)，但是，他並不主張所謂絕對價值說，而是試圖用土地與勞動來衡量商品的相對價值。他甚至試圖建立土地與勞動的等價原則與等式，從而可以以單一標準來衡量商品的自然價格。Petty 進一步區分出所謂的自然價格、政治價格與當前價格。自然價格指的是在最優生產的狀態下，由土地與勞動所衡量出來的價值(必須以扣除必需品之後的剩餘來進行等價交換的衡量)。政治價格指的是，當前生產的現實狀況與潛在可能的生產狀況之間的落差所產生的價格(主要是因為閒置與浪費的存在)，例如當 200 人做 100 人就可以進行的農業生產時，必會導致生產成本的提高，穀物就會上漲，這就是政治價格(基於浪費的土地與勞動衡量出來的價值)。當前價格指的是用貨幣(通常是銀本位)對於政治價格的表述。三、Petty 之所以認為貿易順差、關稅制度是合理的，主要是因為這樣有助於提高國內就業與生產狀況，貴金屬的輸入亦有助於價值的儲藏與國際交易的支付(當時面對的是貨幣短缺的問題)。而且，關稅制度也有利於抑制可能帶來腐敗與犯罪問題的奢侈品消費。四、針對人口與社會問題。Petty 認為人口是國富的根本(無論就土地的價格、貨幣的需要量、勞動力與稅基的問題)。而且，基於對社會問題的關注，Petty 特別強調製造業的重要性(主要是出口導向)，因為它可以解決失業問題。此外，他也強調必須擴大公共支出，一方面實施濟貧，另一方面透過公共工程提供就業機會。五、針對稅收問題，Petty 強調必須降低政府與教會不必要開支與部門的擴張，同時，他也強調稅收必須正比於收入與消費，甚至，強調稅務公平與再分配的邏輯。此外，Petty 也認為一切稅收的合理性都必須從是否有助於國富的角度來思考，避免稅賦的任意性與過重的負擔。Petty 更認為，從這個角度出發的稅收制度(包括土地稅、人頭稅、關稅、消費稅)，所收集的資料也將有助於政府對於國富狀況的掌握。

的詞語的思維性論證，他試圖用數字、重量與尺度的詞彙來表達他想要討論的問題，並把論證的基礎建立上人們的感官經驗與有可見根據的原因上，並諷刺那些將原因建立在人們容易變動的主觀思想、意見、態度與情緒的研究。因此，基於這樣的立場，Petty 試圖透過已收集的與假設的數據⁹⁸，比較英、法、荷蘭的土地、人口、賦稅、產業、資本等狀況，以進行國家財富問題的衡量與估計，進而試圖回答英國當時真實的國富狀況(為了反駁當時對於英國國富衰降的憂慮)，以及相較於法荷的優勢所在(特別是荷蘭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接著，Petty 進一步把政治算術學運用到當時愛爾蘭所面對的財政與經濟問題⁹⁹。在《愛爾蘭的政治解剖》一書裡，Petty(1981)援引了 Francis Bacon 對於國家的身體類比，以及對於政治學的解剖學比喻來定位他的政治算術學，並試著以愛爾蘭的殖民狀況作為解剖實驗的對象(因殖民地狀況相對不複雜，Petty 具有第一手的理解)。他利用殖民征服後所收集的資料與假定，對於愛爾蘭的人口、土地、商品價格、進出口貿易進行政治算術學的分析。透過這些分析，Petty 試圖指出，愛爾蘭人對於殖民的反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他也試圖指出，英格蘭在與愛爾蘭打交道的五百年來(從 12 世紀諾曼人征服到 17 世紀的殖民入侵)，英格蘭對於愛爾蘭所作出的貢獻與蒙受的損失，以及英格蘭實際上擁有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所在。因而，透過這些數據與論證，Petty 試圖說服愛爾蘭人放棄抵抗，順從其經濟上的利益與自然的律則，接受愛爾蘭與英格蘭合併的美好遠景。而且，他也進一步提供對於完成合併，解決愛爾蘭的經濟與財政問題，政府應該做的改革(如促成通婚、移民、貿易、議會改革)。

簡言之，Petty 的政治算術學，不僅試圖透過看似客觀的數字分析來擺脫傳統道德訓令與倫理要求的限制，更建立了一種以人口為中心的國家財富的會計模

⁹⁸ Petty 許多數據都是他臆測的，他在寫作中，也清楚地表明這些數據是他估計、推算與假定的，而且許多論點都只是重申他在《賦稅論》一書中的論點，這些數據只是用來強化或佐證他的論證。

⁹⁹ 17 世紀中葉清教徒革命時，Oliver Cromwell 發動了對於愛爾蘭的征服戰爭。在戰勝愛爾蘭後，Petty 被委以重任，負責愛爾蘭的地理探勘，以作為戰爭紅利的分配的基礎(包括貴族、軍官、士兵與戰爭融資者)。Petty 也在這個過程裡獲得大量的領土與財富。關於 Petty 的生平與其經濟學的關係，請參考 Aspromourgos(1988)。

式。此一分析方式，不僅使得國富問題的思考，從國際貿易轉向到政體的內部(重點在於國內生產力的提高)，而且，也可以用來處理社會問題、區辨國與國之間的差異，甚至合理化當時方興未艾的殖民地征服。因此，透過政治算術學對於所謂自然律則的呈顯(透過數字與數字的關係)，經濟的觀念逐漸走出了家計模式的，形成一種自然律則的秩序想像(Buck, 1977)，經濟論述也逐漸從政體的家計模式(具有一定的任意性)，逐漸轉向所謂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式(以經濟自然秩序為對象，並探究政治治理的可能)¹⁰⁰。

四、市場的表徵技術的演進

在上述的討論裡，我已經指出，對於經濟的理解，要從所謂家計模式轉換到供給跟需求所決定的市場模式，16世紀的價格革命、17世紀的早期現代危機與重商主義，都具有不可抹滅的貢獻。16與17世紀的危機，使得經濟問題從公共討論的邊緣移向了政策辯論的核心。重商主義則進一步使得經濟議題的思考模式，不但脫離了宗教與法律訓令的限制，更突破了既有家計模式的理論框架。因此，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許多後來被歸屬於 Adam Smith 關於市場理論的創見，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在中晚期的重商主義找到理論上的根源。其中，極為關鍵的問題在於：Adam Smith 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往往被認為是市場觀念真正的起點)真正的貢獻到底為何？市場觀念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到 Adam Smith，又有哪些差異與突破？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從知識表徵技術的角度，來探究這些不同思想如何證成其關於市場的相關理論。

(一) 複式簿記的修辭效果

¹⁰⁰ Buck(1982)指出，18世紀中葉之後，政治算術學逐漸集中於與人口有關的生命統計，相關的人群分類方式與統計理論的假定(不再重視以財產為基礎的分類方式，轉向強調年齡、出生率、死亡率等人口屬性的分類)，甚至改變了傳統共和主義所界定君主與臣民(subjects)的關係，形成了一種新的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係的理解。

如前所述，在第一代的重商主義的相關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個自主經濟領域的觀念，逐漸在形成，這也具體表現在 Mun 的貿易平衡論之中。所謂貿易平衡論的平衡(balance)觀念，乃是源自複式簿記關於資產負債平衡的觀念，而且，Mun 的貿易平衡論，在一定程度上僅僅只是把複式簿記的借方與貸方的資產負債計算，運用到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貿易收支帳上(Finkelstein, 2000:ch5)。眾所皆知，Werner Sombart 與 Weber 都曾推崇複式簿記所代表的理性計算對於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這種論斷過於低估早期單式簿記所可能具有商業上的靈活性，也高估了複式簿記的重要性與可執行性。而且，這種論斷，往往過於強調複式簿記所具有的理性計算面向，忽略了複式簿記往往只是為了交易的結算，並不是商業決策上的工具(Braudel, 1982:574-5)。因此，複式簿記所起的歷史作用，與其說是促進了商業決策的理性的與科學的基礎，倒不如更正視其所具有的修辭效果(Thompson, 1994; Carruthers & Nelson, 1991)。

從中世紀以降在宗教訓令對商業打壓的氛圍中，複式簿記對於商業活動的正當性具有不可低估的效果。一方面，複式簿記所強調的資產與負債、借方與貸方的平衡，清楚地展現了一種公平的意象，使得向來被認為是狡詐與缺乏良心上商業操作，開始披上了公正與公平的神聖外衣(特別是考量到教會當時對於公正價格的強調)。複式簿記所採取的對稱幾何的書寫形式，也被認為體現了上帝創造世界的對稱設計，因而可以被含納進宗教的神聖秩序之中(Thompson, 1994)。另一方面，複式簿記的書寫格式，不但使得靈活且多變的商業操作，具有了治理的可能性，其對於成本與風險的展現，更使得利潤獲取具有正當性，也清楚地展現了商人的美德與信用。而且，複式簿記所具有的形式精確性(precision)，不僅展現了實質正確性(accuracy)的效果，而且，基於數學形式所產生的中性書寫主體，不僅挑戰了 Aristotle 以降關於知識等同於“常識”(common sense)的說法(常識在此的意義乃是外在感官經驗的判斷與統合之規則)，也挑戰了當時立基於修辭術的知識基礎。因而，複式簿記不僅幫助了商業活動取得公眾的信任，更幫助商業專

業系統與法律治理系統的創設 (Carruthers & Nelson, 1991 ; Poovey, 1998:ch2)¹⁰¹。

簡言之，複式簿記的技術形式與修辭效果，不僅使得商業活動具有倫理上的正當性，也抬高了商業知識的重要性與商人所具有的社會地位。在這個意義上，面對著 1620 年代的經濟危機，第一代重商主義者 Misselden 與 Mun 都試圖借用複式簿記來發展關於政體的家計模型，而 Mun 則更進一步發展貿易平衡理論。一方面，透過複式簿記的封閉性宇宙觀念(表現在對稱幾何的形式上)，強調經濟領域有其內在自然法則(由上帝所設計與給定的)，無法由君主的權威所決定，必須透過具有特殊知識的持有者，才可以窺視此一律則，因而強化了商業專家第一手經驗的權威性(因而排除了來基於常識而生的經濟論述的干擾)。另一方面，透過數字表徵看似無涉利益(disinterested)的中立性，可以避免商業精英對於經濟議題的發言所遭受到之利益衝突的質疑(Mun 本人是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成員，其對於貿易保護與貿易順差的提倡，即受到此一批評的)。

(二) 從政治算術學到經濟表

上述這種透過數字表徵來掩蓋論述背後所涉及的利益關係，也清楚地出現在 Petty 利用政治算術學對於愛爾蘭的政治解剖上。如前所述，Petty 試圖透過看似客觀且中立的數據分析，利用成本效益的計算來說服愛爾蘭人放棄抵抗，接受英格蘭殖民的好處。然而，在這背後隱藏著 Petty 本人在愛爾蘭的巨大經濟利益，因此，Petty 的政治算術學同樣展現著無涉利益與利益的辯證關係。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Petty 以數據分析來證成某些帶有利益的政策背後，乃涉及了 17 世紀所謂科學革命的知識變革。在以 Bacon 為起點的這場知識變革中，基於對歸納與實驗法的推崇，Bacon 拒斥了 Aristotle 已降將知識與常識的等同，強調了新經驗的重要性(因而也動搖了神聖文本的權威性)，並強調資料收集(以商人為主)與普遍知識生產(以文人為主)的同等重要性。因此，雖然 Bacon 並

¹⁰¹ 關於 14-15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會計與商業應用數學的發展(包括阿拉伯數字的運用、四則運算、度量、代數法則等等)，以及這些數學工具與當時的商業制度、歷史文化之間的關係，請參考 Swetz (2003)。

沒有對於如何從特殊且具體的經驗中發展出抽象且普遍的理論，作出太多的說明，但是，Bacon 的知識理論，的確與傳統立基於修辭學的知識模式產生重要的斷裂，開始強調事實、證據與平鋪直述的論證風格(Daston, 1991；Dear, 1995; Poovey, 1998:97-104)。然而，由於 Bacon 未能解決從特殊到普遍、具體到抽象的知識論問題，因而，在後 Bacon 時代的自然哲學內部，引發了 Boyle 與 Hobbes 的辯論(Shapin, 1994; Shapin & Schaffer, 2006)。在這場辯論裡，Boyle 繼承了 Bacon 的立場，一方面強調實驗、歸納、避免概化的立場，另一方面，則是試圖透過紳士所具有的文明、榮譽、誠實等品格保證，並利用公開展示與可重複操作的實驗來建立公眾對於從特殊經驗到普遍理論的接受與信任(此一方案後來得到了皇家科學會的推崇)。但是，對於 Hobbes 來說，傳統修辭學的知識立場固然值得批判(Skinner, 1996)，但是，Bacon 主義的知識立場仍是有所缺陷的(經驗歸納無法真正正確保知識的確定性)。因此，他認為真正的自然哲學基礎，乃合理的計算與推導，以及共同的知識立場，其代表乃是幾何學與代數學。因而，對於 Hobbes 而言，數學表徵與共同的知識立場的重要性在於其無涉利益，這不僅可以用來作為自然哲學的基礎，以可以發展所謂的道德哲學。在面對諸多不同的嗜慾(appetites)所引發的政治危機與道德爭議，Hobbes 認為，只要能夠建立起一個普遍人性觀察位置(主要是立基於人性論的討論)，就能夠將不同的嗜慾翻譯成共同的利益¹⁰²，進而透過算術來衡量可能的差異與衝突(Poovey, 1998:104-109)。

Petty 的政治算術學正是結合了這兩種不同的知識立場(Petty 曾擔任過 Hobbes 的秘書，後來也成為皇家科學會的成員)。他一方面繼承了 Hobbes 對於算術與演繹方法的推崇，另一方面，則試圖將政治算術學建立在資料歸納的基礎上。換言之，透過數字來表述已收集到與臆測的“經濟事實”，並利用數量與數量之間的關係來進行理論的概化與抽象，Petty 的確使得計算成為觀察與實驗方法

¹⁰² 值得注意的是，Hobbes 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明確以利益原則來建構社會理論的人(但是，利益原則在他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只是，Hobbes 的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原則、自愛(self-love)原則，是否能被等同於自利(self-interest)原則，則是有所爭議的。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考 Myers(1983)、Force(2003)、Engelmann(2003)。

的重要成分，同時，也使得不可見的自然律則，得以在數字的算術關係中顯現出來，因而為市場觀念的產生(獨立且自主的經濟領域)，建立了知識的基礎。

在後 Petty 的經濟論述的發展中，重農學派的領袖 François Quesnay 關於“經濟表”(Tableau économique)的分析，亦從數學表徵技術為市場觀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基本上，重農主義論者幾乎都強調農業發展的重要性，認為農業是唯一可以創造生產剩餘與經濟價值的生產部門。而且，基於對於農業革命的重視，以及對於生產性階級(農人)與非生產性階級(工人、商人、地主與貴族)的區分，重農主義者(特別是 Quesnay)開始強調資本積累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此外，正如同“Physiocracy”一詞乃是由希臘文“fusis”(自然)與“cratein”(支配)所組成一樣，重農主義論者非常強調自然秩序的存在，並強調此秩序所具有的恆定性與優位性，因而他們幾乎都普遍地強調自由放任原則的重要性。對於他們而言，這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原則，乃是任何具有理性之光的人與開明專制的君王所必須積極服從與執行的“積極秩序”(私有財產乃是此一秩序的一環)¹⁰³。為了表述這個以農業為基礎的積極秩序，Quesnay 則進一步利用“經濟表”來分析與圖示這樣的積極秩序。

Quesnay 之所以發展“經濟表”，主要是為了分析在一個複雜的經濟體系中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所具有的交換關係(主要是商品與貨幣的交換)。透過假設性數字的賦予(主要表現在貨幣價值上)，Quesnay 追蹤了在貨幣與商品交換中剩餘的移轉。一方面，這刻畫了經濟秩序所具有的結構，另一方面，它則是分析經濟秩序再生產的狀態與條件(特別是關於稅收、對外貿易、奢侈品消費與人口問題)(Roncaglia, 2006: 96-9)。因此，雖然 Quesnay 的重農主義忽視勞動對於剩餘生產的重要性，但是，透過“經濟表”的投入產出分析，Quesnay 不僅把不同經濟生產部門關連起來，形成一種有機的整體組合，同時，也強調資本積累與生產的市場導向的重要性。而且，透過“經濟表”的政治算術，Quesnay 不僅得以避開各種經

¹⁰³ 基本上，重農主義對於自然秩序的強調，乃是為了批判與回應先前法國 Colbert 所代表的重商主義政策。透過對於自然秩序的強調，一方面可以批判君主立法權威所具有的武斷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緩和絕對王權的君王專制所可能帶來的危害。

濟利益的糾纏，深入地分析各種階級在經濟體系的分工，而且，“經濟表”所具有的對稱且均衡的圖示效果，也使得一種自主且均衡的經濟自然秩序(在經濟系統自我再生產意義下的均衡觀念)，首次被清楚且系統地表述出來。

(三) 臘測的歷史方法

透過前面關於相關經濟理論與知識表徵技術的討論，我們似乎可以發現，許多後來被歸諸 Adam Smith 的市場理論洞見(如勞動分工、價值理論、資本積累)，似乎都早已經出現在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相關論述當中。因此，即便 Adam Smith 沒有受到晚期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影響，獨立地創造了這些理論，但是，我們似乎很難不同意 Schumpeter(1994:179-180)對於 Adam Smith 較為貶低的評價。基本上，Schumpeter 認為，在《國富論》一書裡的思想與理論，幾乎沒有一個是 Adam Smith 所原創的，這些觀點幾乎都可以在自然法哲學家、晚期重商主義者、重農主義者的著作裡找到，因此，將《國富論》吹捧成開創性的劃時代著作，是值得懷疑的。然而，他也指出，雖然《國富論》缺乏真正理論上的原創性，但是，這並不能貶低 Adam Smith 在綜合整理與系統化既有理論觀點上的偉大之處。

根據 Schumpeter 的看法，Adam Smith 對於經濟論述的貢獻，在於其利用系統性的哲學方法來統整既有的相關理論，這種系統的方法最為清楚地展現在 Adam Smith 以天文學史為例的哲學方法的著作上(Schumpeter, 1994:177)。換言之，Adam Smith 理論的真正突破所在，並非在具體的理論命題的建構，而在於其研究方法的論證上。在這篇名為《哲學探討的指導原理：以天文學史為例》(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的文章中，Adam Smith(1980)清楚地展現了 Newton 哲學的影響，甚至第一次使用看不見的手的比喻(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來形成神啟的秩序(Macfie, 1971)。在該文裡，他指出，各種天文學的哲學體系(無論是托勒密體系還是哥白尼體系)，並不是自然法則的揭露，而是一種想像力的發明物，是為

了把原本紛雜且不和諧的現象聯繫起來，因而自然哲學家乃是發明理論而非發現理論(Smith 這一點深受其好友 Hume 的影響)。雖然，哲學體系往往只是想像力的發明物，無法僅由理論與自然律則(往往是預先假定的)的一致性來保證知識的正確性，但是，它仍有助於我們從一片混沌的事件中發現意義(Newton 的自然哲學就是最好的例證)。基於這樣的立場，Adam Smith 反對用數學來表徵與解釋實在所造成的精確性與正確性的混淆。因而，基於相同的立場，他對於政治算術學的數字使用提出懷疑(Roncaglia, 2006: 119-120)。

那麼 Adam Smith 如何解決前述關於特殊／普遍、具體／抽象的知識論問題呢？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回到著名的 Hume 對於歸納法的懷疑上。由於 Hume 拒絕先驗假設的推導，同時也注意到內省法會受到主觀意識的干擾，因此，他試圖透過觀察與實驗方法來奠定有效的知識基礎。這也使得 Hume 注意到內在主觀意識與外在客觀事件所具有的知識論難題(特別表現在著名的因果律的討論上)，這也進一步使得他對於歸納法的理性知識基礎提出了質疑。基本上，Hume 並不質疑歸納法的使用與其有效性，而在於他否定了歸納法的理性基礎，而將其奠基于人們的信念與習慣上。那麼又是什麼保證了歸納法的推理，能夠獲致普遍有效的知識？Hume 把答案指向了神啟的自然律則與普遍人性的研究對象(Hume, 1980；Poovey, 1998:170-4, 197-203)。

雖然，Hume 承認了自然律則背後可能有神意設計的存在，但是，他的懷疑論精神，也使他對於秩序乃是神意設計的說法有所保留(Hume, 1989)。此外，對於那些用來展現自然秩序的哲學體系，Hume 也認為這可能僅僅只是一種發明與虛構。因此，對他而言，系統性之道德哲學的理論建構的基礎並不在於神意設計與宗教論證，而在於以普遍人性為對象，基於哲學家的道德與哲學素養(有別於普通人的簡單觀察)，透過歷史方法，來尋找普遍的一致性與歷史發展的趨勢(並且承認歷史因果律則往往乃是行動者的非預期後果所促成的)。至於，那些缺乏文字記載的“前歷史”，則可利用思想實驗的臆測與假設來予以補充(系統性比喻在此扮演著關鍵地位)(Poovey, 1998:229-236)。

事實上，所謂的歷史方法，普遍地瀰漫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中。早在 Hume 之前，身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早期代表人物的 Henry Home，就曾在自然法的傳統下，利用歷史方法來研究法學的歷史進，並創立了著名的歷史演化的四階段理論(漁獵、畜牧、農業與商業)。Home 基於歷史方法對於民法、財產問題的討論，以及他的四階段理論，使得幾乎所有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菁英們(如 Hume、Smith、Adam Ferguson、Lord Kames、William Robertson、Thomas Reid 等人)，都格外重視商業社會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起源與發展的問題(Herman, 2003:ch4)。這種後來被 Dugald Stewart(他是 Adam Smith 的學生與道德哲學講座教授的繼承者)稱之為“臆測歷史”的史學研究，一方面清楚地受到了當時英國方興未艾的殖民地征服經驗的影響，因而美洲印地安人的生活狀況，常常被用來對於漁獵與畜牧社會狀態的歷史臆測的主要依據(Meek, 1976)；另一方面，他們的歷史方法的支持，亦清楚地展現了 Bacon 與 Newton 的實驗哲學，以及當時神意設計說的影響。他們都試圖從經驗觀察出發，來奠立普遍知識的基礎，並利用神意設計說來填補觀察與推論所具有的落差(Hume 大概是其中最具有懷疑論精神與系統化傾向的人)(Poovey, 1998:222-7)。

換言之，用臆測歷史來解決當時的知識論難題，乃是 Adam Smith 建立其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重要知識背景(特別是 Hume 的保留與修正)。臆測歷史對於商業社會的關注也構成了《國富論》一書中的重要主題¹⁰⁴。

(四) Adam Smith 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經由上述的討論，當我們回到 Adam Smith 在《國富論》一書的討論，我們似乎可以清楚地發現，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存在著系統性哲學與歷史描述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最為具體地表現在第三篇與第一、二篇的論證方式上的差異)。在第

¹⁰⁴關於臆測歷史對於 Adam Smith 政治經濟學體系形成的影響，請參考 Hont & Ignatieff(1983)。除了上述的知識背景外，Adam Smith 也深受自然法傳統的影響(特別是 Samuel von Pufendorf、Hugo Grotius 與 Charles Montesquieu)，關於這點的相關討論，請參考 Clark(1992)、Haakonssen(1981, 1996)、Schabas(2005)。事實上，Adam Smith 正是從法學課程的講授來開啓他對於經濟議題的討論，參考 Smith(1962)。

一、二篇的部分，Adam Smith 利用系統方法，綜合了先前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相關理論，推進關於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與勞動作為價值絕對判准、以自然價格為中心的價格機制)¹⁰⁵、勞動分工(分工所帶來效率與市場的增長)、經濟階級(工人、資本家、地主與對應的工資、利潤與地租)、貨幣與資本積累等相關討論。但是，在第三篇部分(以及在第四、五篇的相關之處)，他反而利用歷史方法來說明財富發展的自然趨勢(這受到四階段理論的影響)，並描述了羅馬帝國衰落以來的制度史與經濟史。

面對這兩種論證方式所可能具有的緊張關係，Adam Smith 主要是利用勞動價值與資本積累的觀念將這兩部分關連起來。首先，有別之前理論對於勞動與價值概念的討論，Smith 賦予了勞動概念不同的理論地位。他使得勞動成為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絕對尺度(包括作為自然價格的判准)，並用勞動來說明國民財富的起源。接著，他引入資本積累的觀念，說明不同勞動力對於資本積累的推動，並說明了資本的性質與累積方法。最後，利用勞動與資本積累這兩個抽象的概念，Smith 結合了歷史例證，說明了歐洲城市的興起與商業社會的形成，並試圖說明商業交易對於資本在不同生產部門(主要是工商業與農業)所造成的影響。

換言之，從市場觀念進生的角度來看，Smith 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具有三個重要的理論突破：一、就前人已經勾勒出來的具有內在自然律則的經濟秩序，Smith 賦予此一經濟秩序一個絕對的支點(勞動)，並使得一切經驗意義上的市場波動都能夠找到其秩序的固定參照點(自然價格)(cf. Foucault, 1970:ch7)。二、Smith 引入歷史性(historicity)的觀念於政治經濟學的體系當中，因而經濟秩序的觀念，不再僅僅只是靜態且封閉的，開始轉向某種動態且有過程性質的秩序想像¹⁰⁶。三、

¹⁰⁵ 一般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往往會利用當代價格均衡機制來理解 Smith 對於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的區分，以及以自然價格為中心的競爭調整機制。實際上，這乃是一種誤解，因為，對 Smith 而言，市場價格並非是一種理論變量，乃是一種觀察到的經驗變量。至於作為理論變量的自然價格，則是由交換價值的不同組成(地租、利潤、工資)，以及最終由勞動價值來衡量，根本不涉及供給與需求的調整機制(Roncaglia, 2006:138-144)。

¹⁰⁶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模型(源自於法國的 Walras)，其思想根源並不在 Adam Smith 的體系當中，而是在 Quesnay 的體系當中。因此，我們在第一、二章所提到的 Hayek 從“競爭過程”、“自發性秩序原理”對於完全競爭市場模型的批評，的確是有其思想史上的根據的。

Smith 將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奠立在勞動、分工與資本積累的觀念上，並用以分析歷史中不同社會的狀況，這使得不同生產模式(四階段歷史理論)，逐漸成為不同社會的根本構成性原則，因而，用商業社會來表述具現代性的文明社會(如蘇格蘭許多臆測歷史所做的一樣)，獲得經濟理論上的意義與根據。

五、結論

從上述的討論來看，市場觀念的產生，在西方的歷史上經歷過一番不小的曲折。首先，在 17 世紀以前，經濟事務不僅被歸屬在私人家務的領域，涉及的乃是對於必需品的處置(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與暴力)，個人唯有免除這種必然性的負擔，才得以進入公共生活之中而取得自由。而且，經濟議題也不處於公共集體生活的討論議程之中，只有在例外的狀態下(特別是涉及高利貸與公正價格問題)，才會進入公共的視野之中(通常還以負面的方式表述出來)。到了中世紀，即便時至晚期已經可以看到商業的復甦與興盛，但是市場的交易行為依然受到宗教法規與訓令的壓抑。只有到了 16-17 世紀的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中，經濟問題才開始被問題化，成為當時思想與論述的重要焦點，所謂的國富問題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浮現。

其次，隨著 17 世紀中政府在財政制度上的改革，以及相伴隨的重商主義論述的出現，所謂的國富問題不僅有著制度的基礎，更有論述上的具形條件。而且，隨著重商主義論述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與商業知識的被看重，對於經濟議題的討論框架，也開始突破了傳統宗教訓令與法律規範的約束，發展出市場交易領域具有相對自主性與內在規律的想法，經濟的分析方式，也逐漸從私人家計模式轉變成一種政體的家計模式。此外，隨著 Locke 與 Petty 對於貨幣流通、人口與稅收問題重新定位，經濟分析的方式也逐漸走出了傳統的家計模式，轉向了一種流通模式與國民財富會計模式。特別是在 Petty 所創立的政治

術數學中，他以人口為中心的國民財富會計模式中，國富問題逐漸從國際貿易問題轉向了對於國內生產力提升的正視。而且，政治算術學所強調的客觀數字分析，不僅使得市場觀念得以突破傳統倫理上的束縛，也使得不可見的經濟領域的內在律則，得以在數字與數字的關係中呈顯出來，形成一種有別於家計模式的經濟秩序圖像。

再者，市場觀念的形構，除了有賴新的經濟問題的形成(人口與稅收)與商人地位提位的提升外，更有賴於新的知識表徵技術的引入。第一代的重商主義者，幾乎都借用源自於複式簿記的知識技術與修辭效果，來賦予商業活動倫理上的正當性，並且也利用複式簿記在數字與格式上的客觀性與對稱性，來形構商業領域的自主性與商業專家的無涉利益的中立性。Petty 的政治算術學，更是站在科學革命的知識背景上，結合了 Bacon 與 Hobbes 的知識論立場，利用數字表徵的形式精確性，來完成從特殊經驗到一般理論的概化，形構了客觀的經濟領域的內在律則。至於，18 世紀重農主義論者，則進一步強調所謂的自由放任原則與經濟領自然律則的統治。尤其，Quesnay 發明“經濟表”來表述這種由自然律則統治的經濟秩序。在其“經濟表”的圖示與分析裡，Quesnay 不僅使得社會中各種生產部門形成一種有機整體組合，而且，他也首次將自主且均衡的經濟秩序清楚地表述出來。

最後，到了 Adam Smith 的時代，不僅政治經濟學有了更系統化的體系，市場觀念也有了更根本的突破。基於 Newton 的自然哲學、自然法傳統、神意設計說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臆測歷史的影響，Adam Smith 一方面透過系統性哲學為經濟的自然秩序找到概念體系上的基石，也為經驗上的市場波動找到固定的秩序參照點；另一方面，他也將歷史性原則引入了政治經濟的體系當中，試圖透過歷史方法來找到經濟秩序的自然律則，進而使得經濟秩序的觀念，走出封閉且靜態的均衡觀念，轉入動態且具過程性質的秩序想像。透過這兩方面的結合，Adam Smith 也進一步使得市場觀念，不再僅僅指涉一個簡單、特殊且受到層層約束的交換場所，而是整個社會都可以用市場觀念來表述。因而，一個市場(商業)社會

的秩序圖像，得以在 Adam Smith 的理論體系中具形。

總而言之，透過經濟問題的浮現、治理機制的改革、經濟論述的進展與知識表徵技術的演進，市場觀念得以突破傳統宗教、法律、倫理與思想上的束縛，在古典時期逐漸浮現。同時，在此一過程裡，經濟的觀念也開始有了現代的意義(從家計到整體系經濟秩序)，市場的觀念更是逐漸地從集市(marketplaces)的觀念逐漸轉向了單一市場(the market)觀念，為後來市場的絕對化發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第五章 市場問題及其治理

一、導言

在前一章裡，我們處理了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的迸生狀況。市場觀念的迸生，不僅有賴於相關經濟問題的轉折與知識技術的裝備，更涉及了 Taylor(2004) 所謂現代性的社會想像革命。在這場現代性的社會想像革命下，人們藉由一種去鑲嵌的社會秩序圖像來勾勒經濟領域的內在自然律則，並且試圖建構所謂自由放任原則來作為市場基本的治理機制，以掃除有礙於此一律則運作的相關障礙。因而，市場觀念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模本，不僅具有其歷史經驗上的指涉(特別是商業社會的來臨)，更有規範企圖的期待(特別是自由經濟秩序的實現)。然而，市場觀念雖在古典時期就已經出現，許多關於市場的爭議也都可以在此一時期找到根源，但是，從古典時期市場觀念的迸生到 20 世紀絕對化市場觀念的形成，市場觀念仍然經歷了許多歷史與知識上的轉折。這些的轉折，雖然可能並未更動市場觀念的基本秩序圖像與意涵，但是，相關歷史與論述脈絡的翻轉，不僅改變了市場觀念所涉及的問題組與概念叢結，也改變了對於市場治理機制的理論定位。因此，於本章，我們將處理市場觀念從 18 世紀到 20 世紀所涉及的爭議與轉折，並討論相關問題意識、概念叢結與治理機制的轉變。

要處理上述圍繞市場觀念而生的轉變，我們就不能僅從經濟學學科視野出發來考察市場觀念的演變(因為這終將避免不了現在主義的投射與學科線性系譜的限制)。事實上，打從市場觀念迸生以降，市場所涉及的就不僅僅是所謂純粹的經濟事務，而是涉及某種特定的治理模式的形構與爭議(Rosanvallon, 2004)。這種治理模式，其根本的意義在於回答下述的問題：在市場社會底下，個人為何且如何達成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的個人又如何形成有序的市場社會？因而，在這個意義上，市場觀念的演變涉及的乃是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形成與轉變¹⁰⁷。從歷史與

¹⁰⁷ 廣義來說，自由主義的治理術，除了市場模式之外，尚存在著所謂“契約模式”(或者稱之為“政治社會”模式、公民社會模式)。這兩種不同的模式，不僅意味著以政治為中心，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治理模式的區隔，實際上，這兩種治理模式也存在著既關連又對抗的關係(政治自由主義 vs.

論述史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治理術的轉變，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一、17-18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時期；二、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社會自由主義時期；三、20世紀中葉以來的先進(advanced)自由主義時期(Barry et al., 1996；Rose, 1999；Rose & Miller, 2008；Dean, 2010)。因此，底下，我將簡單地依循這個架構來處理市場觀念所涉及的爭議與轉折：首先，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討論的重點將擺在當時對於商業社會與自由放任原則的爭議。其中，主要的議題是，在古典時期裡，人們對於商業社會所具有的矛盾情結(具體地表現在奢侈品消費引發的爭議上)。當時，人們一方面利用了市場(商業)自由流通的社會圖像，形構了“溫柔的商業將有助於和平與秩序，並促進文明進步”的論題(the doux-commerce thesis)，歌頌商業所帶來的文明與自由的進步；另一方面，商業的興盛與繁榮也引發了人們的文明毀壞的憂慮。人們憂心著伴隨商業社會而來的貪婪、嫉妒與浪費等問題，將導致美德(virtue)的淪喪、社會的動盪與文明的衰敗。因此，商業與美德之間的關係，乃構成18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論題(特別是英國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隨著“溫柔商業”論題的提出，自由放任原則也逐漸取得了統治地位，形成了一種自由主義的經濟治理術。然而，有趣的是，自由放任原則卻在糧食領域引發了重要的爭議與騷亂。因而，自由放任的實現，所導致的並非市場自由均衡體系的建立，而是傳統的民眾道德經濟學(moral economy)的反抗。

其次，在所謂社會自由主義時期，19世紀中市場觀念所引發的對立詮釋與意識型態的對抗，將會是討論的重點。繼承著古典時期對於商業社會的負面評價，於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後，浪漫主義論者(如William Wordsworth、Samuel Coleridge、Thomas Carlyle)開啟了他們對於市場社會與政治經濟學的批評。雖然，政治經濟學者往往以缺乏政治懂經濟學的科學素養與市場社會體制運作的相關知識，來回應浪漫主義者的批評，但是，這兩者之間的交鋒與區隔，卻也意外

經濟自由主義)。這一點也清楚地表現在Rousseau與蘇格蘭啟蒙運動論者在看待奢侈品的不同態度上(請參見後面的討論)。

地引發了所謂文明與文化的爭議。文明與文化的爭議，不僅改變了古典時期對於市場社會的樂觀態度，同時，也意外地強化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化與專業化的傾向。此外，隨著工業革命的來臨，所謂的社會問題(特別表現與工人生活狀況有關的議題上)，不僅成為公共輿論與政策改革的焦點，亦成為政治經濟學學科論述關心的所在。政治經濟學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一方面使得政治經濟內部產生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裂(特別是勞動價值說所引起的分裂)；另一方面，這兩者的分裂卻也共同地導致政治與經濟的分化與錯位(經濟議題開始成為設定政治議題的基本面，政治議題也被轉譯成所謂的分配問題)。而且，到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為了處理 1870-1890 年代幾次劇烈的經濟危機，以及應付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人們普遍對於自由放任的教條失去了信心。於是，重新思考政府管制與干預的任務，在當時已經逐漸學院化的經濟論述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因而，政府管制也逐漸成為處理一切社會問題的核心(Keynes 對於自由放任的批評乃是最為具體的代表)。

接著，在所謂先進的自由主義時期，隨著二戰前蘇聯體制的建立、戰時的社會資源動員的經驗與二戰後西歐重建的需要，經濟論述已成為政策規劃的基本技術手段。為了避免自由放任的缺失與對抗共產主義的擴散，如何“重建”所謂“自由經濟體制”(這意味著市場是規劃出來得而非自然而然的傾向)，已成為當時西方主流經濟論述關心所在。因而，一種在德語世界中被稱之為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的治理術已逐漸登上歷史的舞台，這個最為具體地特別表現當時西德弗萊堡學派(the Freiburg School)的學說與影響力上面。同時，也在此一時期，在經歷過邊際效用革命後的主流經濟學內部，亦爆發了一場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之辯”(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支持計畫經濟的新古典經濟學 vs. 堅持市場價格機制優位性的奧地利學派)。然而，無論是哪一方被認為取得這場辯論的勝利，這場辯論都意味一種去歷史化、去社會化的絕對化市場觀念也逐漸浮出了檯面。隨著市場絕對化傾向的出現，到了 1960 與 1970 年代，在以 Milton Friedman 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手中，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不僅開始應用到傳統所謂的非經濟

議題上，市場觀念與治理術也開始透過相關政策主張滲透到非經濟領域上。於是，在這種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思維裡，不僅出現了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散，更出現了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延展---一種試圖在沒有市場的地方發明市場的企圖。因而，一種絕對化市場觀念所導致的根本錯置，清楚地在芝加哥學派的思維中展現出來。

最後，在結論部分，我將簡單總結上述的討論。並且，試著回到市場作為經濟現代性的社會想像的問題上，來討論上述這些爭議與轉折，如何導致市場觀念逐漸地走向絕對化的發展。

二、古典自由主義時期的市場社會的爭議

如前一章所述，在所謂的 17 世紀時，為了在當時以奢侈品為主的國際貿易競爭中取得勝利，重商主義論者基本上都是支持當時在各國普遍存在的禁奢法 (sumptuary laws)，以提高出口額度，並降低進口額度(Finkelstein, 2000:251)。然而，到了 18 世紀，隨著奢侈品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擴散，以及新的消費社會與時尚文化的形成，這些禁奢法不僅開始形同具文，人們也開始對於奢侈品、消費、商業文化產生正面且樂觀的看法(McKendrick et al., 1982；Berg & Clifford, 1999；Berg & Eger, 2003；Berg, 2005；Hunt, 1996)。因而，一種所謂“溫柔商業”論題，逐漸在古典時期誕生¹⁰⁸。這個“溫柔商業”論題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奢侈品(乃至於商業)的去道德化，更意味著市場(商業)社會在歷史與論述上站穩了腳跟。因此，底下，我將先從古典時期關於奢侈品的去道德化所引發的辯論談起。

¹⁰⁸ 根據 Hirschman(1977)的看法，這個論題乃是啟蒙運動中一個重要命題(無論在法國還是在蘇格蘭)，而且，最為清楚地表現在 Montesquieu(1998)《論法的精神》一書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後面我們會討論到的 Hume、Adam Smith 都深受 Montesquieu 的影響。

(一) 奢侈品的去道德化與商業社會的辯論

雖然，奢侈品的去道德化在晚期重商主義論者，如 Barbon(1982)與 North(1982)那裡就已經露出了端倪¹⁰⁹，但是，古典時期關於奢侈品所引發爭議，則是要 Bernard Mandeville 的手中，才引發了廣泛的辯論(Hundert, 1994；Barry, 1994:ch6)。在《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 一書裡¹¹⁰，Mandeville(2002)語不驚人死不休地為奢侈品消費正名。他開宗明義地指出，優雅且舒適的生活是不可能與純真、儉樸的美德共存的。因此，他抨擊那些對於試圖貶低人們對慾望追求與財富積累的道德論者(如 the 3rd Earl of Shaftesbury)，乃是無理、愚蠢與偽善的。此外，更為驚人的是，他甚至進一步認為，一個摒除了惡行的美德社會，不但無法養活龐大的人口，而且往往只會處於貧窮、落後的邊緣。因而，他認為，使人類文明走向勤勉、富裕與強大的發展方向的，並非源自於人類的美德，而是源自於人類不可根除的惡行(vices)。上述這些言論，似乎動搖了傳統道德與宗教理論關於善因與善果、惡因與惡果必然連結的倫理訓令。於是，Mandeville 的論點似乎展現出一份看似矛盾的命題(至少就當時的人眼光看來)：一方面，他承繼了傳統對於奢侈的批判，公開地承認奢侈與矯揉、衰弱、傲慢、貪婪、欺騙、妒忌、虛榮等個人惡行之間的連結；另一方面，他卻也公開地指出了奢侈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正向關連(如同本書副標題所顯示的)(Barry, 1994:128)。

而且，為了釐清私人惡行與公共利益上述這種看似矛盾的關係，Mandeville 進一步引入所謂的模仿晉升機制(emulation) (Hundert, 1994:175-183)¹¹¹。首先，

¹⁰⁹他們兩人已經意識到，人們對於慾望的追求有助於刺激商業的成長，過於將消費壓抑於生活必需品的水準，終將導致貧困世界的來臨。而且，他們兩人也認為過於揮霍雖可能有損於個人的美德，但是卻無害於集體的貿易成長。

¹¹⁰這裡必須提醒，《蜜蜂的寓言》一書，陸續有幾個擴大的版本。最初在 1705 年，首先是以散文詩出現(本書的第一部份)。接著，在 1714、1723 年又增加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有關美德、慈善、社會本質的討論，並且於 1714 年版正式更名為現在這個書名。但是，此時仍未引起廣泛的重視。直到 1728 年，又增加了幾個回應、評論與六個對話錄(本書第四部份)，本書才開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¹¹¹如同前面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指出的，Hayek 認為市場秩序乃是一種自發性秩序，其根源是行動的非預期後果。而且，他也進一步將此秩序原理的發現，歸功於蘇格蘭啟蒙論者，其中 Mandeville 被認為是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但是，我必需指出，Mandeville 並不是用行動的非預期

他將所謂奢侈品與必需品的定義予以相對化處理。在這種相對定義下，對於下階層而言是奢侈的東西，可能被更高階序的人們視為生活必需品。同樣的，對於古代人而言，可能被認為極度奢侈的東西，可能對於現代窮人而言，不過是生活必需用品。因此，對 Mandeville 而言，文明社會的進展本來就是跟奢侈品的擴大與“必需品化”連在一起的。此外，針對慾望滿足的追求乃是個人毀滅根源的說法，他也反駁指出，問題根源並不在於奢侈品的消費，而在於個人的愚蠢，在於個人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因而，奢侈品的消費本身不具有任何固有的缺陷，所有惡行的根源都源自於個人自我治理能力的缺乏。最後，針對奢侈可能引發的集體道德的衰弱與文明的毀壞的說法，Mandeville 的論證，並不試圖糾纏於奢侈的惡行定位，而是轉向地指出，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於奢侈品的消費，而是出自於管理的不善與不良的政治。他認為，只要透過社會階序之間的模仿晉升機制，來達成文明的教化、品味的養成與行為舉止的規訓，就可以解決此一問題(進而也解決個人治理能力缺乏的問題)。因而，嫉妒與奢侈品的時尚風潮，不但不會帶來負面的社會後果，反而有可能帶來正面的公共利益，甚至，所謂有助於文雅(civility)與禮儀(polite)社會的形成。

上述 Mandeville 這種驚人的言論(至少對於當時人而言)，固然為他本人引來惡名昭彰的聲譽，但是，卻也開啟了 18 世紀啟蒙運動對於奢侈品與美德之間關係的反思與辯論¹¹²。無論在這場辯論裡，Mandeville 收到的是稱讚還是毀譽，對

結果機制來連結私人惡行與公共利益，相反的，他主要是立基於階序社會的秩序圖像上，利用所謂的模仿晉升機制來連結此二者。

¹¹² Mandeville 的論點在西歐帶來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在英國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內部，Adam Smith 的老師 Hutcheson、Hume、Ferguson 等人都曾討論 Mandeville 這種特殊的美德觀與奢侈品的概念(當然有稱許之處，亦有批判之處)。除了英國之外，法國可以說是反響最大的一個國家。在法國啟蒙運動內部，從 Montesquieu、Voltaire、Rousseau 幾乎都受到 Mandeville 的影響。最為特別的是在象徵著法國啟蒙運動大成的《百科全書》中，就有著 St. Lambert 所寫關於奢侈的詞條(正反兩面意見都同時陳列，但是較為傾向於正面評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 18 世紀關於奢侈品的大辯論裡，到了後來，正面論點往往集中於強調奢侈品的消費有助於國富的積累，反面論點則會強調奢侈浮華將使得軍人的武德、勇敢與男子氣概，變得陰性化(feminization)與柔弱(effemincay)，因而不利於國力的發展與維持(這個論點 Mandeville 亦反駁過了)。關於 18 世紀這場大辯論的整體回顧，以及西方歷史上關於奢侈品所引起的爭議，請參考 Barry(1994)、Roberts (1998)、Berg & Eger(2003)、Shovlin(2006)。關於陰性化命題所引發的爭議，請參考 Berg & Clifford (1999)、Clery(2004)。

於同時代的人來說，他的驚世駭俗的論點，幾乎一手就把奢侈品的概念，從宗教神學領域轉變到政治／哲學領域，完成了奢侈品的去道德化(Barry, 1994:135)。而且，也是基於這個基礎上，透過這場辯論，一個新的問題意識就浮現了出來：財富與美德之間到底具有怎樣的關係(特別是有別於傳統道德教條與宗教訓令所強調的關係)？商業社會到底是有助於文明還是有害於文明的？

針對此一問題，在後 Mandeville 的啓蒙運動中，大致上可以區分出三種不同的立場¹¹³。一是 Jean-Jacques Rousseau 所代表的激進的否定論立場。在早期發表的《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 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1755) 的著作裡，Rousseau(2004, 2009a)對於文明社會的進展提出了激進的控訴。他認為，科學與藝術的進展(這是商業社會的重要象徵)，並未帶來人類的幸福與進步，相反的，從自然狀態到文明社會的過度，乃是一種人性的根本墮落(自然狀態下，人類是自由且平等的高貴野蠻人)，一種社會不同平等狀態的產生(基於私有財產的出現，社會產生貧富分化，富者在社會契約簽訂時，往往會基於自己的利益，欺騙窮者，並利用契約簽訂後的政治權力來維護其既得利益)。因此，對於 Rousseau 而言，奢侈品、商業興盛所代表的並不是美德的提升與文明的進步，而是一種君主暴政的工具(一種以宮廷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崇拜與模仿)，一種貧富分化的機制。從根本上來說，奢侈、商業就是一種道德墮落與社會不平等的象徵(Rousseau 這種激進的否定論立場，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後來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於市場社會的批判)¹¹⁴。

¹¹³近來史學研究的成果表明，現在已經很難再像 Gay(2008)一樣去談論“一場”統一的啓蒙運動整體性。近來對於啓蒙運動的研究，已經從時間(從 18 世紀延伸到 19 世紀)、空間(地域與國別)、承載者(各種社會團體、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社會出身)、不同理念之間的爭議與交錯等面向，對於各國啓蒙運動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只是，在關於奢侈品的辯論上，至少在法國啓蒙運動與英國蘇格蘭啓蒙運動之中，展現了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與流通性。因而，上述的討論我傾向於強調這些共同性與流通性，較為忽視上述這些面向上的差異(例如法國重農學派就不甚重視關於奢侈品的爭議，對其而言，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都是無生產性，因而無關宏旨)。關於對於近來啓蒙運動成果的回顧與討論，請參考 Porter(2001)、Himmelfarb(2004)、Israel(2001、2006、2010、2011)。

¹¹⁴至於，如何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Rousseau(2009b)在《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1762)將解答指向了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生成與原始社會契約的恢復。Rousseau 這種激進觀點，後來甚至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因此，在這個意義上，Shovlin(2006)甚至認為奢侈品的爭議，

除了 Rousseau 這種激進否定論的觀點外，大多數主流的啓蒙運動論者(如 Montesquieu、Voltaire、Hume、Condorcet 等人)，基本上則是持肯定論的立場。他們基本上都支持所謂“溫柔商業”的命題(Barry, 1994:134-142；Rothschild, 2002)。其中，Hume(1984)對於商業與奢侈品的討論乃是最為關鍵的。在《論商業》(Of Commerce)與《論技藝的精美》(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¹¹⁵這兩篇文章裡，Hume 深化了“溫柔商業”的命題。基本上，Hume 並不同意 Mandeville 將奢侈品等同惡行的論點，也不同意他將奢侈的美德歸諸於良好的政治管理手段。對 Hume 而言，奢侈品的技藝與精緻的藝術是相通的，因此，奢侈的精緻化，將可以帶來品味與審美經驗的提升，有助於個人美德的形成(特別是精緻化所需要的知識、技能與勤勞)。此外，對於所謂商業將導致陰性化與軟化的論題，Hume 也認為，所謂的軟化乃意味著戰爭不再殘酷與慘烈，更具人性。因而，這種軟化並不是一種缺陷，反而是一種美德的提升，所謂尚武精神，事實上，只有在未開化的野蠻民族那裡才佔據主導地位。於是，基於這樣的立場，Hume 甚至更進一步認為，市場社會有其內在道德的生成，它不僅有利於和平的出現，更有利於人們對於友誼、社交性傾向的增加(Silver, 1990; Hill & McCarthy, 1999)。最後，Hume 還指出，商業社會並不會妨礙武德與國力的強大，一個具有良好分工且貿易發達的商業社會，不僅不會陷入古代為了維持武力所導致征斂賦稅、國富民窮的困境(如古代斯巴達的人民生活的慘狀)，相反的，可以透過所累積的龐大剩餘來滿足雇用軍隊的需求(賦稅與生活必需品)，以維持國家武力的強大與國民幸福的齊頭並進(Hume 這些論點基本上都為 Ferguson 與 Adam Smith 所承繼)。

第三是所謂折衷論的立場，Ferguson 與 Adam Smith 都是這種立場的代表人物(雖然這兩者立場略有差異)。基本上，這兩人大致上都同意所謂“溫柔商業”的論題，也都讚賞商業社會所帶來的文明進步，但是，對於 Ferguson(1999)而言，

乃是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之一。關於法國對於奢侈品的辯論(特別是 Voltaire 與 Rousseau 之間的爭辯)，請參考 Williams(1982:39-44)與 Shovlin(2006)。

¹¹⁵ 這篇名為《論技藝的精美》的文章，其原名為《論奢侈》(Of Luxury)，本發表於 1752 年，但於 1760 年重新發表時，則被更名為現在這個名字。

市場社會的確存在著文明危機的隱憂。雖然商業的興盛的確可能使得人們基於互惠性、共感(sympathy)發展出友愛、同情、真摯等美德，然而，商業社會卻不具有內在的機制，讓人們停止對於私利與競爭的追求，轉向這些更高尚美德的形成(特別是當私利的追求將為他人帶來災難時)。此外，他也認為，商業社會缺乏內在的防腐機制，因而無法理所當地避免政治的奴役、人性的衰落與國家的衰敗等問題的產生(特別是當人們失去對於財富的開創性與積極性，轉而崇拜起有權有勢者，而有權有勢者也開始高枕無憂、狂妄自大的時候)。相較於 Ferguson 這種較具悲觀性的警告，Adam Smith 則展現了他較為樂觀的折衷主義立場。一方面，Adam Smith(1976:17,26)肯定商業社會實現了人們自由交易的自然傾向，也明白地指出，在商業社會裡，每個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商人，都必須依賴交換而生¹¹⁶。因此，他高度讚揚商業社會所帶來的自然自由的體系與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商業社會內在的腐敗傾向。這種腐敗的傾向，不僅表現在商人對於壟斷特權的合謀、對公共利益的破壞與對工人的剝削外，也表現在勞動分工對

¹¹⁶ 在傳統的詮釋當中，當討論到交易時，往往會引用 Adam Smith(1976:18)著名段落(我們每天的飲食，並不出自於屠夫、釀酒師、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於他們的自利)來論證交易所具有的互惠性，並試圖用“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來形容這種從自利到互利的協調機制。但是，上述這個著名的段落，並不是 Adam Smith 的重要創見(交易具有互惠性乃是老生常談)，Adam Smith 也不試圖用看不見的手來解釋這樣的協調機制。此外，在當代經濟學裡，人們往往也認為 Adam Smith 試圖利用看不見的手來說明市場競爭、價格機制、市場自發性秩序(基於非預期後果)等觀念。雖然這些看法的確可以從 Adam Smith 關於市場的相關理論中得出，但是，實際上，Adam Smith 在《國富論》裡並沒有用看不見的手來解釋這些觀念。根據 Evensky(1993)、Rothschild(1994)、Grampp (2000)等人所做的歷史與文獻考察，在 Adam Smith 的整體著作中，出現過三次看不見的手的比喻。第一次出現在前一章所提到的《論天文學史》中，用來形容神啟秩序，而且具有諷刺的意義(用來解釋原始多神信仰的起源，並諷刺這具有迷信色彩)。第二次，出現在《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一書裡(Smith, 1997: 230)，亦具有某種神啟秩序的意涵，也有著諷刺意涵(富人的天性雖是自私與貪婪的，但是，經由看不見的手的引導，透過他們的奢侈浪費，將他們的成果與窮人分享，因而不知不覺促進了社會利益，這跟神的公正分配是相當的)。第三次，則是出現在《國富論》一書裡(Smith, 1976:477)。在這次的用法，依然具有諷刺的意味(主要是諷刺那些標榜其行為乃是為了公益實則只為私利的商人的裝模作樣)。在這個討論進口限制的章節裡，看不見的手主要是用來解釋商人私利的追求如何無意之間增進了社會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Adam Smith 並沒有主張，個人私利的追求“必然”會達成公共利益的和諧與增進，至少在該章裡，個人基於私利的資本投資，只有在恰好留在國內時，並且也支持國內具有生產力的產業時，看不見的手才能起到協調私利與公益的角色。因此，Adam Smith 對商業社會的自然自由體系，並非毫無保留(如新古典經濟學與奧地利學派一樣)。事實上，Adam Smith 並不信任商人，他甚至認為商人會聯合起來，欺騙或壓迫公眾以獲取私人利益(Smith, 1976:278)。簡言之，市場看不見的手(如果真的有這隻手的話，因為 Smith 從未如此表達過)對於私利與公益之間的協調，並非是毫無條件的，亦無法簡單地保證自發性自由秩序的到來。

於一般人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單調的分工導致了創造力的喪失，更使得工人越來越麻木不仁，終究失去了理性與情感交流的能力)。因而他試圖尋求法律與教育手段來補救這樣的缺陷。雖然，Adam Smith 清楚地認識到了商業社會對於美德與公民性所可能具有的危害，但是，從他臆測歷史的分析視野來看，相較於古代的奴隸制與封建體制的野蠻與落後，商業社會終究是文明的、自由的(而且還具有持續進步的潛力)，因而對於商業社會所帶來之文明與自由的進步，Adam Smith 始終保持著樂觀的態度(Winch, 1978:ch3；Griswold, 1999: ch7)¹¹⁷。

上述這三種論點，雖然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立場，但是，他們都共同使得對於商業社會的評價，無法簡單地由傳統宗教訓令中得出(他們的論點也預示了之後對於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而且，隨著“溫柔商業”論題的勝出(Rousseau 的觀點雖極具影響力，但是畢竟是少數之說)，透過加速商業流通以促進文明進步的想法也受到了肯定，因而，所謂自由放任原則就逐漸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治理術。

(二) 作為市場社會治理機制的自由放任原則

所謂自由放任的原則，並非是 Adam Smith 所獨創的(雖然他的確是推廣這個原則最重要的推手)。這個原則的首先採用乃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論者¹¹⁸。如同“Physiocracy”一詞的字源(“fusis”自然與“cratein”支配)所表明的，重農主義者認為，治理國家應該是自然秩序的法律，而非君王。君王應該接受專家的指導，去理解自然律則的內容與要求，不但要避免任意干預經濟領域，還要如同園丁一般積極地去除有害於經濟自然法則運作的事務。因而，讓自然律則自行其事的意義下，重農主義論者從 Quesnay 已降，基本上都是自由放任原則的支持者。而且，

¹¹⁷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Pocock(1985, 2003)的看法，上述 Ferguson 與 Adam Smith 對於美德的正視，以及對於商業內在可能的腐敗機制的認識，都受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公民人文主義(Civil Humanism)傳統的影響。因此，近來對於 Adam Smith 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歷史重建的研究，相當注意這個傳統對於他們經濟思想的形塑。關於此點，請參考 Hont & Ignatieff (1983)。

¹¹⁸ 根據牛津英語辭典線上版的說法，“Laissez-faire”乃是透過重農主義的文獻進入到英語世界當中。一般認為這個口號乃是出自於 1750 年代法國經濟學家 Vincent de Gournay 的口中。請參考 <http://www.oed.com/view/Entry/105152>。

Quesnay 之後的重農主義論者，甚至追求一種毫不妥協的絕對自由放任原則，試圖把這一原則擴大到所有政府的職能之中，並延展到經濟領域之外(Rosanvallon, 2004:96)。

有趣的是，在重農主義身上，自由放任原則並沒有展現出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的結合。身處於法國絕對王權的統治下，以及以擔任法國宮廷顧問或大臣維生的重農主義論者，在他們身上，自由放任原則所展現的乃是經濟自由與開明專制的結合¹¹⁹。就如同前一章，我們對於 Quesnay“經濟表”的分析所指出的，“經濟表”展現的是一種政治算術與經濟自然均衡的綜合。因此，“經濟表”弔詭地展現了兩種不同的特質，一方面，它可以用來指導君王理解自然的積極秩序，實施符合此一秩序的干預與規劃；另一方面，它也展現了市場的自主與均衡秩序。換言之，重農主義論者的自由放任原則所要表達的，正是一種符合市場自然秩序的計畫，以及在專制體制下可以協調各種利益的自由競爭(Rosanvallon, 2004:97-8)。

有別於重農主義所強調的開明專制體制與自由放任原則的結合，只有到了 Adam Smith 手中，“溫柔商業”論題與自由放任原則才有系統地結合起來。如前所述，他對商業社會的禮讚，主要是因為一個公平且正義的商業社會(這有賴於法律、公共行政上的制度設計)，將能建立起一個自然的自由體系。因此，基於對自然自由體系的喜好，他支持所謂的自由貿易，也明確地規定了政府的作為與義務，並且還批判那些屬於有礙商業流通的制度(如學徒制、商人的壟斷特權、不合理的稅制、定居法、濟貧法等等)。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確支持以自由放任來作為商業社會的治理原則(Evensky, 1992；Minowitz, 1993)。

然而，對於自由放任原則，Adam Smith 的確提出了許多的保留。首先，Adam Smith 並不是教條主義式的自由放任主義者。他清楚地指出，在當時的英國貿然

¹¹⁹對於重農主義者的始祖 Quesnay 來說，在中國的專制體制下，君權所受到儒家倫理與士大夫階層的層層限制，以及中國龐大且獨立的官僚體制(特別是透過科舉選拔)，乃是這種結合極為理想的模範。因此，Quesnay(1992)甚至寫了一本關於中國專制體制的書(在極為薄弱的資料基礎下)，來闡述他心中最為理想的結合形式。

地實施自由貿易是不具現實意義的(Smith 甚至用裁兵引發兵變的比喻來提醒此點)，自由貿易的實施必須先解決公眾既有的偏見與商人既有的壟斷勢力。其次，在討論著名的航海法段落時，他也清楚地表明國防問題的重要性遠大於國富問題，因此航海法對於自由貿易的限制，乃是合理且明智的(Smith, 1976 : book IV ch.2)。再者，在面對市場社會可能具有的利益衝突問題時，他也沒有聽任自由放任原則自行其事。他不僅批判商人的利益常常有背於公共利益，而且，也抨擊他們往往會聯合起來，欺騙並壓迫公眾以獲取私人利益，因此，Adam Smith 警告人們必須留心商人所提出的任何新商業法規(Smith, 1976:278)。此外，面對勞資之間的衝突，他傾向於站在勞工這邊，批判雇主們常陰謀地聯合起來打壓工資。同時，他也提倡高工資與低工時，認為這些不僅有助於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也有助於整體生產力的提升(Smith, 1976:book I ch.1)。最後，在前述已經討論過的商業社會的內在腐敗傾向(富者的特權與貧者的退化)，Adam Smith 明確地要求建立一個公正且平等的司法體系來保證一般人的權利，而且，他也要求司法權必須獨立於行政權之外，以避免特權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此外，針對貧者的退化，他也要求國家應該提供公共教育來搶救這種退化的狀態(Smith, 1976 : book V ch.1)。

從上面的討論來看，這兩種版本的自由放任原則，都具有一個相同的特徵，即他們都試圖利用自由放任原則來消除舊秩序的壟斷特權與關隘壁壘，以促成市場交易的自由流通。因此，在 18 世紀末的時空環境下，自由放任原則並不意味著一種消極的政府不干預原則，相反的，自由放任原則乃是一種批判性原則，其作用在於打造一個單一的市場空間，將散落的各種集市連結起來，以促成市場社會的實現。換言之，自由放任作為市場社會治理術，事實上，形構了市場社會本身。

(三) 糧食的自由貿易與民眾道德經濟學的回應

在 18 世紀末(甚至直到 19 世紀中葉)，上述自由放任原則之一個重要的實

踐領域在於推動穀物的自由貿易。而且，對於重農主義者與 Adam Smith 來說，利用市場機制使穀物自由流通來應付飢荒，乃是唯一正確的處理辦法(Foucault, 2007:29-49)。傳統上，在重商主義的政策邏輯下，為了應付飢荒，政府往往從法律手段著手來處理此一問題，不但對糧食價格進行限制，也對囤積居奇進行限制，而且，也對穀物的出口進行嚴格的管制(對於進口則予以補貼)。此外，在平時，政府也對於糧食的耕作面積、耕作種類、糧食的儲存、跨地域的糧食移動進行嚴格的監控。這種重商主義的政策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保持糧食的低價，使得城市工人的薪資得以減少(這有利於出口導向的國際貿易政策)。同時，透過打壓農民與糧商的利潤，使得糧食盡早地出現在市場上，緩解稀少現象，避免城市中物價的通膨與人民的暴動。但是，這種重商主義的糧食安全政策，到了 18 世紀中葉以後，則持續地遭到了嚴重的質疑，因而，要求糧食自由貿易的呼聲不絕於耳。法國大約在 1763 -1764 年確立了穀物的自由貿易原則(Foucault 認為這象徵著重農主義者的勝利)。英國雖然沒有完全廢除穀物相關法令(穀物法相關法規要到 1846 年才完全廢除)，但是，也持續地鬆綁相關限制，而且，到了 18 世紀末，穀物交易也越來越傾向於自由貿易的商業化經營¹²⁰。

重農主義論者與 Adam Smith 之所以支持對於穀物交易的自由放任，在於他們認為，只要允許穀物自由的流通與儲存，市場機制就會起到調節的作用，從而解決糧食的相關問題。當穀物生產過剩時，只要允許穀物的自由儲存與出口，就可以維持穀物的價格，避免穀賤傷農。至於食物短缺的情況，他們認為，事實上一國之內不可能完全沒有食物(因而重農主義論者甚至認為食物短缺是一種幻覺)，食物至少可以支撐全體人民一段不短的時間，因此，只要允許在國內與國

¹²⁰ 根據 E.P. Thompson(1993: ch4)的說法，在英國，傳統的穀物交易的交易模式要求的是，在盡可能的範圍內，使消費者與農場主“直接”交易。農場主必須在集市中將穀物出售，而不能在穀物還在田裡就將其出售，也不能為了提高價格而將其囤積。在集市交易時，必須先讓窮人進行交易，等到一定時間過後，才由大商人進場交易。大商人也被要求不能進行穀物期貨的交易，不能根據樣品進行交易，也不能囤積居奇，更不能為了牟利在同一集市與鄰近集市內買了再賣。但是，到了 18 世紀以後，穀物交易中商人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許多農場主不再於集市中出售穀物，糧商開始非公開地買進大量的穀物(甚至進行穀物期貨約定)。到了 1770 年代，反對糧商存在，以及反對穀物囤積與壟斷的法規遭到了廢除。關於 Adam Smith 對於英國穀物法規的討論，以及他對於國內穀物貿易自由的鼓吹，請參考 Smith(1976:book IV ch.5)。

際之間穀物的自由流動，考量到未來將會出現的糧食供給，那麼當前的“短缺”所導致的價格上漲，將會有其極限，而且，從各國湧入的糧食，不僅將會緩解穀物的短缺，還會很快地將價格回復到較為正常的水準。因此，舊有應付飢荒的辦法，不僅沒有解決此一問題，甚至加重了飢荒現象的產生。

上述這種對於穀物自由貿易的鼓吹，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自由放任的治理術對於單一市場空間與市場社會的實現企圖¹²¹。然而，這種試圖以穀物貿易作為自由放任原則的治理機制試驗，並沒有如預期的引來美好且合理的經濟秩序，相反的，這種機制招來的是 18 世紀末的層出不窮的糧食暴動(糧食暴動甚至是法國大革命的重要導火線)。對於糧食暴動，重農主義與 Adam Smith 或許可以辯解，這是因為民眾的無知與偏見，因而政府只能順應這樣的偏見進行干預，進而破壞了市場的調節機制。但是，E.P. Thompson (1993: ch4)指出，在這所謂民眾的“偏見”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樸素的道德經濟學。這種經濟學乃是一種源自於傳統家父長制的一種正當性的概念，其核心乃是關於生存機會的經濟學。因此，當處於糧食短缺與高價的艱難時期，商人若干缺乏良心的舉動(例如將當地糧食輸往可以出得起更高價的地區、將貨物存放在外地以控制當地供給與價格、以高價壟斷市場上即將上市的供給、提供份量不足或質量低劣的供給、對於價格隨意地抬高)，將會使得民眾採取直接且粗野的行動，並迫使政府當局回復家父長的管制措施¹²²。

換言之，從民眾的道德經濟學來看，自由放任原則與市場社會的觀念，事實上極具烏托邦的色彩(Thompson:1993:203,207；Rosanvallon, 2004:102)。穀物自

¹²¹ Adam Smith(1976:book IV ch.5)甚至認為，假設所有國際之間都能夠自由貿易，那麼各國將會像一個帝國的各省一樣，實現一種單一市場，以合理且迅速地互通有無。而且，他也認為，即使一個國家非常地小(如義大利的城邦共和國)，也只有在非常例外的狀況下，才會有限制穀物輸出的需要。此外，他更指出，對於穀物自由貿易的限制，只有在穀物價格非常高的狀況下，還有穀物試圖輸出，才需要禁止。

¹²² E.P. Thompson 這種“道德經濟學”的說法，引發了許多的誤解與爭議。關於這些爭議與回應，請參考 Thompson (1993: ch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代經濟學中，諾貝爾獎得主 Sen(1981)對於 20 世紀第三世界飢荒的分析，所發展出來的資格身份(entitlement)理論(主要是批評食物的短缺不是飢荒產生的必要或充分原因，重點在於資格身份的有無與實現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了民眾道德經濟學的分析(Thompson 在回應時也引用 Sen 的著作)。

由貿易的試驗，不但沒有提供自由放任原則的經驗佐證，還相反地指出了市場觀念的侷限性與不切實際。市場社會固然具有內在美德提升的可能性(如互惠性、友愛等)，但是，市場似乎只服務那些具有交易資格身份與能力的人，對於缺乏此資格身份與能力的人，市場機制的運作似乎總是顯得殘酷，因而民眾的回應亦往往也顯得粗野與殘暴。因此，這場市場社會的觀念與民眾道德經濟的碰撞，不僅預示了 19 世紀以降諸多關於市場的對立詮釋，而且，也揭露了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被掩蓋的烏托邦色彩。

三、社會自由主義時期關於市場的對立詮釋

如前所述，雖然，Adam Smith 系統性地綜合之前的經濟論述，並開創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但是，實際上，要在 19 世紀初拿破崙戰爭後，古典政治經濟學此一學門，才稱得上真的確立(Winch, 1996:ch1)¹²³。在 1815-1825 年之間，政治經濟學不僅有了權威性著作與代表人的出現 (T. Malthus、David Ricardo、Robert Torrens、J. McCulloch 等人的著作都出現在此一時期)，也有了可以發表的專門的雜誌(如 *Edinburgh Review* 與 *Westminster Review*)¹²⁴與學術社群(the Political Economy Club)¹²⁵。同時，也在此一時期，政治經濟學建立了對於公眾的

¹²³ 在 1815 年之前，除了法國 Jean-Baptiste Say 外，幾乎不存在對於後世具有影響力的著作。因此，這個時期主要都是 Adam Smith 體系的傳播(但是並不意味著此時缺乏有創見的經濟論述)，例如當時具有影響力的文人，如 Edmund Burke、Jeremy Bentham，都認識 Adam Smith 本人，也都相當熟悉《國富論》一書。Bentham 甚至在 1787 年發表的《為高利貸辯護》(*Defence of Usury*)一書裡，批評 Smith 沒有貫徹其自由放任的原則，因而錯誤地支持立法設立利率的上限。因而，Bentham 的功利主義，實際上徹底地揚棄了 Smith 對於自由放任原則的保留，使得自由放任徹底的激進化(cf. Cumming, 1981)。至於 Say 的著作，在當時的人眼光看來，似乎有認為他不過是 Smith 體系的法國詮釋者，並沒有建立自己獨立的理論或體系(Whatmore, 2000:6-9)。

¹²⁴ 基本上，*Edinburgh Review* 乃是輝格黨人所創，McCulloch 曾是這個刊物的編輯。*Westminster Review* 則是 Bentham 與 James Mill 為推廣功利主義哲學而創設的。

¹²⁵ 值得提醒的是，在這個時期，政治經濟學其實很難與 Bentham 的功利主義區分開來(雖然這兩者的確有著不同的關懷，政治經濟學顧名思義乃是對於經濟議題的討論，功利主義則集中於政治改革的問題上)。這兩個學派幾乎共享相同的知識圈與思想傳統。而且，這兩個學派尚有著 James Mill 的串連與中介(Mill 對於政治經濟學與功利主義的推動，都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Halévy, 1955:ch3)。

影響力，政治經濟學家開始進入政府部門或國會工作(如 Ricardo 曾擔任過下議院議員)，並影響了當時許多的公共政策 (如穀物法的辯論、銀行券與金本位的辯論、舊濟貧法的爭議)，而且，政治經濟學的專門講座也開始設立(如東印度公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都在此時設立了政治經濟學講座或課程)(Gordon, 1976; Langer, 1987)。

有趣的是，在此一時期，Adam Smith 的複雜且綜合的理論體系，遭到了政治經濟學者的切割。古典政治經濟學者基本上都只繼受《國富論》前兩篇的系統性哲學的理論框架，對於後三篇的文明社會的形成、商業社會的出現、文明腐敗、政府作為等議題，基本上都是無視的。人們不再以自然自由體系的財富與美德的辯證來理解 Smith 的著作，而是簡單地以所謂自由放任原則來理解他的核心論證(Tribe, 1978: 135-145; 1995)。因此，正是基於這種切割，古典政治經濟學完成了從道德哲學到專門化的經濟分析的轉變，自由放任也成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教義(Adam Smith 也成為絕對自由放任的重要標誌)。只是，政治經濟學這種專門化、科學化的發展傾向，除了來自於自身學科傳統的切割與建立外，也來自於外部批評的強化。因此，底下我將進一步討論浪漫主義對於商業社會與政治經濟學的批評，如何進一步強化了政治經濟學的專業化。

(一) 文化與文明的對抗--浪漫主義 vs 古典政治經濟學

在上述古典政治經濟學走向成熟之際，英國的文學與藝術場域也在同一時期走向了專業化與特定化的發展，並形成了以湖濱詩人(lake school of poets)為代表的浪漫主義運動。根據 Raymond Williams(1985: ch2)的說法，這場文學與藝術場域的專業化具有以下五點特色：一、19 世紀初，一個文學市場與藝術市場已經形成，文學家與藝術家得以藉此擺脫對於貴族的依附，成為一種獨立的職業。二、因為藝術市場的出現，文學與藝術也逐漸成為一種商品(特別表現在小說的興盛)，其創作技藝也被視為跟一般商品生產方式不具差別。三、有趣的是，當公眾的支持成為藝術家們取得獨立的社會條件，以及藝術逐漸被視為是一種生產手

段時，拒斥流行、媚俗的藝術風格，抱怨藝術生產的過度商業化，追求所謂“理想”的讀者與作者之間關係，試圖以藝術來引導公眾，卻也成為藝術家們普遍的審美標準。四、在擺脫貴族與拒斥公眾的基礎上，追求原創性，展現藝術家的個人風格與個性，也成為此時的重要藝術作品傑出與否的重要判準，傑出的藝術家也因而往往被視為是特立獨行的天才。五、在上述的背景下，藝術逐漸被認為是一種對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也是一種對更高實在的認識，更是開啓想像力以認識真理的重要手段。換言之，在立基於藝術的商業化，但是卻又拒斥此一前提的基礎上，一個獨立的藝術領域得以形成。浪漫主義也正是站在這個歷史背景上，開啓了他們對於政治經濟學與商業社會的批判。

浪漫主義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始於 William Wordsworth、S. T. Coleridge、Robert Southey 等人對於 Malthus《人口論》的批判(Winch, 1996:318-22; Connell, 2001: ch1)。在 1798 所發表的第一版《人口論》中，Malthus 批判了 William Godwin 與 Condorcet 樂觀的社會改良主義。Malthus(2008)指出，基於兩性的激情，人口幾乎每 25 年就會以幾何級數成長，但是，糧食的生產則是算數級數的方式增加，面對這兩種之間的必然失衡，人口的自然規律必然會抑制人口的成長，這種抑制方式就是貧困與罪惡，通常會透過失業、疾病、飢荒、瘟疫、戰爭等來展現。因此，對 Malthus 而言，貧困並非是社會制度的問題，而是人口自然規律的結果，而且，對於窮人的慈善救濟，不僅無助於他們狀況的改善，甚至只會使得人口問題急遽地惡化，更加深窮人的苦難。上述 Malthus 這種“通往地獄的道路乃是由善意鋪成的”的驚人言論(但是，在第二版時，Malthus 則開始承認道德改良對於人口問題改善的可能性)，不僅引來他所屬的宗教團體的批判(Malthus 本人具有牧師身份)(Hilton, 1988:73-9)，也遭來浪漫主義論者的挖苦與諷刺，Carlyle 甚至替政治經濟學冠上了“憂鬱科學”(dismal science)的名號(Levy, 2001)。

浪漫主義論者對於 Malthus 與其後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主要都是從道德與人性的角度出發。他們往往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缺乏對於社會道德改良的信念，缺乏對於人性具有教養、培育的可能性的認識。因而，他

們試圖從所謂“文化”(culture)問題的角度來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商業的辯護與對於社會問題的自由放任態度 (Connell, 2001)，因而開啟了著名的“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的爭議。根據 Williams 的說法(2003: 37-9, 81)，在古典時代，文明一詞指涉的是一種狀態與過程，總是與野蠻相對立。到了 19 世紀初，浪漫主義選擇用文化一詞，來對立於文明一詞，因而，文明一詞從原來具有禮儀、秩序的意涵，開始具有了負面的意義，意味著單調、刻板、機械化、自主性的喪失等等。而文化一詞，則是從原來耕作與照料的意思(cultivated)，逐漸被賦予了跟文明具有一樣意涵的意義(在古典時期)，而且，到了 19 世紀，也在浪漫主義者的手中，文化被用批判新興工業文明所具有的機械特質，批判其所具有的抽象理性與缺乏人性等特質。因而，在浪漫主義者對政治經濟學與商業社會的批判中，文化與文明的對張，也開始被賦予了精神發展與物質發展的對立意涵。

上述這種文化與文明的對立，最為清楚地表現在 Carlyle 於 1829 年在 “Edinburgh Review” 所發表的 “Signs of Times” 一文 (Williams, 1985:ch4; Fontana, 1985:175-6)。在該文裡，Carlyle 用所謂的機械時代 (the Mechanical Age) 來形容當時的商業社會。在他眼中，這是一個社會鉅變的時代，也是一個道德與人性淪喪的時代。他指出，機械化不僅掌握了人類外在與物質環境，也規約了人類內在與精神事務，人類開始對於個人的努力、自然的崇高力量失去了信念，一切都開始順應起機械化的安排。而且，他還進一步指出，政治經濟學不僅沒有妥善地處理社會財富的集中與貧富差距的擴大等問題，當他們自我抵銷的無為主義與自由放任主義感染了一般人的作為時，更是這一切慘事的本源。面對這樣的時代，Carlyle 認為不該感到沮喪與絕望，應該更堅守對於人性尊嚴與人類高貴歷史使命的信念。他指出，知識與教育正在打開最卑賤的人的眼睛、正在增加無數的思考心靈，因此，這個時代依然有著進度的動力，人類依然向更高貴的自由前進。

有趣的是，政治經濟學者甚少正面回應浪漫主義者這種道德與文化評論。即使論及這些批評，他們往往會認為這些評論根本是建立在對商業社會與政治經濟

學的錯誤知識之上(Langer, 1987)。然而，浪漫主義的批判，並不能說完全沒有效果。正是基於這些批判，沿著文化與文明對立的軸線，政治經濟學者不僅強化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學科自我定位，而且，為了挽救公眾可能因為上述的批判所導致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誤解，政治經濟學者(特別是 McCulloch)也試圖透過推廣教育來挽回政治經濟學的聲譽。於是，在 19 世紀，還出現了由 Jane Marcet 所著《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話》(*Conversa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 1824)與由 Harriet Martineau 所著《圖解政治經濟學》(*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4)兩本暢銷的政治經濟學一般普及讀物，來推銷政治經濟學的知識(Searle, 1998)。

(二) 社會問題的興起與政治經濟學的分裂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除了浪漫主義的批判外，政治經濟學也面臨著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所挑起的社會問題的挑戰。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在英國各大工業區都陸續暴發了工人砸毀機器的運動。於是，英政府被迫在 1812 年，訂立了懲治搗毀機器的相關法規(Frame Breaking Act 與 the Malicious Damage Act)，明訂破壞機器者將被處以重刑，甚至死刑。這些被冠以“盧德運動”(Luddite Movement)的工人暴動，不僅被認為象徵著工業革命中工人的身份從手工匠過渡到薪資工人，更被視為是英國工人階級意識與社會問題的起源(Thompson, 1963; Dean, 1991; Green, 1995 ; cf. Castel, 2003)。這場機器問題所引發的工人暴動，在當時不僅獲得公眾的注意，也引起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關注(Berg, 1980)。特別是在 Ricardo 生前所出最後一版(也就是 1821 年第三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中，Ricardo 甚至添入了“論機器”(On Machinery)一章，並改變了他先前認為機器的引進對所有人都有利的立場。在該章裡，他收回他之前認為機器的採用將不會改變勞動需求與工資水準的看法，並公開地承認用機器來取代人類勞動，是會導致失業問題的發生，因而對勞動階級具有極大的危害。因此，他認為，勞動階級認為機器的採用有損於他們利益的看法，並非基於成見與誤解，而是符合政治經濟學原理的。雖然，Ricardo

承認機器導致失業問題的存在，但是，他基本上還是認為，只要機器的使用是漸進而非突然被發明出來的，上述的問題應不致造成太大影響。但是，Ricardo 對於機器問題的最新見解(配合著他的勞動價值說)，終究為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分裂埋下了伏筆(Hollander, 1971)。

面對著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與工人階級生活慘況的改善問題，以及 Ricardo 的勞動價值說與機器論點所引發的爭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大致有了以下幾種回應方式。首先，延續著上一節所指出的文化與文明的對立，政治經濟學家們，切開了道德論述與科學論述的差異，抹去了原來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內在於政治經濟學的道德成分與意涵¹²⁶，以區分機器問題爭議背後的道德勸說與科學論證，並將許多社會問題歸諸於道德慈善事業，而把政治經濟學限縮於對財富生產的科學分析(Berg, 1980)。接著，在主流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家當中(如 James Mill、McCulloch、Nassau William Senior 等人)，則進一步結合 Bentham 的功利主義，一方面逐漸修正(如 McCulloch)或揚棄(如 Senior)勞動價值說，另一方面，則是以自由放任原則來進行大幅度社會改革 (特別是 1834 的新濟貧法的出現與 1815 年 -1846 年穀物法的爭議)(Kanth, 1986)。

其次，除了這種堅守原來自由主義的修正外，沿著科學主義與 Ricardo 修正主義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內部也出現了所謂社會主義轉向的風潮。在以 William Thompson、Thomas Hodgskin、John Gray、John Bray 等人為代表，被稱之為李嘉圖社會主義(Ricardian Socialism)的政治經濟學中，他們試圖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利用勞動價值說來證成工人應該獲得與全部商品價值相等的公平薪資的論點，並試圖賦予當時以 Robert Owen 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合作運動之政治經濟學科學基礎(Thompson, 1984, 1988, 1998)。

最後，上述的這種科學主義與政治經濟學內部分裂的趨勢，亦可以在後

¹²⁶ 有趣的是，這種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純化，也使得不少宗教人士試圖回到蘇格蘭啟蒙運動中更具神啟論色彩的政治經濟學傳統，來重新神學化政治經濟學(將神啟設計論與福音主義引入政治經濟學中)，並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是用來達成神學目的的一種手段。而且，到了今天，這個傳統無論在天主教，還是基督新教中都延續下來。關於這種神學化的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討論，請參考 Hilton(1988)。

Ricardo 時代最具權威的政治經濟學者 John Stuart Mill 的身上看到。在 Mill 的身上，不僅可以看到基於浪漫主義批判而對功利主義作出來的修正(cf. Mill, 2000)，亦可以看到他對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浪潮的回應。面對著社會問題與政治經濟學內部的分裂，Mill 一方面將政治經濟學視為一門關於財富生產的科學，並聲明政治經濟學只處理人性的一個側面：佔有財富的慾望，從而為對於人性其他面向的討論，留下了許多可能性與空間；另一方面，面對著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的興起，Mill(2008:320-338)承認社會主義對於現存在社會關於壟斷、商業詐欺等社會不公平的指控，但是，他也認為社會主義對於資本運作、自由競爭、當前社會的進步都存在著片面的理解，所推動的改革方案也缺乏科學的基礎。因此，他也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革或革命方案所可能遭遇的困難(特別是共產主義方案在效率方面所遭到的難題)。此外，在極具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一書中，Mill(1987)更對試圖彌合社會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他先區分出生產領域與分配領域的不同，認為前者屬於自然規律的領域，乃是政治經濟學的討論對象，而後者屬於社會制度的領域，涉及到不同制度設計的問題。因此，在這個區分上，政治經濟學不必然連結到自由放任原則，實際上，政治經濟學是可以跟任何制度設計結合的。基於此點，Mill 更進一步研究了各種財產制度。他試圖平衡地指出，共產主義(極端的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難題在於如何保障自由、避免對於個體性的壓抑並支持人性多樣化的發展，私有財產制則是在於如何避免過度且任意的不平等，以及如何避免財產權與契約自由的濫用(Mill 本人的立場是根據合作主義與利潤分享的精神來對於私有財產制進行改良) (Paul, 1979:155-160)。

總而言之，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的興起，的確在政治經濟學內部造成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裂。Mill 的妥協與讓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為了彌合這種古典政治經濟學內部的分裂趨勢。只是在這種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對抗中，我們似乎可以發現，不僅經濟領域從所謂政治領域分化開來(這是從古典時

期以來，經濟論述對於經濟領域具有獨立於君王意志的內在規則所不斷強調的，自由放任原則乃是最佳的展現)，甚至，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形成了一種錯位，政治問題開始被轉譯成財產體制問題與分配問題，因而，政治領域開始從屬於經濟領域(社會主義從財產與分配問題來討論政治制度，明顯地展現了這點)¹²⁷。

(三) 自由放任的實現與終結

上述政治經濟學內的社會主義轉向，可以說是 19 世紀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插曲，此學科的主旋律依然是由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所主導的(Mill 即便對社會主義有所同情，但原則上仍是一個自由主義論者)。在 1815-1870 年這個被歷史學家 E. Woodward(1962)稱之為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裡，自由放任原則基本上仍是政治經濟學者與功利主義論者進行社會改革的基本綱領(雖然在不同領域存在著不少保留與彈性)。這種由自由放任原則所主導的社會改革，最為清楚地表現在反穀物法的運動中。1836-46 年代，為了反對 1815 年由托利黨(Tory Party)所主導的，旨在保護地主與貴族利益的穀物法，Richard Cobden 與 John Bright 等人組成了所謂反穀物法聯盟(Anti-Corn Law League)。在這個聯盟裡，組成份子大多是製造業者、工廠主或商人，其主要的社會改革綱領正是所謂自由放任原則。這個總部設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被常被稱為曼徹斯特學派(the School of Manchester)的聯盟，甚至比古典政治經濟學者更毫無保留的支持所謂自由放任的政策。他們不僅反對穀物法對於地主與貴族利益的保護，他們也反對 19 世紀上半葉，旨在保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工廠法改革¹²⁸。這個在政界、公共輿論界與學界都有影響力的政治遊說聯盟，甚至在 1845 年愛爾蘭大飢荒剛爆發的背景下，說服了當時托利黨 Robert Peel 內閣，廢除了穀物法，改以自由貿易

¹²⁷ 從這個意義上說，Marx 的理論乃是這個發展趨勢的最高階段。在 Marx 的分析裡，歷史發展的未來，成就的並非是 Hegel 以國家為代表的絕對精神的開展，相反的，在未來的共產主義裡，國家僅僅作為簡單的生產管理機構而殘存下來，因而政治領域將徹底消亡(Dumont, 1977；Rosanvallon, 2004:ch8)。

¹²⁸ 古典政治經濟學者雖然大多支持自由放任原則，但是，他們普遍也都支持工廠法的改革(Blaug, 1958)。因此，曼徹斯特學派可以說是更為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

原則來應付這場大飢荒。因而，對於當時英國國內外的觀察者而言，曼徹斯特學派幾乎等同於自由放任的同義詞(Woodward, 1962:119-123)。

事實上，不僅是飢荒的問題，早在 1840 年代，自由放任原則已經引入愛爾蘭，試圖徹底地解決愛爾蘭的貧困問題。1838 年，在身兼政治經濟學者與都柏林地方主教身份 Richard Whately 的主導下，愛爾蘭實施具有自由放任精神的濟貧法改革(主要是移植英國 1834 年的新濟貧法改革)。此外，為了應付這場 1845 年爆發的飢荒，在農業與糧食的領域，也開始實施更激進的自由放任政策(Black, 1960)¹²⁹。只是，隨著大飢荒的惡化與加遽，在 1850 年代，上述的自由放任政策也開始遭到了質疑(這種質疑聲音甚至出現在愛爾蘭經濟學者中)。人們不僅對於穀物自由貿易提出了道德批判，甚至對於政治經濟學是否適用於愛爾蘭這塊與英國在自然與社會環境上極大差異的土地上，提出了根本的質疑(Koot, 1975；Boylan & Foley, 1992:ch6)。

類似於上述的批判，隨著 1870 年代開始，英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比較長的蕭條時期，無論是政客、學者還是公眾輿論普遍失去了 19 世紀中葉對於自由放任政策的信心(Searle, 1998:2)。而且，在此一時期，英國也出現了大量與社會福利有關的社會立法。這些似乎都意味著自由放任原則的衰退，甚至在主流經濟學者當中，也開始對於自由放任原則提出質疑。Mill 兩位弟子，John Elliot Cairnes 與 Henry Sidgwick 都會反對在公眾心中將政治經濟學與自由放任原則劃上等號的看法。他們都批判自由放任原則缺乏任何科學的根據，也不應該被視為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此外，在英國開啓經濟學邊際效用革命的 Williams Stanley Jevons、Philip Wicksteed、Alfred Marshall 等學者¹³⁰，在面對工會運動的興起與

¹²⁹ 根據 Black(1960)說法，Richard Whately 等人在愛爾蘭主導的自由放任政策，並不單純只是消極的不作為而已，而是試圖在相對落後與封閉的愛爾蘭，透過所謂自由放任的政策來打通愛爾蘭既有的關隘壁壘(如同前述 Adam Smith 在古典時期的倡導一樣)。

¹³⁰ 根據 Black et al. (1973)與 Howey(1999)等人的考察，嚴格來說，1870 年代的邊際效用革命，並不能稱得上是一場知識革命，無論是上述的英國學者與奧地利學派的 Carl Menger，事實上並不認為自己正在開啓一場革命，他們只是試圖結合古典體系與所謂的主觀價值說(Menger 則是認為自己跟德國舊歷史學派是一脈相承的)。只是，主觀價值說與邊際生產力概念的引入，卻也使得階級概念不再是合法的經濟分析範疇，勞動價值說與分配問題所帶出的階級對立意涵，因而消失於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視野中(Clarke, 1982:232)。

大量社會立法的出現，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更深刻理解上(透過當時對於大量對於窮人與工人生活狀況的社會調查)，也越來越接受政府對於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干預與管制¹³¹。他們都認為，政府干預與市場都是達到最大化社會福利的一種手段，市場不必然具有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效果，政府的干預也不存在任何先驗原則的限制，至於何者是較佳的手段，則必須就具體的個案來分析(他們原則上都普遍歡迎當時的社會福利改革法案)(Paul, 1979)。

毋庸置疑的，上述這種對於自由放任原則的懷疑與對於政府干預的歡迎，到了 20 世紀 J. M. Keynes 手中達到了最高峰。在 1926 年發表的〈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一文中，Keynes(2004)不僅清楚地回顧了自由放任原則形成的思想史過程，他也對於此原則的理論基礎提出了質疑。基本上，Keynes 認為自由放任原理固然有其 18 世紀的思想根源與歷史背景，但是，19 世紀自由放任原則在公眾心中取得勝利，乃是由於曼徹斯特學派、功利主義、二流經濟學權威與不良的經濟學普及讀物(主要是指 Marcer 與 Martineau 的著作)的鼓譟而來的，在主流經濟學權威(特別指的是 Malthus 與 J. S. Mill)的科學理論中，事實上得不出自由放任這樣的結論。此外，他也指出，保守主義、共產主義的負面形象與商人對於自由放任原則的推波助瀾，也強化了自由放任主義的聲譽與權威。他更指出，自由放任主義所立基的個人主義與利益和諧的兩個原理，乃是不切實際與缺乏根據的。因此，他進一步主張，當前經濟學的任務並不在於如何捍衛自由放任原則，重新限縮政府的干預，而在於重新將政府的任務與非任務區分開來。對他而言，當前政府任務在於去完成那些個人無法承擔的工作，以矯正資本主義可能的內在缺失，例如，加強對於貨幣與信用的管制、加強對於大企業的監控(並透過公布這些訊息引導公眾監督與投資決策)、在國內的投資與儲蓄之間形成進行協調、制訂與人口規模與品質有關的社會政策。

¹³¹由於 Jevons、Wicksteed、Marshall 等人堅守所謂的科學立場，因此，對於政府管制的態度，較少流露於他們較一般性的經濟學理論著作中，比較常出現在他們屬於應用經濟學與實際議題討論的部分。關於他們的立場，請參考 Jevons(2001)、Wicksteed(1967)、Marshall(1969)、Marshall & Pigou(1956)。

總而言之，在 19 世紀末的社會立法浪潮與對自由放任的懷疑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市場失靈的看法在形成中，市場不但不再是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解答，相反的，市場本身成為了問題。因此，在這個基礎上，經濟論述開始改變對於政府干預的態度。於是，透過重新布置政府的任務，利用政府的干預與管制來解決市場失靈與社會問題，已成為當時經濟學任務的關心所在，因而管制問題也成為了當時經濟治理術的基本關懷。

四、先進自由主義時期市場機制的重建與發明

在上述的討論裡，我們已經指出，雖然以市場自由放任原則為核心的經濟自由主義，其誕生地主要在英國，但是，到了 19 世紀末，對於自由放任的懷疑與對於政府管制的歡迎，已成為英國許多經濟學家的基本立場。有趣的是，正當自由放任原則在英國經濟學內部已經走向死亡(特別是表現在 Keynes 經濟學的出現)，對於自律市場的信心也開始在經濟學內悄悄地重建。只是，這一次，英國經濟學卻必須從德語世界中，進口本來土生土長的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在德語世界的重建，主要的時間在 1920-30 年代，代表學派有兩個：一個是常常以秩序自由主義為名的弗萊堡學派；另一個則是較為知名的奧地利學派(這一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是 Ludwig von Mises 與 Hayek)。弗萊堡學派主要成長於納粹德國，並積極介入二戰後西德經濟的重建。奧地利學派則是在此一時期，由 Mises 挑起對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批判(Hayek 延續了此辯論，並轉介進英語世界當中)。這兩個學派都代表了一種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興起，一種對於市場機制的重新定位。而且，這種治理術更在 1970 年代凱因斯經濟學垮台後，於芝加哥學派的手中，達到了最高峰(Mirowski & Plehwe, 2009)。因此，底下我們將先由弗萊堡學派談起，並回顧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之辯，以及芝加哥學派的相關論述，來討論當代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重建。

(一) 秩序自由主義--弗萊堡學派

所謂的弗萊堡學派，指的是圍繞 Walter Eucken 所組織起來的一個學術團體(成員也大多與弗萊堡大學有關係，故以此為名)¹³²。此學派成長於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因而，對於國家的恐懼，以及重新思考國家之於經濟秩序的功能與正當性成為該學派的主要核心關懷。在 1948 年，由 Ludwig Erhard(他是西德首任經濟部長，並被稱為西德經濟奇蹟之父)所召集，並由 Eucken、Böhm、Mikscha、Müller-Armack 等人所主導的西德經濟管理部門的專家會議中，弗萊堡學派的成員引導該會議作出了有別於當時馬歇爾計畫(以凱因斯干預主義為核心)的重建原則。在該重建原則裡(此原則後來成為 Erhard 的施政綱領)，他們明確地主張要重建市場經濟，解除對於市場價格的干預，並把經濟從國家的干預中解放出來。而且，他們也主張，對於國家的重建，要避免無政府與暴民狀態的產生，必須將以人民為名的統治，建立在公民的自由基礎上，並明確化國家管制的範圍與界線。因此，對於弗萊堡學派而言，戰後西德重建的關鍵在於，如何以經濟自由作為正當性的基礎來重建國家，並且，約束國家對於其自身正當性基礎的戕害(Foucault, 2008:80-84)。

上述這種弗萊堡學派對於經濟秩序重建的思考，並非只是簡單為了因應戰後重建需求而產生的。事實上，早在 1936 年，由 Eucken、Böhm、Großmann-Doerth 所發表了名為一篇名為“我們的任務”(Unsere Aufgabe)的文章，就已經展現出來(因而，這篇文章常被當作是弗萊堡學派或者是西德秩序自由主義的宣言)¹³³。然而，這樣對於經濟秩序的思考，在當時的德國則面臨著幾個有待克服的思想與現實的障礙：一、源自於 Friedrich List 並在歷史學派保留下來的貿易保護主義；二、

¹³² 這個學派其他代表人物還有 Franz Böhm、Hans Großmann-Doerth、Edith Eucken-Erdsieck、Hans Gestrich、Friedrich Lutz、Karl Friedrich Maier、Fritz Meyer、Leonhard Miksch 等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Wilhelm Röpke, Alfred Müller-Armack 與 Alexander Rüstow 等三人，雖然嚴格來說不屬於這個學派，但是，他們都跟這個學術團體關係甚為密切，並且一起共同參與了二戰後西德經濟的重建。

¹³³ 該文後來被英譯，並更名為“The Ordo Manifesto of 1936 ”，收錄於 Peacock & Willgerodt (1989)。

由俾斯麥所打造的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三、兩次世界大戰所經歷的計畫經濟的效果與經驗；四、凱因斯干預主義在當時國際的盛行。五、納粹所顯示的關於國家主義與原子化大眾社會的弊病(Foucault, 2008:107-114)。因此，在面對這些難題上，弗萊堡學派展開了他們對於經濟秩序重建的思考。

在弗萊堡學派的相關討論裡，一個極具關鍵的特色在於，他們並不相信所謂自由放任的原則。他們認為，市場經濟的特性並不在於傳統經濟論述所認為的交換(特別是在商業意義上的市場交易)，而是在於競爭。因此，從競爭出發來定位市場經濟，根本無法得出所謂自由放任原則的結論。對他們而言，競爭的本質並非是一種自然現象，並非是基於人類本能、慾望、交易動機的行為結果，而是一種形式化的規則，有其內在的邏輯。因此，基於競爭作為一種形式化的規則，自然不可能、也無法得出任何關於自由放任的結論(Foucault, 2008:118-120)¹³⁴。

從這種的思考出發，弗萊堡學派的學者得出三項重要的經濟秩序重建的重要見解(Foucault, 2008: 133-145)：一、有別於傳統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壟斷的趨勢(Marx 與 Keynes 都這樣認為)，弗萊堡學派認為，壟斷根本上就不是經濟活動自發形成的，事實上，無論從歷史、還是政策來看，壟斷乃是對於市場經濟過程不當地人為干預所產生的。他們更指出，雖然歷史的發展存在的資本集中化的現象，但是，集中化不必然導致壟斷，即便出現短期的壟斷，市場內在的競爭機制，也會使得此一現象難以長存。因此，對於他們而言，當前經濟重建的關鍵不在於透過政府干預來解除壟斷，而在於設計適當的法律與制度規則，來避免外部活動的介入而產生壟斷。

二、針對政府干預行為，Eucken 等人也重新作出了界定。他們認為，面對市場經濟，國家有兩項作為可以實施，一個是管制行動(regulatory actions)，另一個則是協調性的組織行動(organizing actions)。針對管制行動，他們指出，政府的

¹³⁴ 根據 Foucault 的說法，弗萊堡學派對於競爭本質與內在邏輯的討論，受到了 Husserl 的現象學方法的影響，因而反對傳統經濟論述立基於“樸素的自然主義”(naïve naturalism)對於市場的相關立場。因此，他們試圖利用現象學的方法，從市場的特徵中抽象出基本原理，並形構其秩序的純粹狀態。

管制措施，首要目標在於維持價格的穩定，但是，不能直接針對經濟過程進行物價干預(如限定價格)，而應該針對市場的條件進行干預(例如利用貨幣供給控制通膨)。針對組織行動，他們則是指出，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作為，還有很大一部份在於政府可以改善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改善市場經濟得以運行的背景框架(framework)。他們指出，政府可以通過人口、技術、教育、法律等非經濟因素，來重建或改善市場經濟秩序(當時，一個重要的例子乃是創造農業的市場化)。

三、針對方興未艾的福利國家政策，弗萊堡學派認為，不能把社會政策當作是一種對於市場經濟運作結果的補償或者矯正。他們指出，市場基本上就是強調多元、差異的(這是競爭的前提)，因而均等化的政策都是有害市場經濟的協調機制。社會政策所能作的，僅僅在於保障一般人最低的生活需要。至於，個人在市場經濟中所遭遇到的風險，則應該提高個人的收入，由其儲蓄與個人保險來應付。因此，對他們而言，社會政策的重點並不在於風險的社會化與再分配，也不在於保證一般人購買力而提升有效需求，而在於透過不斷地經濟成長來提高個人對抗風險的能力¹³⁵。

換言之，在弗萊堡學派的秩序自由主義思考中，我們似乎可以發現，他們基於對於市場特徵的現象學還原，使得他們以競爭來界定市場，形構了一種競爭性經濟秩序的純粹狀態。這不僅使得他們用競爭取代了交易，從而避免了自由放任原則所引發的諸多爭議（無論就道德問題上、還是分配問題上），而且，在他們所謂的競爭性經濟秩序的討論裡，市場不再是從社會層層的包圍中分化出來，反而是對於社會秩序的重建，都必須圍繞著市場來展開，政府也不再是基於市場的問題而進行干預，而是為了市場的實現來進行干預。因此，在弗萊堡學派的競爭性秩序原理當中，我們不僅看到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重建，市場觀念所具有的烏托邦與規範性色彩，也明顯地顯露了出來。

(二) 社會主義計算之辯

¹³⁵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社會政策原則，並沒有在戰後西德實施。

二戰期間對於自由主義治理術的重建，除了弗萊堡學派外，尚有知名的奧地利學派(此時，主要的領導者乃是 Mises)。只是，奧地利學派對於經濟治理術的重建，並不是透過對於經建政策影響而產生的，而是透過對於當時相當盛行的社會主義經建方案進行批判，來鋪陳出他們對於市場治理的想法(意即所謂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之辯)。在一次大戰後，由於蘇聯革命的成功，以及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地國的垮台，一時之間，各種社會主義方案在德語世界中大行其道。在這樣的背景下，1920 年，Mises 發表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一文¹³⁶，對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展開了批判¹³⁷。在該文裡，Mises 對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主要批評，在於他認為，當一切生產的物品都收歸國有，即不存在產品市場，產品的價格將無從決定，貨幣也失去了意義。在這樣一個缺乏價格機制的體制下，理性經濟計算將是不可能的，那麼社會主義國家該如何進行有效率的經濟計算與管理，將成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永遠無法解決的難題。簡言之，Mises 認為，沒有自由市場，就沒有價格機制，沒有價格機制，就沒有經濟計算，因此，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從根本上就是不可實行的(Caldwell, 1997:1858)。

上述 Mises 的批判，隨著 1935 年，Hayek 在英國出版了《集體主義經濟計畫：對於社會主義可行性的批判性研究》(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一書，因而在英語世界引發了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之辯¹³⁸。在辯論的第一個階段，F. M. Taylor(1929)、W. C. Roper(1931)與 H. D. Dickinson(1933)等人，試著從經濟理論上來回應 Mises 的質疑。Dickinson

¹³⁶ 該文後被 Hayek 翻譯成英文，收錄於 Hayek(1935)。

¹³⁷ 值得注意的是，事實上，在此一時期的各種社會主義論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對於共產主義內的經濟體制該如何操作，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這一點構成了 Mises 批判的力道所在(Lavoie, 1985:20)。根據 Hayek(1949:141-5)的說法，對此一問題提出解答的，乃是 Otto Neurath。在 1919 年的著作裡，透過戰時經濟的經驗，Neurath 指出，對於商品供給的管理，可以不顧價格因素，以及對於經濟的理性計算，可以立基於實物而非價值單位的基礎上來進行估量。Neurath 的論點，構成了 Mises 展開批判的主要對象。

¹³⁸ 根據 Hayek(1949:145)的說法，在德語世界中，社會主義者對於 Mises 的回應，往往只是針對 Mises 的措辭而來，並沒有辦法駁倒他的批判。要不然就是在承認 Mises 批判是有效的前提下，嘗試著建構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或者試圖引入競爭機制於社會主義中，只是，這些設想有多大可行性仍是值得懷疑的。

等人試圖指出，在人們具有理性與全知的假設下，任何經濟體系的生產與資源配置的問題，都可以用 Walras 一般均衡的聯立方程式來表示(資源配置的問題，就是求取此一聯立方程式的解)，因此，從理論觀點來看，資本主義體制與社會主義體制是一樣的。資本主義體制固然可以用市場價格摸索來尋找此一方程式的解，在社會主義體制，則是可以由計畫當局來透過試誤過程(try and error)來求解(Caldwell, 1997:1860; Lavoie, 1985)¹³⁹。針對這些回應，Hayek(1949:153-8)則試圖點明，在社會主義下，這種求解過程所可能遭遇的困難。他指出，設立這種方程式與求解過程所需要的訊息與知識，乃是不可想像的龐大，不可能集中於中央計畫當局的少數人手中，因而缺乏任何的可實行性。此外，Hayek 更指出，即便社會主義引入了具有試誤性質的計畫性價格機制，但是，這種機制無法像競爭性自由市場那樣，靈敏地對於供求變化作出自動調節。而且，他也指出，社會主義方案還存在著企業經理人對於風險承擔、創新與投資之激勵難題。因此，Hayek 認為，雖然計畫經濟在理論上可行，但是在實際上並不可行，而且，即便承認其可行，表現也無法及於競爭性自由市場。

上述 Hayek 在第一階段的批判，引來了 Oskar R. Lange(他是波蘭的流亡者，後來也回到波蘭，擔任政府要角)的回應，辯論進入了第二階段。在 Lange(1936, 1937)的回應裡，他首先反駁 Mises 的批判。他同意 Mises 所言，價格對於經濟計算的形成的重要性，但是，Mises 却錯誤地以為只有市場才存在價格。Lange 指出，在社會主義裡，計畫當局是可以提供物品的會計價格，來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決策參考，因此，經濟計算是可能的。此外，為了回應 Hayek 計畫經濟不具有與競爭性市場相同效率的論點，Lange 則延續了 Dickinson 等人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具有理論形式上的相似性論點(Lavoie, 1985:118-124)。基於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Lange 試圖指出，只要中央計畫當局給出任一物品的臨時價格，並要求企業經理人根據這些價格，實施成本最小、利潤極大化的生

¹³⁹ 值得提醒的是，這種用 Walras 一般均衡分析來為計畫經濟辯護，並不是 Dickinson 所首創的。事實上，Walras 本人就提出過類似的嘗試，試圖用一般均衡分析來為社會主義奠立科學基礎(Hodgson, 1999: 31)。

產要素組合，通過不斷地摸索試誤，以及對於產業規模的調整，計畫經濟終究會找到正確的會計價格，並且表現的競爭性市場一樣良好。至於，所謂的激勵問題，Lange 則承認此一問題的存在，但是，他認為真正問題在於科層組織的僵化。而且，他更指出，科層組織的僵化並非是社會主義特有的，事實上，資本主義體制也很難擺脫此一問題(Caldwell, 1997:161-3)。針對 Lange 的回應，Hayek(1949:ch9)則指出，Dickinson 與 Lange 等人的回應，乃是將競爭引入社會主義當中，只是不把價格交給市場決定，而是由中央權力機構來安排，因而他們的辯護，實際上承認競爭的重要性。但是，他們的試誤解決辦法，雖然具有理論可能性，但是，依然缺乏現實的可行性。此外，Hayek 也指出，他們這種想法，顯然地受到了完全競爭市場之靜態性均衡觀念的誤導，忽視了現實世界中持續地變化才是真正的鐵律。這種靜態的均衡觀念，使得他們誤以為最終狀態已經達到，因此，生產最佳組合與方法就成了已知。這不僅忽視了最佳生產方法的知識發現過程，也忽視了價格機制對於此過程所起的引導作用。因此，對 Hayek 而言，Lange 等人雖試圖引入競爭於計畫經濟中，但是，實際上，他們並不了解市場作為一種競爭過程的真正意義。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奧地利學派的立場，非常接近弗萊堡學派從競爭對於市場觀念所做的重新界定(這一點在 Hayek 身上最為明顯)¹⁴⁰。Lange 等人則是站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的立場，試圖為計畫經濟奠立理論基礎。有趣的是，雖然從現在的觀點來看，Hayek 似乎已經對於 Lange 等人的論點作出強而有力的反駁，而且，他稍後也發展了對於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分析的批判，並強化他關於市場作為競爭過程、作為知識發現過程的論點。但是，在此辯論完之後，大多數的新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Lange 所處的一方贏得了這場辯論，至少，從新古典經濟的框架上來看，Lange 等人的理論是具有理論

¹⁴⁰ 事實上，Hayek 本人與弗萊堡學派成員都算熟識，他的整體社會理論著作，更可以說是秩序自由主義最為完整的理論表述。Hayek 在其 1962 年弗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講中，不僅公開地推崇弗萊堡學派的知識成就，他甚至清楚地表明，他與 Eucken 在知識立場與政治立場上的親近性(Ebenstein, 2001:241)。

上的可能性的(至於，實際上的可行性問題，只要有大型計算機就可以解決)(Lavoie, 1985:10-20)¹⁴¹。然而，無論是哪一方取得勝利，這場辯論都意味著市場的絕對化傾向已經露出了苗頭。一方面，基於這場辯論，Hayek 固然開啓了他從經濟學到社會理論的轉折，因而完善了秩序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對於市場觀念的重建，仍然避免不了將市場本質化的問題¹⁴²。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對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辯護，則清楚地展現了市場絕對化所導致的錯置，一種由完全競爭市場的靜態均衡觀念所導致理論框架的錯置(這一點特別清楚地表現在以一般均衡分析來展現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理論形式上的相似性)。

(三) 新自由主義的當代旗手--芝加哥學派

如前所述，在英語世界當中，主流經濟學自 19 世紀末開始，就越來越傾向於支持政府干預。而且，這種傾向，更是在 Keynes 的手中，達到了最高峰。因此，移民到英語世界的奧地利學派，在此時，只能在凱因斯經濟學知識霸權的打壓中，漸漸積蓄自己的力量。Hayek 於 1947 年成立了一個以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為核心的學術團體，即著名的朝聖山協會(the Mont Pelerin Society)，試圖集結有志於古典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理念的仁人志士，在集體主義大行其道的氛圍下，為自由主義保存火種¹⁴³。正是在這個學術團體裡，弗萊堡學派、奧地利學派與芝

¹⁴¹ 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分析工具，特別是 Wassily Leontief 基於一般均衡理論所發展出來的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都對於當時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造成很大的影響，而且東歐的經濟學者跟美國的經濟學家也存在著交流與互動，本身就是蘇聯人的 Leontief 與波蘭人的 Lange 更在這些交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Bockman & Eyal, 2002)。因此，在辯論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新古典經濟學者都認為所謂 Hayek 所認為的現實上不可行的問題，根本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知識工具確實正在東歐實踐著。一直到 1980-90 年代，隨著 Don Lavoie(1981, 1985)對於此辯論的重新評估，以及 1989 年共產主義體制的瓦解，人們才開始認為應該是奧地利學派贏得了這場辯論(Stiglitz, 1994)。

¹⁴² 關於這一點，在第二章討論 Hayek 的社會理論時，就已經指出。事實上，這種本質化的傾向，在弗萊堡學派那裡就已經展現出來。

¹⁴³ 朝聖山協會本身主要是一個學術性團體，對於實際經濟政策沒有直接的影響力。但是，透過該社會員 Antony Fisher 在 1955 所成立的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EA)(這是在 Hayek 的鼓勵下成立的)，朝聖山協會的理念，則開始影響了英國的政策。IEA 也成為柴契爾夫人經濟政策背後的最重要的智囊團(Cockett, 1994: ch 4, ch5)。1981 年，Fisher 更在美國成立“亞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The 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更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主要是透過協助全球各種新自由主義智庫的設立)(Cockett, 1994:ch7； Mirowski & Plehwe, 2009)。

加哥學派產生了密切的交集與互動¹⁴⁴，因而，新自由主義的火種，就傳遞到芝加哥學派的手中(cf. Cockett, 1994: ch 3; Mirowski & Plehwe, 2009)¹⁴⁵。

如同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在 1970 年代，由於福利國家的危機與停滯性膨脹的出現，傳統凱因斯主義干預主義(或者，用 Harvey 說法乃是鑲嵌自由主義)遇到了理論上與實務上的危機。並且，隨著美國雷根總統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義一躍成為 1980 年代極具主導性的政策思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被動員起來，為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背書。

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到了芝加哥學派手中，除了保有弗萊堡學派、奧地利學派對於競爭性秩序原理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強調外，更有了新的發展與特色。首先，(去)管制問題已成為此時治理術的核心關懷。由於新自由主義是福利國家的危機中登上歷史的舞台，因此，如何拆解福利國家，以成為當時的政策與理論思考的重心，因此，去管制、私有化已成為此時司空見慣的改革(Harvey, 2005:3)。在可被視為芝加哥學派治理術宣言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裡，Friedman(2002[1960]:35-6)甚至洋洋灑灑地列出了美國政府十四項的不當作為(這些作為基本上應該廢除或者透過私人來經營)。因此，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市場的治理術並不是在於重建市場經濟秩序，也不是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國有化與社會化政策，而是在將政府的干預標記為問題的根源，透過所謂去管制與私有化的政策來釋放市場的力量。換言之，在傳統經濟的領域裡，芝加哥學派的市場治理術的特色，並不在於形構一個新的可治理對象與方法，而在於將“治理”本身作為治理術的對象，形成一種對於治理的(去)治理。

其次，市場的治理術已經開始運用到非經濟的領域。在 Friedman 的宣言裡，

¹⁴⁴Eucken 與 Röpke 都是這個學會的成員，Mises 與 Hayek 也是理所當然的會員。至於，出席 1947 年第一次聚會的芝加哥學派成員，則有 Frank Knight、Aaron Director、George Stigler、Milton Friedman。至於，芝加哥學派著名的後續代表人物如 James Buchanan 與 Gary Becker 也都加入了此協會。

¹⁴⁵ 這裡必須提醒，芝加哥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在許多知識立場上具有著極大的差異。其中，最為關鍵的乃是研究方法上的差異。芝加哥學派更傾向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數理推導與定量分析，但是，奧地利學派則是採取主觀主義立場，反對數學與統計方法在經濟學的運用，而且，也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靜態的均衡分析。此外，這兩個學派在貨幣理論、景氣循環理論等總觀經濟學理論上，都有著極大的差異。關於這兩派的差異與比較，請參考 Skousen (2005)。

他清楚地表明，應該將鬆綁與私有化政策運用到初等與中等教育的公立學校改革中。他認為，應該增加私校的數量，並把政府對公立學校的補貼，以憑證的方式發給那些想選擇私立學校的家長。如此一來，將可以於教育體系中引入競爭機制，使家長作為支付教育費用的消費者，得以具有更多選擇的自由，也使得教育的供給必須考量消費者的意見。後來，Friedman 更設計出所謂教育券計畫來具體化教育市場的改革(Friedman & Friedman, 1980:ch6)¹⁴⁶。

最後，這種市場原則在非經濟領域的運用，甚至在 Becker 手中走向極致。Becker(1976)不僅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廣泛地運用到歧視、家庭、犯罪等傳統非經濟的領域，形成了著名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他(1993)甚至進一步建議，基於犯罪人是理性的，以及人類對於金錢誘因的敏感性，應該利用罰金來取代傳統的監禁刑罰，如此一來，透過犯罪價格機制的運作，將可以達到犯罪的最適化配置，長期而言，可以降低犯罪率。因此，在 Becker 的手中，社會問題不再構成政府對於市場進行干預的正當理由，相反的，市場機制已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類似的例子也可以在離婚率、毒品、環境保護等問題上操作)。

簡言之，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去)管制問題已取代了當代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核心。而且，在治理術的操作上，市場經濟不僅可用處理經濟領域的問題，甚至，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解答。因而，在結合新古典經濟學與競爭性秩序原理的芝加哥學派身上，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市場觀念的本質化傾向(市場本質就是競爭，因而可以用於非經濟領域)，市場的絕對化所導致的理論框架的混淆與錯置(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對於市場制度架構的撤銷)，也清楚地顯露出來。

¹⁴⁶ 根據 Naomi Klein(2009)的說法，在 2005 年的卡崔娜颶風之後，美國政府在右派智庫人士的影響下，接受了 Friedman 的建議，對於風災後學校的重建，實施了私有化與教育券的改革。許多右派人士因而讚許卡崔娜颶風實現了多年來未能完成的公立學校體系的改革。Klein 將這種趁著災難對於公共領域進行私人掠奪，以及以災難來打開市場改革機會的心態，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與震盪教義(shock doctrine)。她並指出，這種新自由主義震盪療法的創始人正是 Friedman。

五、結論

在上述的討論裡，我們主要回顧了從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到先進自由主義三個時期，關於市場的問題與其治理術的相關轉折。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市場觀念乃是跟商業社會的倫理問題關連在一起。此時，市場的治理術主要是透過自由放任原則來掃除傳統舊秩序的關隘壁壘，因而具有積極與批判性的意涵。只是。這種治理術，依然避免不了文明腐敗的憂慮，以及民眾道德經濟學的對抗。

在社會自由主義時期，市場的經濟問題經歷了文化問題與社會問題的轉折。通過浪漫主義所發起的文化與文明對抗，古典政治經濟學強化自身的專業化與科學化的傾向，自由放任原則也逐漸地成為一種口號與教條。受到來自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的挑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僅在內部產生了分裂，也對於自由放任原則產生了懷疑，市場似乎不再作為問題的解答。反的，市場似乎就是問題本身。因而，到了 19 世紀末，基於科學主義的立場，新古典經濟學體系開始與市場原則脫勾，經濟學家不僅歡迎政府的干預，甚至歌頌著自由放任原則的終結。

在先進的自由主義時期，弗萊堡學派、奧地利學派都從競爭概念出發，來重新定位市場秩序的原理，以避免自由放任原則所引發的爭議與懷疑。他們不僅試圖以市場為核心來安排社會的重建與政府的治理，也試圖以競爭性市場秩序來批判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此外，在奧地利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社會主義計算的辯論中，市場的絕對化已經清楚展露了跡象。一方面，Hayek 關於競爭性市場秩序原理的討論，有著將市場本質化的傾向；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所強調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理論形式上的相似性，也清楚地展現了市場絕對化所導致的錯置。而且，當芝加哥學派站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接過了新自由主義的旗幟時，經濟治理的重心，已不再是市場秩序的重建，而是以政府的不當治理為治理對象。他們甚至試圖在傳統屬於非經濟的領域裡，透過市場機制的發明來解決該領域的社會問題。因此，在芝加哥學派身上，我們似乎可以看見市場的本質化與

絕對化的一種結合(這兩者都共同地撤銷了市場所原有的集市交易的意象，以及對於市場制度框架的討論)。

回到市場作為經濟現代性的社會想像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市場觀念乃基於商業交易而發展出來的，古典經濟論述對於商業領域內在自然律則的形構，使得市場觀念自始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烏托邦與規範性的色彩，自由放任原則乃是實現此一烏托邦的主要工具(民眾道德經濟學對於穀物自由貿易的抗議，清楚展現了這一點)。19世紀中，對於市場社會諸多對立的詮釋，不僅強化了對於市場烏托邦屬性的掩蓋(特別在所謂政治經濟學科學化與專業化的發展上)，而且也導致了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錯位，人們不僅從分化的觀點來理解市場觀念的產生，而且，更進一步以經濟為基礎，使得政治領域從屬於經濟領域(這是基於政治問題乃是分配問題的定位)。19世紀中末，隨著自由放任原則的實踐所引發的諸多質疑，市場已經不再是問題的解答，反而成為了問題的所在。於是，經濟學者開始試著將自由放任原則與將經濟理論脫勾，因而引發了兩種關於市場觀念的知識變革。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基於科學的學科定位，將經濟學理論框架與市場經濟脫勾，使得經濟分析不僅可以用來分析市場經濟體制，也可以用來證明政府干預與社會主義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然而，經濟理論與市場經濟的脫勾，帶來的並不是經濟論述的科學化、去意識型態化。相反的，其所展現的乃是絕對化市場所產生的理論框架的錯置。另一方面，弗萊堡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則試圖在對於自由放任的普遍質疑中，對於市場作出重新的定位。他們不僅透過對於市場的本質與純粹狀態的討論，以“競爭”來取代原有的交換概念，從而避免了自由放任原則的爭議，更試圖使市場機制成為整體社會生活安排的基本原則(社會的重組與政府的干預都要為了市場的實現)。只是，在這樣的過程裡，秩序自由主義卻有著對於市場本質化的傾向。這種傾向既強化，同時也掩蓋了市場觀念所具有的烏托邦與規範性色彩。因此，當芝加哥學派試圖結合了新古典經濟學與競爭性市場原理時，市場絕對化所導致的錯置與混淆，就在他們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綱領中，清楚地展現了出來。簡言之，從古典時期到當代，市

場觀念正是在這些關於市場問題與治理術的爭議與轉折中，逐漸地走向了去歷史化、本質化與絕對化的發展。





第六章 市場的知識政治

一、導言

在前面的章節裡，我們主要是透過市場觀念的演進，來討論市場觀念是如何走向絕對化的發展。於本章，我們將改變視角，試著從經濟科學本身的演變來回答市場觀念是如何走向絕對化的發展。正如同我們在導言中所指出的，現代性打從誕生以來，就跟社會科學具有著糾結纏繞的關係。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市場觀念與經濟科學的關係裡。然而，要處理經濟科學的演進與市場絕對化發展之間的關係，其中主要的關鍵，在於從知識政治與象徵鬥爭的角度來定位學科的演進史。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於經濟科學演進的處理，我們主要關心的並不是具體理論之間的差異與變化，而是關於體系之間的區隔、學科性質的爭議與方法論上的辯論。

對於理論體系、學科性質與方法論的爭議之考察，其所意涵的並不是根據特定科學哲學或知識論所設立的真理標準，來對於不同理論進行真／假之間的辨別。而是將知識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學術爭議，視為是一種學術場域內的象徵鬥爭，一種試圖在學術場域中取得支配地位、遊戲規則的制訂權、真理代言權與判定權的象徵鬥爭。而且，此一象徵鬥爭，不僅會導致場域內正統與異端的分化(基於這兩者共享的某些理所當然的前提)，也會產生一種知識操作程序與儀式的建立（主要是用來決定什麼是真正當性的知識與維護場域結構的再生產）。因此，在這樣的爭議與鬥爭過程中，不同理論體系的區辨，不僅有助於不同學派之自我知識立場的確立，也會強化其內部成員的認同。方法論上的爭議，則是有助於設立某種知識操作程序與儀式，來決定什麼是合理且正當的提問與正確。

體系之間的區隔、學科性質的爭議與方法論上的辯論，不必然保證某一學科知識的有效積累，甚至往往只會阻礙不同學派之間的相互理解，強化了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但是，正是基於這些誤解與對立，使我們得以從學科史與論述史的角度來觀察，在特定關鍵時期裡，某些特殊知識心態的形成，以及這些知識心

態如何去動員場域內外的資源來進行知識政治的象徵鬥爭。這些知識心態與資源動員，不僅涉及了具體的人員與物資的聚集，更涉及了象徵面向的操作。這些象徵面向的操作，往往涉及了對於學科外部特定象徵權力的援引(如國家的正當性給予、其他學科成功典範的模仿、某些公認的真理判準的引入)，以及學科內部論述傳統的片面性的挪用與(再)發明。

因此，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或許可以考察，經濟學此一學科的演進過程中，理論體系的區隔、學科性質的界定與方法論上的爭議，如何有助於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準此，底下的討論，我們主要分為五個部分：首先，我們將從古典時期，Adam Smith 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化談起。我將指出，Adam Smith 如何在區隔於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過程中，使政治經濟學從原來國家理性之學，徹底地轉變到立法者的科學。這樣的轉變，事實上也確立了市場觀念所具有的自然律則的地位。其次，我將討論 19 世紀初 Ricardo 與 Malthus 對於政治經濟學所採取的不同方法論立場的爭議，以及 J. S. Mill 對於 Ricardo 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捍衛。Ricardo 政治經濟學體系所採取的抽象演繹方法，的確在政治經濟學內部引發了一場關於學科性質與方法論的爭議。為了回應對於 Ricardo 體系的批判，Mill 則試圖透過幾何學的類比來賦予抽象演繹方法的正當性基礎。然而，正是在這種幾何學的類比中，市場的相關法則逐漸取得了先驗律則的定位。此外，受到 Auguste Comte 的影響，Mill 也開始修正他的立場的。在 Mill 的修正裡，他開始承認政治經濟學的律則所具有的歷史相對性，同時，也開始重視歷史演化方法的重要性。只是，在這種歷史思維與方法的復甦過程中，不僅使得市場觀念逐漸展現了一種“相對性的絕對化”，也為後來的經濟學方法論大戰埋下了伏筆。接著，我將討論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發生在英國與德國的方法論大辯論。這兩場辯論，不僅強化了主流經濟學往數理化方向的發展，而且，也此一過程中，經濟學此一學科逐漸揚棄了歷史特定性的問題，因而，市場的觀念也逐漸地走向了絕對化的發展趨勢。最後，我將焦點集中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經濟學內。在此一時期，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知識霸權地位的取得(相對於所謂的舊制度經濟學)，經濟學逐

漸地走向形式主義革命。因而，市場的制度、歷史與社會背景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地空洞化，最終導致了絕對化市場觀念的成形。

二、從國家理性之學到立法者的科學

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只有到了 17 世紀的重商主義手中，經濟論述才逐漸擺脫了宗教、倫理與法律的層層束縛，取得一定自主性的地位。同時，也在這個過程裡，經濟的概念逐漸從傳統家計的意義，轉變到具現代意義上的經濟秩序意涵。儘管，在重商主義的論述裡，經濟領域所具有的自主性逐漸地被形構了出來，但是，重商主義論者基本上仍是以君王的謀士來自我定位(而非學術取向的學者定位)。因此，此一時期的經濟論述，並不具有現代意義上之科學理性的學科定位。相反的，重商主義乃是在所謂國家理性(*Raison D'être / ratio status*)的傳統下來對於經濟此一領域進行考察。

(一) 國家理性之學的興起

所謂的國家理性之學，根據 Foucault(2007)的說法，乃是在 1580-1660 年間出現的一種論述。這種論述主要是區隔於傳統基督教以牧養權力(*pastoral power*)來界定君王的任務與權力。在這種論述當中，君王被賦予了一種特別的任務，一種相對於上帝、教皇、父親的特殊任務，一種對於公共事務的問題化與治理化的任務。在這種任務裡，君王被要求不能再以自我的恣意或宗教的訓令，而必須根據國家理性來進行治理¹⁴⁷。所謂的國家理性，主要有兩層意義：一方面，就國家的角度來看，國家理性指涉的乃是維護共和國完整必不可少的元素(如領土、制度、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就理性的角度來看，則指涉的是一種規定與技藝，一種對於維護國家完整、和平與安寧的方式。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國家理性

¹⁴⁷ 根據 Foucault(2007:255)說法，國家理性的說法，乃是起源於義大利，然後逐漸擴散到整個歐洲。

之學乃是君主治理必不可少的一種知識，一種有別於宗教訓令與法律規定的嶄新治理知識，一種對於基於對於國家事務完整理解的治理技術。

事實上，這種國家理性之學的興起，乃是因應後宗教改革時期的 17 世紀整體性危機而來的。這種國家理性之學，不僅涉及了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與外交的折衝與平衡（特別表現在 1618-1648 年三十年戰爭之後的歐洲秩序重建），更涉及了一國之內的內部的“公共治理”(polizei／police)。這種內部的“公共治理”，根據 Foucault (2007:322-8) 的說法，其主要對象有下列五者：1. 公民的數量、2. 生活必需品的保障、3. 人口的健康問題(如瘟疫防制、公共衛生等)、4. 對於職業的管制(特別是關於濟貧與遊民的監督)、5. 商品的流通以及其所涉及的交通與公共工程問題。因此，重商主義的論述正是基於這種公共治理的需求而出現的。

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在重商主義的論述當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對於上述“公共治理”對象的討論(特別在 Petty 的經濟理論與政治算術學上)。因此，公共治理與商業交易、公共治理與城市發展、公共治理與人口管理、公共治理與公共收支，都構成了重商主義論述在國家理性的基礎上，將自主性的經濟領域與君王的治理技藝結合起來的方式與主題。因而，從這種國家理性之學來定位重商主義，或許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重商主義論述會引發了關於財富分析與國家主義兩種不同的對立詮釋。

(二) 國家理性的瓦解—重農主義的轉折

上述這種從國家理性對於經濟論述的定位，到了 18 世紀末，就逐漸地在重農主義者手中瓦解。相對於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論者不再強調人口是國富的起源(土地才是一切財富的根源)，不再重視商業交易的根本性(農業才是唯一具有生產力部門)，不再以城市為中心來形構公共治理的目標(鄉村的農業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所在)，甚至對於糧食安全問題，也不再強調國家的擔保與干預(用自由放任原則來取而代之)。

事實上，如同我們一再地指出的，重農主義(Physiocracy)一詞，其所意涵的

乃是自然的支配，而非君王的統治。如同 Foucault(2007:349-358)指出的，相對於國家理性的人為技藝，在重農主義那裡出現了一種新的自然性，一種關乎人的自然性，一種社會的自然性。重農主義論者正是基於這種自然性來批判國家理性、公共治理與重商主義的人為性。而且，基於這種自然性，重農主義不僅強調經濟論述的科學理性定位¹⁴⁸，也強調人口與經濟事實都服從於特定的自然程序。同時，基於這種新的自然性的形構，重農主義也改變了對於國家之於經濟秩序所扮演的角色。在這種新的角色裡，國家不能、也不再需要制訂經濟秩序的根本規章，國家所需要作的乃是消極地縮小對於經濟的干預，以及積極地排除那些有礙於自然秩序運作的障礙。

因此，在重農主義的論述中，正是在與國家相對的社會、與任意性相對的經濟秩序、與君王利益相對的國民利益、與國家理性相對的科學理性、與公共治理相對的自由放任等原則上，經濟論述開始有了新的定位。經濟論述不再作為君王的謀略之學，而是以立法者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的面目重新定位(Faccarello & Steiner, 2008)。重農主義也正是基於這種立法者科學的定位，透過積極的市場自然秩序的形構，一方面批判君王對於經濟秩序的任意性干涉，另一方面緩和君王專制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這兩點在法國的絕對王權脈絡下，特別具有意義)。

(三) Adam Smith 的立法者科學

雖然，重農主義的確透過反對國家理性之學，改變了經濟論述的定位。但是，不可否認的，在重農主義者身上，當這種立法者的科學與絕對王權結合時，這兩者之間仍然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立法者科學雖規定了君王的義務，但是君王仍

¹⁴⁸ 如我們在第四章指出的，Petty 的政治算術學常常被當成歷史上的首次的科學的經濟分析。而且，在 17 世紀科學革命的背景，Petty 的確有非常有意識地建構客觀的經濟分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Petty 主要仍是以君主謀士之學來定位他自己的理論。然而，重農主義者雖然也強調開明專制，但是，他們卻更強調君王必須服從與執行自然的積極秩序。因此，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重農主義論者乃是站在 Petty 的基礎上，更清楚地把這種自然性給形構出來(特別表現在 Quesnay 的經濟表上)，並要求此一自然秩序的積極實現。

保有恣意行事的可能)。事實上，如同自由放任原則一樣，這種立法者的科學，只有到了 Adam Smith 手中，才更具系統性的完備。

如同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只有到了 Adam Smith 手中，古典時期的經濟論述才有了系統性的統整，因而，才誕生了政治經濟學此一學門。而且，如同重農主義論者一樣，Adam Smith 正是以所謂立法者的科學為政治經濟學定位。在 Adam Smith 的討論中，他正是透過批判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的體系來建立自己的科學體系。針對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Adam Smith(1976:book IV, 208-9)指出，重農主義與重商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都試圖鼓勵特定的產業，維護特定階層的利益，這不僅違背了自然的趨勢，而且終究會導致與其政策目標背道而馳的結果產生。

對於 Adam Smith 而言，立法者科學的任務並不在於任何政策性的偏傾，而在於透過廢除一切特權與限制的制度，使得自然自由的體系建立起來。而且，Adam Smith 還指出，一旦這種自然自由體系建立起來，人們將在不違反正義的法律之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並與其他階層的人競爭，如此一來，將可以解除君王監督與指導私人產業，並使其符合社會利益的義務(Adam Smith 認為君王不具有完成此義務的充分智慧或知識，因而往往陷於錯誤)。對於 Adam Smith 而言，君王事實上只有三項簡單的義務：一、國防上的義務。保護社會，避免其他社會的入侵。二、司法保護上的義務。提供公正的司法機關，保護個人使其免受他人的侵害或壓迫。三、以社會利益為目標，提供公共工程與公共支出的義務¹⁴⁹。

事實上，對於 Adam Smith 而言，完整的立法者的科學，不僅包括著經濟理論，也包括著道德哲學、法學理論、政治學理論與歷史理論(Winch,1978；Haakonssen, 1981)。在先於《國富論》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一書的最後一段，Adam Smith 就預先地聲明了，除了《道德情操論》之外，他將就正義問題、公共治理、稅收、軍備與其他的法律治理對象，以及法律與政府的一般原理與歷史

¹⁴⁹ 關於 Adam Smith 對於這三項義務的細節討論，請參考《國富論》第五篇。

演變，提出新的說明。因而，才有了《國富論》一書的出版¹⁵⁰。換言之，雖然 Adam Smith 的確系統性地建立了政治經濟學體系，但是，他並未將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門來看待。在他的立法者科學裡，經濟論述乃是跟其他學門論述有機的整合在一起。只是，在他對於經濟論述的立法者科學定位中，市場的觀念所具有的自然律則的定位，以及烏托邦與規範性色彩，就更清楚地顯露了出來。

三、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方法論爭議

如我們在第五章所指出的，在 19 世紀初，到了 Ricardo 與 Malthus 的世代，政治經濟學才開啟了科學化與專門化的發展。只是，在這樣的過程裡，不僅自由放任的原則逐漸地被絕對化，Adam Smith 所建立的知識體系與立法者科學的定位，也遭到扭曲與揚棄。如同我們在第五章所指出的，在 Ricardo 對 Adam Smith 繼承裡，事實上只選擇性地接受了《國富論》一書中的第一篇與第二篇的內容與框架，對於其他三篇的主題與研究方法（特別是歷史方法），相關討論幾乎付之闕如。同樣的，在 Malthus 的《經濟學原理》一書裡，其所討論的主題，依然主要繼受於《國富論》一書中的第一篇與第二篇的內容。因此，正如同 Donald Winch(1978:184-5)所指出的，在所謂政治經濟學史的科學系譜中，Adam Smith 與他正統或非正統的繼受者之間的差異，往往比人們想像中要來的大¹⁵¹。

(一) Ricardo 與 Malthus 的方法論之爭

¹⁵⁰ 在《國富論》一書裡，並沒有包含正義理論與法理學的討論。事實上，Adam Smith 生前並沒有完成關於正義理論與法理學的著作。關於他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可以參考他學生所做的課堂筆記(Smith, 196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該課堂筆記裡，Adam Smith 是在以公共治理(police)為主題的講演裡，開始他的經濟分析。這似乎也佐證了上述經濟論述起源於公共治理需求的看法。

¹⁵¹ 根據 Winch(1978:ch7; 1996)所指出的，Adam Smith 的遺產，在 19 世紀初的英國，有著許多不同的繼受軸線。除了 Ricardo 與 Malthus 所繼受的政治經濟學外，其道德哲學與歷史方法的繼受者主要有 Dugald Stewart 與 John Millar，政治理論的繼受者主要是 Edmund Burke，法理學與立法者科學的繼受者是 Jeremy Bentham。這些人對於 Adam Smith 遺產的繼承，都具有很強的片面性。

在狹義化的政治經濟學學門裡，即便 Ricardo 與 Malthus 都共同繼受了《國富論》屬於系統性經濟論述的部分，但是，這兩者之間，仍有著顯著的地方法論上的差異。在 Ricardo(1962)所著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當中，他主要是立基於 Adam Smith 的體系上，佐以若干已知的事實(基於簡單地觀察得來的)或公理，利用抽象演繹方法來發展關於價值、地租、工資、賦稅、國際貿易等理論，為政治經濟學建構了一套更具邏輯一致性與精確性的分析結構(相較於 Adam Smith 歷史方法與演繹方法的結合)¹⁵²。然而，在 1820 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裡，Malthus(1965:3-13)就對 Ricardo 的方法提出了批判。Malthus 指出，當前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兩個重大的弊端：一方面，那些較具理論傾向的政治經濟學學者，往往過於輕易地將問題予以簡化，並草率地將結論予以概化，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Ricardo 的方法論屬於此種)；另一方面則是，那些較具實用傾向的人，往往試圖從局部的事實得出草率且冒昧的結論，忽視了問題的全面性。Malthus 更指出，那些主張簡化與概化的理論家，往往對於所建立的法則與命題，採取一種絕對的態度，不容許修改與否認異例的存在。因此，基於上述的批判，Malthus 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必須兼顧問題的複雜性與全面性。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提出普遍性的命題，但是，這些普遍性的命題，除了邏輯上的一致性與精確性外，尚必須透過進一步的收集資料來加以檢驗。而且，這些命題的概化與運用，也都必須就具體的經驗個案來加以驗證，無法簡單地類推適用(Redman, 1997:295)。簡言之，在 Malthus 對於 Ricardo 的批判中，他清楚地表明了，不能為了邏輯的一致性，犧牲掉對於問題複雜性的掌握，對於理論命題的概化，也必須考量經濟事實的諸多層面所可能帶來的限制。

有趣的是，雖然 Malthus 的方法論的立場，看似更為合理且完整，而且，這樣的立場，也更接近 Adam Smith 所採取的立場。但是，如同後來歷史的發展所

¹⁵²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 Ricardo 主要是繼受《國富論》前兩篇的內容，但是，在分析的框架上，Ricardo 的體系往往更為嚴格，也更為狹隘。在 Adam Smith 屬於系統性之經濟分析的部分(如價值、工資、地租議題的討論)，他往往會考慮經濟實在的諸多層面，對於歷史背景也往往比較敏感(特別表現在分工議題的討論上)。但是，在 Ricardo 的體系當中，不但缺乏這些面向上的關照，而且，往往會將發展出來的命題，直接套用在經驗案例上(Roncaglia, 2006:182)。

表明的，在 19 世紀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化與專業化過程中，乃是 Ricardo 的理論體系取得了支配地位，人們終究還是以《人口論》而非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著作來定位 Malthus 的知識成就(Winch, 1987, 1996)¹⁵³。Malthus 理論方案的失敗與 Ricardo 體系的勝出，除了反映出當時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狀況外¹⁵⁴，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於政治經濟學科學化的知識心態。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科學化的氛圍中(特別是在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攻擊下)，人們不僅試圖限縮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將政治經濟學從道德哲學中區分開來)，而且也試圖為政治經濟學建立穩固的分析基礎，Malthus 這種帶有保留與限制的方案，以及他對於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道德哲學的定位(Malthus 本身是牧師，他與神學化的經濟學一直脫離不了關係)，在 Ricardo 清晰的分析體系的對照下，是很難受到人們的青睞的(Redman, 1997:ch6；Klaver, 2003: ch1)¹⁵⁵。

(二) J. S. Mill 的捍衛與修正

雖然，Ricardo 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確在 19 世紀初政治經濟學內部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但是，不可否認的，此時政治經濟學仍然飽受來自學科內外的攻訐。在方法論與學科性質的定位上，除了上述的 Malthus 外，Ricardo 體系也遭到了來自 Richard Jones 與 William Whewell 的批判(這兩人乃是好友，都是劍橋大學的教授)。他們兩人都不滿於 Ricardo 體系的抽象與非經驗性的特質，因此，試圖從歸納法的原則出發，發展更具經濟基礎與歷史取向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他們

¹⁵³ 有趣的是，到了 20 世紀，Keynes 曾試圖為 Malthus 翻案(這主要是基於 Keynes 認為 Malthus 乃是有效需求理論的先驅)。他認為，Ricardo 體系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百年統治，乃是經濟學此一學門的災難，如果當初勝出的是 Malthus，經濟學知識將不知道會有多麼大的進展(Redman, 1997:262)。

¹⁵⁴ 如我們在第五章所指出的，19 世紀初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此一學門的確立，乃是基於政治經濟學社 (the Political Economy Club)的推動(Malthus 乃是會員之一)，以及與功利主義論者的聯合。然而，無論是政治經濟學社，還是功利主義的聯合，其主要的推手都是 James Mill。Mill 不僅在政治經濟學的確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他事實上還是 Ricardo 體系的催生者(出身於股票投資商的 Ricardo，乃是在他的指導下來完成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因此，Ricardo 的體系正是在這個社會脈絡下勝出的。

¹⁵⁵ 實際上，Ricardo 與 Mill 父子，都會抱怨過 Malthus 的理論體系過於模糊，缺乏分析上的精確性(Redman, 1997:261, 294)。

都認為，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基礎，並不在於普遍公理、命題與法則的建立，而在於對於經濟事實的全面性掌握。過於沈迷於普遍命題的建立，不但會導致經濟學知識的劃地自限(永遠在已知的事實上打轉)，而且，還會忽略了這些所謂具有普遍性的公理、命題或法則，事實上乃是具有歷史的相對性與特定性。因而，Jones 與 Whewell 都試圖結合統計與歷史方法來矯正當前政治經濟學的偏頗(Milonakis & Fine, 2009:24)¹⁵⁶。

基於這些對於 Ricardo 體系的方法論與學科性質的批判，在 1830 年代，身為 Ricardo 體系的欽定接班人的 J. S. Mill(這是在他父親 Jame Mill 的刻意栽培下)則試圖捍衛 Ricardo 體系的正統支配地位。在〈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適當的研究方法〉(“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一文裡，Mill(2000:86-114)試圖在許多混淆與爭議中，為政治經濟學做出更嚴格的定義。他清楚地指出，無論從國富問題的角度，還是從生產、交換與分配的規律，以及道德科學與立法者科學的角度，都無法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做出令人滿意的界定。因此，Mill 主張，應該從人類對財富追求的慾望與行動出發(這僅僅只是人性與人類行為的某一側面)，將政治經濟學定義為一門旨在研究人類對於財富的追求所衍生的社會現象的規律，而且，這種社會現象不會因為人類對於其他目標的追求而有所改變。此外，除了上述更為狹隘與特定的定義外，Mill 也試圖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做出澄清。針對歸納與演繹方法的爭議，Mill 指出，政治經濟學雖是道德科學的一部份，但是，政治經濟學作為抽象科學，其所採取的乃是先驗(*a priori*)的方法，其推理的基礎乃是根源於假設而非事實。而且，基於幾何學的類比，Mill 更指出，即便政治經濟學的推理基礎是立基於無關經驗事實的假設，但是，這並不會因此而否定了政治經濟學結論的有效性(如同幾何學原理不會受到經驗事實的否定一樣)。相反的，這反而提醒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乃是在特定前提下才成立的，因此，基於真實狀況與假設條件的偏離，政治經濟學必須容許在結論部分出現的誤差與修正(這是政治經濟

¹⁵⁶ Jones 與 Whewell 都是 1834 年倫敦統計協會(英國皇家統計協會的前身)的創始會員。

學的具體運用必然會存在的不確定性)。此外，他甚至主張，基於道德科學無法像物理科學以實驗來進行原因辨別，上述這種先驗方法，乃是道德科學中獲取真理與有效知識的唯一方法(歸納法的意義，僅僅是在具體經驗個案適用時，用來降低真實狀況的擾動因素與不確定性)。

換言之，在上述 Mill 對於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捍衛中，他主要是透過幾何學的類比，以先驗推理方法來定位政治經濟學的抽象與演繹的分析。因此，在這種的定位上，市場的觀念與自由放任原則，就非常容易地取得了如幾何學秩序與原理一般的先驗地位。

有趣的是，在中晚期的作品裡，Mill 似乎開始修正他早年的立場。如同我們在第五章所指出的，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裡，Mill 開始將政治經濟學限縮於生產的領域，並且在分配的領域裡，承認社會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在對於道德科學的邏輯討論中，Mill(1988)似乎也開始修正對於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先驗法則性的定位，承認這些律則具有歷史的相對性。Mill(1988:82)指出，道德(社會)科學的方法，不該建立在抽象的幾何學的方法上，而必須建立在物理學的具體演繹法上¹⁵⁷。此外，Mill(1988:92-3)甚至承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假設與命題，僅僅適用於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工業世界，因此，對於其他社會狀態的情況，則必須結合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與所謂的民族或政治性格學(Ethology)來發展適當的人性假設，以建立符合該社會狀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而且，在承認歷史相對性與經驗事實的重要性的前提下(這主要受到 Comte 的影響)，Mill 也開始意識到歷史演化方法與統計方法對於道德科學的重要性(前者指向了經驗事實在歷時序列上的一致性與社會動力學，後者則指向了經驗事實在共時面上的一致性與社會靜力學)。Mill 更指出，歷史演化方法所確定的規律，只要再通過逆向演繹法，從人性原理中先驗地演繹出來中，就可以建立普遍的科學律則，擺脫傳統歷史方法的

¹⁵⁷ 這種方法與幾何方法最大的差異在於，幾何學的抽象演繹法往往僅是基於一個簡單地原因就進行結論的推導，具體演繹法則是考量了許多共同原因的存在，並試圖結合它們彼此之間的規律來進行推導。而且，具體演繹法的知識有效性基礎，並不在於先驗推理本身，而在於結論與觀察結果之間的一致性(Mill, 1988:83-5)。因此，具體演繹法具有更強的經驗性，而且也更看重經驗事實的存在。

猜測與模糊的特點，建立真正關於文明進步與社會演化的歷史哲學(Comte 的歷史哲學乃是最佳的例子)。因此，在 Mill 晚期的修正裡，他不僅承認歷史方法與歸納統計方法的正當性，他甚至也承認市場經濟的律則乃是具有社會脈絡性與歷史相對性的(僅適用於那些較為發達的現代工業經濟國家)。

(三) 小結

總而言之，在 19 世紀政治經濟學內部的方法論爭議裡，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佔據主流正統位置的 Ricardo 體系，正是在與 Malthus、Jones 與 Whewell 等人的對抗下，開始以幾何學類比來證成自己的抽象推論。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觀念開始被賦予了先驗法則的地位。然而，來自於 Comte 的整體性科學理論與歷史哲學的衝撞，卻也使得 Mill 開始相對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假設，因而，歷史方法與社會演化的問題，就再次浮現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之中(相對於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歷史階段論)，這也為後來的經濟學方法論大戰，埋下了重要的伏筆。然而，也正是在這種歷史哲學的思考中，市場的觀念卻也弔詭地展現了一種“相對性的絕對化”。一方面，市場觀念的相關經濟律則，開始被限縮於經濟較為發達的工業國家(英國是主要對象)，不適用於歷史上與空間上的其他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另一方面，這種受到 Comte 影響而在當時英國方興未艾的歷史演化方法中(Burrow, 1966)，本被限縮於英國脈絡的市場相關律則，卻也開始被賦予了進步的、現代性的意涵，英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也成為其他社會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市場的觀念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展現了一種“相對性的絕對化”。

四、19 世紀末的經濟學內部的方法論大戰

如上所述，在 Mill 與 Comte 的影響下，歷史方法與歸納統計方法已經取得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正當性。到了 19 世紀末，歷史經濟學已成為主流古典政治

經濟學主要的競爭對手。由於 1870 年代以降，英國主流經濟學也經歷了所謂邊際效用的革命¹⁵⁸，因而，新的歷史經濟學與新的邊際分析經濟學之間的碰撞，開啟了英國經濟學內部的方法論的爭議。除了英國經濟學內的方法論爭議外，幾乎在同一時期，在德語世界中，也發生了著名的新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方法論大戰(the Methodenstreit)。這兩場方法論的辯論，不僅涉及了經濟學新典範的形成與經濟學學院建制化的問題，而且，也促成市場觀念的重新定位。因此，底下的討論，將先從英國經濟學的方法論爭議談起。

(一) 英國歷史經濟學派的興起與方法論的爭議

如上所述，19 世紀中，在 Ricardo 體系所統治的政治經濟學內部，歷史性的思維與研究方法，一直作為伏流潛藏起來(Jones 與 Whewell 乃是這種取徑的始祖)。直到 19 世紀中葉，隨著愛爾蘭大飢荒的所造成的慘劇，不少愛爾蘭當地的政治經濟學者(如 John K. Ingram 與 T. E. Cliffe Leslie)，對於政治經濟學中存在著普遍性法則的想法展開了攻擊，認為以自由放任原則來處理這場飢荒，不僅沒有改善問題，反而使飢荒問題更為惡化(Koot, 1975)。因此，基於這樣的質疑，Ingram 與 Leslie 都是試圖發展一種更具歷史特定性的經濟分析。

基本上，Ingram 乃是 Comte 實證主義的忠誠追隨著。他採取比 J. S. Mill 更為激進的立場，試圖用歸納與歷史的研究方法來取代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方法(Koot, 1987:53-59)。Leslie 則是試圖引入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並結合 Henry Maine 的法律史方法，來矯正 Ricardo 體系的缺陷(Leslie 較為折衷的立場，甚至獲得了 Mill 的賞識)(Koot, 1987: 39-53; Collini, 1983:247-265)。基於上述的立場，

¹⁵⁸ 如同我們在第五章註釋 130 所指出的，嚴格來說，邊際效用革命並不能稱得上是一種知識革命。邊際分析運動的推動者如 Menger、Jevons、Marshall 等人，不但彼此間具有不同的理論立場，他們也都不認為自己正在進行一場知識革命。他們只是試圖站在主觀價值學說的立場，來重建古典體系(分別對應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功利主義與德國舊歷史學派)。而且，邊際分析的觀念與主觀價值學說，早在 19 世紀中葉，就已經出現在 Hermann Gossen、Antoine Cournot、Jules Dupuit 等人的著作中(Black et al., 1973; Howey, 1999)。事實上，大概只有發展一般均衡分析的 Walras 是最具有革命意識的(他最為清楚地表明要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因此，所謂用邊際效用革命的革命性意涵，乃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於 1930-50 年代的形式主義革命(基於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對於歷史所做的一種知識投射。

他們都共同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人性預設(特別是針對所謂基於財富渴望所做的推論)，強調人的慾望與偏好都受到了個人所處的歷史與社會背景的影響，因而，政治經濟學基於人性原理所推導出的普遍性命題，乃有其歷史時空與社會脈絡的限制。因此，Ingram 與 Leslie 反對將源自於工業社會的古典政治經濟體系(特別是關於工資、私有財產與貨幣等理論)運用到愛爾蘭所面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上。而且，他們也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於邏輯的嚴密性與精確性的過度強調。這種對於演繹邏輯體系的執著，往往只會使得政治經濟學體系成為一種邏輯遊戲，一種市場的操作手冊，而且還會使得政治經濟學者自滿於該體系的完整性與完美性，忽視了政治經濟學體系不過是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命題與學說的集合，深受不同時空背景的影響。此外，針對 1870 年代已經開始的邊際分析與經濟學的數學化運動(Howey, 1999; Black et al., 1973)，Leslie 也清楚地指出，當前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問題在於，試圖急切地發展出一個完整且對稱的系統，透過用數學的確定性與精確性來解決所面臨的經濟問題，這種企圖不過反映出政治經濟學者對於問題本質與分析工具的完全誤解(Hodgson, 2001:68-70)。

換言之，正是在 Ingram 與 Leslie 的手中，一種具英國特色的歷史經濟學首次被確立起來(相較於德國歷史學派，Ingram 與 Leslie 較不重視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也隨著他們的觀點在英國的擴散，一場方法論上的爭議，在歷史經濟學與 Marshall 所引領的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爆發開來。然而，我們必須指出，這場在英國爆發的方法論爭議，並沒有如在德語世界中那樣的激烈。在 Marshall 所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劍橋學派的觀點中，他們雖然意識到歸納法與經驗主義知識論的缺陷與不足(歸納法仍然必須依靠演繹與分析來建立因果機制與理論)，但是，他們也對於單純依靠演繹法所進行的漫長推理感到懷疑(演繹法必須基於歸納的基礎，公理必須當成分析工具而非事實來看待)。他們不僅試圖綜合演繹法與歸納法的爭議¹⁵⁹，也高度讚賞新歷史學派 Schmoller 等人，在結合演繹與歸納

¹⁵⁹ 這一點清楚地表現在 Marshall 的學生，也 Keynes 的父親 John Neville Keynes 的方法論著作上 (Keynes, 2001)。

上所取得的知識成就。而且，即便在面對 Jevons 所開啓的邊際分析數學化浪潮中(Schabas, 1990)，Marshall 依然試圖在過度的數學化與平庸的經驗主義中，找出到一條中間道路(Hodgson, 2001:102-3)¹⁶⁰。至於在歷史經濟學派方面，身為此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H. S. Foxwell，雖然強調統計方法與歷史方法的重要性，並且也批判主流經濟學低估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與自由競爭所可能帶來的災難，但是，他跟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之間，並不存在劍拔弩張的關係。Foxwell 不僅跟 Jevons 與 Marshall 都具有良好的私人友誼(他本身就是 Marshall 所組成的劍橋經濟學圈的成員之一)，他也高度欣賞演繹經濟學所取得的知識成果(Koot, 1987: 39-53)。

事實上，這場方法論的爭議，主要爆發於 William Cunningham 與 Marshall 之間。Cunningham 與 Marshall 不只發生過教職爭奪的糾紛(1885 年的劍橋政治經濟學講座)，以及對於經濟學教學內容與學位考試制度之間的爭吵(這主要發生 1903 年的劍橋大學中關於經濟史的內容在經濟學課程與考試上，應該佔多大比例的爭議)，在對於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這兩人都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Cunningham 指出，由於社會與人性的不停變動，Marshall 那種試圖將普遍社會規律與具體個人主觀心態結合起來的方案，註定是徒勞無功的。因此，他進一步主張，經濟學不該成為一種純粹社會物理學(只研究人對於財富的渴望與演繹相關規律)，應該像生物學等學科一樣，重視觀察、描述、命名與分類，並且在分類的基礎上發展科學律則。此外，基於經濟理論的歷史相對性，他也認為，Marshall 那種試圖結合抽象理論與具體經驗事實的折衷方案(如將 Ricardo 的地租理論運用到 15 世紀 Tudor 王朝與 19 世紀末的印度)，終究只會淪為一種徒具形式的智力遊戲。然而，在 Marshall 對 Cunningham 的回應裡，Marshall 並沒有更

¹⁶⁰ 值得提醒的是，雖然 Marshall 身處於 1870 年代經濟學邊際分析運動的浪潮中，但是，其所建立的理論體系，並不意味著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決裂，而是試圖將主觀價值理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體系綜合起來。因此，Marshall 的理論體系一直具有折衷與妥協的成分在內。同樣的，在面對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爭議上，Marshall 不僅展現了他的折衷主義立場，甚至還承認了經濟學的規律是具有歷史相對性的，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而，Marshall 甚至企圖將發展於生物學的演化理論引進新古典經濟學的架構中，認為經濟學的未來在於朝演化理論發展(Collini et al., 1983: ch10)。

進一步深化他個人在方法論上的主張(劍橋學派雖主張折衷方案，但是，對於此方案的具體執行策略，依然曖昧不清)，他只是重申他對於經濟史與歷史方法的基本立場，以及對 Cunningham 對於他基本立場的誤解表示遺憾(Koot, 1987:142-149)。

上述這場英國經濟學內部的方法論爭議，其爭議的結果只是見證了 Marshall 對於當時英國經濟學所具有的宰制性地位¹⁶¹。在與以 Marshall 為首的劍橋學派的知識鬥爭中，面對著劍橋學派在理論框架與方法論的折衷立場，以及他們對於既有學院建制的統治，歷史經濟學終究沒能在英國經濟學圈紮根下來(主要是轉向了經濟史的領域)。但是，透過這場爭議，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爭論的雙方都承認經濟理論與經濟律則具有所謂的歷史相對性，也共同承認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至少適用於像英國一般的現代社會。因此，市場觀念的“相對性的絕對化”，也就在正統論述與異端論述的共同承認中穩固了下來。只是，當歷史學派逐漸被驅除於經濟學外，而且隨著 1940-50 年代更為激進地數學化的形式主義革命的到來，歷史性的思考就逐漸地消失在經濟學內部，因而，市場的觀念就逐漸地走向了絕對化的發展。

(二) 德語世界的方法論大戰

除了上述這場在 19 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內部的方法論爭議外，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在德語世界中也爆發了一場更為激烈的方法論大戰。這場著名的方法論大戰，主要爆發在以 Schmoller 為首的新歷史學派與以 Carl Menger 為首的奧地利學派之間。然而，由於歷史取向的經濟學研究，在德語世界的經濟學中，不僅有著較長的傳統，而且，也在當時的學院建制中佔據著支配性的地位(Tribe, 1988; 2007)，因此，不同於英國的狀況，在德語世界中，發動這場辯論的並不是新歷

¹⁶¹ 在這場爭議裡，英國歷史經濟學家如 Foxwell、W. J. Ashley 等人，幾乎都站在 Marshall 這一方，批判 Cunningham 過於扭曲與惡意地對 Marshall 進行攻擊。因而，在當時的經濟學學圈中 Cunningham 幾乎被孤立起來，最後只好黯然地轉向了經濟史的領域(Koot, 1987:146)。關於 Marshall 以及學生如何促成英國經濟學的學院化與專業化，並因此取得對於經濟理論與學院建制的宰制性地位，請參考 Maloney(1985)、Kadish(1989)、Kadish & Tribe(1993)。

史學派，而是 Menger 以他所開創的邊際分析的新經濟學，對於當權的歷史學派展開了批判與攻擊。

在 Menger 對於新歷史學派的批判裡¹⁶²，他首先試圖為所謂的理論經濟學與理論性知識進行辯護(在承認歷史方法的正當性前提下)。Menger([1883]2007)指出，理論經濟學關心的是在具體經驗現象背後的一般性律則與精確的典型關係。這種一般性律則與精確典型，必須從具體的現象中抽離出來。這種抽象的達成，主要是透過對於該現象的最簡單要素與必然性因素的考察，因而，它僅僅關注人類活動的某一特定側面。基於這種立場，Menger 甚至主張，這種理論性知識與理論經濟學所確立的精確法則(例如市場的供需定律)，在抽象與分析意義上乃是永遠成立的(但是，在具體經驗個案上必然會有所偏離)，因此，不可能也不必要透過經驗現象來加以檢驗(Menger 援引幾何學原理類比來說明此點)。接著，基於這種界定，Menger 對於歷史學派展開了攻擊。他認為，新歷史學派完全誤解了理論性知識與理論經濟學的性質與意義。經濟史與理論經濟學乃是屬於經濟學兩個不同領域(另外還有一個領域是政策領域)，前者關心的是經濟現象的所有層面，後者主要是凸顯經驗現象的某一側面。這兩者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補性，彼此之間也不可能相互替代。但是，新歷史學派往往混淆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基於理論經濟學將取代經濟史的誤解，試圖反向地用經濟史來取代理論經濟學)，也忽視了經驗主義的方法仍然必須使用理論性的抽象方法。

其次，Menger 也回應了歷史學派對於理論經濟學人性預設的攻擊。他指出，歷史學派往往會批判理論經濟學在人性預設上的偏頗(特別是所謂的追求慾望滿足的自利假設)，忽視了人性在不同時空下會有所變化的。但是，理論經濟學並不否認除了自利以外的行為動機的存在(如友愛、公共精神、習慣與正義感等)，

¹⁶²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 Wilhelm Roscher 所代表的舊歷史學派，Menger 是相當推崇的。他甚至把他的《國民經濟學原理》提獻給 Roscher。事實上，Menger 與舊歷史學派有許多共同之處。在舊歷史學派中，他們往往會基於主觀價值理論，對於 Ricardo 體系的勞動價值說展開了批判，而且，他們也常常試圖利用大量的歷史事例去補充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這種主觀價值理論的立場與對於歷史方法的使用方式，都跟 Menger 的立場是一致的(Caldwell, 2004: 46-47)。

它只是從人類經濟行為中抽取出最具主導性的自利動機，並藉以發展精確性的原理。最後，針對歷史學派所強調的方法論集體主義立場，Menger 也從他原子論的立場(方法論個體主義)提出了批判。歷史學派論者，往往會將國民(volk)視為是一個集體的概念，並試圖以此為對象來進行歷史分析與描述，因而將國民經濟學定位成一種國家之學，並且誤以為歷史乃是由一個集體性主體所推動的。但是，Menger 認為，所謂的國民經濟現象，不過是無數個人經濟活動的結果，歷史的變化與規律乃是非設計性的。因此，真正的國民經濟學必須以個體為單位來進行考察，必須將國民經濟現象的經驗性規律，還原到它的構成要素上，如此才能建構真正的理論性解釋。

簡言之，Menger 認為，歷史學派試圖透過歷史研究與統計方法來達成經濟規律與經濟理論的建構，終究不過只是一種徒勞無功的嘗試。而且，他們對於理論性經濟學與理論性知識的貶抑，終究只會阻礙經濟學知識的進展。針對 Menger 這種批判，Schmoller 則重申他一貫的方法論立場。Schmoller 認為，Menger 的理論仍犯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理性主義的謬誤，試圖將社會現象“化約”到個人的行動上，低估了社會現象內眾多社會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他同樣也懷疑，在不考量經濟與社會其他部門的複雜關係的前提下，所謂的理論經濟學是如何可能認識到經濟的一般性本質。因此，對 Schmoller 而言，當前的經濟學的任務，並不在於發展抽象的理論(這是長遠的未來目標)，而在於增加觀察的數量、準確性和完整性，並且在藉助更全面性的描述性資料的基礎上，對於現象進行分類與範疇說明，這些才是邁向普遍理論之前所必須完成的準備工作(Caldwell, 2004:75; Grimmer-Solem, 2003:259-259)。

在 Schmoller 與 Menger 的首度交鋒裡，雖然兩人都向對方提出了若干的批評，但是，一定程度上，都只是在強調各自的基本立場，雙方的論點甚至可以出現一定的兼容性。然而，在 Schmoller 的回應之後，Menger 則發表了更為激進的

攻擊性言論，甚至對 Schmoller 進行了人身攻擊¹⁶³。Schmoller 也開始透過他對於德國教育部與學術界的影響力，封殺奧地利學派成員在德國大學的教授職位。演變到後來，參與這場方法論辯論，並徹底地駁斥對方的論點，逐漸變成學派內部成員宣示效忠的試金石，因而引發了一場長達十幾年的筆墨論戰。這場方法論大戰，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 Schmoller 的過世，以及新一代歷史學派的學者對於這兩種方法論立場予以綜合(這主要是 Weber 的貢獻)¹⁶⁴，這場曠日廢時的論戰才終告落幕(Caldwell, 2004:ch3-ch4)。

這種方法論大戰，雖然終究淪為學派各自立場的宣示與區隔，但是，對於雙方的學派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奧地利學派所產生的變化，甚至影響了市場觀念的演變。由於 Schmoller 在德國經濟學界所具有的學閥性地位，以及他在與奧地利學派爭奪大學地盤中的大獲全勝，使得後 Menger 時代的奧地利經濟學者，開始試圖往非德語世界尋求學術上的結盟，切斷奧地利學派與德國舊歷史學派之間的淵源，例如 Eugen von Böhm-Bawerk、Friedrich von Wieser、Joseph Schumpeter 等人，都試圖往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靠攏，去發展更具數學化的經濟理論，逐漸地揚棄了 Menger 的作品中對於歷史方法與制度演化的重視(Caldwell:ch5)¹⁶⁵，因而，市場經濟律則與相關理論，就失去了其歷史前提與制度

¹⁶³ 這主要表現在 1884 年 Menger 所發表的《德國國民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謬誤》(*Die Irrth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一書上。

¹⁶⁴ 實際上，Weber(1993)對於理念型(idea type)的方法論設定，正是為了在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方法之間，取得一種折衷的立場(結合歷史方法與精確典型的抽象方法)。Weber(1949)一方面批判了新歷史學派在價值中立、客觀性、社會政策等問題上的缺失；另一方面，Weber(1999:ch18)也指出，邊際效用分析乃是一種目的手段關係的理念型分析，邊際效用分析的基礎並不在於心理法則而在於社會的性質。邊際效用分析之所以越來越能夠取得成效，正是基於世界的理性化，使得現實與經濟理論的前提的相似性不斷地增加，因而目的手段的分析變得越來越有用。只是，奧地利學派學者雖然高度讚揚 Weber 對於歷史學派的批判，但是，Weber 的折衷派立場並沒有獲得他們的青睞，例如 Mise(2001)就不接受 Weber 以理念型與理性化對於理論經濟學所做出的定位。Mise 認為，理論經濟學的法則並不是因歷史發展而取得其成效的，理論經濟學乃是以人類行為中永遠存在的因素為基礎的，因而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乃具有不同的性質，並不只是 Weber 所認為只是概念程度上的區別。而且，Mise 也批判 Weber 對於行動類型所做的四種區分，他認為 Weber 不該錯誤地對於理性與非理性行動進行區分(沒有徹底地堅守主觀價值立場)，因為，事實上，一切的行動都是理性的(至少對行動者而言)，只是不同行動有著不同的目的，不理性的說法，只是觀察者強加諸行動者之上的區分。此外，Schumpeter(1994:32, 77)不僅批判 Weber 的詮釋學方法，也批判 Weber 的理念型方法，錯誤地將理念型的“封建人”與理念型的“資本主義人”對立起來，才建構了虛假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命題。

¹⁶⁵ 這一點要到中晚期的 Hayek 著作中才重新獲得了正視(Hayek, 1973:ch2;1988:ch1)。

脈絡之間的連結(Menger 事實上是重視這些經驗上的連結的)，逐漸地走向了絕對化的發展。

(三) 小結

在上述的兩場方法論大戰裡，其中一個關鍵的爭議點在於，理論與經驗事實的關係。從歷史取向的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還是標榜主觀價值理論的邊際分析經濟學，都不可能脫離具體經驗脈絡而建構一般性理論與律則。因此，從他們的歷史性思維看來，市場經濟的律則最多只能適用於現代社會中，並不具有普世性的效力。從 Marshall 與 Menger 的立場來看，他們都承認抽象方法的運用，乃是基於特定歷史背景與制度脈絡的前提下，利用抽象推理來建立普遍理論。因此，他們兩個都試圖在捍衛抽象方法的同時，為所謂的抽象理論與經驗事實之間，建立一定程度的關連。因而，在他們的理論當中，市場觀念依然是一種“相對性的絕對化”方式出現¹⁶⁶(如同歷史取向經濟學所承認的)。只是，隨著歷史性思維在經濟學理論視野中的消失，以及後來更激進地數學化形式主義革命的到來，不但具體的歷史制度脈絡消失於理論建構的視野，抽象理論也開始解除了它的具體經驗連結。換言之，新古典經濟學問題根源，並不在 1870 年代的邊際效用革命，而在於 1930-1950 年代的形式主義革命。也正是在這種形式主義革命的浪潮下，市場觀念逐漸地走向了絕對化的發展。

五、從多元典範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

¹⁶⁶基本上，在關於經濟理論的相對性問題上，Menger 的立場則更接近 J. S. Mill 早期的立場(兩者都用幾何學來類比普遍經濟理論)。但是，在 Menger 的著作裡，他並沒有主張所謂先驗方法乃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事實上，Menger 一直承認歷史方法的重要性與正當性，他也試圖結合抽象方法與歷史方法來考察制度的演化(Menger, 2007)。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市場的觀念也出現了一種“相對性的絕對化”(絕對化指的是市場基本原理，相對性則是市場在制度脈絡下的具體表現)。甚至到了後來，Menger 也開始承認，他的抽象經濟理論僅僅適用於現代交換經濟之中(Hodgson, 2001:90)。

在上一節裡，我們回顧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發生在經濟學內部的兩場方法論的辯論。然而，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參與這兩場辯論的任何一方，事實上都未能獲得真正的勝利。在二次大戰後，德國與英國的歷史經濟學，基本上在經濟學內部已經不見蹤影。Marshall 那種具有折衷性的理論體系與方法論立場(以及他所強調的“局部均衡”的分析)，以及強調不確定性、訊息問題與競爭過程的奧地利學派，都在二次大戰後成邊際分析傳統中的異端¹⁶⁷。事實上，在 20 世紀上半葉，經濟學內部多元典範的競逐中，真正脫穎而出的乃是以一般均衡為中心的新古典經濟學¹⁶⁸。

雖然，新古典經濟學的許多概念與理論(如效用理論、資本理論、廠商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等等)，都可以在二戰前的眾多學派中找到根源，但是，在兩次大戰期間，新古典經濟學除了以 Walras 的一般均衡分析為中心進行系統性的調整外，還經歷了一場對於學科性質與理論表述方式的重新定位，因而開啟了數理模型化的形式主義革命¹⁶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兩次大戰期間，經濟學的發展重心已經逐漸轉向了美國，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在美國的紮根，則勢必會與美國本土的舊制度經濟學產生碰撞(Yonay, 1998)。因此，要討論這場形式主義如何造成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之前，我們先從舊制度經濟學談起。

(一) 舊制度經濟學的興衰

所謂的舊制度經濟學，其主要的精神領袖是 Thorstein Veblen。在 1890-1910 年代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裡，Veblen 對於 18 世紀以來主流經濟學體系進行批

¹⁶⁷ 雖然，Marshall 的劍橋學派與 Menger 的奧地利學派，都可以稱得上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源頭(這是基於他們都是邊際分析的開拓者)，但是，就新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極大化行為、市場均衡與偏好穩定等預設而言，Marshall 與 Menger 不是有所保留，就是有所批判。

¹⁶⁸ 20 世紀上半葉，經濟學此一學門，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取徑與典範。除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方法論大戰中的四個學派外，尚存在著以 Walras 與 Vilfredo Pareto 為代表的洛桑學派、德國的弗萊堡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美國的舊制度學派、以 Knut Wicksell 與 Gunnar Myrdal 為代表的斯德哥爾摩學派、以及 Frank Knight 與 Jacob Viner 為代表的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等等。

¹⁶⁹ 事實上，二戰後的所謂新古典經濟學，乃是站在二戰前的不同學派的基礎上，進行系統性的調整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就數理模型化的形式主義革命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內部，甚至可以作出新舊世代的區分(二戰前的諸多邊際分析提倡者都可以歸屬於舊世代)。

判，進而奠定了所謂美國本土舊制度經濟學的基調¹⁷⁰。基本上，Veblen(1990)是從現代生物學演化觀點來批評既有的經濟學傳統。他認為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邊際分析的主流現代經濟學傳統(甚至是歷史取向的傳統)，其基本理論體系與解釋機制，幾乎都還停留在達爾文之前的自然史狀態。在這個主流傳統裡，往往會把人性當成是既定的，不隨物質條件變化而變化的，並且試圖從形上學的自然律則角度來解釋社會現象。在人類動機的問題上，這個傳統只採取享樂主義的理論，認為人類的動機只追求快樂，無視於人類行為受到生物本能、社會習慣的影響。在解釋社會變化上，也往往採取目的論的解釋方式，認為社會是朝著他們所謂理想狀態前進，無視於社會變化乃是基於制度與個人共同演化與相互適應的結果。在因果解釋問題上，往往只會從經驗事實中抽取出所謂的正常狀態，但是，卻無力去解釋諸多經驗事實相對於正常狀態的變異，因而依然停留在自然史的分類理論階段，無法對於時間序列上的變化提出因果性的說明¹⁷¹。此外，Veblen 更尖銳地指出，這種建立在自然法則的形上學與分類學的主流傳統，乃是早期商業發展階段的產物，事實上早就不符合歷史發展最新的變化了(特別是 19 世紀末大企業的興起)。然而，這些理論體系卻受到層層地保護，並且在片面吸收經驗事實的情況下，就逐漸變成學者們思維習慣中的框架，形成了他們對於事實的理解。因此，他呼籲用演化經濟學來取代這些早該被歷史拋棄的經濟學形式。換言之，Veblen 從根本上就質疑建立在 18 世紀自然法傳統下的市場經濟律則(這是一種形上學律則)，他也清楚地表明，面對當前的托拉斯企業對於經濟領域的統治，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經濟模型早就不合時宜了。

¹⁷⁰ 值得注意的是，一戰以前，美國經濟學主是受到德國經濟學而非英國經濟學的影響。當時，去德語世界學習經濟學幾乎可以說是經濟學學者的一種風潮。因此，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對於舊制度經濟學具有很大的影響。不過，即便存在著理論上的親近性，Veblen 仍然對歷史學派提出了批判(Hodgson, 2001:137-143)。

¹⁷¹ 在這個論點上，Veblen 也對奧地利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分析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奧地利學派雖然重視過程，但是，他們對於所謂抽象理論正常狀態的強調，使得歷史過程對他們而言，並不是一個累積的、適應的與逐漸開展的因果序列，只是一種無意識地往正常狀態前進的過程(基於行動的非預期結果)，因而，終究無力打破分類學的傳統。至於歷史學派的問題，往往只是在大量的歷史描述與統計數據去建立分類學的說明，沒有致力於因果性的解釋，甚至充滿了歷史哲學與目的論的說教。

因此，站在 Veblen 對於既有經濟學理論學派的批評上，20 世紀初，所謂的舊制度經濟學就在美國如火如荼地展開。這場舊制度經濟學的知識運動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以 Wesley Clair Mitchell 為首，並以哥倫比亞大學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為重鎮，結合歷史與統計分析的哥倫比亞學派。另一個是則是 John R. Commons 為首，以威斯康辛大學大學為重鎮，結合歷史與制度分析的威斯康辛學派。在這兩個中心的努力下，20 世紀初，舊制度經濟學幾乎成為美國大學中的最具影響力學派，並且，在美國經濟學協會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Rutherford, 2011)。

有趣的是，到了 1930-1940 年代，舊制度經濟學在美國逐漸衰落，其所以衰弱的原因相當的複雜，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在於新古典經濟學所帶來的挑戰。首先，在哲學基礎與心理學基礎上，舊制度主義的實用主義哲學與對於本能與習慣的強調，遭到了來自學科外部的邏輯實證主義與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攻擊(cf. Camic, 1986)，新古典經濟學也站在這些攻擊的基礎上，在學科內部對舊制度經濟學展開了批判。而且，在學術的再生產上，以舊制度經濟學為取向的經濟學博士畢業生，因應當時羅斯福新政的需要，大多往政府公職去就職，因而，為新古典經濟學留下了相當大的學院教職空缺(而且，當時美國高等教育尚在擴張中)(Biddle, 1998)。此外，在面臨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中，舊制度經濟學雖然影響了新政，但是，卻無力對於大蕭條的發生與解決，提出完整的解釋與政策綱領，因而，在知識鬥爭中無法回應 Keynes 經濟學的挑戰。於是，結合了 Keynes 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學派就取而代之(主要由 John Hicks 所發起，並由 Paul Samuelson 在美國推廣)。最後，在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動的數理建模方法與計量經濟學的風尚下，舊制度經濟學的制度分析與統計分析，就顯得缺乏一致性的理論框架與穩固的方法論基礎。即便在 1930 年代，Commons(1962)嘗試圖為制度經濟學建立穩固的理論與方法論基礎，但是，在已經發生改變的學科內外的學術氛圍下，這樣的努力顯得已經太晚了(Hodgson, 2001:ch11-12；Yonay, 1998；Morgan & Rutherford, 1998)。

(二) 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

舊制度經濟學學派在二戰後的瓦解，可以說是為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掃除了最後的阻礙。如上所述，起源於 1870 年代邊際效用革命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兩次大戰期間，經歷了系統性的統整與理論表述方式的重建，在經濟學內部引發了所謂形式主義的革命，進而使得市場的絕對化達到了最高峰。這場發生在 1930-1950 之間的重建運動，大致上有以下三個軸線：一、經濟學學科性質的重新定位。在經濟學的論述傳統上，經濟領域一直都被認為是此一學科的主要關注對象，對於此一對象的不同定義，也常常反過來定義了學科內不同學派之間的區隔。但是，到了 1930 年代，在奧地利學派的影響下，為了反擊歷史學派與制度學派對於邊際分析與理論經濟學的批判，Lionel Robbins(1984)試圖重新定位經濟學的學科性質與意義，並透過此一定義的界定，將制度取向與歷史取向排除在外。在 Robbins 的重新定義裡，他不採取傳統依據研究對象所下的學科定義方式(他稱為此為唯物主義的定義)，而是透過重新定義所謂的經濟問題來界定。對他而言，所謂的經濟問題，指的就是行動者為了滿足慾望，在稀少性手段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因此，經濟科學研究的正是稀少性資源的配置性問題(特別是在極大化假設下)。在這樣的定義下，稀少性的問題成為經濟科學的重心，經濟學也變成了選擇的科學。此外，更重要的是，根據這樣的定義，邊際分析的經濟學，將不受限於市場經濟制度，可以運用到一切的體制之中。於是，脫離研究領域束縛的經濟學，就逐漸成為了一種形式科學(Hodgson, 2001:207-209)。這不僅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理性選擇理論鋪平了道路，也預告了市場絕對化的來臨。

二、一般均衡分析的復甦與重整。雖然 Walras 的一般均衡分析，在瑞士洛桑學派 Pareto 等人手中延續下來，但是在 1930 年代以前，在英語世界中，佔據統治地位的仍是 Marshall 的理論體系與表述方式。然而，在 Lange(1936、1937)、Hicks([1939]1953)、Samuelson(1947)等人的努力下，一般均衡分析開始在英語世界中廣為人知。其中，Lange 將一般均衡分析運用到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算問題

上，不僅使經濟學家意識到一般均衡分析重大的實踐潛力，而且，更透過社會主義計算之辯，使得一般均衡分析廣為人知。Hicks 則透過當時英語世界所熟知的 Marshall 經濟學的語彙，重新描述了 Walras 的一般均衡分析，並且在降低數學門檻的情況下(將數學推導放置到附錄)，提高人們對於一般均衡理論的興趣，以俾使人們得以意識到一般均衡分析可為經濟學提供一個統一的框架。Samuelson 則是站在 Robbins 對於經濟科學的新定義上，試圖以一般均衡分析為基本框架，利用數理建模方法來重新整合先前諸多理論。他不僅使人們認識到先前諸多不同的理論(如資本理論、地租理論、工資理論等)，在數學上具有相同的形式結構，因而可以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透過最大化行為假設與靜態均衡概念推導出來，而且，他也向人們展現了數理建模方法所具有的強大潛力(Ingrao & Israel, 1990; Weintraub, 2006)¹⁷²。然而，正是在這種以一般均衡的數學形式架構中，許多既有理論尙存的經驗指涉意涵就理所當然地被剝除了，因而，在形式主義的模型結構中，市場的觀念也就理所當然地被絕對化了。

三、對於 Keynes 經濟學的轉化與綜合。面對著 1929 以來的經濟大蕭條，1936 年，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的出版，Keynes 在經濟學內部掀起了一場革命。在該書裡，Keynes(1954)向強調市場均衡的古典傳統提出質疑，強調古典理論沒有正視不確定性問題，也無法解釋非均衡狀態的出現，因而他試圖提出一個更符合現實的一般理論來取而代之。然而，有趣的是，Keynes 理論所具有的革命性(特別是對於不確定性的強調與對均衡概念的質疑)，在《通論》發表不久後，就遭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馴化。1937 年，Hicks(1937)提出著名的 IS-LM 模型，試圖在靜態均衡的框架下來重新詮釋 Keynes 的理論，並將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綜合起來。後來，在 Alvin Hansen 與其學生 Samuelson 與 James Tobin 等人的努

¹⁷² 根據 Ingrao & Israel 與 Weintraub 等人的說法，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背後，除了來自於模仿古典物理學的理論典範外(主要是熱力學)，還是受到當時由 David Hibert 所開啓的數學公理化與形式化運動的影響。事實上，推動公理化運動與邏輯實證論的維也納學派，也是最早試圖對於一般均衡的存在提出數學證明的，特別是 Menger 的兒子 Karl Menger 與 Hibert 的學生 John von Neumann。

力下，不僅對此一模型的數理建構予以完善化，更將 Hicks 版本的 Keynes 經濟學傳播到美國，形成了所謂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學派¹⁷³。於是，在這種綜合底下，Keynes 的革命反而成就了市場均衡的救贖(Keynes 的批判成為一般均衡的一種特例，但是，透過 Keynes 的干預政策就可以使市場回到一般均衡)，他所說的一般理論更是成為了新古典經濟學在總體分析上的補充(相對於一般均衡的個體分析)。

換言之，正是基於上述三條軸線，新古典經濟學在 1930 年代，開啟了數理建模的形式主義運動。至此，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擺脫了具體的經驗對象領域，轉向可以在任何狀況下運用的形式化與公理化科學(只要稀少性問題存在即可)，數理模型的形式化遂成為經濟學普遍的理論表述形式。即便在經濟學內部仍然存在著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政策爭議，但是，市場的一般均衡已成為此辯論永恆的參照點。而且，這樣的一場形式主義革命，更在 Kenneth J. Arrow 與 Gérard Debreu(1954)對於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與穩定性的證明中達到了高峰。經濟理論的形式化與數理模型化，或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重大成就。只是，在這樣知識成就裡，經驗性的經濟議題被轉換成技術性問題(特別是數學方程式的求解問題)，社會科學的研究也被轉譯成機械工程的研究(在古典物理學的機械論世界觀與形式化數學模型的幫助下)(cf. Sen, 1987 ; Hayek, 1944:ch1 ; McCloskey, 1996)。於是，在這種工程學思維下，不僅“模型的實在”逐漸取代了“實在的模型”(cf. Bourdieu, 1990: 49)¹⁷⁴，規範與事實之間也產生了嚴重的錯置¹⁷⁵，因而，市場的觀念也完成了它走向絕對化的漫長旅程。

¹⁷³ Samuelson 之極其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對於此一學派的推廣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新古典綜合一詞，也出現在該書 1955 年的第五版中(Blanchard, 1987)。

¹⁷⁴ 這種知識心態與謬誤，一個非常鮮明的比喻就是“一個手裡拿槌子的人，看什麼都像是釘子”(If you have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¹⁷⁵ 請參閱在第一章裡，關於新古典經濟學在理性選擇、競爭機制、市場的必要性等三個問題上所出現的理論弔詭。

六、結論

在本章裡，我們主要是透過理論體系之間的區隔、學科性質的爭議與方法論上的辯論，來討論 18 世紀以來的經濟學傳統裡，市場經濟的抽象原理與法則是如何被定位。首先，在古典時期，我們指出了，當經濟論述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過渡到 Adam Smith 的理論體系時，政治經濟學也逐漸從所謂的國家理性之學轉變到立法者科學(用社會的自然性來對抗君王的人爲性)。而且，在這樣的轉變中，市場經濟的相關原理，就取得了自然律則的地位。只是，此時的市場經濟原理仍然無法與道德哲學、法律的正義原則、政治學原理、歷史理論脫離開來（在整體立法者科學的統合下）。其次，我們回顧了 19 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涉及的方法論爭議。19 世紀初，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專門化與科學化的浪潮中，政治經濟學逐漸脫離了整體性的立法者科學，逐漸取得了獨立與自主性的學科定位。而且，也在這個越來越傾向於專門化的學科當中，在 Ricardo、Malthus、Jones、Whewell 之間，爆發了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爭議。正是在 Mill 早期對於主流的 Ricardo 體系的捍衛中，透過幾何學的類比，市場經濟的原理就取得了先驗法則的地位，因而免除了經驗檢驗的質疑與問題。只是，到了 19 世紀中葉，在 Comte 的實證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影響下，Mill 開始修正了他的方法論立場，因而市場的律則開始出現了一種“相對性的絕對化”。市場法則雖然被限縮於只適用於先進工業國家，但是，卻也變成其他國家未來發展的方面。接著，我們討論了發生在 19 世紀末英國與德國經濟學界的兩場方法論辯論。在這兩場辯論中，無論在歷史取向的經濟學裡，還是在早期的邊際分析經濟學裡，他們都試圖保持著抽象理論與具體經驗之間的連結。因此，在正統論述與異端論述的共同承認下，市場律則所具有的“相對性的絕對化”，就穩固了下來。只是，這兩場辯論的結果，終究使得歷史性的思考逐漸消失於主流經濟論述之中。最後，我們討論舊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碰撞。在 1930-50 年代裡，新古典經濟學經歷了一場知識上的重建。在這場重建裡，新古典經濟學不僅在知識鬥爭中擊敗了舊制度經濟學，而

且，也開啟了數理建模的形式主義運動。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形式主義的革命中，不僅使得新古典經濟學擺脫了經驗現象的約束，更使得新古典經濟學逐漸變變成了一種社會工程學。同時，也在這樣的過程裡，市場的觀念就逐漸地被去歷史化、去制度化、抽象化與絕對化，因而銷融於理論框架之中。

換言之，回到市場觀念的歷史發展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從古典時期到當代，在經濟論述的正統與異端的知識鬥爭下，主流經濟論述為了對抗異端論述的挑戰，不斷地往所謂專門化與科學化的方向發展，而且，也在這個過程裡，市場的經濟原理不斷地獲得相關的知識裝備。為了對抗異端論述的人為性、非現實性與相對性的批判，市場的經濟原理也依序獲得了自然性、先驗性與絕對化的定位。這種為了對抗異端的科學化發展趨勢，更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知識重建中，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只是，諷刺的是，正是基於形式主義革命所取得的科學化知識成就，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所導致的概念框架的錯置與混淆，也就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清楚地呈現了出來。



第七章 結論

一、總結

1985 年，社會學家 Granovetter 發表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鑲嵌問題〉(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一文。在該文裡，Granovetter(1985)開宗明義地否定了“在現代性的過渡中經濟已經分化開來”的論點，並批判既有社會學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與實質學派經濟人類學，對於傳統社會的誤認與對於現代自律市場的肯認(經濟行動在傳統與現代社會的鑲嵌程度，並非是全有與全無)，更提出了“即便在現代社會裡，經濟並非是去鑲嵌的，經濟行動依然是鑲嵌在社會關係裡”等主張。然而，在這篇後來被視為是新經濟社會學宣言的文章裡(Swedberg, 1997)，Granovetter 無疑地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去鑲嵌的經濟想像從何而來？為何在現代性的過渡裡，會發展出“去鑲嵌”的經濟想像，並以單一且自律的市場概念(*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表述之？事實上，對此問題的忽視，不僅導致了社會科學相關概念框架的錯置與日常生活中認知範疇的混淆(特別表現在市場、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等爭議性論題上)，甚至，也使得試圖從鑲嵌命題出發來重構的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新經濟社會學，遭遇到理論發展的內在困境(吳鴻昌, 2009, 2010；湯志傑, 2009a, 2009b；Krippner, 2002；Krippner & Alvarez, 2007)。

換言之，市場觀念的根本問題，不僅涉及了概念與實在的混淆與錯置，亦涉及現代性底下某種看待經濟的特殊方式的形成，更涉及了主流經濟論述的知識發展歷程。因此，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本文試圖以市場(the market)的觀念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並藉此對於現代性的相關問題提出若干的反思。在導論的部分，主要是從現代性議題出發來定位市場觀念與相關知識構作的問題(特別是現代性的“想像”與“想像的”現代性)。藉由現代性與社會科學所具有的莫比斯環關係的相關反省，我們指出，市場的觀念與經濟論述也具有這樣的糾結纏繞關係。為了更進一步具體化這樣的關係，在第一章的部分，透過經濟學的社會工程現象

所引發的爭議，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所造成的理論弔詭，我們將問題導向了所謂市場觀念的絕對化。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不僅表現在市場概念的本質化(概念與實在的等同與貼合)，也表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形式化理論模型所造成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市場觀念不但被去歷史化與去社會化，甚至逐漸銷融於理論視野之中，因而理論框架也在相關問題上產生了混淆與錯置)。因而，在第二章的部分，我們主要是透過現代性之經濟想像的反省(關於市場社會的爭議)，以及主流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的相關討論(經濟論述的表徵模式之後設反思)，來突破市場觀念絕對化所造成的限制。並且，基於 Foucault 對於現代性想像的分析與批判，以及 Bourdieu 對於學院知識的批判性反思，我們也提出了相關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策略的思路。

基於上述的定位，為了回答市場觀念是如何走向絕對化，我們先處理市場觀念的進生。因此，在第四章裡，我們考察了市場觀念在西方古典時期的論述形構歷程。首先，在西方中世紀以前，經濟議題往往被視為是私人家計領域的事務，市場的交易行為往往受到來自宗教法規與倫理訓令的打壓。只有經歷了 16-17 世紀的價格革命與早期現代的危機後，經濟問題才逐漸被問題化，成為當時公共輿論與知識論述的焦點。其次，到了 17 世紀重商主義者手中，經濟問題與經濟論述突破了宗教與法律上的層層束縛，一種具有自主性的經濟領域漸漸地被形構出來，經濟問題也才慢慢地突破既往的家計處理模式。再者，除了經濟問題的轉化以外，市場觀念的進生，還有賴特定知識表徵技術的形構。因此，我們考察了從重商主義的複式簿記修辭學、Petty 的政治算術學與 Quesnay 的“經濟表”等知識表徵技術。透過這樣的考察，我們發現，這些知識技術，不僅使得市場交易活動得以具有倫理上的正當性，也形構了經濟領域所具有的相對自主性與內在律則性。而且，在 Quesnay 的“經濟表”模型裡，市場經濟秩序所被認為具有著整體性與均衡性，更是清楚地展現了出來。最後，基於 Adam Smith 對於系統性原則與歷史性原則的結合，市場的經濟秩序，不僅有了概念體系上的基石(勞動價值說)與經驗波動上的固定參照點(自然價格)，而且也從僅具靜態封閉性的均衡概念，

走向了具動態與過程的秩序想像。因而，到了 Adam Smith 手中，市場的觀念就逐漸地從集市(marketplaces)轉變成單一市場(the market)的概念，市場的觀念也逐漸可以用來表述整體的社會，一種市場社會的整體秩序圖像於是清楚地被形構了出來，這也為市場觀念的絕對化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延續著市場觀念的進生，在第五章裡，我們主要從治理術的角度來處理市場觀念如何成為現代性經濟想像的核心，並逐漸地走向絕對化的發展歷程。首先，自從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誕生以來，市場的觀念就與商業社會的倫理爭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古典時期的經濟論述對於商業領域之內在自然律則的形構，使得市場觀念自始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烏托邦與規範性的色彩，自由放任原則更成為實現此一烏托邦社會的主要工具。只是，在此一時期，市場的觀念與自由放任原則，依然避免不了文明腐敗的憂慮，以及民眾道德經濟學的反抗。其次，在 19 世紀中，市場的相關爭議經歷了文化問題與社會問題的轉折，因而也引發了諸多對於市場社會的對立詮釋。這些在社會上與論述上的對抗，使得自由放任原則開始變得絕對化，這不僅強化了對於市場烏托邦屬性的掩蓋(透過政治經濟學的專門化與科學化)，市場觀念甚至變成諸多對立詮釋所共同承認的前提。同時，社會問題的興起與社會主義的出現，也導致了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錯位，人們不僅從分化的觀點來理解市場觀念的進生，而且，更進一步以經濟為基礎，使得政治領域從屬於經濟領域(這是基於政治問題乃是分配問題的定位)。接著，隨著自由放任原則的實踐所引發的諸多質疑，19 世紀末，經濟學者開始試著將自由放任原則與經濟理論脫勾，因而引發了兩種關於市場觀念的知識變革。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基於科學的學科定位，將經濟學理論框架與市場經濟脫勾，並透過形式主義的知識革命，使得經濟分析不僅可以用來分析市場經濟體制，也可以用來證明政府干預的必要性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弗萊堡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則試圖在對於自由放任的普遍質疑中，對於市場觀念重新予以定位。他們不僅透過對於市場的本質與純粹狀態的討論，以“競爭性秩序原理”來取代原有“市場交換”的概念(強調競爭所具有的規則性)，從而避免了自由放任原則所可能導

致對於市場的誤解。他們更試圖使市場機制成為整體社會生活安排的基本原則(社會的重組與政府的干預都要為了市場的實現)。於是乎，就在這兩場不同立場與態度的知識變革中，市場觀念的絕對化露出了苗頭(新古典經濟學表現了絕對化市場所導致的理論框架的錯置，競爭性秩序原理則表現了市場觀念的本質化)。最後，當芝加哥學派結合了新古典經濟學與競爭性秩序原理後，市場絕對化所導致的錯置與混淆，就在他們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綱領中，清楚地展現出來。簡言之，從古典時期到當代，正是在這些關於市場問題與治理政策的爭議與轉折中，市場觀念逐漸構成了現代性之經濟想像的核心，也逐漸地走向了去歷史化、本質化與絕對化的發展。

除了從治理術角度所作的考察外，在第六章，我們主要是透過理論體系的區隔、學科屬性的爭議與方法論的辯論，來處理市場觀念在如何在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中，逐漸地向絕對化的發展歷程邁進。首先，在古典時期，經濟論述的定位，經歷了從國家理性之學到立法者科學的轉折，也在這個轉折過程中，市場的經濟原理被賦予了自然律則的定位。只是，此一時期，市場的經濟原理依然無法與其他領域的自然法則，以及歷史的演變脫離開來。其次，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基於對於 Ricardo 理論體系的捍衛，市場的經濟原理，不僅開始專門化與科學化，而且透過幾何學的類比，也逐漸取得先驗法則的地位，因而，被認為不必接受任何經驗事實的檢驗。然而，19 世紀中葉，在 Comte 的實證主義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影響下，市場的觀念也開始走向了“相對性的絕對化”。然而，在這種相對化的過程裡，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市場原理，不僅被認為是符合先進工業國家的社會現況，甚至也成為落後國家未來發展的指引。接著，在 19 世紀末，透過經濟學內部的兩場方法論爭議，市場觀念的“相對性的絕對化”即清楚地穩固了下來，成為經濟學界內正統與異端論述所共同接受的立場。只是，這場辯論的最終結果，卻也使得歷史性的思考逐漸消失在經濟理論中。最後，在 20 世紀中葉，隨著舊制度經濟學的衰落與新古典經濟學知識霸權的確立，市場觀念的絕對化就掃除了最後的障礙。1930-1950 年代，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之知識重建過

程中，新古典經濟學擺脫了具體的經驗對象領域，轉向了可以在任何狀況下運用的形式化與公理化科學(基於稀少性問題的普遍存在)，形式化模型也成為經濟學普遍的理論表述形式。就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觀念銷融於理論框架的視野裡，完成了走向絕對化的最後旅程。

總而言之，結合上述三部分的考察，我們或許可以概括出市場觀念的絕對化發展歷程：首先，在古典時期，基於商業的興盛，以及對於神權與王權的反抗，西方論述形構了一種具有內在自主性與律則性的經濟領域，並且用單一的市場概念(the market)來表述這樣的領域(甚至用來表述整體的社會)。而且，隨著立法者科學與自由放任原則的建立，市場的觀念與相關原理被賦予了掃除特權與維護自由的批判性與積極性，而且，逐漸具有了自然律則的地位，市場體制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可欲的且必須實現的烏托邦。其次，隨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建立，在學科內外的社會與知識衝擊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僅越來越傾向於科學化與專門化的自我定位(免除了政治、文化、倫理上的爭議)，市場的相關原理，也被賦予了先驗的幾何學公理的地位(因而免除了上述爭議與經驗檢驗的問題)。然而，19世紀末，隨著自由放任原則的實踐所引發的質疑，以及來自於歷史性經濟論述的挑戰，一方面，主流經濟論述開始試圖與自由放任原則脫勾，並在1930-50年代，進行了形式主義的知識革命(在一般均衡的架構下)；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原理也進行了本質化的重建(競爭性秩序原理)。因而，當本質化的市場經濟原理結合了形式主義的知識表徵技術，市場的觀念也就完成了其漫長的絕對化旅程。

簡言之，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涉及了下面六條重要軸線的歷史與知識轉折：一、從家計到經濟；二、從諸多集市(marketplaces)到單一市場(the market)；三、從自由放任原則到競爭性秩序原理；四、從烏托邦想像到市場社會的實現；五、從立法者的科學到形式主義的革命；六、從自然律則到規範性形式公理。因此，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不僅涉及現代性想像的歷史轉折與知識脈絡的重置(從古典時期以降關於市場社會的諸多爭議與對立詮釋)，更涉及了現代性底下某種特殊看待經濟的知識心態與表徵技術的形成(從立法者的科學到形式主義的工程學心

態)。而且，在這樣的過程裡，市場觀念的絕對化，不僅導致學科概念框架的錯置與日常生活中認知範疇的混淆，也使得現代性的“想像”往往輕易地過渡到“想像的”現代性。

二、市場社會理論的重建與現代性的重估

從上述的總結來看，市場觀念的絕對化過程實則涉及複雜的知識構作歷程。因此，回到現代性的經濟想像與主流經濟論述的糾結纏繞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發現，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所涉及的問題脈絡與概念叢結的翻轉與重置，似乎使得既有社會理論對於現代性之經濟想像與主流經濟論述的批判都失去了應有的力度，因而迫切地需要對於更根本問題的釐清與批判性立場的重建。

針對現代性的經濟想像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市場社會與經濟學社會工程的爭議)，我們不能再停留於對於市場(或資本主義)的道德、政治與文化批評。這些批判往往可能錯置問題的定位(例如浪漫主義的文化與文明的對立中，唯物主義的定位，以及社會主義的批判中，分配問題所導致經濟與政治領域的錯位)，甚至助長了市場觀念絕對化的趨勢(這些批評都非預期地強化了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切割，意即所謂經濟領域的分化)。事實上，自從市場觀念在古典時期產生以來，市場觀念與相應的制度形構就被賦予了內在的倫理意涵(溫柔商業的論題)，而且隨著積極性之自由放任原則的提出，市場觀念與體制更取得了啓蒙的意義與批判的力度(用來掃除既有的壟斷特權與關隘壁壘)。此外，19世紀以降，市場觀念與體制不僅通過了文化問題、社會問題、治理問題等層層的考驗(這些考驗往往模糊了問題的根源，並助長了絕對化的趨勢)，其相應的治理技藝亦從自由放任原則轉換到競爭性秩序原理。然而，在這個市場觀念的絕對化過程裡，市場觀念與體制不但沒有失去其內在的倫理意涵與批判力度(無論在自由放任，抑或自由競爭的名義下)，更取得了對於經濟議題的優勢性的支配地位，成為思考所謂經濟

議題的核心想像¹⁷⁶，甚至成為了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手段(特別表現在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崛起)。因此，對於市場的觀念與體制的批判，我們似乎必須回到市場觀念的積極性與批判性的古典根源，一方面正視市場觀念與體制對於既有社會連帶的拆解與重組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同時，探究壟斷與競爭、自由市場與政府管制是如何在現代性底下弔詭地共生在一起。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留意在古典時期的商業社會爭議中，關於文明腐敗的憂慮(私利的擴張、競爭的惡化、富者的特權與貧者的退化)，以及在市場化的社會工程背後，所隱含關於資格身份(entitlement)的社會條件與實現能力等問題(這表現在民眾的道德經濟學的議題上)(Sen, 1981；Bourdieu, 2000a)。此外，我們更應該當心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所涉及的特殊知識心態與認知框架(特別表現在本質化的競爭性秩序原理)。這種知識心態與認知框架，往往試圖用一種單一的“自由市場”(*the free market*)來表述現代性的經濟面向，這不僅使得自律市場的想像與經驗實在被等同與貼合，更使得我們無法釐清到底是市場的概念表述出了問題，還是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出了問題，因而對於市場的贊成與反對，往往只會陷入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的困境(特別是忽略了壟斷與競爭、自由與計劃的弔詭共生)。

除了對現代性之社會想像的批判外，針對主流經濟學的學科知識想像，我們似乎也不能再滿足於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設的批判(這些批評事實上誤導了問題的根源)。事實上，自從古典時期以來，主流經濟論述就不斷地試圖透過各種知識技術的裝備(特別在學科性質的定位與方法論上的辯護)，來豁免關於市場經濟原理的人為性、非現實性與相對性等批判(相對於市場經濟理論的自然性、先驗性與絕對化等定位)，以抵擋來自於異端經濟論述的挑戰(特別是歷史性與制度性的經濟論述)。而且，這種知識技術的武裝，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主義革命，更是達到了最高峰。因此，對於主流經濟論述的批判，我們必須更正視形

¹⁷⁶ 雖然在主流的經濟論述中，一直存在著凱因斯經濟學的成分，因而不少主流經濟學家，例如從新古典綜合學派到新興凱因斯學派(New Keynesian School)，都會對於市場體制的不完全性提出保留(特別是價格的僵固性問題)，也傾向於強調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但是，如同我們在第六章指出的，這種凱因斯經濟學的成分，乃是一種對於凱因斯革命(對於不確定性的強調與對均衡的質疑)的馴化，市場均衡仍是其主要的參照點，政府的干預只是為了回復這種均衡性而已。

式主義革命所導致理論框架上的弔詭與方法論上的爭議(特別是形式化模型所具有的虛擬性與實在性的爭議)(Mäki, 2005；Yonay & Breslau, 2006)¹⁷⁷，與所伴隨的應然／實然、規範／實證等知識立場的混淆(特別表現在形式模型所導致抽象性與現實性的混淆、規範性與實證性的錯置)¹⁷⁸，以及對於市場律則的規範性與烏托邦色彩的掩蓋。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們也不能只是簡單地透過批判主流經濟論述來發展相關的社會學理論，而是必須以更後設的立場來反省主流經濟論述在問題意識、概念框架與方法論立場上的混淆與錯置。在社會學的傳統裡，無論是 Marx 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Parsons 的舊經濟社會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含納，以及新經濟社會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駁斥，都錯誤地以為主流經濟論述是一種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對象的“經驗理論”，因此只要透過批判其理論(無論是辯證法的重構、結構功能論的補充、鑲嵌命題的駁斥)，就可以發展更具完整性與全面性的社會學理論。事實上，無論古典政治經濟學或是新古典經濟學，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關於市場的“經驗理論”，而是利用了某種特定的抽象方法(演繹推導與數理化建模)來發展所謂的市場原理(幾何學類比與形式化公理)，並且試圖透過社會工程來實現市場的烏托邦。因此，倘若要發展經濟的社會學理論，我們就必須同時以主流經濟論述為考察對象與對話對象，除了關注模

¹⁷⁷ 根據 Mäki 等人所做的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反省，以及 Yonay & Breslau 對於數理經濟學所做的科學社會學研究，似乎都指出了經濟學的形式主義，並不試圖描述與表徵經驗實在，而是試圖模仿自然科學的實驗控制方法，利用思想實驗來凸顯所觀察的經驗現象背後所具有的因果機制(利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假設所設計的虛擬情境，來進行變數的控制與隔離)。因此，在這種形式主義的知識論文化下，不僅引發了關於抽象模型的實在論與非實在論的爭議，而且，更產生了一種弔詭的現象：為了更徹底地掌握經驗背後的因果機制，模型則必須往非現實性的方向發展(為了凸顯內生變數之間的關係)，模型的非現實性越高，則越有可能簡化經驗現象而凸顯背後的因果機制(至於模型的概化與一般性問題，則要看其約束條件是否能放寬，是否具有普遍的應用性)。只是，這樣的模型所建立的因果機制或許具有高度的啟發意義，但是，往往過於輕易地遺忘了歷史的特定性問題與經驗現象的關鍵特徵(Hodgson, 2001)，因而引發了第一章所指出的理論框架的弔詭性難題。

¹⁷⁸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對於社會學而言，新古典經濟學與理性選擇理論的抽象模型，往往展現了某種規範性的色彩(特別是在理性的主觀與客觀的歸屬問題，以及市場均衡是一種規範性期待，還是事實性描述等爭議)，但是，對於經濟學而言，這種形式化抽象模型卻被認為是實證的(因為它分析了經濟現象的主導性行為與背後因果機制)，其重點不在於假設是否具現實性基礎，而在於理論的預測能力(特別是基於所謂的“as if”原則)。此外，對於社會學而言，極具現實意義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對於經濟學而言，反而會被歸屬於“規範經濟學”的領域。換言之，從觀念史與社會理論的角度來看，這種混淆與錯置乃是一種誤把模型的實在等同於實在的模型的謬誤。

型與經驗實在的落差外(這是既有社會學論述主要的理論建構策略)，更必須正視經濟論述對於經驗實在之象徵暴力的包裹與社會工程的干預(特別是上述的落差如何在知識構作與社會實作過程中被忽視、掩蓋與自然化，並由誰支付這個落差的代價)，留心相關分析範疇的歷史意義承載與社會煉金術機制(除了分析實在的經驗性與歷史性形構外，更必須注意概念的歷史意義承載，以及概念與實在在歷史進程中的等同與貼合)(吳鴻昌, 2010:181-182)。

簡言之，現代性之經濟想像與主流經濟論述的糾結與纏繞，實際上涉及了某種特定的知識心態、認知框架與理論立場的形成。這不僅反映了現代性的兩面性(歷史性與概念性)與社會科學之雙重身份(立法者與詮釋者)的混淆與錯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19世紀以降人文社會科學在知識構作上所具有的迷思(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知識表徵模式、意識型態上的迷思)¹⁷⁹。因此，回到現代性的一般問題上，對於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歷程的考察，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現代性之“想像”的知識秘密。基於上述的知識心態與知識迷思，西方經濟論述的抽象模型，已經不再只是單純地描述經驗現狀，反而試圖把經驗實在予以重組以符合模型所述，進而構成、製造與發明所謂的現代經濟體系與實作¹⁸⁰。換言之，現代性的“想像”已經不再單純只是一種轉譯與純化後的論述(cf. Latour, 1993)，現代性關於主體、秩序等想像，已經藉由著相關知識技術的裝備(特別是在特定支配性論述的支撐下)，不僅披上普世性的外衣，更配備了普世性擴張的動力，並且已在非西方的世界中與後殖民的場景裡，激烈且激進的實現著(諸多現代性的社會工程在非西方世界中往往比西方世界來得更為激進且徹底)。從歷史與人類學的視野來看，現代性的“想像”固然起源於西方，但是，在西方的世界裡，依然有著各種對於現代性“想像”的社會制衡力量(特別是各種混雜的存在)與對抗性論述(來自於宗教、道德、文化與政治觀點的批判)¹⁸¹。然而，隨著相關知識心態、知識技術

¹⁷⁹ 關於這一點，請參考第三章註釋65的討論。

¹⁸⁰ 相關的討論，請參考第一章註釋15。

¹⁸¹ 雖然這些批判可能誤置了現代性“想像”的根本問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抗性論述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仍提供了許多緩衝與限制的可能。

與知識迷思的全球擴散(往往透過特定的知識菁英)，現代性之“想像”所內建的象徵暴力(特別是世界觀的強制)，往往在非西方的世界中，會以“現代的太現代”方式，透過各種支配性論述與相應的社會工程來實現“想像的”現代性。因此，對於非西方世界而言，Latour 所謂“我們從未現代過”不僅無法構成對於現代性想像的批判與澄清，反而可能加速了現代性的“想像”往“想像的”現代性的過渡(特別是基於文明／野蠻、進步／落後、啓蒙／迷信等對張關係所衍生出的知識心態)。

從市場觀念的絕對化演進歷程，到現代性經濟想像與主流經濟論述的糾結纏繞，乃至於現代性與社會科學的莫比斯環關係，本論文試圖揭露一個關於現代性的知識構作的秘密。在人類歷史的洪流裡，在日常生活經驗的綿延裡，現代性或許只是一張表皮(林峰燦, 2010)，甚至僅僅佔據薄薄的一層。只是，這張薄薄的表皮，毋寧的是關鍵且致命的。然而，我們是否能穿透這張表皮去梳理其下生命經驗的肌理，是否能不透過這張表皮與相關知識形式去表述歷史的更迭與經驗的綿延，甚至是否能夠更換一張量身訂作的表皮，這些問題，對於身處非西方世界的我們，依然是任重道遠的任務。對於現代性之知識構作問題的考察與反思，或許仍是這個任務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參考書目

- Abbott, Andrew Delano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daman, Fikret, and P. J. Devine,eds. (2001) *Economy and Society: Money, Capitalism, and Transition*.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 Agnew, Jean-Christophe (1986) *Worlds Apart : The Market and the Theater in Anglo- American Thought, 15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dridge, Alan (2005) *The Market*. Malden, MA: Polity.
- Alexander, Jeffrey C. (1978)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A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2):177-98.
- Appleby, Joyce Oldham (1978)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estis, Philip, and Malcolm C. Sawyer,eds. (2004) *The Rise of the Market :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Liberalism*.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 Arrow, Kenneth J., and Gerard Debreu (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3):265-90.
- Arrow, K. J., and Frank Hahn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 Ashmore, Malcolm, M. J. Mulkay, and T. J. Pinch (1989) *Health and Efficiency : A Sociology of Health Economics*. Milton Keynes [Engl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Aspromourgos, T. (1988) The Life of William Petty in Relation to His Economics: A Tercentenary Interpret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3):337-56.
- (1996) *On the Origin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Distribution and Value from William Petty to Adam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Aston, T. H.,eds. (1965)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ssays from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Aston, T. H., and C. H. E. Philpin,ed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bb, Sarah L. (2001) *Managing Mexico: 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ckhouse, Roger E. (1992) How Should We Approach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act, Fiction or Moral Ta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4(1):18-35.
- ,eds. (1994)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Baechler, Jean, John A. Hall, and Michael Mann (1987)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Oxford [Oxfordshire]: B. Blackwell.
- Barber, Bernard (1993)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 Some Notes on How We Got from There to Here. Pp. 217-34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Syste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Barbon, Nicholas (1982) 貿易論。顧為群等譯。北京：商務。
- Barnes, Barry (1974)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arry, Andrew, Thomas Osborne, and Nikolas S. Rose,eds. (1996) Foucault and Political Reason :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and Rationalities of Government. London: UCL Press.
- Bauman, Zygmunt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Oxford: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Polity press.
- (1991)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Polity Press.
- (1993) Postmodern Ethic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1995) Life in Fragments :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1997)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 Becker, Gary Stanley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3):385-409.
- (1996) Accounting for Tas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aniel , and Irving Kristol, eds. (1989) 現代經濟理論危機。張瑞猛，張佩珍，洪惠專譯。台北市：遠流。
- Bénatouïl, Thomas (1999) A Tale of Two Sociolo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3):379-96.
- Benedict, Barbara M. (2001) Curiosity :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son, Robert Louis, Giles Constable, Carol Dana Lanham, and Charles Homer Haskins,eds. (1991)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oronto: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erg, Maxine (1980)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8. Cambridge [Eng.]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g, Maxine, and Helen Clifford (1999) Consumers and Luxury: Consumer Culture in Europe 165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erg, Maxine, and Elizabeth Eger (2003) 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 Hounds 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New York: Palgrave.

- Bergin, Joseph,eds. (2001)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urope 1598-17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Peter L. (1992) *Capital Ideas: The Improbable Origins of Modern Wall Street* New York: Free Press.
- (2008) *投資觀念進化論：避險觀念與現代金融創新*。陳儀譯。台北市：財信。
- Berry, Christopher J. (1994) *The Idea of Luxury :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st, Gary Martin (1982)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Biddle, Jeff E. (1998)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ase of Reproductive Failur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Supplement):108-33.
- (2007) *Research Styl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p. 1-8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Biersack, Aletta, and Lynn Avery Hunt,eds.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ack, R. D. Collison (1960)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Irish Question, 1817-1870*.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 Black, R. D. Collison, A. W. Coats, and Craufurd D. W. Goodwin, eds. (1973)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lanchard, Olivier Jean (1987) "Neoclassical Synthesis". Pp. 634-6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K. Newman. London: Macmillan.
- Blaug, Mark (1958)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a Re-Examin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2):211-26.
- (1963) *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2):151-84.
- (1980)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s. (1991) *The 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 Brookfield, Vt., USA: E. Elgar Pub.
- (1997a)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s*. Pp. 55-65 in *Not Only an Economist: Recent Essays by Mark Blaug*.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1997b)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145-64.
- (2003)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5:145-56.
- Blaut, James M.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loch, Marc (1995) 封建社會。談谷錚譯。臺北市：桂冠。
- Block, Fred L. (2001) Introduction. Pp. xviii-xxxviii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2003)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3):275-306.
- Block, Fred L., and Margaret R. Somers (1984)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Pp. 47-84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31(2):283-323.
- Blyth, Mark (2002)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ckman, J., and G. Eyal (2002) Eastern Europe as a Laboratory for Economic Knowledge: The Transnational Roots of Neoliber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2):310-52.
-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Verso.
- Boltanski, Luc, and Laurent Thévenot (1999) The Sociology of Critical Capac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3):359-77.
- (2006) On Justification :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nnell, Victoria E., Lynn Avery Hunt, and Richard Biernacki, eds. (1999)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ttomore, T. B. (1985) 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 Boston: G. Allen & Unwin.
- Boudon, Raymond (1998)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817-28.
- (2003)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1-21.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1):14-25.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1a) 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 *Sociological Forum* 6(1):3-26.
- (1991b)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 eds.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Polity.
- (2000a) Making the Economic Habitus: Algerian Workers Revisited. *Ethnography* 1(1):17-41.
- (2000b) Pascalian Meditatio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ylan, Thomas A., and Timothy P. Foley (1992)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lonial Ireland: The Propagation and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Econom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oylan, Thomas A., and Paschal F. O'Gorman (1995) Beyond Rhetoric and Realism in Economics : Toward a Reformulation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 Braddick, M. J. (1996) The Nerves of State : Taxation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English State, 1558-171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raudel, Fernand (198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ume 2).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84)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97) 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北京市 中央編譯出版社
- (2002) 1450-1750 年歐洲的價格。見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四卷：16 世紀、17 世紀不斷擴張的歐洲經濟，335-444 頁。張錦冬、鐘和、曼波譯，徐強校訂。北京市：經濟科學出版社。
- Brewer, John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Unwin Hyman.
- Brewer, John, and Roy Porter, eds. (1993)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roadie, Alexander,eds. (2003)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Vivienne (2007) Textu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ntention and Meaning. Pp. 538-52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Buck, Peter (1977) Seventeenth-Century Political Arithmetic: Civil Strife and Vital Statistics. Isis 68(1):67-84.
- (1982) People Who Counted: Political Arithmetic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sis 73(1):28-45.
- Bugra, Ayse, and Kaan Agartan,eds. (2007)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rket Economy as a Political Proje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urchell, Graham,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eds. (1991) The Foucault Effect :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ke, Peter, and Keith Folca, eds. (2006)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ssays from Annal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urrow, J. W. (1966) Evolution and Society: 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tos, William N. (1985) Hayek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2(2):332-43.

Caldwell, B. (1997) Hayek and Soc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4):1856-90.

Caldwell, Bruce (2004) 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 A. Hayek. Lond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dwell, Bruce J., and A. W. Coats (1984) The Rhetoric of Economists: A Comment on McClosk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2(2):575-78.

Callon, Michel (1998)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Pp. 1-57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edited by Michel Call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99)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Market Test. Pp. 181-95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ited by 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Camic, Charles (1986) The Matter of Habi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5):1039-87.

Campbell, John L. (1998)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7(3):377-409.

— (2002) Idea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21-38.

Campbell, John L., and Ove Kaj Pedersen, eds. (2001)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R. H., and Andrew S. Skinner, eds. (2003)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Cardoso, José Luís (2007)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conomic Thought. Pp. 622-33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Carrier, James G.,eds. (1997) Meanings of the Market: The Free Market in Western Culture Oxford ; New York: Berg.

Carrier, James G., and Daniel Miller,eds. (1998) Virtualism :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 New York: Berg.

Carruthers, Bruce G., and Espeland Wendy Nelson (1991) Accounting for Rationality: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1):31-69.

Castel, Robert (2003) From Manual Workers to Wage Laborers :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Ques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7) World in Fragments : Writings on Politics, Societ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Imagin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Figures of the Thinkabl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lk, A. F. (1967) Relativist and Absolutist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South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48:5-12.

- Chandler, Alfred Dupont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 Cipolla, Carlo M (1984) *歐洲經濟史：中古篇*。夏伯嘉譯。臺北市：允晨。
- Clark, Charles Michael Andres (1992) *Economic Theory and Natural Philosophy: The Search for Natural Laws of Economy*.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 Brookfield, Vt., USA: E. Elgar.
- Clark, Gregory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Simon (1982) *Marx,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 From Adam Smith to Max Weber*. London: MacMillan.
- Clery, E. J. (2004) *The Feminization Deb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Literature, Commerce and Lux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oats, A. W. , eds. (1981) *Economists in Government: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he Sociology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 eds. (1997) *The Post-1945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eds. (2000)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007)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p. 507-22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Cockett, Richard (1995)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Think-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 London: HarperCollins.
-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J. N., and M. A. Centeno (2006) *Neoliberalism and Pattern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1980-2000*.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6(1):32-67.
- Colander, David C., and A. W. Coats, eds. (1989) *The Spread of Economic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Charles Woolsey (1943)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D.C. (1957) Eli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1):3-25.
- , eds. (1969)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 (1980) *Mercantilism Revisite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3(4):773-91.
- Collini, Stefan, Donald Winch, and J. W. Burrow (1983)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mons, John Rogers (1962) 制度經濟學。於樹生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Connell, Philip (2001) Romanticism, Economics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udert, A.P. (2011) Religion, Magic, and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Santa Barbara, Calif: Praeger.
- Courtemanche, Eleanor (2005) Invisible Hands and Visionary Narrators: Why the Free Market Is Like a Novel. *Critical Studies* 25:69-80.
- Cullenberg, Stephen, Jack Amariglio, and David F. Ruccio,eds. (2001) Post-Modernism,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Cumming, R.D. (1981) Giving Back Words; Things, Money, Persons. *Social Research* : 227-59.
- Daston, L. (1991) Baconian Facts, Academic Civil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bjectivity. *Annals of Scholarship* 8(3):337-63.
- Daston, Lorraine, and Katharine Park (1998)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Cambridge, Mass.: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 Davis, John Bryan,eds. (1997) New Economics and Its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 Marchi, Neil,eds. (1993) Non-Natural Social Science: Reflecting on the Enterprise of More Heat Than Ligh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e Vries, Jan (1976)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an, Mitchell (1991) The Constitution of Poverty: Toward a Genealogy of Liberal Govern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010) Governmentality :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Dear, Peter Robert (1995) Discipline & Experience : The Mathematical Way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lanty, Gerard (2000)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London: SAGE.
- Deleuze, Gilles (1988)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srosières, Alain (1998)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zalay, Yves, and Bryant G. Garth (2002)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alace Wars: Lawyers, Economists, and the Contest to Transform Latin American State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ckey, Laurence (1986) Historicizing The "Adam Smith Problem": Conceptual, Historiographical, and Textual Issu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3):580-609.
- Dickinson, H.D. (1933)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The Economic Journal*:237-50.
- Dickson, P. G. M. (1967)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New

- York: St. Martin's P.
- Dilley, Roy eds. (1992) Contesting Markets: Analyses of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racti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Dow, Alexander, and Sheila C. Dow (2006) A History of Scottish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Dreyfus, Hubert L., Paul Rabinow, and Michel Foucault (1983)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by, Georges (1980) The Three Orders : Feudal Society Imagin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esenberry, James (1960) Comment 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Pp. 231-34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dited by 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umont, Louis (1977)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Essays on Individualism: 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rkheim, Emil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London :: Macmillan.
- Eagleton, T., and P. Bourdieu (1992) Doxa and Common Life. *New Left Review* 191:111-21.
- Eamon, William (1994) Science and the Secrets of Nature : Books of Secret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benstein, Alan O. (2001) Friedrich Hayek : A Biography. New York: Palgrave.
- Ekelund, Robert B., and Robert D. Tollison (1981) 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 Economic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llege Station, Te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oliticized Economies: Monarchy, Monopoly, and Mercantilism. College Station, Te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82) The Case for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1(4):453-82.
- (1983) Reply to Comments [On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12(1):111-20.
- (1990) When Rationality Fails. Pp. 19–51 in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edited by Karen S Cook and Margaret Lev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6(438):1386-97.
- (1999) Alchem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gelmann, Stephen G. (2003) Imagining Interest in Political Thought: Origin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Erreygers, Guido,eds. (2001) Econo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 Erreygers, Guido, and Geert Jacobs (2005)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the Econom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 Etzioni, Amitai (1988)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London :: Collier Macmillan.
- Evans, Robert John Weston, and Alexander Marr (2006) Curiosity and Wonder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Burlington, VT: Ashgate.
- ,eds. (2006) Curiosity and Wonder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Burlington, VT: Ashgate.
- Evensky, Jerry (1992) The Role of Community Values in Modern Classical Liberal Economic Thought.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1):21-38.
- (1992) Ethics and the Classical Liber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4(1):61-77.
- (1993) Ethics and the 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2):197-205.
- Faccarello, G., eds. (1998)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Frenc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Bodin to Walra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Faccarello, G., and P. Steiner (2008) Interest, Sensationism and 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 French 「Philosophie economique」, 1695-1830.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5(1):1-23.
- (2008) Interests, Sensationism and 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 French 'Philosophie economique, 1695-1830.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5(1):1-23.
- Ferguson, Adam (1999) 文明社會史論。林本椿、王紹祥譯。瀋陽市: 遼寧教育出版社。
- Fetter, Frank W. (1965) The Re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o Economic Hist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1/2):136-42.
- Finkelstein, Andrea (2000) Harmony and the Balanc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2006) The Grammar of Profit: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Intellectual Context ... Conclusion: The Grammar of Profit. Leiden ; Boston: Brill.
- Finley, M.I. (1970) Aristotle and Economic Analysis. *Past & Present* (47):3-25.
- Firth, Ann (1998) From Oeconomy to 'the Economy': Population and Self-Interest in Discourses on Government.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1(3):19-35.
- (2002) Moral Supervision and Autonomous Social Order: Wages and Consumption in 18th-Century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5(1):39-57.
- Fletcher, Anthony, and John Stevenson,eds. (1985)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ntana, Biancamaria (1985)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Society: The Edinburgh Review 1802-1832.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rce, Pierre (2003)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 (1971) Orders of Discour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0(2):7-30.
-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 The Will to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4) *The Use of Pleasur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New York: Pantheon Book.
- (1986) *The Care of the Sel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New York: Pantheon.
- (1991a)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Discourse. Pp. 53-72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1b) Questions of Method. Pp. 73-85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1c)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2003a) *Abnormal: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4-1975*. New York :: Picador.
- (2003b)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New York: Picador.
- (2005a) 古典時代瘋狂史。林志明譯。北京：三聯書店。
- (2005b)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New York: Picador.
- (2006) *Psychiatric Power: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3-1974*.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7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10)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2011) *The Courage of the Truth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II) :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ourcade-Gourinchas, M. (2000) *The 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Economic Knowledge: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Ph.D. Dissertation. Thesis. United States , Massachusetts: Harvard

- University.
- (2001) Politic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ory and Society* 30(3):397-447.
-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Profession: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1):145-94.
- Fourcade-Gourinchas, M., and S. L. Babb (2002)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3):533-79.
- Fourcade-Gourinchas, M., and Kieran Healy (2007) Mor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285-311.
- Fox, Christopher, Roy Porter, and Robert Wokler (1995) Inventing Human Science: Eighteenth-Century Domai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rank, Andre Gunder (2001) 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市：中央編譯社。
- Fraser, W. Hamish (1981) The Coming of the Mass Market, 1850-191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riedman, D.D. (1980) In Defense of Thomas Aquinas and the Just Pri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234-42.
- Friedman, Milton (200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1980) Free to Choose :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Fukuyama, Francis (1993)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李永熾譯。臺北市：時報文化。
- Fullbrook, Edward,eds. (2003) The Crisis in Economics: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The First 600 Day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Furner, Mary O., and Barry Supple,eds. (1990) The State and Economic Knowledge: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gnier, Regenia (1993) On the Insatiability of Human Wants: Economic and Aesthetic Man. *Victorian Studies* 36(2):125-53.
- Gallagher, Catherine (2006) The Body Economic: Life, Death, and Sens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Catherine, and Stephen Greenblatt (2000)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mble, Andrew (1996) Hayek: The Iron Cage of Liber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ane, Mike, and Terry Johnson,eds. (1993) Foucault's New Domains. New York: Routledge.
- Gay, Peter (2008) 啟蒙運動。劉森堯、梁永安譯。臺北縣：立緒。
- Giddens, Anthony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nzburg, Carlo (1976) High and Low: The Theme of Forbidden Knowledge in the Sixteenth

-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ast & Present* (73):28-41.
- Goldstone, Jack A. (1984) Urbanization and Inflation: Lessons from the English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5):1122-60.
- (2009) *Why Europe? :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Gomes, Leonard (1987) Foreign Trad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Mercantilist and Classical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 Goodwin, Craufurd, D. W. (2007)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in the Policy Process. Pp. 606-21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Goody, Jack (2004)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 The Great Debate. Malden, MA: Polity.
- Gordon, Barry (1976)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liament, 1819-1823. London: Macmillan.
- Grampp, William D. (1973)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ts Moral Crit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2):359-74.
- (1982) Economic Opinion When Britain Turned to Free Trad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4(4):496-520.
- Grampp, W.D. (1993) An Appreciation of Mercantilism. Pp. 59-85 in *Mercantilist Economics*, edited by Lars Magnuss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Grampp, William D. (2000)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3):441-65.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481-510.
- Gray, John (1998) *Hayek on Liberty*. New York: Routledge.
- (1999) 虛幻曙光：資本市場全球化的危機。陳碧芬譯。臺北市：時報文化。
- Green, D. R. (1995) From Artisans to Paupers: Economic Change and Poverty in London, 1790-1870. Brookfield, Vt.: Ashgate.
- Greif, Avner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immer-Solem, Erik (2003)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Reform in Germany, 1864-18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swold, Charles L. (1999)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illen, M. F. (2001)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235-60.
- Haakonssen, Knud (1981) The Science of a Legislator: The 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Natural Law and Moral Philosophy:

- From Grotius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s. (1998) Adam Smith. Brookfield, Vt.: Ashgate.
- ,eds. (2006)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cking, Ian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dden, Richard W. (1994) On the Shoulders of Merchants: Exchange and the Mathematical Conception of Na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adot, Pierre (2006) The Veil of Isis :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Natur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hn, Frank (1981)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Pp. 123-38 in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edited by 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New York :: Basic Books.
- Halévy, Elie (1955)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 Boston: Beacon Press.
- Hall, John A. (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Oxford [Oxfordshire] 7: Blackwell.
- Hall, Peter A.,eds. (1989)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3):275-96.
- Halpern, Richard (1991) The Poetic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English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the Genealogy of Capit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mouda, O. F., and B. B. Price (1997) The Justice of the Just Price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4(2):191-216.
- Hands, D. Wade (2001)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Jonathan Gil (2004) Sick Economies: Drama, Mercantilism, and Diseas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kell, Thomas L., and Richard F. Teichgraeber,eds. (1993) The Culture of the Market: Historical Essay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kins, Charles Homer (2005) 12 世紀文藝復興。夏繼果譯。上海: 上海人民。
- Hayek, Friedrich A. von,eds.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London: G. Routledge.

-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1952)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Indianapolis :: Liberty Press.
-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chter, M. (1981) Karl Polanyi's Social Theory: A Critique. *Politics & Society* 10(4):399-429.
- Heckscher, Eli F. (1955) *Mercanti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Heilbron, Johan (1995)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Polity Press.
- Heilbron, Joha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1998)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Dordrecht ; Boston,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ejeebu, S., and D. McCloskey (1999) The Reproving of Karl Polanyi. *Critical Review* 13(3):285-314.
- Helleiner, E. (1995) *Great Transformations: A Polanyian Perspective o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Financial Order*.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48:149-64.
- Heller, Agnes (1999) *A Theory of Moderni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Henderson, Willie, Roger Backhouse, and Tony Dudley-Evans, eds. (1993) *Economics and Langu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enderson, Willie, and Tony Dudley-Evans, eds. (1990)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s: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s Discourse*. London: Modern English Public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Council.
- Henisz, W. J., B. A. Zelner, and M. F. Guillen (2005) The Worldwide Diffusion of Market-Oriented Infrastructure Reform, 1977-199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871-97.
- Henry, John F. (2008) The Ideology of the Laissez Faire Program.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2(1):209-24.
- Herlitz, L. (1993) Conceptions of History and Society in Mercantilism, 1650-1730. Pp. 87-124 in *Mercantilist Economics*, edited by Lars Magnuss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erman, Arthur (2003) 蘇格蘭人如何發明現代世界。韓文正譯。台北市: 時報文化。
- Hicks, J.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5(2):147-59.
- Hicks, John Richard (1953) *Value and Capital :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 Hill, Lisa, and Peter McCarthy (1999) Hume, Smith and Ferguson: Friendship in Commercial Society.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4):33-49.
- Hilton, Boyd (1988) *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795-18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lton, Rodney, eds. (1976)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Himmelfarb, Gertrude (2004) *The Roads to Modernity :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 Hindess, Barry (1987)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Market : Arguments on Social Policy*. London;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Hindess, Barry, and Paul Q. Hirst (1975)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 Paul.
- (1977)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 An Auto-Critique of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Hirschman, Albert O.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2)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4):1463-84.
- Hobsbawm, E. J. (1965) 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5-58 in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ssays from Past and Present*, edited by T. H. Ast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Hodgson, Geoffrey Martin (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8) *Economics and Utopia : Why the Learning Econom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1999)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Northampton, MA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2001)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 Routledge.
- Hoffman, P. T., and K. Norberg, eds. (2008) 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 1450-1789。儲建國譯。上海: 格致。
- Hollander, S. (1965)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st Price. *Kyklos* 18(4):615-34.
- (1969) Malthus and the Post-Napoleonic Depress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2):306-35.
-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Ricardo's Position on Machine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1):105-35.
- Hollander, Samuel (1977) Ricardo and the Corn Laws: A Revis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1):01-.
- Hollis, Martin, and Edward J. Nell (1975)

- Rational Economic Man :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ton, Robert (1997) Bourdieu and Common Sense. *SubStance* 26(3):38-52.
- Holton, R. J. (1985)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 Hont, Istvan, and Michael Ignatieff,eds. (1983)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ver, Kevin, D. (2007) A History of Postwar Monetary 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Pp. 411-27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Hoppit, J. (1996) Political Arithmetic i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9(3):516-40.
- Horne, T. A. (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Poverty: Political Argument in Britain 1605-183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Horrocks, J. W. (1925) A Short History of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 Howey, Richard S (1999) 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晏智傑譯。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Huff, Toby E. (2011)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me, David (1980) 人性論。關文運譯；鄭之驥校。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1984) 休謨經濟論文選。陳瑋譯。北京市：商務。
- (1989) 自然宗教對話錄。陳修齋、曹棉之譯。北京：商務。
- (2002) 休謨經典文存。瑜青編譯、上海市上海大學出版社。
- Hume, L. J. (1967) Jeremy Bentham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0(3):361-75.
- Humphreys, S. C. (1969) Histor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Work of Karl Polanyi. *History and Theory* 8(2):165-212.
- Hundert, E. J. (1994) The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 Alan (1996) Governance of the Consuming Passions: 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1999) Governing Morals: A Social History of Moral Regul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tchison, T. W. (1988)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Oxford [Oxfordshire] :: B. Blackwell.
- (2000) On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Northampton, MA, USA :: Edward Elgar.
- Ingrao, Bruna, and Giorgio Israel (1990) The Invisible Hand: Economic Equilibrium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Israel, Jonathan Irvine (2001) Radical Enlightenment :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1)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 Philosophy,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Jay, Elisabeth, and Richard Jay (1986) Critics of Capitalism : Victorian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vons, William Stanley, and Francis Wrigley Hirst (2001) Political Economy : 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 Houndsill: Palgrave.
- Kadish, Alon (1989) Historians, Economists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adish, Alon, and Keith Tribe,eds. (1993) The Market for Political Economy : The Advent of Economics in British University Culture, 1850-190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althoff, Herbert, Richard Rottenburg, and Hans-Jürgen Wagener,eds. (2000) Facts and Figures: Economic Representations and Practices. Marburg: Metropolis Verlag.
- Kanth, Rajani Kannepalli (1986)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in the Ricardian Era.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 Kaufmann, David (1995) The Business of Common Life: Novels and Classical Economics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for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 Kaye, Joel (1998) Economy and Na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 Money, Market Ex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lley, Donald R.,eds. (1997) History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ochester, N.Y., USA: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 Keynes, John Maynard (1954)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 (2004)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Keynes, John Neville (2001) 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黨國英、劉惠譯。北京市：華夏。
- Khalil, Elias L. (1995) Has Economics Progressed? Rectilinear, Historicist, Universalist, and 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i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7(1):43-87.
- Kittrell, Edward R. (196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olonization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1(3):189-206.

- Klamer, Arjo, Deirdre N. McCloskey, and Robert M. Solow,eds. (1988) *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laver, Claudia C. (2003) *A/Moral Economics: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Author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leiman, E. (1987) ‘Just Price’ in Talmudic Literatur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1):23-45.
- Klein, Naomi (2009) 震憾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吳國卿、王柏鴻譯。臺北市：時報文化。
- Kley, Roland (1994) *Hayek'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łodko, Grzegorz W. (2000)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ot, Gerard M. (1975) T. E. Cliffe Leslie, Irish Social Refor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7(3):312-36.
- (1987) *English Historical Economics, 1870-1926: The Ris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Neomercantilism*.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selleck, Reinhart (1985)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2002)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ippner, Greta R. (2002)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30(6):775-810.
- Krippner, Greta R., and Anthony S. Alvarez (2007)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219-40.
- Kurz, Heinz D. (2006) Whithe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Going Nowhere Rather Slowly?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3(4):463-88.
- Lacher, H. (1999) The Politics of the Market: Re-Reading Karl Polanyi. *Global Society* 13(3):313-26.
- Lakatos, Imre, and Alan Musgrave,eds. (1970)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des, Davi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London: Cambridge U.P.
-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W. Norton.
- Lange, O. (1936)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53-71.
-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Two.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123-42.
- Langer, Gary F. (1987) *The Coming of Ag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25*.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Langholm, Odd Inge (1998) *The Legacy of Scholasticism in Economic Thought : Antecedents of Choice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voie, Don (1981) A Critique of the Standard Account of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5(1):41-87.
-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 Goff, Jacques (1984) *The Birth of Purgatory*. London: Scolar Press.
- (1988) *The Medieval Imag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1) What Did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Mean. Pp. 635-47 in *The Medieval World*, edited by Janet L Nelson and Peter Linehan. New York Routledge.
- (2007) 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周嫻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Lebaron, F. (2006) Nobel Economist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The Circula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3(1):87-101.
- Lemke, Thomas (2002)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 *Rethinking Marxism* 14(3):49-64.
- Letwin, William (1975)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1660-1776*.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Levy, David M. (2001) How the Dismal Science Got Its Name :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Ur-Text of Racial Politic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ie, John (1991)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2):219-35.
- (1992) The Concept of Mode of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4):508-23.
- (1993) Visualizing the Invisible H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Market Society" In England, 1550-1750. *Politics and Society* 21(3):275-75.
- Lightman, Bernard V. (1997) *Victorian Science in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ndenfeld, David F. (1997) *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 The German Sciences of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odewijks, John (2007)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s a Vehicle for the Defense and Criticism of Orthodox Economics. Pp. 655-68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Lopez, Robert S. (1976)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wry, S. Todd (1974)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irculation Concept in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5(3):429-44.
- (1987) The Archaeology of Economic Ideas :

- The Classical Greek Tradi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Ancient and Medieval Economics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Lowry, S. Todd, and Barry Gordon (1998) Ancient and Medieval Economic Ideas and Concepts of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Brill.
- Lynch, Michael (1993)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cfie, Alec (1971) The Invisible Hand of Jupit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2(4):595-99.
- MacKenzie, D., and Y. Millo (2003) Constructing a Market, Performing Theory: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a 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1):107-45.
- MacKenzie, Donald A. (2006)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Magnusson, Lars, eds. (1993) Mercantilist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994)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2007) Mercantilism. Pp. 46-60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Mäki, Uskali, eds. (2002) Fact and Fiction in Economics : Models,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loney, John (1985) Marshall, Orthodoxy and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Malthus, T. R. (1965) 經濟學原理。魯傳鼎譯。臺北市：臺灣銀行。
- (2008) 人口論。郭大力譯。北京市: 北京大學出版社。
- Mandeville, Bernard (2002) 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肖聿譯。北京市: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Mann, Michael (1986,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nheim, Karl (1940)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Studies in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ks, Robert (2002)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7)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

- Fate and Fortune in the Rise of the Wes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arshall, A. (1969) Three Lectures on Progress and Pover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184.
- Marshall, A. and A. C. Pigou (1956)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New York: Kelley & Millman.
- Marshall, Mike G. (2000) Luxu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 Motivation: David Hume, Adam Smith, and J. R. McCulloc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2(3):631-48.
- Marx, Karl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mherst, New York :: Prometheus Books.
- Matthias, Klaes (2007) Historiography. Pp. 489-506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McCloskey, Deirdre N. (1986)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90) 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 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1998) Bourgeois Virtue and the History of P and 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2):297-317.
- (2006) The Bourgeois Virtues: Ethics for an Age of Commer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Kendrick, Neil,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1982)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cNally, David (1988)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Re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ek, Ronald L. (1976)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ikle, Scott (1995) Aristotle's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ger, Carl (2001) 國民經濟學原理。劉潔教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 經濟學方法論探究。姚中秋譯。北京: 新星出版社。
- Mielants, Eric (200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ill, John Stuart (1987)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Fairfield, NJ: A.M. Kelley.
- (1988) The Logic of the Moral Sciences.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 (2000) 論邊沁與柯勒律治。余廷明譯。北京市: 中國文學。

- (2000)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Kitchener, Ont. : Batoche Books.
- (2008) 密爾論民主與社會主義。胡勇譯。長春市 吉林出版。
- Miller, Daniel (2002) Turning Callon the Right Way Up. *Economy and Society* 31(2):218 - 33.
- Miller, Judith A. (2000) Economic Ideologies, 1750-1800: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3(3):497-511.
- Milonakis, Dimitris, and Ben Fine (2009)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Method, the Soci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Minowitz, Peter (1993) Profits, Priests, and Princes: Adam Smith's Emancipation of Economics from Politics and Relig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rowski, Philip (1988) Against Mechanism: Protecting Economics from Science. Totowa, N.J. ;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1989)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Machine Dreams :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The Effortless Economy of Sci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irowski, Philip, and Dieter Plehwe,eds. (2009)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Timothy (1998) Fixing the Economy. *Cultural Studies* 12(1):82–101.
- (2002)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5)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26–41 in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edited by George Steinmetz.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The Work of Economics: How a Discipline Makes Its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2):297-320.
- (2007) The Properties of Markets. Pp. 244-75 i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Wesley Clair (1949) Lecture Notes on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 M. Kelley.
- (1967)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From Mercantilism to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A. M. Kelley.
- Mokyr, Joel (1990) The Lever of Riches :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The Gifts of Athena :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ntes, L. (2003) Das Adam Smith Problem: Its Origins, the Stages of the Current Debate, and One Implication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5(1):63-90.
- Montes, Leonidas (2004) Adam Smith in Context: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Some Central Components of His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ontes, Leonidas, and Eric Schliesser (2006) New Voices on Adam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1998) 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臺北市：臺灣商務。
- Morgan, Mary S. (1990) 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Mary S., and Malcolm Rutherford,eds. (1998) From Interwar Pluralism to Postwar Neoclassic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unck, Thomas (2005)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 State,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urope, 1598-17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yers, Milton L. (1983) 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 Ideas of Self-Interest: 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yles, John F. (2004) From Doxa to Experi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1(2):91-107.
- Nelson, Benjamin (1969) The Idea of Usury, from Tribal Brotherhood to Universal Otherho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eocleous, Mark (1996) Administering Civil Society : Towards a Theory of State 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Nicholson, Colin (1994) Writing and the Rise of Finance: Capital Satires of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eli, Russell (1986) Spheres of Intimacy and the Adam Smith Probl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7(4):611-24.
- North, Dudley (1982) 貿易論。顧為群等譯。北京：商務。
- North, Douglass Cecil (1977) Markets and Other Allocation Systems in History: The Challenge of Karl Polanyi.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6(3):703.
-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ecil,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Denis, P. (1970) J. R. McCulloch: A Study in Classical Economics. London: Allen & Unwin.
- (2004)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Revisit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7) Classical Economics. Pp. 112-29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Ochangco, Armando C. (1999) Rationality in Economic Thought: Methodological Ideas on the

-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 Elgar.
- Olson, Richard (1993)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642-1792.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 O'Malley, L.W. P., and Shearing Clifford (1997) Gogovernmentality, Criticism, Policies. *Economy and Society* 26(4):501-17.
- O'Neill, John (1998) The Market : Ethics, Knowledge, and Politic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Ormrod, David (2003) The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650-1770.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ganelli, M. P. (2008) The Adam Smith Problem in Reverse: Self-Interest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0(2):365-82.
- Palonen, Kari (2003)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Cambridge, UK: Polity.
- Parker, Geoffrey (1979) 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 Parker, Geoffrey, and Lesley M. Smith (1997)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 Parsons, Talcott (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 Paul, Ellen Frankel (1979) Mor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Science: The Demise of Laissez-Fair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Peacock, Alan T., and Hans Willgerodt (1989) Germany's Social Market Economy : Origins and Evolution.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 Peart, Sandra J., and David M. Levy (2007) Post-Ricardian British Economics, 1830-1870. Pp. 130-47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Perelman, Michael (2000)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eter, F. (2001) Rhetoric Vs Realism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5(5):571-89.
- Petty, William (1981) 配第經濟著作選集。陳冬野, 馬清槐, 周錦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2006) 賦稅論。邱霞、原磊譯。北京市: 華夏。
- Picon, Antoine (2003) Utopian Soci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Pp. 71-8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ncus, Steve (1998) Neither Machiavellian Moment nor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Commercial Society and the Defenders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3):705-36.
- Pirenne, Henri (2001) 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樂文譯。上海: 上海人民。

- (2009) 中世紀的城市：經濟和社會史評論。陳國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Pocock, J. G. A. (1985)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A Reissue with a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5) *The Ideal of Citizenship since Classical Times*. Pp. 29-52 in *Theorizing Citizenship*, edited by Ronald Bein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03)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9)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cock, J. G. A., Gordon J. Schicket, and Lois G. Schwoerer (1993) *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1800*. Washington, D.C.: Folger Institute.
- Polanyi, Karl (1947)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Commentary* 3(2):109-17.
- (1968)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 Essays of Karl Polanyi*.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1977) *The Livelihood of M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Pomeranz, Kenneth (2004) 大分流 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邱澎生等譯。台北市：巨流。
- Poovey, Mary (1994) *Aesthe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lace of Gender in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 Pp. 79-105 in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edited by George Levin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95) *Making a Social Body: British Cultural Formation, 1830-186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From New Historicism to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4(1):131-39.
- (2008) *Genres of the Credit Economy: Mediating Value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pkin, Richard Henry (2003) *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Roy (2001) *The Enlightenment*. New

- York: Palgrave.
- Porter, Theodore M. (1986)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Theodore M., and Dorothy Ross (200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stan, M. M. , and H. J Habakkuk, eds. (2004) 劍橋歐洲經濟史 第二卷：中世紀的貿易和工業。鍾和等譯。北京：經濟科學。
- Power, Michael,eds. (1996) *Accounting and Science: Natural Inquiry and Commercial Reas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asad, Monica (2006)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reda, Alex (2007) Sts and Social Studies of Finance. Pp. 901-21 in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edited by Edward J. Hackett, Olga Amsterdamska, Michael Lynch, and Judy Wajcman.
- Psalidopoulos, M., and Maria Eugénia Mata (2002)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in Less Developed Europ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Quesnay, François (1992) 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談敏譯。北京：商務。
- Ramirez, Francisco O. (1988) *Rethink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ntradictions and Movement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Rashid, S. (1993) Mercantilism: A Rent-Seeking Society. Pp. 125-42 in *Mercantilist Economics*, edited by Lars Magnuss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awls, John (1972) *A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ay, Michael John (2004) *Economic Experts and Economic Knowledge*. 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ted States --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Recktenwald, Horst Claus (1978) An Adam Smith Renaissance Anno 1976? The Bicentenary Output-a Reappraisal of His Schola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6(1):56-83.
- Redman, Deborah A. (1997)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eynolds, Susan (1994) *Fiefs and Vassals :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icardo, David (1962)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
- Robbins, Lionel Robbins (1984)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 Roberts, M. J. D. (1998) The Concept of Luxury in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y: Adam Smith to Alfred Marshall.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1(1):23-47.

- Roemer, John E. (1981)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ds. (1986)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ncaglia, Alessandro (2006) The Wealth of Ideas :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per, W. Crosby (1931) The Problem of Pricing in a Socialist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Four Genres. Pp. 49–75 in Philosophy in History: Essay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Richard Rorty, J.B. Schneewind,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anvallon, Pierre (2004) 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楊祖功、曉賓、楊齊譯。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
- Rose, Margaret A. (1991) 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 A Critical Analysi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Nikolas S. (1999) Powers of Freedom :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Nikolas S., and Peter Miller (2008)
- Governing the Present :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Cambridge: Polity.
- Rose, Nikolas S., P. O'Malley, and M. Valverde. (2006)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83-104.
- Rosenau, Pauline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Alexander (1992) Economics--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nberg, Nathan, and L. E. Birdzell (1999)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seveare, Henry (1991)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1660-1760.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Ross, Dorothy (1991)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thschild, Emma (1994)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319-22.
- (2002) Economic Sentiments :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usseau, Jean-Jacques (2007) 論科學與藝術。何兆武譯。上海：上海人民。
- (2009a)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高煜

- 譯。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
- (2009b) *社會契約論*, 又名, *政治權利的原理*。何兆武譯。北京: 商務。
- Ruccio, David F., and Jack Amariglio (2003) *Postmodern Moments in Modern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eschemeyer, Dietrich, and Theda Skocpol (1996) *States, Social Knowledg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Polic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Rutherford, Malcolm (1994)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The I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s, 1918-1947 : Science and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Jeffrey, and David Lipton (1989) Poland's Economic Reform. *Foreign Affairs* 69:47.
-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Samuels, Warren J.,eds. (1990) *Economics as Discourse: An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Economist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 Samuelson, Paul Anthony (1947)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muelson, P. A. (1987) Out of the Closet: A Program for the Whig History of Economic Science.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9(1):51–60.
- (1988) Keeping Whig History Honest.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10(2):161-67.
- Schabas, Margaret (1990) *A World Ruled by Number: William Stanley Jevons and the Rise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2) Breaking Away: History of Economics as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4(1):187-203.
- (2002) Coming Together: History of Economics as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208-25.
- (2003) British Economic Theory from Locke to Marshall. Pp. 171-8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 *The Natural Origins of Economic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moller, Gustav (1936) *重商制度及其歷史意義*。鄭學稼譯。上海市: 商務印書館。
-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9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Schutz, Alfred (1967)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earle, G. R. (1998) *Morality and the Market in Victorian Brit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K.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 6(4):317-44.
-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Oxfordshire] :: B. Blackwell.
- (2001)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apin, S. (1992) Discipline and Bounding: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s Seen through the Externalism-Internalism Debate. *History of Science* 30(90):333-69.
- Shapin, Steven (1994)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apin, Steven, and Simon Schaffer (2006) 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蔡佩君譯。台北市：行人。
- Shapiro, Barbara J. (2003) A Culture of Fact : England, 1550-1720.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hiller, Robert J. (2005)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ionoya, Yuichi,eds. (2001)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he Historical and Eth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s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5) The Soul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ethodological Essays on Schmoller, Weber, and Schumpeter. New York :: Springer.
- Shovlin, John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Luxury, Patriot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 Allan (1990) Friendship in Commercial Society: Eighteenth-Century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6):1474-504.
- Simon, Herbert A. (1957)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Mathematical Essays on Rational Human Behavior in a Social Setting. New York: Wiley.
- Skinner, Quentin (1978)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usen, M. (2005) Vienna & Chicago, Friends or Foes?: A Tale of Two Schools of Free-Market Economics: Capital Press.
- Slater, Don, and Fran Tonkiss (2001) Market Society: Market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 Small, Albion Woodbury (1909) The Cameralists: The Pioneers of German Social Pol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art, Barry (1993) Post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2003)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 Smelser, NJ (1992)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A Theoretical Assessmen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4(4):381-410.
- Smith, Adam (1962) 亞當.斯密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陳福生、陳振驛譯。北京:商務。
-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 (1997) 道德情操論。蔣自強等譯。北京市:商務。
- Somers, Margaret R. (1995) What's Political or Cultural About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Toward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oncept Fo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3(2):113-44.
- Somers, Margaret R., and Fred Block (2005) From Poverty to Perversity: Ideas,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over 200 Years of Welfare Deb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2):260-87.
- Sorenson, Lloyd R. (1952) Some Classical Economists, Laissez Faire, and the Factory Ac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2(3):247-62.
- Spiegel, Henry William (1983)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and Rosalind C. Morris (2010)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David, and Laszlo Bruszt (1998)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Werner (1994) 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U.S.A.: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98a)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n Its Rela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1998b) The Ide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ought: Three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Steedman, Ian (1995) Socialism and Marginalism in Economics 1870 -193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teinfeld, Robert J. (1991) 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 1350-187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teinmetz, George,eds. (2005)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wart, M. A. (1990)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Stigler, George J. (1957) 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5(1):1-17.
- (1960) The Influence of Events and Policies o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2):36-45.
- (1982) *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igler, George J., and Gary S. Becker (1977)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2):76-90.
- Stigler, Stephen M. (1986)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 The Measurement of Uncertainty before 190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oseph E. (1991) 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on <http://www.nber.org/papers/w3641.pdf>.
- (1994)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2002)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李明譯。台北市：大塊文化出版。
- Stone, Lawrence (1967)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New York: Oxford U. P.
- Stroumsa, Gedaliahu A. G. (1996) *Hidden Wisdom : Esoteric Traditions and the Roots of Christian Mysticism*. New York: E.J. Brill.
- Supple, Barry Emanuel (1959)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A Study in the Instability of a Mercantile Econom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wanson, R. N. (1999)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New York: Distributed exclusively in the USA by St. Martin's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1994) Markets as Social Structure. Pp. 255-82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97)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What Is Ahead?* *Acta Sociologica* 40(2):161-82.
- Swetz, Frank (2003) *資本主義與算術：十五世紀的新數學*。彭廣愷譯。臺北市：河中文化。
- Swidler, Ann, and Jorge Arditi (1994)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305-29.
- Taussig, Michael T.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2) *The Nervous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 Taylor, Charles (1991)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F. M. (1929)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8.

- Taylor, James Stephen (1969) The Mythology of the Old Poor La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9(2):292-97.
- Teichgraeber Iii, Richard (1981) Rethinking Das Adam Smith Problem.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2):106-23.
- Thirsk, Joan (1978)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homas, Parakunnel Joseph (1963) Mercantilism and the East India Trade. London: Cass.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3) Customs in Common.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W.W. Norton.
- Thompson, G. (1994) Early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Rhetoric of Accounting Calculation. Pp. 40-66 in Accounting a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edited by Anthony G Hopwood and Peter Miller.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James (1996) Models of Value: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ove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Noel W. (1984) The People's Science: The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loitation and Crisis 1816-34.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Market and Its Crit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1998) The Real Rights of Man. Political Economies for the Working Class 1775-1850. London ;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 Throop, C.J., and K.M. Murphy (2002) Bourdieu and Phenomenolog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2):185-207.
- Thurow, Lester C. (1983) Dangerous Currents: The State of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95) Critiqu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Touraine, A. (2000) Can We Live Togeth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racy, James D. (1985) A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 : Renten and Renteniers in the County of Holland, 1515-15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ibe, Keith (1978)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1) Genealog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 (1988) Governing Economy : The Reformation of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Mercanti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State Formation. Pp. 175-86 in Mercantilist Economics, edited by Lars Magnuss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995)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 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Pp. 23-44 in Adam Smith's Wealth of

-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edited by Stephen Copley and Kathryn Suther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99) Adam Smith: Critical Theoris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2):609-32.
- (2003) Continent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Physiocrats to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Pp. 154-7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Strategies of Economic Order: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95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Historical Schools of Economics: German and English. Pp. 215-30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Tuck, Richard (1979)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 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1572-1651.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Grotius to Kant.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lly, James (1980) *A Discourse on Property : John Locke and His Adversa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Meaning and Context :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1993) An Approach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 Locke in Contexts.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59(4):S251-S278.
- Valdés, Juan Gabriel (1995) 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1990)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Viner, Jacob (1960)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45-69.
- (1972)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Viner, Jacob, Jacques Melitz, and Donald Winch (1978) Religious Thought and Economic Society : Four Chapters of an Unfinished Wor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Vogel, Steven Kent (1996)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on Mises, Ludwig (1991) 反資本主義的心境。夏道平譯。台北市：遠流。
- (2001) 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梁小民譯、左大培校。北京市：經濟科學出版社。

- Von Stuckrad, K. (2010) Locations of Knowledg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Esoteric Discourse and Western Identitie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 Wagner, Peter (1994)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2001a) Theorizing Modernity : Inescapability and Attainability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2001b)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No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2003) As Intellectual History Meets Historical Sociology: Historical Sociolog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Pp. 168-79 in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Gerard Delanty and Engin F. Isin. London ; Thousand Oaks: SAGE.
- (2008) Modernity as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 A New Sociology of Modernity. Malden, MA: Polity.
- Wagner, Peter, Carol Hirschon Weiss, Wittrock Björn, and Wollman Hellmut, eds. (1991) Social Sciences and Modern State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oretical Crossroad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sity Press.
- Wagner, Peter, Björn Wittrock, and Richard Whitley, eds. (1991) Discourses on Society: The Shap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Dordrecht ;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Wakefield, Andre (2009) The Disordered Police State : German Cameralism as Science and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ker, Kenneth O. (1941)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2):168-77.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ds.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04) 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 Waszek, Norbert (1988) Man's Social Nature. A Topic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 Frankfurt am Main ; New York: P. Lang.
- Waterman, A. M. C. (1991) Revolution, Economics and Religion : Christian Political Economy, 1798-18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2007) Mathematical Modeling as an Exegetical Tool: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Pp. 553-70 i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Warren J. Samuels, Jeff E. Biddle, and John B. Davis. Malden, MA: Blackwell.
- Weber, Max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Free Press.

- (1993)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臺北市：遠流。
- (1999) Essays in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eintraub, E. Roy (1991) Stabilizing Dynamics: Constructing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How Economics Became a Mathematical Scien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Will Economics Ever Have a Past Aga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1-14.
- (2007) Economic Science War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9(3):267-82.
- Wennerlind, Carl, and Margaret Schabas,eds. (2008) David Hume's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Whatmore, Richard (2000) Republican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Jean-Baptiste Say'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arrison. C. (1981)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3):517-47
- White, Hayden V.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hitley, R. (1986) The Structure and Context of Economics as a Scientific Field.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4:179-209.
- Wicksteed, Philip Henry, and Lionel Robbins Robbins (1967)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 And Selected Papers and Reviews o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Williams, Raymond (1985) 文化與社會：1780 年至 1950 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彭淮棟譯。台北市：聯經。
- (2003)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台北市：巨流。
- Williams, Rosalind H. (1982) 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liamson, John,eds. (1990)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London :: Collier Macmillan.
- Wilson, G.W. (1975) The Economics of the Just Pri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7(1):56-74.
- Winch, Donald (1965)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lon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The Emergence of Economics as a Science, 1750- 1870. Pp. 507-73 i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II., edited by Carla Cipolla.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 (1978) Adam Smith's Politics : 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Malthu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Riches and Poverty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9) Wealth and Life :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848-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nch, Donald, Patrick Karl O'Brien, and British Academy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Historical Experience, 1688-1914. Oxford: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tztum, A. (1998) A Study into Smith's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Das Adam Smith Problem Revisited.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3):489-513.
- Wood, Diana (2002) Medieval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 Ellen Meiksins (2002)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 A Longer View. London: Verso.
- Wood, Neal (1994)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 Some Early Tudor Views on State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odmansee, Martha, and Mark Osteen,eds. (1999) 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 Stud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Woodward, E. L. (1962) 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ordie, JR (1997) Deflationary Factors in the Tudor Price Rise. *Past & Present* (154):32-70.
- Xenos, Nicholas (1980)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Apolitical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Humanities in Society* 3(3):229-42.
- (1989) Scarcity and Modernity. New York :: Routledge.
- Yack, Bernard (1997) The Fetishism of Modernities : Epochal Self-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Yonay, Yuval P. (1994) When Black Boxes Clash: Competing Ideas of What Science Is in Economics, 1924-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1):39-80.
- (1998)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Institutionalist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nay, Yuval, and Daniel Breslau (2006) Marketing Models: The Culture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Sociological Forum* 21(3):345-86.
- 王國斌 (1998) 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
- 吳鴻昌 (2009) 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計畫：鑲嵌命題的爭議及其反省（上）。*社會理論學報* 12(1): 97-145。
- 吳鴻昌 (2010) 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計畫：鑲嵌命題的爭議及其反省（下）。*社會理論學報* 13(1): 161-194。
- 林峰燦 (2010) 肉體證據：西方巫術論述中身

體觀念的歷史與知識轉折。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湯志傑 (2009a) 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29): 135-193。

湯志傑 (2009b) 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30): 117-164。

葉啓政 (2004) 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台北：三民書局。

蔡博文 (2005) 解構「一隻看不見的手」話語：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反思。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